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劳工的力量

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美〕贝弗里·J.西尔弗 (Beverly J. Silver) / 著

张璐 / 译

张璐 刘建洲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依据国际劳工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新数据库，对劳工运动进行了长历史时段和全球范围的研究，揭示出 19 世纪晚期以来地方的劳工运动与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是相关的。通过对所选的全球工业一种有深度的、实证性的分析，分析了劳工运动的重心在国家之间转移及其与生产的地理分布的关系。作者提出，劳工运动爆发的主要场所在随时间而转移的同时，也随资本发展的新核心的起落而转变，论证了劳工运动（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深深地嵌入世界政治的动态体制当中。纵观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本书剥离出现时代国际劳工运动危机的真正的新内容。为反驳劳工运动已陷入终结性危机，本书最后对 21 世纪国际劳工运动可能出现的新形式做了探究。

贝弗里·J. 西尔弗的这一内容丰富、实证性强、论证有力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阶级性的分析，而这正是目前的学术研究所奇缺的。好！
——列奥·帕尼奇 (Leo Panitch)，纽约大学

为了解读劳工运动，西尔弗通过扩大调查的地域范围，向我们揭示了当劳工运动在北美势弱的时候，却在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顺利地进行。这是对现代政治论证争论的一大贡献。

——萨斯基亚·萨森 (Saskia Sassen)，芝加哥大学

贝弗里·J. 西尔弗的这本新书对于政治经济学家、经济社会学家甚至那些关心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挑战。她规避了“竞次”的悲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依托大量的数据资源和历史学知识，通过资本流动的两个方面来追踪劳工运动的高涨和衰退：资本的空间转移和资本转移到新的生产线——两者都是对劳工运动的反应。包罗万象而又详尽，厚重而又不乏可读性，可借鉴且具有历史视野，这本书把政治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悉尼·塔罗 (Sidney Tarrow)，康奈尔大学

上架建议：世界经济



ISBN 978-7-5097-1421-8

定价：49.00元

劳工的力量

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美〕贝弗里·J.西尔弗 (Beverly J.Silver) / 著

张 璐 / 译

张 璐 刘建洲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美)西尔弗(Silver, B. J.)著；张璐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1421 - 8

I. ①劳… II. ①西… ②张… III. ①工人运动 -
历史 - 研究 - 世界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4976号

·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劳工的力量

——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著 者 / 贝弗里·J. 西尔弗

译 者 / 张 璐

校 者 / 张 璐 刘建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宋浩敏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邓晓春 盖立杰

项目统筹 / 许春山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5.6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字 数 / 341千字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21 - 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 - 2009 - 4566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 Beverly J. Silver 2003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written by Beverly J. Silv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版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英文版译出。

新版《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自五年前推出以来，由于其选材精当、内容丰富、观点多样而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厚爱，始终畅销不衰，其中多部著作已数次再版，成为一个重要品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变化的深刻关注。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 360 多年的历史。不言而喻，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我们既应该研究它的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又应该探索其在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其特征。但世人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他们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当今世界中，世界所有国家无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就需要像其每个成员一样恪守这个体系的市场规则，进行竞争和合作。认真了解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运动态势，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而为世

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出现了无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具体地说，进入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整措施。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性进步浪潮推动下，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增长，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 20 世纪初相比，提高了约 100 倍，大幅度地增强了其综合国力。在产业和劳动力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服务化、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劳动者队伍走向知识化、脑力化、多层次化，其整体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日益提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在运作体制层面上，国家垄断逐步转向国际垄断，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金融杠杆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并推行私有化和兼并等一系列手段来实现跨国资本的垄断。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国家通过税收、福利政策、改善企业组织结构、调节社会再分配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拓展国际贸易的新空间，促进了生产经营、资本流动、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

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先后出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保守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等学说和理论。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上升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占主流地位的学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体制发展的基本原理，或者甚至可

以说是普遍有效的灵丹妙药。但另一方面，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曾一度比较沉寂的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近年来再度日趋活跃。针对新自由主义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和金钱“拜物教”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日趋加剧、贫困化现象愈益严重、失业率和社会犯罪率激增、经济主权不断弱化等恶果，把当代资本主义形象地比作“绞肉机”、“疯狂的赌场”、“金融机器”等论说，以其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论据，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有的论者认为，断言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似乎就能自动地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这种观点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即使是诸如斯蒂格利茨那样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恳切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完整的，或者甚至是一种误导。可以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当前出现的深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危害性的佐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批判使命的本质的认识 and 信念，以犀利的文笔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境遇，揭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种种严重危机和异化现象，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断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其真理性和有效性。他们同所谓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的论调针锋相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终曲”的观点，并且强调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思维的定式，去设想人类的未来。

不言而喻，当代资本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资本主义各国的具体情况及其历史和现实发展各不相同，它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有所区别。正因为如此，欧洲的一些理论家提出了诸如“莱茵模式”即欧洲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美

国模式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之说。国际学术界的各派观点尽管大都认为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对于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由量至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当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新的进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变化及其广度和深度、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客观的认真分析和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对我们有用的经验。但这不是唯一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还要求我们具有科学的态度，认真探索其演变规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其发展。应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的繁荣现象乃是其自我改良和改善的表现，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及其固有的基本矛盾。闭目塞听，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这种极端教条主义固然是错误和有害的。但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违背科学的和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富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在总结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数十种。我们将继续本着以往的宗旨和精神，精心选材，优先选择和出版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论著。同时，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的有关著述，无论中外，即使是一家之言，也均在本丛书兼收之列，以期为我国最广大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尽可能完整的参照，来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元月

中文版前言

《劳工的力量》至今已经有超过 11 种语言的版本出版发行。能为中文版作序言我感到特别荣幸。中国漫长而重要的劳工斗争史对于形成我写作本书的思路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我衷心地希望中文版的读者们能在这本书中找到概念和分析的框架，从而有助于理解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和全球的劳工运动的发展动态。我期待着听到中文版的读者们的反应，并与读者们进行许多有益的交流。

当《劳工的力量》在 2003 年首次以英文出版时，在关于劳工与全球化的文献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的论点是，由于制造业在相对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导致了工人力量和福利状况的残酷的持续恶化，这就是所谓的“竞次”论点。

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中，我强烈反对这一论点。我提出的一个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

描述了一个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即资本为了找寻更为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而不断转移到新的地理场所。然而，这并没有导致简单的“竞次”现象，相反，其结果是在每一个新的资本喜爱的生产地点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和兴起强大的劳工运动。第二章以 20 世纪汽车工业为例描述了这一历史模式；它追溯了汽车大生产连续不断地拓展，从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源地美国，到五六十年代的西欧，再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组被称为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以巴西、南非、韩国为代表）。虽然汽车公司在选择每一个新的投资地点时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预期，但是强大而有效的劳工运动很快就在这些新的投资地兴起。第三章描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世界纺织工业的一个相似模式。总而言之，《劳工的力量》讲述了世界工人阶级（以及工人斗争展开的领域）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地彻底改革自身，而被周期性地创造和重塑的世界劳工史。

《劳工的力量》最初出版之时正值全球制造业资本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我认为，如果以往劳工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能够作为预测未来趋势的指南，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造业迅速扩张的地方将出现强大的新的劳工运动，尤其是在中国。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工人抗议行动，不过这些抗议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抗议，也就是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被创造，却在企业重组和市场改革中由于大规模裁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的抗议。这种由于工人遭受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性”结果而引发的抗争类型（即我称之为“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是《劳工的力量》世界劳工抗争叙事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劳工的力量》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要论点是：资本到哪里，劳工和资本的冲突就会跟到哪里。这一论点所关注的是

一种不同类型的劳工抗争，我将其称为“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这一类型的抗议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抗议，往往在正经历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产业和地区兴起。这些工人阶级是由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的“创造性”一面所形成的。

移民工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这可以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到五六十年代的西欧，到七八十年代的巴西和南非的经历中得到印证。周而复始地，大量涌入的移民工人（乍看起来似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使迅速的工业化成为可能。通常第一代移民工人不反抗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第二代移民工人则成为大规模劳工斗争的骨干力量，并且在争取工人条件的改善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一新工人阶级形成和抗议的叙事也能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动态过程中得以体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个十年间，从农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年轻的农民工很少会公开抗议。大多数的观察家认为这些农民工事实上是中国农村地区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的一部分，鉴于此，大多数观察家预测，要指望这些工人公开地为他们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作抗争（假设他们会的话），那也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大概从2004年开始，一轮罢工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这为我们“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就会跟到哪里”的总论断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2010年夏天中国汽车配件厂和其他工厂的罢工潮为我们这一论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事实上，尽管远非完全一致，2010年中国汽车工人的罢工和《劳工的力量》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汽车工人从3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系列罢工浪潮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所有这些罢工中，罢工的发生都出乎管理层的意料；第二代移民成为战斗的

主力；罢工工人成功地使多家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的结果。这一谈判力量是由于工人在复杂的劳工分工中占据了战略性地位，从而使工业大生产特别容易受局部停工和破坏的影响。例如，1936~193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主要的发动机厂的罢工导致整个通用公司停产。类似的，2010年5月为本田汽车公司的四家整车组装厂生产80%自动变速器的配件厂的一场罢工，威胁到了本田在中国的整个运作。最后，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一系列罢工浪潮都导致了工人们的重要胜利（包括工资上涨，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工会对一线工人的要求更有反应，以及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而且，这些胜利的影响已经超越了那些具体参与罢工的工厂。从许多方面讲，这些胜利标志着一个劳动关系新纪元的开始。

如果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劳动关系的新纪元，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在这一序言中我只能提供一些线索，我希望中文版的读者们会发现《劳工的力量》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有价值，并运用这些工具找到他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

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寻找答案呢？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家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已经作出了妥协让步，例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但是资本家同时也在通过调整生产来寻求打破劳资力量的平衡，使之对资本有利。作为这些调整努力的副产品，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以及工人开展斗争的基础也在周期性地发生改变。为了系统思考这些过程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含义，《劳工的力量》归纳出四种资本面对强大工人运动而作出的普遍反应：（1）将生产地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我将其称为空间调整）；（2）改变生产组织和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比如使用机器人（技术调整）；（3）资本进入新的具有

更高增加值的生产领域（产品调整）；（4）资本完全从贸易/生产领域转移出来，进入金融和投机领域（金融调整）。

事实上，我们已经能够在今天的中国看到前三种资本反应的迹象。关于空间调整，已经有广泛的轶事证据显示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的工厂主已经在中国国内以及更贫穷的国家诸如越南和孟加拉国寻找工资更低的生产场所。这一资本转移的含义对于中国工人而言并非直截了当。相反，我们在对资本地理转移的实际规模或影响作出结论之前需要谨慎。尽管在讲述20世纪资本地理转移时，我在本书中所关注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工控制，我也试图阐明劳动力成本和控制并不是投资决策的唯一决定因素。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资本在高收入国家中的持续投资。事实上，廉价劳动力仅仅是近几十年来资本在中国投资的部分原因。以规划的工业区和市场网络为依托的聚群经济，一支健康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时代公共健康和普及教育的遗产），发展良好的交通运输和物流体系，以及国内市场的规模，这些效应都构成了在中国投资的强烈的动机。事实上，随着工人涨薪，市场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这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更有吸引力。

资本的地理转移及其对劳工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监测的重要过程。如果在《劳工的力量》中所呈现的过去的发展规律与我们理解的未来的发展动态有关，我们可以预期即使资本发生了显著转移，也不会出现简单的“竞次”现象。最近关于越南成功罢工的报告再一次印证了我们关于“资本到哪里，冲突就跟到哪里”的论断。同样，资本在中国境内的地理转移的主要影响将很有可能缩小中国国内的地区不平等，而并不是导致一个在中国国内的“竞次”现象。

也有广泛的轶事证据显示资本家们用技术调整，比如引进节

省劳动力的技术，来应对中国的劳工抗争和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例如，富士康最近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它在中国的工厂里引进 100 万台机器人。资本向更多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转移，将会怎样影响中国和全球劳资力量的平衡？《劳工的力量》再一次认为，不论是空间调整还是技术调整，都没有对工人的力量产生单向的影响。的确，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倾向于减少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从而削弱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力量。但是，这一趋势也倾向于加强工人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因为使用昂贵的机器增加了生产中的任何破坏行为给资本所造成的损失，包括那些由罢工和怠工所造成的损失。正如前文所讨论过的，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在汽车产业的五月罢工中得以体现，而汽车业是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之一。

不过，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进行的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导致了另外一个主要问题，也就是由于全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越来越不相匹配所导致的问题。资本主义摧毁既有生计的速度比创造出新的生计的速度快得多，从而产生了大量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工人。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世界的生计危机。如果不有意地背离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资本主义，尤其是在过去两个世纪席卷全球的、资本密集的、排斥劳动力的西方模式，这场危机就难以解决。

也有显著的轶事证据表明今日中国正在努力追求产品调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有意识地努力使经济重心转向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上明显看出来。尽管一些资本转移到新的产品线的经济活动一直都有发生，《劳工的力量》第三章强调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移，即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主导产业（分别为纺织业和汽车业）的崛起和在全球的普及。我们发现，正如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劳工抗争的最重要的地理场所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转移，作为对每一次空间调整的回答，最重要的产业领域久而久之也在随着划时代的产品调整而转移。更具体地说，我们观察到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劳工抗争的主要中心从 19 世纪的纺织工业转移到 20 世纪的汽车工业。

尽管纺织和汽车工业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 21 世纪的主导产业，即能够为一轮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提供基础。在本书第三章，我做了一些努力，试图识别哪一个或哪一些产业有可能成为 21 世纪的新的主导产业，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劳工运动力量的产业。当《劳工的力量》最初在 2003 年出版的时候，我们能够识别正在经历相对快速增长的新的工业活动，但是难以识别出一个像纺织业和汽车业这样曾经拥有标志性地位的主导产业。

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证据表明如果 21 世纪将有另一轮世界范围的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必须超越资本密集、资源浪费（和依赖矿物燃料）的“美国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生态极限（或许也包括生计极限）。回想起来，不管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诸如风力和太阳能否被看做 21 世纪的领导产业，从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在这些领域里所作的巨大投资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已经广泛地认识到 20 世纪的矿物燃料工业复合体（包括采用机械内燃的汽车工业）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 21 世纪的主导产业可能是什么（假设的确还将存在再一轮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新的主导产业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腾飞。对于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世界劳工运动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含义。纵观历史，新的主导产业总是首先在富裕国家里得以发展。纺织业创新的最初场所是在英国，汽车大生产则是在美国。而且，新兴主导

产业所创造的财富收益绝大部分由它们最初出现的地区所获得。这一规律的结果就是重复制造全球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不加修饰地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富强的国家继续保持富强，贫弱国家继续保持贫弱。

这反过来对劳工运动有重要的含义。本书第二章表明，在整个 20 世纪，伴随着每一次空间调整，十分相似的汽车工人运动在截然不同的国情下产生。然而，第三章发现，尽管资本到哪里，劳工—资本的冲突就跟到哪里，随着连续的每一轮资本的地理转移，冲突展开的阵地也在改变。换言之，与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运动面对着根本不同（和更加困难）的条件。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论点，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检验今日中国和美国新政之间的相似性（及相似性的有限性）。发生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罢工浪潮（集中在大生产工业），其高潮导致了劳工—资本—国家之间社会契约的建立，从而改善了所有美国工人，不仅只是少数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工人的条件。雇主同意认可工会并稳定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使其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美国政府则同意采取旨在保持高需求和低失业率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社会契约在美国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有效，直到 80 年代才被资本和美国政府打破。

是什么条件允许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维持如此稳定的长期的社会契约？部分的解释来源于美国即将成为 20 世纪主导产业的先锋这一事实。在 20 世纪中期的工业大生产领域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因此高利润十分普遍。这些高利润使劳工—资本的协议得以保障。新的领导产业及其产生的高利润也允许产生新的工作，从而弥补了那些由于“技术调整”而失去的工作。

然而，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国家（包括像巴西、南非和韩国等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加入到一般的工业大生产尤其是汽车大生产的行列中。就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也经历了如同美国在三四十年代所经历的那般富有战斗性的劳工抗争的浪潮。这些工人运动也同样赢得了主要的胜利。但是，不像发生在美国的劳工抗争运动，这些胜利通常是短暂的。美国作为创新者所获得的高利润率对于工业大生产的后来者们来说已经不复存在。

当中国（与巴西、南非、韩国相比更是如此）进入汽车和其他制造业大生产的全球竞争时，竞争的压力已经变得很大，利润率已经特别薄。而且，当中国加入全球竞争时，这些行业已经日益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导致了一个矛盾现象，即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工业产量增长率的同时，就业水平却停滞不前。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去简单重复美国所推行的社会契约，因为美国模式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有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新的主导产业所带来的罕见的高利润来为其提供财政基础。事实上，《劳工的力量》第四章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尽管美国宣称所有国家都能发展并达到美国的消费标准，二战后几十年里在美国盛行的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使大多数世界工人无法享受到相同好处的基础之上的。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第一个清楚的信号，表明美国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无法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否则将引起利润率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危机。21 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印证这一论点。

资本主义面对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第四种回应，即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空间调整、技术/组织调整和产品调整之外，就是金融调整（或者说资本从贸易和生产领域中流出而进入金融和

投机领域)。第四章指出了自 1870 年以来具有广泛金融调整特点的两个时期。其中一个时期是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的头几十年(1929 年的华尔街崩盘可作为其终点)。在最近几十年(大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正在经历另一个广泛的金融调整或者说“金融扩张”的时期。

物质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要流入贸易和生产领域而不是金融和投机领域)通常能够增强劳工的力量。然而,正如第四章所示,无论一百年前还是今天,大规模的金融调整都严重削弱了世界工人运动。

与涉及生产地理位置的空间调整和产业地点的产品调整不同,金融调整是资本家从生产投资领域中完全撤出。当然,技术调整(特别是当资本家采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形式时)也促进了劳动力总需求的严重下降和世界范围的主要的生计危机,不过,它们往往会增加那些仍被雇用的工人的工作场所的谈判能力。金融调整则不然。事实上,无论是今天还是一百年前,金融化时期都是阶级不平等急剧增长和财富再分配从劳工向资本大规模转移的时期。

在 20 世纪初,这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即消费不足的危机(由于需求不足)和合法性危机(由于大规模失业和民生凋敝)。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这一双重危机,尽管最初瓦解了工人运动,最终却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高涨的、爆发性的抗议活动,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高潮同时涌现。

我们今天是否正在见证一场相似的危机和相似的反应?我们是否正处于又一个这一时期的边缘,即一个世界范围内高涨的和爆发性的抗议活动、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高潮同时涌现的时期?

今天，正如在 20 世纪前半期一样，我们观察到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并存的现象。我们看到马克思式的抗争，由于物质扩张（以及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而继续在世界某些地区发生，甚至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趋势是在向金融和投机领域转移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20 世纪初的美国与过去几十年的中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再一次有意义。两者都在一个世界趋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时期经历了一轮主要的物质扩张和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但是，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被“消解”的工人阶级的抗议）大概是当前世界劳工的主导形式。众多例子之一就是 2011 年在欧洲爆发的反紧缩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是由主权债务危机骤然引发的，而这些主权债务危机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的当前的金融扩张所导致的债务危机长链条上的最新环节。

当前全球劳工抗争浪潮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世界政治动态发展机制需要被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上。第四章着重分析了 20 世纪劳工运动的命运是如何与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也展示了历次金融扩张是如何与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地理中心的转移相联系的。因此，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金融扩张中，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在当前的金融扩张中，世界经济增长（“物质扩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的中心转移到了东亚。要从后者得出许多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正处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出现深刻危机的时期。

换句话说，从历史上看，金融扩张时期就是现存全球秩序陷入深刻危机而新的全球秩序的轮廓开始浮现的时期。由旧转新的过渡时期总是激烈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暴力的时期，也是人类遭受巨大苦难的时期（想想 20 世纪前半期的情况）。虽然战争的

性质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观点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得以阐述），劳工运动的轨迹仍然继续与世界地缘政治的动态发展机制交织在一起。

解决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计危机，避免国家之间的暴力和战争升级，是 21 世纪工人和世界公民所面临的两大关键性挑战。在历史上，工人的斗争在应对此类挑战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确实，如果世界能在不远的将来走上一条更公平、更可持续也更加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工人正在进行的为争取尊严和正义的斗争无疑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贝弗里·J. 西尔弗教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前言和致谢

本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大约 20 年前为参加第七次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会议而与乔万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共同提交的一篇会议论文, 那次会议由查尔斯·伯奎斯特 (Charles Bergquist) 组织, 在杜克大学举行。那篇论文题为《劳工运动与资本流动: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美国与西欧》(“Labor Movements and Capital Mo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n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这是我们最初尝试去理解不同国家的劳工运动是如何通过世界经济进程尤其是资本的跨国转移, 而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努力。这些年来, 这颗第一颗种子与其他种子融合在一起生长, 并发展成为现在这本书。在写作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 与乔万尼·阿里吉的持续不断的交流给本书的最终成稿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因此, 我首先要学术上对乔万尼·阿里吉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世界劳工研究小组的朋友们, 这个小组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定期在宾汉姆顿大学 (Binghamton

University) 的费尔南·布罗代尔^①中心 (Fernand Braudel Center) 举行聚会。除了我自己, 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有乔万尼·阿里吉、马克·贝蒂尔 (Mark Beittel)、约翰·卡斯帕里斯 (John Casparis)、杰米·F. 丹格勒 (Jamie Faricellia Dangler)、梅尔文·杜波夫斯基 (Melvyn Dubofsky)、罗贝托·P. 库兹涅茨 (Roberto Patricio Korzeniewicz)、唐纳德·凯特力特 (Donald Quataert) 和马克·塞尔登 (Mark Selden)。正是在这个小组的讨论过程中,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要从全球的和历史的视角来认真研究劳工运动, 需要建立新的类型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在已有文献中尚不存在。1986年, 研究小组投入到大规模的数据收集项目中, 并开始建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 [World Labor Group (WLG) database], 本书即是建立在这一数据库的基础之上的。

不久, 我们便发现组建这个数据库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 还要冒难以完成的风险。为了能够在这个项目中投入更多的时间, 我放弃了之前一直努力在做的博士论文题目, 转成做一篇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组建和分析相关的题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特伦斯·霍普金斯 (Terence K. Hopkins, 1928 ~ 1997) 为本书的最终成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还要感谢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他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总是为我提供建议和支持。

我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久, 就和三名研究生一起成立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1902 ~ 1985),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 参与创建了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人类科学院等学术机构。1984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985年11月逝世。著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文明史纲》等。——译注

了一个研究小组，他们是布鲁斯·波多布尼卡（Bruce Podobnik）、马华·萨卡尔（Mahua Sarkar）和内蒂·雷格特斯（Nettie Legters）。1993年我们定期会面，并于那个年底在社会科学史学会（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年会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也越来越确信最富有成果的一种研究方式就是通过对全球几个行业的比较分析来有效推进这个项目。正是在这个小组的这种研究和探讨的背景下，我开始朝着本书的比较研究的框架迈出了第一步，并最终形成了第三章。

这个比较全球工业的研究项目部分地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社会学项目（1993年）的资金支持。这一资助加上1989年的世界社会基金会（苏黎世）的资助，在几个关键时刻为这个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物质鼓励和精神支持。

在过去十年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许多研究生和本科生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我一起为这个项目而工作，包括帮助我更新和扩展WLG数据库。我在此衷心感谢他们所有的人，虽然我也为不能一一列出所有需要感谢的人的名字而深表遗憾。

在20世纪90年代，我投入到了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中，使得这本书在加速完成的道路上不得不有所绕行，不过也让我有机会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动荡与世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项目早在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关于世界霸权比较的研究工作小组时期就开始运作了，其成果集中体现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①（Minnesota, 1999）一书中。我认为这次绕行，使我在本书中对劳工运动、战争和世界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更加深入。

我要感谢许许多多人在2001年春天和夏天阅读了本书手稿并

^①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sota, 1999），中译本由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并于2006年再版，王宇洁译。——译注

提供了详细的评论、建议和支持的人们，他们包括：乔万尼·阿里吉、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拉维·帕拉特（Ravi Palat）、列奥·帕尼奇（Leo Panitch）、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苏耀昌（Alvin So）、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和许宝强（Po-Keung Hui）等等。我还要感谢2001年春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与世界—历史社会学研讨班上的研究生们所提出的有益的评论。作为对这些反馈的回应，我对本书许多地方的论点做了进一步明确和推进（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我还要感谢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建议使用现在这个书名。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晚期开始直至现在。任何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只要涉及当下，就会受到一种强烈的诱惑去不断追赶最近的焦点问题。本书初稿完成于2001年3月，也就是在“9·11”事件之前。本书于2002年春天进入编辑制作，也就是在当年秋天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大型劳工抗争爆发之前。在“9·11”事件之后，我在第一章增加了一段，在第五章加了一个脚注。但是，我还是想今后有机会的话就劳工抗争与“反恐战争”的关系多写点东西，“9·11”事件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证实了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即工人运动的轨迹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发展中。同样的，对于最近在码头工人发生的冲突，也值得我们花精力进行分析，这次事件同样印证了本书的另一个中心论点，也就是运输工人已经而且将继续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劳工运动中占据战略性地位。毫无疑问，在本书付印和呈现给读者前，新的热点问题将会让我萌发继续深入本书有关论据的冲动，但是我希望运用本书所展现的概念性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和将来的劳工运动。

本书献给我的父母罗伯特（Robert）与罗斯·西尔弗（Rose Silver），他们总是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前言和致谢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劳工运动与劳工研究的双重危机	1
第二节 关于劳工与劳工运动的现状与未来的辩论	5
第三节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劳工抗争：概念与 理论框架	16
第四节 研究策略	31
第五节 20 世纪的世界工人：本书概要	48
第二章 劳工运动与资本转移	51
第一节 汽车产业中劳工抗争的世界—历史模式	53
第二节 从美国的弗林特到韩国的蔚山：汽车工人 大罢工浪潮的历史再现	57
第三节 后福特主义的技术调整？	84
第四节 边界划分和“精益—二元”生产模式的悖论	87

第三章 劳工运动与产品周期	94
第一节 汽车产业的产品周期	97
第二节 比较视角中的纺织工业产品周期	102
第三节 产品周期、调整策略与运输产业中的 劳工抗争	122
第四节 一种新的产品调整策略?	129
第五节 结论	152
第四章 劳工运动和世界政治	155
第一节 世界大战和劳工抗争	156
第二节 19 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和现代 劳工运动的兴起	164
第三节 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恶性循环	173
第四节 劳工抗争, 世界大战和殖民地 世界的国家独立	182
第五节 美国霸权、大众消费以及发展主义的 社会契约	187
第六节 从美国的霸权危机到世界劳工的危机	203
第五章 世界—历史视角下当代劳工运动发展的 动力机制	212
第一节 一场冲向底线的竞赛?	212
第二节 南北差距的终结?	214
第三节 工人结构性谈判力量的削弱?	215

第四节 战争与工人权利将何去何从?	219
第五节 新劳工国际主义?	223
附录一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 概念化、测量方法与 数据收集程序	227
附录二 从报纸索引中记录数据的说明	249
附录三 国家的分类	257
参考文献	25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劳工运动与劳工研究的 双重危机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社会科学界几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劳工运动正面临着普遍性的、严峻的危机。已有的文献已经证明了劳工运动的如下几个趋势：罢工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开与激进的劳工斗争日渐消退（Screpanti, 1987; Shalev, 1992）；工会密度^①（union densities）不断下降（Western, 1995; Griffin, McCammon, Botsko, 1990）；实际工资减少；工作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Bluestone 以及 Harrison, 1982; Uchitelle 以及 Kleinfeld, 1996）。尽管大多数实证研究所关注的都是富裕国家（尤其是北美和西欧）的劳工发展趋势，但许多人也意识到：这种危机已经是世界范围的，并且对全球的劳工和劳工运动产生了

^① 工会成员人数占有所有非农业雇佣劳动者总数的百分比。——译注

不利影响。

劳工运动所面临着的普遍而严重的危机，使得一度繁荣的劳工研究领域也充满了危机感。正如威廉·希威尔（William Sewell, 1993: 15）所指出：“由于有组织的劳工阶层似乎越来越无法承担革命话语与改革主义话语所赋予他们的解放者的角色，关于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已经不再具有某种紧迫性了。”（Berlanstein, 1993: 5）

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劳工研究与劳工运动的双重危机是长期性的，并且在结构上与20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几次具有时代特征意义的重大转变密切相关。对某些人而言，这一危机不仅仅是严峻的，而且是致命的。^① 亚里士泰德·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就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所发生的各种转变，带来的是“我们称之为‘工人阶级’这个具有显著社会特征的群体事实上的消亡”。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为‘劳工权利’而斗争的工人正在快速消亡，仅存的斗争者也被看做今天的一个面临灭绝的残余物种”（1995: 28）。同样，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也认为，“信息时代”的来临已经改变了国家主权和劳动者的工作体验，并且以不同方式削弱了劳工运动作为“社会凝聚力和工人代表性的主要来源”的能力。信息时代的来临，还削弱了工人在未来成为解放的“主体”的任何可能性，即构成新的“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的来源，其目的是重建市民社会的各种社会机制。因此，对卡斯特来说，只有基于非阶级认同的各种认同运动，才是“信息时代的唯一可能的主体”（1997: 354, 360）。

^① 原书中为斜体强调，中文版中改为黑体强调。下同。——译注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观察家认为，劳工运动正在日益高涨，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愈演愈烈的针对由当代全球化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动荡的大众反抗运动。这些反抗活动的典型事件之一，是1995年在法国爆发的反对改革的大规模罢工——当时的法国《世界报》更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称之为“第一次反全球化的抗议”（引自Krishnan, 1996: 4）。^① 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会议的时候，抗议活动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使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启动陷于停顿，并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评论家们开始认为，西雅图的示威游行与美国劳联—产联的新激进主义的（组织）立场一起，标志着复兴的美国劳工运动正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Woods et al., 1998；更广泛的讨论，参见Panitch, 2000）。受到这些激进活动的影响，此前总是坚持宣告劳工运动和劳工研究已经消亡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也重新开始对劳工研究产生了兴趣。旨在积极地将学术成果与劳工运动结合起来的新期刊得以创立 [例如《劳动美国》（*Working USA*）]；美国还召开了关于新劳工运动的大型学术会议；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下面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劳工运动的新的分会。^②

对某些人而言，这些新的激进主义和运动（尽管依然分散而微弱）是潜在的第一个信号，预示着一场大规模劳工暴动的大地震即将到来。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抗议活动还显得过于

① 事实上，对于那些其视野超越了北方富裕国家的人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发展中世界里，都可以看到一种浪潮，一种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紧缩政治的“前所未有的国际性（大众）抗议浪潮”（Walton and Ragin 1990: 876-7, 888）。

② 即美国社会学协会劳工和劳工运动分会（labor and Labor Movement, ASA Section），网址为 <http://www.laborstudies.wayne.edu/ASA/>。——译注

微弱和分散，不足以抗拒更为强大和更具有瓦解力量的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

在这些关于未来劳工运动的充满分歧的预见中，哪一个更为可信呢？为了充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与通常所进行的劳工研究相比，我们需要将劳工运动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来展开分析。对劳工运动未来的评价，其基础（不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是建立在对当代世界历史创新性的判断之上。那些认为劳工运动面临终结危机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根本上全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过程已经完全改造了工人阶级以及劳工运动所赖以运作的环境。相反，那些预言重大劳工运动将再度出现的观点则倾向于认为：历史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周期性循环的动力机制的特点，它不断制造出新的劳工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暗示我们，对劳工运动未来的预测，应当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过去特定历史时期的类似动力机制的比较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才能够将历史上所发生的周期性现象，与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区分开来。

本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将对劳工抗争作为世界一历史现象进行研究而引发的各种理论、概念和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予以概述。但是在我们将继续讨论之前，下一节将首先对当代关于目前和未来劳工运动的诸多争论加以考察，以为我们对过去的劳工运动进行研究做好铺垫。第一个争论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即当前的全球化过程，是否已经明确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的劳工和劳工运动在结构上的弱化，并直接导致劳工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冲向底线的赛跑”（race to the bottom）；第二个争论则围绕着全球化是否正在创造出有利于强大的劳工国际主义出现的客观条件而展开。

第二节 关于劳工与劳工运动的 现状与未来的辩论

一场“冲向底线的赛跑”？

劳工运动危机的一种常见解释是：20世纪后期生产性资本的高流动性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迫使全世界工人都在其中相互竞争。就像杰伊·马泽（Jay Mazur, 2000: 89）所指出的，通过将生产迁移（或者仅仅是威胁要迁移）到“世界的另一端”，跨国公司已经给“国际劳工运动”带来了来自“数量庞大的无组织工人”的竞争压力。结果是劳工的谈判力量被削弱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在工资与工作条件方面“冲向底线的赛跑”（“竞次”）开始了（亦可参见 Bronfenbrenner, 1996; Brecher, 1994, 1995; Chossudovsky, 1997; Godfrey, 1986: 29; Fröbel, Heinrich 以及 Kreye, 1980; Ross 及 Trachte, 1990; Western, 1995）。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对劳工运动的最重要影响并非其对工人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而是它对工人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削弱了实际上的国家主权。随着国家变得无力对资本流动进行有效控制，它们保护其公民的生计和工人的其他权利（包括福利国家和实质民主）的能力，也随之被削弱了（Tilly, 1995; Castells, 1997: 252 - 254, 354 - 355）。那些坚持维护对其公民及工人阶级的广泛而昂贵的社会契约的政府，冒着被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最高回报的投资者所完全抛弃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竞次”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通过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其废除

各项社会福利的提供，以及其他束缚资本在其境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政策法规。新欧洲货币（欧元）的艰难问世，被看做该过程的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因未能取消社会保护的种种方案从而以足够快的步伐适应高度流动的资本的需求而遭到了“惩罚”。

这一资本转移的压力给南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压力甚至更大，因为在那些国家，通过重新安排债务支付方法，可以对政府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正如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所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1996：132 - 135）。

对劳工运动危机的另一种重要解释，则强调最近在生产组织和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转变，而不是资本流动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转变（或者说“流程创新”）破坏了工人谈判力量的传统基础。因此，克雷格·詹金斯和凯文·莱西特（Craig Jenkins 及 Kevin Leicht, 1997：378 - 379）就认为，虽然“传统的标准化福特主义大生产体系为劳工及其相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但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则改变了这种组织环境”。此外，全球竞争压力迫使世界各国的雇主争相采取新的“灵活生产”制度，以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作为上述转变的结果，一度稳定的工人阶级被与“分包商和临时就业中介机构的临时和肤浅的关系网络”所取代。其结果是，一个从结构上被瓦解和缺乏组织的工人阶级形成了，他们更倾向于发展“怨恨政治”（a politics of resentment）而非“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会和左派政治”（亦可参见 Hyman, 1992）。

虽然在既有文献中这种“竞次”的论点及其变种流传甚广，我们还是应该对论断世界经济力量正在造成一种全世界工人和工人运动状况普遍向下趋同的观点持谨慎态度。也就是说，对于以上讨论的“竞次”文献中所强调的各种动态机制，都存在着其他的替代解释。就资本流动性而言，“竞次”论点所强调的，是资本为追寻廉价劳动力而从高薪地区向低薪地区流动。然而，与这种观点相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FDI）依然在北方国家内部（即在高工资国家之间）流动。因此，1999年，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有超过75%流向了高收入国家。单是流入美国的外资就高达2760亿美元，超过了流向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中欧和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和——2260亿美元（UNCTAD，2000：2-3）。

当然，工业资本确实是在流向低工资地区，而且对某些行业和地区来说，这一资本流动的规模是巨大的。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论证的，这一资本转移的影响远非“竞次”论点所暗示的那么单向。虽然在生产资本撤离的地方，劳工力量受到了削弱，但是在投资喜好的新地点，新的工人阶级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发展壮大。因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凭借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范围从西班牙、巴西到南非和韩国），也同时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打造出了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反过来形成了强大的、植根于不断扩张的大规模生产行业的新劳工运动。这些劳工运动不仅在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在20世纪后期的民主传播背后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如鲁思·科利尔（Ruth Collier）所言，“（关于民主化）的比较和理论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民主化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会以及与劳工紧密联系的政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些文献中至多只是得到了些许暗示（1999：110）。”^①

此外，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揭示的，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将要看到的，在一些情况下，及时生产（just-in-time）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使用及时生产方法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工人的可靠性是及时生产方法所依赖的基础。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产网络越是全球化，由工人行动引发的生产中断所带来的潜在的地理影响就越是广泛。

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初的观察家们曾经确信，与福特主义相联系的大转变宣告了劳工运动的死亡。因为福特主义不仅使工会化程度最高的技术性工人的技能变得过时了，而且使雇主能够开辟新的劳动力来源，从而导致工人阶级因种族和其他先赋差异（ascriptive differences）而陷入毫无希望的分裂状态，并且彼此还被“绝妙安排的分割和异化技术”所孤立（Torigan, 1999：336 - 337）。只是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会化取得成功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福特主义在本质上能够增强劳工力量，而非削弱劳工力量。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我们又一次

① 关于南非和巴西，参见塞德曼（Seidman, 1994）；关于美国和墨西哥，参见考伊（Cowie, 1999）；关于韩国，参见具海根（Koo, 1993；2001）。亦可参见埃文斯（Evans, 1995：227 - 229）、贝纳里亚（Beneria, 1995）、马尔科夫（Markoff, 1996：20 - 31）、穆迪（Moody, 1997）、阿里吉和西尔弗（Arrighi, Silver, 1984：183 - 216）、西尔弗（Silver, 1995b；1997）。

处在这种事后改变视角的前夕？

最后，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受到了侵蚀，其争论也很激烈。事实上，许多人认为“竞次”是政治冲突的结果，而不是无情的全球经济进程破坏国家主权的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围绕全球化〔尤其是TINA，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的言辞是被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盾牌，以帮助政府和公司推卸其所推行的有利于收入从劳工向资本集中的大规模重新分配政策的政治责任。这一观点认为，劳工运动的斩钉截铁的政治斗争，有潜力去揭露这种“别无选择”的陈词滥调的本质，从而改变意识形态环境，迫使政府转向实行更有利于劳工的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参见Block, 1990: 16 - 18, 1996; Gordon, 1996: 200 - 203; Tabb, 1997; Piven, 1995）。

这种观点，也是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 2001）的观点，他认为在“9·11”袭击事件后，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环境。对格雷德来说，新危机“颠覆了各种虚假的前提，正是这些前提被用来兜售所谓企业主导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各个国家，“至少是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从来“没有失去它们对贸易征税和管理的权力”，它们“只是避免行使那些权力而已”。然而，“9·11”事件要求“主要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主张，开始运用其受到忽视的国家主权，即有目的地干预市场并代表社会行使某些规则”。政府努力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以监控恐怖分子的金钱的行动，必然会引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政府寻求实现其他社会和政治目标的类似努力，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格雷德认为，“战争和衰退产生的爱国力量，给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清醒时刻”和新的“教育与煽动”的政治机会。

回顾过去，2001年的最后几个月是否能被视为“难得的清

醒时刻”抑或是某些其他类型的转折点，还有待观察。^① 无论如何，正如本书第四章将要阐明的，整个 20 世纪劳工运动的历史轨迹塑造了全球政治，尤其是霸权、对抗、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动力机制，并且劳工运动本身也被全球政治所塑造。因此，我们在第五章中关于世界劳工未来的结论，将建立在对世界一历史分析的两项重述的基础之上，即对全球政治动态的分析（第四章的重点），和对嵌入其中的全球经济动态的分析（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双重嵌入性的本质远比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各种情况更为复杂。首先，前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相对于国家主权”的辩论，其表述的形式过于两级化，似乎是认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然而正如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所指出的，国家本身就是“确定新的框架并通过这些框架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1999a: 158; 1999b）。此外，在构建这些新框架时，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因此，就像在文献中所常见的那样，讨论国家主权的总体趋势是毫无意义的。对一些国家来说，全球化是国家主权的施行；^② 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它标志着其主权的长期被削弱或主权不存在的情形出现了新的形式（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

① 事实上，在“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全世界已经计划好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被取消的事实说明，政治机会的消逝，至少与其到来表现得同样明显 [《劳工记录》（*Labor Notes*），2001: 3; Reyes, 2001: 1 - 2; Slaughter 及 Moody, 2001: 3]。

② 强大的国家在多重压力下行使这种主权，包括来自全球工人和其他次属群体的斗争的压力。事实上，第四章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本身是美国国家主权的行使）之后所构建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在其中嵌入某些相对“有利于劳工”的要素，正是因为有这些斗争的压力。同样，强国现在所“建立起的推进全球化的新框架”，只有当它们能够感受到类似的自下而上的挑战时，才有可能在这一新结构中引入有利于劳工的要素。

主义再到全球化)。这反过来又对围绕劳工国际主义的辩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劳工国际主义？

我们在上一节里讨论的许多主题，在关于 21 世纪初是否正在出现有利于强有力的劳工国际主义的条件条件的辩论之中，再次浮现出来。事实上，这场辩论的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在造成旧的劳工国际主义危机的相同进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的种子。根据这种观点，在“生产全球化”的过程中，两极分化的趋势现在主要表现在各国国内而不是在各国之间，因此，南北之间的分化日益变得无关紧要（Harris, 1987; Hoogvelt, 1997; Burbach 和 Robinson, 1999; Held 等, 1999; Hardt 及 Negri, 2000）。一个具有相似（且令人不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单一而同质的世界工人阶级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用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和杰瑞·哈里斯（Jerry Harris）（2000: 16 - 17, 22 - 23）的话说，当前的跨国进程正在“导致世界加速分化为全球资产阶级（或者说跨国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这一跨国资产阶级日益成为“追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事业……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而“跨国工人阶级”（尽管“还不是一个自为阶级”）则日益成为一个“自在阶级”，从而为劳工国际主义提供了客观基础。

事实上，许多观察家和抗议的参与者认为，反对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始于 1999 年 11 月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正是这种新劳工国际主义出现的初步的征兆。根据《国家》（*The Nation*）（1999: 3）的一篇社论，西雅图抗议标志着“新型政治的里程碑”，美国劳工运动在其中“摆脱了其国家主义而采用了国际主义和团结一致的新措辞”。在西雅图抗议之

后，杰伊·马泽尔（Jay Mazur，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组织联合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认为，“分裂并非存在于南北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极度集中的资本及其所支配的政府之间”（2000：92）。

此外，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生产不仅造就了生活和工作条件日益相似的世界工人阶级，而且往往也造就了面对相同跨国公司雇主的世界范围的劳动力大军。利用企业帝国一个地方的工人打击另一个地方的工人的威胁，使得劳工运动活动家和观察家意识到，工人必须成立在地理范围上与其跨国公司雇主旗鼓相当的组织（Mazur，2000；Cowie，1999；Moody，1997）。国家主权的缩减会进一步增加这种要求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国家主权相对于超越国家的行动者在实际上已经被严重削弱的话，显然工人一味针对他们本国政府提出要求将很难或者根本得不到满足。如果力量的真正较量现在已经处于超越国家的层面上（无论是以私营跨国公司的形式，还是以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的形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劳工政治也必须提升到超越国家的层面上来。

尽管存在着上述观点，在得出我们正在迈向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的世界形势的结论之前，我们需要慎之又慎。首先，最近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一项实证研究并不完全符合出现同质的全球工人“自在阶级”的情况。该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依然占据着世界总体性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其比例范围约在74%~86%（Milanovic，1999：34；Korzeniewicz及Moran，1997：1017）。同样，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的更直观的计算表明，第三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平均数，依然只是第一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数的一小部分：1960年为4.5%，1980年为4.3%，而1999年为4.6%（根据世界银

行的计算，1984，2001；参见 Arrighi, Silver, 以及 Brewer, 2003)。这一关于收入极端不平等的发现本身并未削弱以下论点，即属于同一个跨国公司雇主的工人在行动上采取国际合作策略是有益的。尽管如此，它确实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要“证明存在着一个（工人）命运的实际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损害他人意味着损害自身（Levi 和 Olson, 2000: 313）——依然是劳工国际主义所面临着的一项不可低估的挑战。

主张推动劳工国际主义的论点部分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全球劳工运动才能有效地完成挑战各类全球性组织与制度的任务。但是，对于那些认为国家主权的衰减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相信国家（至少是一些国家）依然有力量保护其工人阶级的那些人来说，致力于国际劳工团结并非劳工运动所拥有的唯一的或者说最好的政治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最有效的劳工运动战略是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实行有利于工人的各项政策。^①

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同意某些强大的国家是决定全球化变数的关键行动者（而其他国家实际上无能为力），那么，对劳工运动而言，这些强大国家就是最有战略意义的目标。从这一视角来看，强大国家的工人—公民，与那些不太强大的国家的工人—公民的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在参与政治斗争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些政治斗争旨在向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即实际上有力量改革超越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的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这

^① 这并不排除为了帮助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而试图动员国际团结的情况，譬如，凯克和辛金克（Keck, Sikkink, 1998: 12 - 13）所讨论的“飞去来器”战略中所出现的情形就是如此。在梳理国家—国际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同组合时，道格·伊米格和悉尼·塔罗（Doug Imig and Sidney Tarrow, 2000: 78）对抗议动员的层面以及抗议目标的层面的区分是相当有用的。

些强大国家的工人—公民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殊优势地位，以符合全世界工人利益的方式，成为劳工国际主义的排头兵。不过，南北收入差距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北方工人旨在改革超越国家制度的斗争，是更有可能成为迈向形成全球工人阶级的“自为阶级”的一步，还是新形式的国家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

事实上，参与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第三世界代表对示威活动的解释是这样的，即与其说它是新劳工国际主义的证据，不如说是对北方劳工与北方政府结盟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议程的表述。^① 就在这次世贸组织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第三世界国家一致通过决议，反对在贸易协议中加入要求更高标准的劳动和环境的社会性条款。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加入这些社会性条款并不是国际上关心第三世界工人福利的表述，而是设置壁垒阻止第三世界出口品进入富裕国家的新方式——是“在理想主义伪装下的贸易保护主义”（Dugger, 1999）。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遵循基本劳动标准的提议也遭到了南方工会活动家的“意外抵制”，表现为：参加2000年4月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大会的南方代表们认为，对违反劳动标准的制裁，有可能成为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Agence France-Presse 2000）。

简而言之，人们对当前的国际劳工政治的趋势与事件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将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介入这场争论。例如，第二章和第三章将揭示，工业生产的全球化如何构成了一个矛盾的过程，造成了地理上分散的工人阶级在物质状况方面同时迈向

^① 在11月30日示威活动之前1个月，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与一批商界领袖，在支持克林顿政府关于世贸组织谈判的贸易议程的信件上签字（Moody, 1999: 1），这一事实无疑支持了这种观点。关于导致西雅图事件的南北紧张关系，参见奥布赖恩（O'Brien, 2000: 82-92）。

趋同和分化，这一矛盾过程，对劳工国际主义的过去和未来也具有类似的矛盾性影响。^① 第四章将通过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劳工运动、国家主权和世界政治的审视来重述这一进程。它将表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彼此敌对和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工人—公民相对其政府的谈判力量有所增长，因为在战争机器中工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工业和战场前线）的齿轮。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由于工人在武装斗争中有效地运用了这种被增强的谈判力量，各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扩大工人作为公民和工人的权利，来确保工人的忠诚。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 H. Carr）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著作中指出，这种将工人整合进民族国家事业中的做法，是19世纪劳工国际主义垮台的根源。在19世纪，“当国家属于中产阶级而工人没有祖国的时候，社会主义是国际的”。不过，对卡尔说来，“1914年的危机转瞬间表明……大批工人本能地知道在他们的面包的哪一面涂有黄油（即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力量那一边）”。因此，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社会主义不光彩地消亡了”（1945：20-21）。

当前的全球政治状况是否再度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新阶段的蓬勃发展？从目前所讨论的情况看，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判断当代国家主权的性质、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以及南北分化的性质。因为即便（一些）国家拥有实行“对劳工友好的”政策的实力，工人是否也拥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政府代表他们运用这种实力？而如果一些工人确实也拥有这种必要的力量，他们会不会使用（政府会不会响应）这种力量来巩固或破除南北分

^① 本章第三节将讨论工人状况同质化的趋势是否真的有利于在不同国家、种族等的工人之间发展劳工团结的问题；在劳工国际主义的大部分“乐观主义”文献中都假定情况确乎如此。

割呢？或者，如果工人不再拥有影响其政府所必需的谈判力量，他们是否会再度发现自己没有“祖国”，而劳工政治也将再度“本能地”转向国际主义？

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回到所有这些问题上。不过，它们的答案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因此，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确定一些分析工具，来分析工人谈判力量的源泉与性质及其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转变。

第三节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劳工抗争： 概念与理论框架

工人力量的源泉

关于世界劳工状况的诸多争论是基于当代全球化对工人谈判力量所产生的影响的不同假设。埃瑞克·奥林·怀特（Eric Olin Wright, 2000: 962）对组织性和结构性力量的区分，为我们辨别不同类型的工人谈判力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组织性力量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和政党。与之相对应，结构性力量简单说就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怀特进一步将结构性力量划分为两种子类型：第一种子类型我们称之为市场谈判力量（marketplace bargaining power），它是直接源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的力量。第二种子类型我们称之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它“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能；（2）总体失业率较低；（3）工人具有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依靠非工资性收入生存下去的能力。^①从另一方面说，紧密嵌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具有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即某一个关键节点的工人的停工，能够造成远比这一局部停工本身更为广泛深远的破坏性影响。例如，整个装配线由于某一个部门的工人停工而中断，或者铁路工人罢工造成整个依赖于及时运送零配件系统的公司陷于停顿，都体现了这种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②

那些认为全球化给劳工运动带来了严重的甚至是终结性危机的人，也认为全球化的各种影响瓦解了所有形式的工人的谈判力量（参见第二节）。在这一观点看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后备劳动力大军的调动创造了一个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的确是被削弱了。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农业和制造业的全球扩张，导致非工资收入的来源在不断减少，从而迫使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无产者，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了。最后，全球化通过削弱国家主权，也削弱了工人的组织谈判力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人的组织力量已经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以确保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雇主有同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义务。这种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反过来也进一步削弱了工

① 关于第三种形式的市场谈判力量，参见埃瑞克·欧林·怀特“什穆的寓言”的有关讨论（1997：4-9）。亦可参见阿里吉和西尔弗（1984：193-200）。

② 关于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参见阿里吉和西尔弗（1984：193-5）。与之相类似的概念，参见爱德瓦兹（Edwards, 1979）“技术控制的局限性”和皮尔润（Perrone, 1984）的“位置力量”（positional power）。后一概念也被沃伦斯、葛瑞芬和罗宾（Wallace, Griffin, Rubin, 1989）所用。亦可参见冲提的相关著述（Tronti, 1971）。关于第三世界出口产业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参见伯格区斯特（Bergquist, 1986）。

人的市场谈判力量。而这种市场谈判力量，过去曾经在国家福利政策所形成的“社会安全网”和限制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保护之下得到加强。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既削弱了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又破坏了其结社力量；反之亦然。因此，全球性劳动力后备大军的调动不仅直接破坏了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而且也通过增加现有的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为其成员谋福利的难度，而使得这些组织在许多工人眼里逐渐失去了正当合法性。此外，雇主和国家对工人组织的直接攻击（伴随着战后社会契约的瓦解），直接破坏了工人的组织力量。他们还通过增加工人组织得以成功维护或扩展国家“社会安全网”政策的难度，而进一步侵蚀着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

如果说，人们普遍认为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削弱了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和组织谈判力量，那么，相关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和劳动过程的转变，则被普遍看做对劳工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破坏。因此，转包生产和其他形式的对垂直一体化的分解被认为是逆转了历史趋势，即由于福特式大生产体系的扩展而不断增强的劳工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福特主义增加了资本对工人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脆弱性，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当然，持续流动的生产（包括装配线）通过同质化和去技能化，也削弱了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从而使资本有可能（实际上更倾向于）使用潜在的、缺乏工业生产经验的后备劳动力。而且，持续的流动性生产将一大批无组织的工人变成无产阶级，而这些新的非技术工人很难被吸纳到已有的技工工会或者是左翼政党中去，这难免削弱了工人的组织力量。

虽然如此，劳工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在多个层面都有所增长。首先，很明显，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以及在随后几十年的广

大地区所不断发生的情况都清楚表明，装配线可以使具有战略地位的数量相对较少的工人激进分子破坏整个工厂的产出（参见第二章）。其次，随着某一公司里多家工厂之间生产整合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家生产关键输入部件的工厂的罢工，能够使整个工厂乃至整个公司陷于停顿。最后，随着生产的不断集中化和集权化，由于某一关键公司或产业的罢工所造成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也在不断增长（例如，联结各个工厂和市场的交通运输业）。对于那些在国家所极度依赖的外汇交换产业中工作的工人而言，情况尤其如此。正如查尔斯·伯格区斯特（Bergquist, 1986）所论证的，那些在主要出口产业以及相关交通产业工作的数量相对较少的第三世界的工人，具有破坏公司、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能力。^①

生产组织中所发生的各种后福特主义的转变，究竟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削弱了劳工的市场、工作场所和组织谈判力量——正如当代大量分析所暗示的——这些问题是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将要探讨的中心论题之一。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还将探讨另一种可能性，即在工人的谈判力量和工人实际使用该力量为争取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斗争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关于全球化和劳工研究的文献中，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工运动危机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结构性客观条件的转换所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推论性环

① 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般性强调不同，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所指向的是一种关于生产的集中化（集权化）与劳工谈判力量之间的不同关系（例如，Wright, 1997）。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更为强调资本的集中和中心化对工人组织力量的影响，即通过使大批工人在生产中互相接触和互相依赖，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人集体意识和集体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不论是那一种观点，它们都普遍认为，垂直一体化的瓦解和生产分割的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削弱了劳工的力量。

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尤其是那种相信“别无选择”的观念，对于劳工运动具有强大的瓦解力量。正如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劳沃德（Frances Piven 及 Richard Cloward，2000：413 - 414）所指出的，“力量的信念”本身就是工人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对工人的动员一直被这样一个信念所鼓舞，即工人拥有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且他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力量，来改变其工作、生活条件，使其向着更好的方面发展。他们认为，全球化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这个维系了一个世纪的对工人力量的信念”，并且创造了一个极度瓦解劳工的政治斗志和为改变现状而进行斗争的意愿的话语环境。工人信念的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结构性和组织性谈判力量的变化，但是毫无疑问，这一信念转变本身也影响着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

为了辨别和理顺这些各种形式的工人谈判力量是怎样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的分析将在两组假设的指导下展开，这两组假设所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和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假设都关注在将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不过，第一组假设围绕着将劳动力转变为商品这一过程在时间上的不平衡而展开；第二组假设则关注该转变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以下我们将依次对每一组假设予以简要的验证。

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

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波兰尼为我们审视劳工运动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得出结论说，劳动力是一种“虚拟的商品”，任何将个体当成“彼此等同的”商品加以对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深切

不满和反抗。但是，就像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强调的是凸显历史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工抗争发展的阶段式性质（stage-like nature）；而我们对波兰尼的解读，强调的则是劳工抗争的钟摆式性质（pendulum-like nature）。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出于论证的目的）假设，劳动力市场服从于“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的原则，因此，劳动力可以通过体现其全部价值的工资（即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而自由交易。然而，劳动力的购买者很快就会发现，劳动力并不是一个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其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力商品是内在于人类之中的，而人一旦受到过于漫长、过于严酷或过于紧迫的驱使和逼迫，就会抱怨和抵抗。于是，从理论上说，斗争成为生产环节中劳工—资本关系的内生的常见形态。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表现出其虚拟特征，那么，对于波兰尼而言，劳动力的虚拟（以及从而僵硬的）性质，在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是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因为它们要么不是通过生产而产生的（土地），要么其被生产出来的原因并非为了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劳动力和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无异于组成每个社会的人本身和每个社会存在其间的自然环境；将它们整合到市场机制中去，就意味着使社会在实质上从属于市场法则。”（Polanyi, 1944: 71）

所以，对波兰尼而言，缺乏约束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虚拟商品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将激起一种相应的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波兰尼称之为“双重运动”（1944: 130）。每

一次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深化，都受到这样一种动员的反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机制来调节和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市场”，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和工会等（1944：176-177）。但是，只有在一个将提供生计置于追求利润之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相对的、对劳动力去商品化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解决之道。

波兰尼的分析，为我们审视 20 世纪劳工运动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钟摆式的运动。当钟摆摆向对劳动力的商品化时，就会激起强烈的、要求保护劳工的反向运动。所以，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早期，市场的全球化导致了工人和社会组织中一次强大的反向运动（参见第四章）。作为对不断上升的劳工激烈斗争的回应，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钟摆摆向了对劳动力的去商品化的一端。各国以及国际上纷纷建立社会契约，它们将劳工、资本和国家联结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工，使其免受不受约束和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的损害。但是，这些保护生计的社会契约越来越被认为是资本利润增长的一种束缚——而这个束缚在 20 世纪晚期的全球化浪潮中被打破了（参见第四章）。如果我们通过波兰尼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全球化过程，就可以期待新一轮钟摆的反向运动。事实上，当代的无数分析者都将波兰尼（1944）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分析作为理论基础，用来解释当前对全球化的强烈的反冲式抵抗，并以此来预测未来（正在增长中的）反冲式抵抗（或反向运动）（参见 Kapstein, 1996: 16-28; 1999: 38-39; Rodrik, 1997; Mittleman, 1996; Gill 和 Mittleman, 1997; Block, 2001; Stiglitz, 2001; Smith 和 Korzeniewicz, 1997）。

在波兰尼的分析中，自我调控的市场扩张之所以激起了抵

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颠覆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并被广为接受的关于生存权利的社会契约——换言之，是一种“非正义感”引发了这些抵抗。但是，在波兰尼的分析框架中，“力量”这一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因为在波兰尼的分析中，一个不受约束的世界市场最终将被“从上而下地”推翻，即便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们缺乏有效的谈判力量。这是因为，自我调控的全球市场不过是一个“乌托邦”规划，就其自身而言它是无法维系下去的——其崩溃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崩溃是从上而下发生的，无论来自底层的抗议是否有效。^①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不仅重视工人的谈判力量，而且还强调不公平感在确认资本的局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同时制造了不断增长的大众苦难和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力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离开了劳工资本便什么也不是；并且，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导致了劳动力拥有者的力量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强。譬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进步如何不仅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落魄和被剥削，而且还导致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和其反抗剥削的倾向。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1959：763）。该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述：“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

^① 该结论在波兰尼对20世纪30年代的分析中多少被削弱了，因为波兰尼的分析同时也暗示，关于不可避免地自由市场的终结，其终结最后将采取何种方式（譬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罗斯福新政），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本质和力量很有可能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的脚下被挖掉了。”（1967：93 - 4）马克思的阐述认为，尽管“工业的进步”可能会削弱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但会增强劳工在工作场所中的谈判力量以及组织力量。

在关于劳工研究的文献中，马克思的论述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的批评，尤其是它已经成为所谓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基础，即以¹一种概括性的线性叙事方式，认为无产阶级化必定导致阶级意识和（成功的）革命行动（关于这一批评可详见Katznelson和Zolberg，1986）。但是，如果通读《资本论》第一卷，我们就会发现，书中很少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是线性增长的，而是和当代的动力变化机制相对应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描述。其中，劳工反抗生产中的剥削，资本则不断以革新生产和社会关系来克服这种抵制。在每一次革新运动中——从手工业到工厂体制再到机器大生产，工人所具有的旧形式的谈判力量虽然被削弱了，却获得了一种更广泛和更具破坏性的新形式的谈判力量。

马克思的论述让我们有理由预测，工人阶级和劳资冲突的形式将会不断发生转变。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革新可能会导致工人阶级中某一部分的解体，甚至会将其中的某一部分变成“濒危物种”，正如当今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各种毫无疑问的转变一样（参见第一节）。但是，与各种新要求 and 新的斗争形式相伴的，是新的斗争主体和冲突场所的出现，体现出劳资关系发展的领域也正在发生转换。所以，波兰尼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钟摆式的运动（或者说是重复），而马克思的观点则揭示了一系列连续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生产的组织方式（并因此而导致的工人阶级及其斗争领域）一直都在发生着持续而根本性的改变。

通常，研究者们倾向于过于僵化地去辨析到底谁是工人阶

级——是 19 世纪的手工工人，还是 20 世纪的大生产工人，而认为劳工和劳工运动处于不断形成和再形成过程之中的见解则为此提供了一副重要的解药。因此，我们应该放眼关注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早期迹象以及由那些正在“被消解”的工人阶级的抵制而引起的“反冲抗争”运动，而不是把他们看做所谓的“历史性替代”运动（Castells, 1997）或者是一个“残余的濒危物种”（Zolberg, 1995）。因此，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去辨别正在出现的各种由下至上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性的和破坏性的两个方面的回应。

因此，我们对世界劳工的长期动态的研究，将同时关注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我们指的是劳工对扩张到全球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反冲式抵制，尤其是由那些正因全球经济转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和那些曾经从已经建立起来但正在被从上而下抛弃的社会契约中获益的工人们所进行的反冲式抗争。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我们指的是那些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意识后果而被不断塑造和加强的新兴工人阶级的斗争，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工人阶级正在被消解。

界限划分和历史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

上述讨论揭示出了历史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趋向于不断加强劳工的力量，并使资本（和国家）不断地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而为了控制工人运动，资本和国家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妥协让步，但这样一来，又必然造成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导致利润率危机（crisis of profitability）。另一方面，资本（和国家）试图恢复资本利润率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契约并加剧劳动力的商品化，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和工人的反冲抵抗。

这两个趋势，即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趋势，彰显出历史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紧张状态。对一种危机的化解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另一种危机的产生。这种交替造成了一种趋势，即在以对劳工去商品化和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为特征的历史阶段和以对劳工再商品化和打破旧社会契约为特征的历史阶段之间作周期性的来回振荡。

这一时间上的变化趋势，与另一个空间上的变化趋势紧密交织在一起。换言之，在时间上延续着的对劳工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之间的周期性摇摆，是与另一个在空间上不断对劳工商品化的程度或烈度进行空间地域划分的过程纠缠在一起的。为了理解这个时间和空间相互关联的动力发展机制，我们可以先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一个较为接近的解释，即关于历史资本主义具有“系统层面上的问题”的特征这一论述来理解这一现象。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劳工被部分地去商品化和建立起昂贵的社会契约的条件下，利润依然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只要这些妥协仅仅是对世界劳工中的一小部分作出的。就像沃勒斯坦在谈到二战后的社会契约时所说的，“资本可以把几亿西方工人纳入社会契约中来，同时仍然维持该体系的利润水平。但一旦资本将几十亿第三世界工人都涵盖进来，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了”（1925：25）。

的确，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正是这样一个分裂，即为了将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推广到全球而作的不着边际的承诺和由于事实上无法从中赢利而无法兑现这一承诺的分裂，成为美国二战后所建立的霸权的最重要的局限。而且，这个矛盾在19世纪70年代的爆发为新一轮钟摆摆向世界自我约束的自由市场（即现阶段的全球化）提供了背景。

更宽泛地说，不仅对工人阶级“权利”内容的定义上存在

着持续的斗争，而且这样的斗争也发生在对拥有那些权利的工人的类型和数量的界定上。一个新的合法性/利润率危机如何发生以及以多快的速度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空间策略”来决定的——即为了界定谁将被“包括进来”而谁将被“忽略”所作的各种划分“界限”的努力。

事实上，女权主义对主流劳工研究的一个关键性的批评就是，它没有能够认识到各种“界限划分”策略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劳工研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故事，其关注的是西欧和美国那些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因面临无产阶级化和去技能化（deskilling）而组成政治团体并为自身的生计和工作传统所遭受的威胁而斗争。但正如女权主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含蓄地将某些参与者定义为阶级形成的典型的或普遍的主体，研究者忽略了种族（白人）和性别（男性）这些具有历史独特性的参与者。其结果是，关于“性别和种族以何种方式……构成基本的阶级认同”的问题就被忽略了。而且，工人们自身如何积极地构建身份认同从而拒绝其他工人享受同等的社区权利的问题也被忽略了（Rose, 1997: 138 - 9）。^①

由于忽略和低估了种族、民族、性别和国别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中心作用，传统的劳工研究步入了马克思的后尘。马克思预计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会产生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工人阶级，他们具有趋于相同的经验、利益和认识，从而为统一的国家（和国际）劳工运动打下了基础。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

^① 所以，关于那些19世纪晚期的“精华工人”，这些技术精湛的工匠们不仅仅将非技术工人排除于他们的政治组织之外，而且他们还通过“排他性的学徒制”建立“技术自身”。而且，这种“技术自身”“被历史性地构建成（白人的）男子汉特质”（Rose, 1997: 147; 另参见 Barton, 1989; Somers, 1995; Phillips 和 Taylor, 1980; Cockburn, 1983; Elson 和 Pearson, 1981; Rose, 1992; Tabili, 1994; Roediger, 1991）。

“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1967：88，92，102）

这些结论是建立在将劳工和资本两个方面的观点进行综合的基础之上。就像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90a: 63）所指出的，20世纪晚期削减成本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和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对于资本来说无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劳动工具（无论其年龄、性别、肤色和国籍是什么）”。但是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推断，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工人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工人自己就会自愿放弃他们非阶级性的身份。事实上，正是因为持续的对工人阶级的瓦解和重塑给工人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所以工人中总是有一种内在的普遍倾向去划分非阶级性的边界和界限，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旋涡的基础。^①

每当面对被资本当成一群没有个性而只有增加资本价值的不同能力的大众时，无产者都在反抗。几乎毫无例外地，他们借助或创造出新的任何可能的显著特征（年龄、性别、肤色和各种地理特征）的结合体，以要求资本对他们区别对待。作为结果，家长制、种族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成为构成世界劳工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以这种或那种

① 显然，本讨论和先前介绍的关于劳工国际主义的辩论是吻合的。一些对劳工国际主义持“乐观”态度的观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即认为资本超越国界将劳工同质化的倾向，会增加工人们积极打破他们之间的分隔并跨越他们以前存在的分歧的机会。

形式继续存在于最具无产阶级特点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之中 (Giovanni Arrighi, 1990a: 63)。

尽管上述讨论指出了划分界限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打破这些界限则符合资本的利益，但如果认为这是解释排他性的界限划分的唯一机制，那就错了。事实上，大量的研究都强调了资本和国家从这种排斥性的界限划分中获益。佛瑞德瑞克·库珀 (Frederick Cooper, 1996) 关于非洲工会战后经验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人积极打破排他性的界限的有力例证。借用殖民主义国家的各种普遍主义话语，非洲工会要求将“工人权利”这个概念扩展到平等地包括帝国的所有工人——无论是帝国本土的工人还是殖民地工人，无论是黑人工人抑或是白人工人。非洲工人的这些要求建立帝国范围内的工人权利的合法性的努力 (即打破既存的、用以区分本土和殖民地工人的各种界限)，受到了资本家和国家试图划分新的界限并加固旧界限的努力的抵制。殖民力量迈向去殖民化过程和国家主权的决定产生了一个新的界限，该界限通过将其前殖民地工人和公民排除在外的方式，来尽量减少宗主国的义务。工人的普遍要求给国家和资本带来了“系统层面上的问题” (见前述)，对“公民权利” (当然也是工人权利) 的重新定义，有助于缓和存在于普遍主义言论和实际操作之间显而易见的差距，从而减少其爆发的可能性。

殖民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对非洲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区的持久的紧密联系的反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本土的工人阶级文化产生并再生产着各种模糊的界限，并因此增加了资本和国家对超越城市工作场所延伸到整个地区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担忧。出于对因界限模糊而引发无法控制的动乱的担忧，资本家和政府试图划分新的界限——制造并强化一个僵硬的存在于城市/乡村以及

初级/次级部门之间的分化。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一部分“紧凑的、稳定的并且享受合理收入的劳动力——从而使这部分工人与非洲社会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Cooper, 1996: 457）。通过划分出一个显而易见但规模相对较小的、在主要产业部门工作的、享有特权的城市工人群体，他们希望合法性、控制和利润可以同时存在。

在马姆德·马姆丹尼（Mahmood Mamdani, 1996: 218 - 84）看来，南非种族分离的例子是同一个理论的不同体现。在1948年，随着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的胜利，南非急剧地从稳定劳工的政策，转向“大规模地将非洲人驱逐出城市和对流入人口和居民实行有力监督”的政策（Frederick Cooper, 1996: 6）。结果是“南非的移民工人”，马姆丹尼写道，成为了“城市激进主义和乡村不满之间的传送带”。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把城市斗争的形式从城镇带到了保留地”，又在20世纪60年代把“反叛之火从农村带到了城市”，最终导致了1976年的索韦托暴动。在索韦托暴动后的十年里，南非国家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稳定劳工的政策上去。它试图在流动人口和城镇人口之间“建立起一座长城”，并将组织工会的权利限定在城市居民的劳工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控制’”。这一界限划分策略使移民劳工和城市居民劳工之间的“差别”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紧张状态的“分水岭”（Mamdani, 1996: 220 - 1）。^①

综上所述，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互相关联的形式：分隔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性特征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本书论述的前提是，历史资本主义

① 与之类似但有所不同的关于国家通过划分界限的策略，其以不同的公民和工人权利来制造和分离两个阶级的工人——城市固定工人和乡村—移民工人的个案，参见索林格（Solinger, 1999）对中国和罗伯茨（Roberts, 1995）对拉美的研究。

的特征在于它存在一种系统层面的问题，正是这一特征使得界限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并不认为排他性的界限划分始终是某个具体组织的行动。谁在使用界限划分？他是如何使用这一策略来解决/利用这一系统层面的问题的？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通过先验的理论推论来决定的。相反，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历史—实证分析来解答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推断，那些面临着来自不同地位工人激烈竞争的工人更有可能采用一种排他性的界限划分策略，而正在出现的被排除在现有社会契约之外的新兴工人阶级，则最可能试图挑战并打破现存的各种界限。但是，当这些趋势与国家、与资本家的排斥性/吸纳性的倾向互相作用的时候，划分和打破界限的具体动力机制就会变得相当复杂了。

第四节 研究策略

劳工抗争的时间与空间

正如本章伊始所述，本书的核心前提之一是：与通常的研究相比，要想彻底理解当代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需要我们在一个跨越历史时间更长、涵盖地理范围更广的框架内展开分析。对劳工运动未来的评判，明确或隐含地建立在我们关于当代世界的历史创新性的判断的基础之上。那些认为劳工运动已经出现致命危机的人，往往认为当今时代是全新的、史无前例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进程已经完全重塑了工人阶级和（或）劳工运动所赖以存在并在其中运作的疆域。相比之下，那些期望重新出现重大劳工运动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断重复出现的动态特征，包括持续不断地在劳工和资本之间造成矛盾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后一种观点更为可信，它表明对劳工运

动未来的预测必须基于对当代的动力机制与过去历史阶段相类似的动力机制的比较。因此，本书回顾既往，探究各种重复出现和演变的模式，以期能够分离出在当前劳工运动面临的形势中真正新颖的因素。

之所以要将分析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劳工研究的典型分析范围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崭新性这一相同的问题有关。迄今为止，以下的假设是颇为常见的：某一地方的工人和劳工运动的命运，能够对另一地方的劳资冲突的结局（尤其是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过程作为媒介）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如此，这种假设被普遍认为是仅适用于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劳工运动研究，而不能应用于在此之前的阶段，因为当代的全球化被视为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分界。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具有地方性影响的社会互动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大”（Tilly, 1995），那么，正如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现有阶段的全球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阶段。在认为全球化是一种重复出现的现象的那些人当中，尽管还存在着一一些为合理确定全球化进程可以在历史上向前追溯多远的争论，^① 不过，这些人都普遍认为，在当前的全球化阶段与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事实上，一些人认为，今天各国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相互关联度并不比19世纪末更大——而19世纪末正是被普遍认为是标志着现代劳工运动诞生的那个时期。

与19世纪后期相互关联的一个明显例子，是该时期的大规模全球劳动力迁移（这也是对劳工和劳工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

^① 关于这场争论的实例，参见梯利（1995）、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9）、吉尔斯和弗兰克（Gills, Frank, 1992）、蔡斯-丹（Chase-Dunn, 1989）、奥罗克和威廉森（O'Rourke, Williamson, 1999）。

个案之一)。^① 这一迁徙在传播各种形式的劳工抗争,以及在促成波兰尼式的“自我保护”运动(即限制移民的运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例子同时也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世纪后期各经济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并且这种相互关联影响着劳工运动的行为及其结果。它还表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其对劳工流动的限制更为严格),并非对过去的简单重复。

于是,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前提在于:处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因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全球政治进程而被彼此联系在一起。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去理解各个“个案”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关系过程,是理解至少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劳工运动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

本书自始至终特别关注各种相关过程,无论这些过程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就直接的相关过程而言,行动者认识到并且有意识地推动事件之间的关联程度。这些直接的相关过程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传播和团结。就传播而言,位于被时间和空间所分离各个“事件”之中的行动者,受到关于其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信息传播的影响(Pitcher, Hamblin, Miller, 1978)。“社会性传染”(social contagion)是在有关传播方法的研究中常见的景象。上文讨论过的非洲工会活动家“受到”关于工人权利话语的“传染”,就是传播的例子之一。这类传播可以在来源地与“社会病”感染地之间没有积极合作(比如欧洲和非洲工会活动家之间的合作)的情况下发生。相比之下,先前讨论的直接的关联过程的第二种形式(即团结),涉及个人接

^① 正如戴维·赫尔德及其合著者所指出的,相对于世界人口的规模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移民流动规模比20世纪末更为显著(David Held等,1999,第6章;亦可参见O'Rourke, Williamson, 1999,第7~8章)。

触和社会网络——就劳工国际主义而言，即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Tarrow, 1998; McAdam 和 Rucht, 1993: 69 - 71; Keck 和 Sikkink, 1998）。

就间接的相关过程而言，受影响的行动者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各种关系性的联系。相反，行动者往往是被其背后的系统性过程所联系起来，这些系统过程包括对我们称之为“系统层面的问题”的一系列行动与反应的非预期后果。如果说，强大的劳工运动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迁移到新的地点（从而打击了位于去工业化地区的劳工，但增强了处于工业化地区的劳工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地方的劳工运动的命运，因间接的相关过程而被联系在一起了。事实上，隐含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文献背后的一个潜在论点就是：低工资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与高工资地区的去工业化过程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众多研究中，参见 Fröbel 等，1980; Bluestone 和 Harrison, 1982; Sassen, 1988; MacEwan 和 Tabb, 1989; Dicken, 1998）。

在 19 世纪后期全球移民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发现，间接和直接的相关过程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劳工运动联系起来。先前提到过的劳工运动意识形态和实践随着工人在全球的流动而扩散是传播的实例之一。我们也可以发现至关重要的间接关联过程。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劳工运动成功地使得开放式移民成为非法，从而为美国工人阶级的稳定奠定了基础，而且促成了其后的美国产业组织联合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胜利。然而，与此同时，这一美国劳工运动的“成功”，关闭了欧洲自 19 世纪以来就必不可少的社会安全阀门。因此，它改变了欧洲工人运动得以开展运作的疆域，而且，根据爱德华·霍列特·卡尔（1945）的看法，它为欧洲劳工运动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世界劳工运动的归并与分解

由于把跨越时空的个案之间的关系作为解释性框架的核心部分，本书在研究策略上不同于对劳工研究的比较—历史的方法。这种比较—历史的视角，如本书这里所概述的方法，对从一个或数目有限的个案中进行概括的方法予以批评，进而倡导扩大分析的地理范围。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学者尤其反对传统劳工研究中的一种趋势，即试图建立工人阶级形成的单一模式（即所谓的“宏大叙事”），并以之作为标准而将所有的实际历史经验判断为“例外”或“异常”（Katznelson 和 Zolberg, 1986: 12, 401, 433）。相反，历史—比较的方法包含了“发现变异”的策略，即分析无产阶级化的相同经验是如何导致不同结果的。换句话说，大部分比较—历史的研究文献，其在寻找差异的时候遵循的是“分解”的策略，这与寻找共同性和普遍性时所遵循的“归并”个案的策略形成了对比（Hexter, 1979: 241 - 3; Collier 及 Collier, 1991: 13 - 15）。这些结果上的不同，则被普遍归结为先前就已经存在并独立产生的各种差异，而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则存在于不同个案的内在特征之中。^①

① 使用这一策略的例子数不胜数。理查德·比尔纳其（Richard Biernacki, 1995: 1 - 3）认为，虽然德国和英国纺织业在技术上具有一致性（相同类型的机器、同样的市场），但它们所形成的车间实践和劳工运动的策略是不同的，因为在关于购买和出售劳动力的含义方面，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观念。其结果是，德国和英国“在西欧的各种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发展道路中，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同样，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1986: 450）所得出的诸多结论中——以其主编的书中关于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文章为基础，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性质对于工人阶级最初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造成工人阶级政治模式变异的最为重要的单个决定因素……仅仅取决于在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这个阶级之时……其所面对的是一个专制（absolutist）国家，还是一个自由（liberal）国家。”换言之，他们从劳工运动和政治的牵连程度，以及这种牵连与此前存在于个别个案（国家）内在特征的独特差异的联系方面，去追溯劳工运动的不同结果的原因。

虽然在劳工研究中，近期的一些最有趣的学术著作都采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但完全依靠比较—历史的策略，则阻碍了我们去全面理解用来作为劳工运动行为与结果的关键解释变量（即个案本身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 1984: 146）所指出的，严格的跨国分析的结果也许会起到误导作用。一个社会单元与其所嵌入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之间的联系，“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效应，似乎这种效应就是该社会单元本身的自发属性”。结果是，存在于社会单元之间的模式化的差异从表面上看符合跨国研究寻找差异的解释。在人类学研究中，这被称之为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也就是说，在个案被假定为独立的情形下——但实际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存在关系上的联系的——个案之间的关系本身成为一个（未经检验的）潜藏的变量。在先前所描述的例子中，以及在本书各个章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性/变异性并不单纯是由不同个案的独立的、先前就存在的内在特征的相似或差别所导致的。相反，个案之间的关系以及个案与总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解释相似/不同结果的关键部分。^①

总之，本书所采取的视角要求我们运用这样一种分析策略，即对在整体系统中的关键行动者（劳工、资本、政府）之间的相关联的过程保持敏感，并且也要对影响行动者的各种系统性的约束保持敏感。无须多言，这一方法也带来了巨大的研究的复杂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策略来减少复杂性，从而使研究具有可行性。

减少世界—历史分析的复杂性的最著名的策略，是被梯利称

^① 关于高尔顿问题，参见纳罗尔（Naroll, 1970）和哈麦尔（Hammel, 1980）。关于从世界—体系视角对比较—国家方法的批评，参见霍普金斯（Hopkins, 1982b）。

为“涵括式比较法”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最佳运用实例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研究的方法和约翰·梅耶对“世界社会”研究的方法（譬如，参见 Wallerstein, 1974; Meyer et al., 1997）。涵括式比较法减少复杂性的策略是首先发展“一套关于整个体系的‘精神地图’及其运作的理论”，然后，将各个单位的属性与行为中的相似性（或差异性）追溯为它们在“至高无上的整体”中的相似（或不同）的地位（Tilly, 1984: 124）。梅耶关于体系的“精神地图”使得他强调因世界范围的“理性化过程”而导致的各国之间日益趋同。相形之下，沃勒斯坦的“精神地图”，则使他强调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收益的不平等分配，导致核心和边缘地区之间出现了一个反复发生的地理分化过程。不过，对两人来说，局部的属性与行为都被看做某一单位在系统中所处位置的产物。更大的系统对社会关系在局部层面的变革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使变化遵循理论所预见的道路。^①

这种视角的长处在于，它强调的是整体对局部行动者所可能选择的行动范围所施加的各种实际的约束。但其弱点在于，它先验地排除了局部行动（作用）显著影响局部结果的情形，更没有考虑到局部行动者影响整个系统运作的情形。此外，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的边界和界限划分中所阐明的那样，系统中的各个单位无法成为初期的“精神地图”的一部分，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被不断建构的，而这种建构过程本身也是工人阶级形成叙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因此，尽管我们也重视整体对局部行动者所施加的实际的系

^① 这种方法造成很多原本会持赞成态度的学者的不满，即“世界体系理论”通过“假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和功能性特点”，描绘了一幅“关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劳工形式的机械景象”（Cooper, 2000: 62）。

统约束，该研究不能通过采取“涵括式比较”的方法来作为减少复杂性的一种策略。相反，本书所遵循的研究策略，类似于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 1990）称之为“综合比较”（incorporating comparison）的策略——在这种研究策略中，系统中的各种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创造了系统本身。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化的方式，即存在于空间中的关系的过程是蕴涵在时间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

对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综合比较”策略最为适当的因果分析的类型——它也是本书所运用的主要策略——是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所倡导的叙事模式（narrative mode）的一种改进。拉里·格里芬（Larry Griffin, 1992: 405）认为，这种叙事策略，能够使我们可能将社会现象理解为“暂时有序的、连续的、不断展开的和结局未定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危机与不确定性”。按照吉尔·夸达格诺和斯坦·纳普（Jill Quadagno 以及 Stan Knapp, 1992: 486, 502）的说法，作为一种解释的策略，“描述性的精确叙事，能够依据年代描绘事件发生的顺序……其所做的不仅仅是讲故事”。这样的叙事，能够“实现很多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明确各种因果机制”，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影响其所发生的方式”。^①

但是，尽管历史—社会学家已经强调要将时间作为重要的动力机制来对待，但他们仍普遍地继续将空间予以静态地对待（即把各国的个案概念化为固定而独立的不同单位）。就减少分析的复杂性而言，这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合理的策略。然而，正

^① 在本书中有大量的统计性阐述（statistical elaboration），它们的目的在于“解释”，而是用来辨别跨越时空的劳工抗争模式，而这一模式随后成为我们多维因果“故事”的待说明项（explicandum）（参见 Hopkins, 1982a: 32; Danto, 1965: 237）。

如我们已经明确阐述的，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希望遵循的策略。相反，本书试图创建一种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各种事件是在动态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①

我们拒绝采用关于宏观—历史的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两种最常见的减少复杂性的策略（即涵括式比较和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如何控制分析的复杂性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本书所采用的减少复杂性的第一个策略，是对同时进行分析的层面的数量加以限制。在试图分解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1986：14-21）区分了对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研究时应该着手的四个层面。它们是：（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构；（2）生活方式；（3）意识倾向（disposition）；（4）集体行动。本书主要是对第一和第四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动态与劳工抗争的世界—历史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虽然本书在很多地方都涉及第二和第三层面的讨论，但我们并没有试图把第二和第三层面系统地综合到全书的分析中来。

^① 麦克亚当、塔罗和梯利（2001：26）强调的在“各种社会场合之间互动的网络”的层面上运作“关系机制”，与这个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与“环境机制”（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相比，他们的方法更为强调他们所称的“认知机制”（cognitive mechanism）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就他们超越地方或国家层面去追溯相关过程的机制而言，他们往往只强调我们所称的直接的关系过程。其方法忽略了在事件背后发挥重要作用的、独立于相关团体和个人的认知意识之外的间接关系过程（参见前一小节）。换言之，他们并没有把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个历史性的社会体系来展开研究。相反，本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与堂·卡尔布（Don Kalb，2000：38）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为了理解阶级……我们需要重温资本主义”。或者用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的话来说，当拒绝“元理论”（meta-theory）中的“元”（meta）的时候，学者不应该也因此而回避对于“大”（mega）的研究，因为“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宏大问题（megaquestion）”（1996：14；2000：67）。

通过撇开卡茨尼尔森的第二和第三层面，我们也回避了一系列劳工研究中如正在进行的玺壕战的一系列棘手问题。^①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意图是避免争论。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劳工斗争的激烈阶段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存在或缺失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这种意识的确切性质）的特定假设。正如 E. P. 汤普森所指出的，阶级意识在斗争中出现是有可能的，甚至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在斗争的过程中，参与者发现他们自己从属于特定阶级”（Thompson, 1978: 149；亦可参见 Fantasia, 1988；McAdam 等，2001: 26）。或者，也有可能是在出现集体行动之前，人们必须首先在认知上发生重大转变。^② 同样可能的是，各种劳工斗争的主要浪潮，既不先于也不会必然导致我们可以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虽然去发现存在于集体行动与意识之间的模式化关系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要想以关联的和动态的方法论对这里所包含的宏观一历史的一大批个案进行分析，并非本书所能够胜任的。

此外，我们所选择的分析层面，看起来似乎是更偏向于用结构过程而非文化过程来解释劳工斗争的全球和历史模式。但严格说来，情况并非如此。的确，本书在很多地方都坚持认为，我们所描述的种种劳工抗争的模式不能被归因为文化因素。最为明显的是第二章的中心论点：在 20 世纪的进程中，在文化和政治背景极其不同的条件下，在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工人中爆发的劳工运动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此外，该章中的一个反常（冲突倾向

① 譬如，参见《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2000 年春季号中以“学术争论：向工人阶级说再见？”为标题收集的一组文章。

② 因此，道格·麦克亚当、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梅耶（Mayer Zald）（1996: 6-8）认为，抗议行动需要这样的前提，即“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它们为集体行动提供了理由和动机”。

最小) 个案是日本,^① 而日本与该章所分析的最具有冲突倾向的例子之一(韩国), 却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就像第二章所论证的那样, 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国家运动, 不是当做独立的固定实体来看待, 而是看做一个正在展开的系统整体中的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 那么, 用文化来对各国之间劳工运动的差异加以解释, 结果往往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但是,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 在各种劳工运动用来动员的语言与象征符号之间并不存在差异, 比如, 在巴西、南非、日本或韩国的劳工运动之间就有很多不同。此外, 这也并不是说, 进行动员所使用的象征和仪式的不同不能被归结为独特的文化传统。尽管如此, 对于本书来说, 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解释长期的、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模式, 这种存在于各国劳工运动之间的文化差异, 其重要性对于本书而言要低于存在于这些运动之中的各种关系。

的确, 本书所强调的工人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大多数关系, 其性质是经典的“结构性”关系(即地理位置和生产资本的迁移, 对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和工人谈判力量的分布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如此, 某些关系就其性质而言是“文化的”。本章第三节指出了某些劳工运动彼此发生联系的方式, 这些联系方式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宏观—文化的关系过程——或者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文化。例如, 我们已经提及由移民工人在各国间传播的有关工人和公民权利的话语。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现象概念化为自下而上的跨国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但是, 我们也注意到, 帝国(例如在非洲的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 同样具有传播有关普遍权利

^① 日本被认为是一个反常个案是因为其汽车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并没有导致同一时代中的劳工抗争的巨大浪潮。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 日本汽车业的扩张是发生在一系列劳工抗争的重大浪潮之后的。

话语的作用，这些关于普遍权利的话语后来被当地的劳工运动加以利用，并被转化为使劳工的权利主张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这第二种类型的传播方式，也许可以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跨国文化传播。该类型的传播在本书第四章的叙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该章采用葛兰西的世界霸权这一概念，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的特征。美国的世界霸权，包括其他诸多方面，尤其被视为一种跨国的文化建构，它试图在文化层面上对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和革命性动荡的浪潮作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它也不经意地为工人运动提供了远远超越美国国界的、用以构成挑战美国霸权及其合法性的普遍文化要素。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关于我们对待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的第四层面（即集体行动）的方法。本书并未试图去分析工人集体行动的所有形式。^①相反，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劳工抗争尤为激烈时期的集体行动——皮文和克劳沃德（1992：301-5）称之为“非规范性冲突”，而麦克亚当等人（2001：7-8）则称之为“越界行动”。^②正是这些劳工抗争的主要浪潮而非更为制度化形式的抗议，促使资本家（或国家）实施创新；因此，对于理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急剧转型期（例如当前的全球化阶段）来说，它们是最重要的劳工抗争形式。换言之，通过集中关注这些劳工抗争的重大浪潮，我们希望能够对本章第三节中所概念化的两种运动同时加以分析：即波兰尼式的钟摆运动和马克思式的阶段运动，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劳工运动演进背后的不断变

① 对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1986：20）来说，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指的是“组织起来的社会阶级，通过运动和组织而影响社会 and 该阶级在其中的地位”。

② 麦克亚当等人（2001：7-8）区分了“界内斗争”（contained contention）和“越界斗争”（transgressive contention）。越界斗争与界内斗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前一种斗争中“至少卷入到冲突中的某些人，是新的具有自我认同的政治行动者，并且/或者说……至少某些派别采用了新的集体行动方式”。

动的基础。^①

至此，我们需要介绍我们用于减少分析的复杂性的最终策略。如果没有关于劳工抗争的时空模式的一种经验性的地图，本书就不可能写成。这一地图使我们有可能确认劳工抗争重大浪潮的时间和地点，从而为我们探究世界劳工运动的规律指出了一条道路，使我们得以在由过去的整个 20 世纪中、与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可能相关的众多事件所构成的、令人困惑的整体中辨明方向。换言之，这一经验地图使我们有可能确定跨越时空的不同模式，从而对更集中地研究什么样的（那里的/何时的）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它也使我们有可能使用“归并”和“分解”个案的策略，来揭示特定的模式，而通过关系性叙事的构建可以解释后者。这一经验地图（我们将在随后的几章里不断加以描绘）的基础，是一个涵盖了全世界在整个 20 世纪的劳工抗争的新的数据库，即“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下面我们就将介绍这一数据库。

勾勒世界劳工抗争模式：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

为了落实我们这里所确定的研究策略，我们需要一幅能够显示劳工斗争总体模式的图景。该图景必须具有足够深广的历史和地理规模，以使我们有可能去探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各

① 就集体行动的参与者而言，我们关注的是“无产阶级”（即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的那些人）。无产阶级的状况包含了一系列的具体情形，其范围包括从拥有市场需求的稀缺技能的那些人（从而拥有相对强大的市场谈判力量）到失业的那些人。无产阶级还包含被私营企业家雇佣和被政府雇佣的那些人，因为被政府雇佣最终并不能免受被作为商品对待的压力，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小于那些处于大型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不论是哪一种情形，在迫不得已时，对利润率的要求（及其与收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迅速荡平任何现存的、与劳动力市场的隔绝状态。

地方层面的行动之间的潜在的反馈机制。鉴于我们强调局部行动之间关系的整体性特征，我们需要收集关于劳工抗争的所有可能相关的事件的信息（即社会整体），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从19世纪后期现代劳工运动开始一直到当代的劳工运动。

直至最近，根本就不存在具有如此历史和地理规模的关于劳工抗争的信息。长时间的系列罢工活动——这是最为常用的劳工抗争指标——仅仅存在于少数核心国家当中。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要么根本就没有关于罢工的统计数据，要么这些数据仅仅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除英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数据库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现象（例如，在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阶段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在20世纪初政府决定不再继续收集罢工数据的美国）。此外，即使是现有的罢工统计数据，其收集的标准往往依据的是某一种官方标准，它忽视了那些对于测量“劳工抗争”而言也许是非常重要的罢工事件。例如，大多数国家经常会在罢工活动的官方记录中，将所谓的“政治罢工”排除在外。然而，工人指向其政府的要求（如通过政治罢工）而不是指向其雇主的各种罢工，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的十分重要的方面。

包含非罢工形式的劳工抗争数据库就更为罕见了。然而，它们对劳工抗争图景的总体构建是非常重要的。罢工并非劳工抗争得以表现的唯一重要形式。劳工抗争经常表现为非罢工的斗争形式，包括怠工、旷工、暗中破坏、示威、骚乱和占领工厂。在罢工被认为非法以及公开对抗显得极其困难或根本不可能的情形下，匿名或隐蔽的斗争形式就显得极其重要，比如不公开的怠工、旷工和暗中破坏。

本书依靠的新数据库是专门为克服既存的、有关劳工抗争的数据来源的局限性而设计的，这些局限性包括地理范围上的

(局限于核心国家)、时间上的(局限于短时段)以及行动类型方面的(以罢工为导向)。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是为在本书中所展开的对劳工抗争的动态的全球分析而特地设计的。^① 基于社会科学中确立已久的传统,世界劳工小组在构建这个数据库时,使用了始于1870年以来的、来自全世界的关于劳工抗争(罢工、示威、占领工厂、粮食暴动等等)的新闻报道的信息。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其时间范围是从1870年到1996年,涵盖的“国家”包括168个,包括的相关劳工抗争的“记载”超过91947件。本节的剩余部分,将提供关于构建和使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相关问题的简略概述(关于更为深入而准确的讨论,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的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社会科学里,利用各大报纸作为一种构建社会抗议(包括劳工抗争)指标的数据源,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和成熟的做法。现有的研究已经利用收集自地方/全国报纸的信息,来测算地方/全国性抗议的发生。不过,世界劳工小组的目标是构建关于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的可靠指标。记录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一份全国性大报纸关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劳工抗争的所有报道是一个缺乏可行性的项目。此外,即便数据收集的努力是切实可行的,在试图将检索到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信息合并为单一的世界指标时,也会产生难以解决的数据来源兼容性的问题。世界劳工小组的解决办法是依靠世界上两大霸权国家的主要报纸:《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至少在初期如此。

我们选择这样的信息源是有一定理由的。首先,在整个20世纪里,《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拥有世界级的信息收

^① 该项目第一阶段的结果发表于西尔弗、阿里吉和杜波夫斯基的著作(1995年)中。

集能力。因此，源于报纸报道的技术局限性而产生的地理偏好问题，对这两份报纸而言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尤其是对《泰晤士报》来说）。其次，作为20世纪两大世界霸权强国的主要报纸，这两家报纸的报道范围较其他渠道更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再次，虽然我们可以预期这两家报纸的报道视野是全球性的，但它们也都可能表现出对某些地区的报道偏好，即向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其势力或利益的特殊地区倾斜〔例如，对《泰晤士报》（伦敦）而言是南亚和澳大利亚，而对《纽约时报》来说则是拉丁美洲〕。通过将这两家报纸的报道结合起来形成的世界劳工抗争的单一指标，有助于矫正单独采用某份报纸作为信息渠道而产生的地区报道偏好〔由于每个报纸对其国内事件报道具有强烈的支持偏好，我们排除了从《泰晤士报》（伦敦）搜寻到的有关英国劳工抗争的报道，以及来自《纽约时报》的关于美国劳工抗争的报道〕。

该研究小组的成员们通读了1870~1996年《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的索引，将所确定的劳工抗争的每一起事件记录到标准的数据收集表格上。在将劳动力概念化为“虚构商品”（参见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的目标是确定所有报道过的、被当做商品的人们的抵抗行为，无论它是发生于工作场所中抑或劳动力市场上。这将包含所有故意和有计划的公开抵抗行为（但也包含“隐蔽”形式的抵抗，如果这些“隐蔽”形式的抵抗成为普遍的集体实践的话）。一般来说，劳工抗争的目标要么直接指向雇主，要么针对作为中间人或资本代理人的政府。尽管如此，由于边界划分在工人努力保护自己从而免于被当做商品来对待的行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参见第三节），某一群体的工人动员起来反对来自另一群体的工人的竞争，也被概念化为劳工抗争，关于此类行动的报道，也都被记录下来。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该数据收集劳工抗争事件的目的，并

不是企图计算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发生的所有或大多数劳工抗争的数目。毕竟报纸所报道的，仅仅是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劳工抗争的一小部分。与之相反，我们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能够可靠地显示劳工抗争变化水平的测量方式——也就是说，与其他的时间节点和空间地点相比，什么时候劳工抗争事件增加了或减少了，什么时候其水平上升了或下降了。鉴于我们潜在的理论观点是强调劳工抗争的主要浪潮在引发转型期（或重组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去辨别和确定劳工抗争的主要浪潮。

我们对这个数据库进行了广泛的可靠性研究，其中，我们比较了由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和由其他已有渠道（劳工历史研究和所有已有的统计数据）得出的劳工抗争的时间剖面图。基于这些可靠性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在确认存在于个别国家中的劳工抗争水平异常高或激烈的年代方面，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是有效而可靠的工具。^① 更具体地说，我们发现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在确定象征着劳资关系历史转折点的那些劳工抗争浪潮方面，具有相当一贯的可靠性。^②

总而言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为我们研究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重大浪潮的模式提供了一份可靠的地图。本书的核心章节就是在这一地图的指引下，来讲述关于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的宏大故事。关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构建、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和度量方法，以及关于数据收集问题的讨论，我们在附

① 关于广泛的对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可靠性研究，参见 Silver et al. (1995)。

② 在确定抗争性浪潮的转折点时，这种可靠性是与作为社会历史数据来源的报纸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报纸往往偏向于不去报道常规事件（诸如有组织的罢工活动），而偏向于报道不常见的劳工抗争（即要么在数量上，要么在质量上偏离常规的事件）。鉴于我们关注的是劳工抗争的非规范事件或越界事件（参见本节的先前部分），这种报道偏好实际上有利于我们的研究。

录一中提供了更为深入详细的信息。附录二列出了编码员在收集数据时所遵循的说明指导。如果读者对更详细的、与该数据库有关的方法论问题感兴趣，可以在继续阅读本书以下各章节之前，先参阅这些附录。

第五节 20 世纪的世界工人：本书概要

第二章的重点是研究被普遍认为是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产业——世界汽车工业中的劳工抗争和资本转移的世界范围的动力机制。从大规模的汽车生产最初在底特律兴起至今，该章追溯了这种生产方式在全球的传播。利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第二章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几乎在每一个汽车大规模生产快速扩张的地点，强大的工人运动，即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式的劳工抗争浪潮，也随之不断兴起，而且，这种抗争在提高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都赢得了重大的胜利成果。该章揭示了一种周期性和反复出现的模式，即汽车制造商为了应对连续不断的新的劳工抗争浪潮，不断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相对廉价并且容易控制的地点。虽然这种资本迁移的策略具有显著削弱资本撤离地区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但它同时也在产业连续扩张的每个新的生产地点不断创造和强化了新的工人运动。

在详细阐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89: 196; 1999: 390, 415, 431 - 45）提出的空间调整（spatial fixes）的概念的基础上，第二章指出，资本在地理上的连续转移，构成了其试图解决利润率危机和（劳工）控制危机的空间调整策略，但这种尝试只不过是重新安排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上取得了成功。第二章还重点关注了汽车企业通过对生产组织和劳动流程进行重大的改革来解决利润率和劳工控制危机所作的努力。为了描述这种动

态机制，我们引入了技术调整（technological fix）的概念。我们认为，生产组织中后福特主义的转型体现了资本对利润率和控制问题实施技术调整所作的努力。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这种技术调整所提供的解决之道，并不比连续的空间调整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更为长久和稳定。

第三章介绍了产品调整（product fix）的概念：资本家为了尝试增加利润和加强控制，他们不仅将生产迁移到新的地点或革新劳动生产过程，而且也努力将生产转向新的行业 and 开发新产品，因为通常在一个新的领域里，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竞争对手也较少。第三章重点关注三个宏观的产品周期的内部和相互联系的动态机制，它们是：作为 19 世纪典型产业的世界纺织业、世界汽车业和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新兴主导产业部门。我们发现，正如劳工抗争在地理上随着行业内部生产布局的调整而进行转移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抗争也跟着新兴主导产业部门的兴起和衰落而在各个部门之间发生转移。

第二章和第三章特地将视角集中在劳工—资本的动态机制之上，这种动态机制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反复和周期性出现的空间和技术（或组织）重组有关。第四章则将研究的视角拓宽，指出世界劳工抗争（以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重组）的总体轨迹深深嵌于国家形成、国家间冲突和世界大战的动态发展机制之中。事实上，在来自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关于 20 世纪劳工抗争的总体时间系列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劳工抗争浪潮与世界大战之间的强烈相关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劳工抗争与世界霸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章将世界政治放到中心舞台，以不同的视角复述了 20 世纪世界劳工抗争的故事，并在此过程中引入了最后一种调整机制即金融调整（financial fix）。正如资本转向新的行业和新产品线以逃避在已经建立的生产领域内的激烈竞争压力

那样（我们谓之产品调整），在竞争变得更加普遍而激烈的时期，资本往往从贸易和生产领域完全转移出来，而投向金融和投机领域。借用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94）的“金融扩张”的概念，我们把资本的这种策略称为“金融调整”。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末过度积累危机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调整是一项关键性机制，而且它对世界劳工抗争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的，在形成20世纪末过度积累危机的过程中，规模更大的金融调整始终是一项关键机制，而且，正如我们所论证的，它也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世界劳工抗争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在第五章即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会对这些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比较探讨，以期对劳工运动当代危机的性质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作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将第五章中重新探讨本章伊始所提到的那些争论。

第二章

劳工运动与资本转移

本章所分析的是被公认为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世界汽车产业中的劳工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动态机制。根据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所提供的各种数据，本章第一节展示了一幅从 1930 年至今的世界汽车产业的劳工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迁模式的画卷。我们发现，劳工运动的分布表现为空间上的一系列转移，这种转移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而工人激进运动的中心先后经历了从北美到西欧，再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过程。

本章的第二节随后对上述劳工运动的空间转移机制进行了描述，包括这种转移与连续不断的资本迁移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汽车产业中的大规模生产，倾向于在其诞生地重新制造类似的社会矛盾，结果是，几乎在所有福特式大生产迅猛扩张的地方，都产生了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劳工运动。尽管在每一次强大的劳工运动爆发后，资本家就会把生产迁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工人更为驯服的地方，从而削弱了那些资本撤离的地方的劳工运动，但这同时又增强了资本扩张的新场所的工人的力量。

因此，与“竞次”的简单直接的观点（参见第一章）相比，我们关于劳工运动和资本迁移之间关系的描述，其所呈现的图景要复杂曲折得多。一言以蔽之，我们发现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资本到哪里，冲突就跟到哪里。或者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89: 196; 1999: 390, 442）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在地理方位上的重组，实际上是资本的一种“空间调整”的策略，其作用不过是“转移危机”；它并不能永久地解决这些危机。

本章前两节的分析所强调的是，在汽车产业扩张的主要地点所爆发的劳工运动浪潮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和彼此之间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汽车产业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其在战后的迅速扩张，并没有导致重大的工人武装运动浪潮。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四节中所论证的，一场主要的劳工运动浪潮成为解释“日本例外主义”的关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武装运动浪潮（它刚好发生在日本汽车工业腾飞的前夕）。为了应对那场劳工运动浪潮所带来的种种限制，日本的汽车企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福特式机器化大生产的模式。日本的汽车制造企业放弃了其早期的垂直一体化的企图，建立了多层次转包体系，以使他们能够在对一部分核心员工提供就业保证（并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从各种更低层次的供应商网络中获得低成本投入和灵活性。这种结合，不仅使日本避免了所有其他主要汽车生产国所经历过的那种大规模的、激进的劳工运动，而且使日本公司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成功引入一系列降低成本的措施（所谓的精益生产），从而在19世纪80年代的全球竞争中大获全胜。

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里，随着世界上采用福特生产模式的汽车制造企业纷纷寻求选择性地仿效日本汽车制造企业，

随着日本汽车公司本身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精益生产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使用。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混合过程创造了一个与福特大生产模式根本不同的后福特主义的“猛兽”，从而大大削弱了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工人的谈判能力（参见第一章）。然而，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三节中所要论证的，这种后福特主义的生产重组从根本上背离了日本模式，因为它虽然采用了精益生产中的各种削减成本的措施，却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就业安全保证，因此，它缺乏能够激发工人主动与雇主进行合作的积极性的基础。而且，上述这些工作场所的转变对工人谈判力量的影响也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完全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精益生产方法反而使资本在连续生产过程中更容易遭受由于生产中断而造成的破坏性打击，从而增强了劳工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

因此，我们发现，无论是后福特主义的技术调整还是连续不断的空间调整，都无法为世界汽车产业中的劳工控制问题提供一个稳定长远的解决之道。我们在本章最后一节中将论证：最近，各大汽车公司作出了各种努力，试图在赢得工人的主动合作的同时削减成本，这造成了汽车产业的劳动力的地理分化的加剧，这一地理分化不仅伴随着核心—边缘的分隔而进行，还围绕着性别、种族、公民权的界限而展开。此外，这些努力所体现出来的矛盾和局限性，反过来又揭示出劳工和资本在公司和产业层面上的冲突是如何深嵌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合法性危机和利润率危机之间固有的紧张状态之中的（参见第一章的讨论）。

第一节 汽车产业中劳工抗争的 世界—历史模式

基于世界劳工研究组的数据库，我们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汽

车工人进行劳工抗争的图景，图 2-1 和表 2-1 对之进行了概括。图 2-1 所展现的，是被报道的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地区分布图（时间上以十年为单位）。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工人斗争的中心发生了一系列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北美，到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西北欧（以及南欧），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一组迅速工业化的国家。^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关于北美的劳工抗争的报道在报道总数中占绝对多数（这两个年代里都达到了 75%），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北美在报道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则明显减少了（分别为 15% 和 20%）。相反，关于西北欧劳工抗争的报道在报道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则从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 23%，上升到 50 年代的 39%，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几乎达到了 50%，然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开始下降。对南欧劳工抗争的报道，^②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幅度增加，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2%，增加到 60 年代的 10%，一直到 70 年代的 32%。最后一次主要的空间转移，则发生在迅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对这些国家劳工抗争的报道，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3%，增至 80 年代的 28%，而到了 90 年代则高到 40%。

通过辨别 11 个国家汽车工人劳工抗争的“高潮点”^③ ——

① 图 2-1 和表 2-1 所包括的 11 个国家都符合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即对该国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报道次数，必须超过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对世界范围内汽车产业劳工运动报道总数的 1%。参见附录一对“报道”的定义及相关量化标准的讨论。

② 阿根廷被包括在南欧国家中，其理由参见本章第五个脚注。

③ 所谓劳工抗争的高潮点（在表 2-1 标示为“X”），其定义如下：即对于某一特定国家和（或）特定年份而言，所谓劳工抗争的高潮点，指的是此时间段该国被报道的劳工抗争运动数量，要达到该国被报道总数的 20%（关于本章中该表所示的 11 个国家所达到的最起码标准，参见本章第一个脚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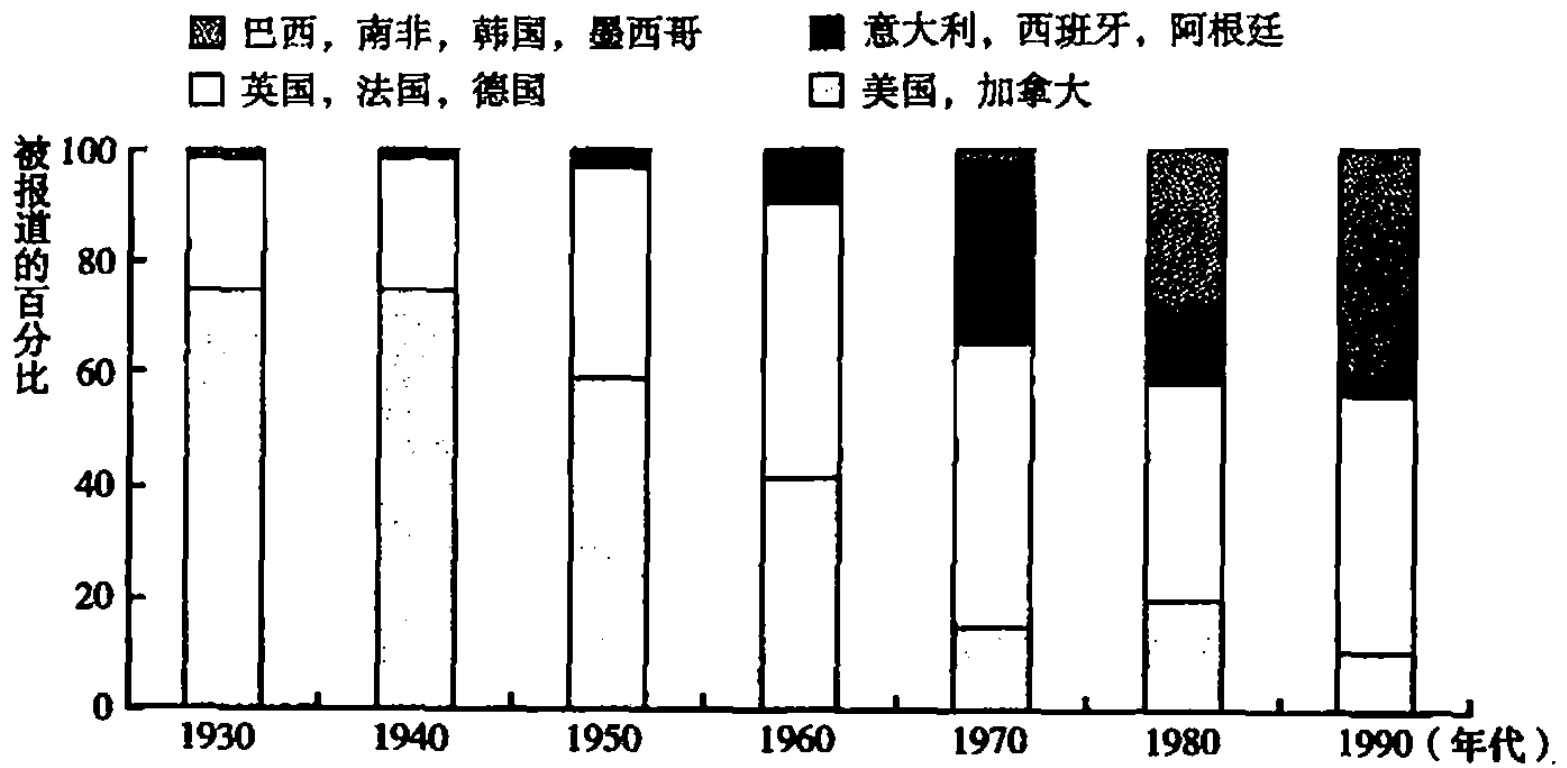


图 2-1 被报道的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地理分布, 1930 ~ 1996

在这些国家，汽车工人的战斗性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表 2-1 再次印证了汽车工人运动的战斗性在空间上发生连续转移的这一图景。

本章的下一节将对表 2-1 所确认的劳工抗争“高潮点浪潮”

表 2-1 世界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高潮点, 1930 ~ 1996

时 间 家	1930 ~ 1934	1935 ~ 1939	1940 ~ 1944	1945 ~ 1949	1950 ~ 1954	1955 ~ 1959	1960 ~ 1964	1965 ~ 1969	1970 ~ 1974	1975 ~ 1979	1980 ~ 1984	1985 ~ 1989	1990 ~ 1996
美 国		X											
加拿大		X											
英 国						X							
法 国								X					
意 大 利								X			X		
德 国									X				
西 班 牙									X				
阿 根 廷										X			
南 非											X		
巴 西											X		
韩 国												X	

注：该表格所包括的 11 个国家都符合以下标准，即对该国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报道数，超过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中对世界范围内汽车产业劳工运动报道总数的 1%。“X”表示达到高潮点的时期，即对该国劳工抗争的报道数达到报道总数的 20%（数据库最后更新到 2000 年 12 月 4 日）。

予以简要描述。^① 在叙述中，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尽管这些劳工抗争的浪潮发生在十分不同的文化—政治环境下，并且所处的世界历史时期也不同，它们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爆发的突然性和声势令同时期的人们感到意外。尽管这些劳工运动遭遇了充满敌意的反工会的雇主（在一些个案中，还有充满敌意的政府）的对抗，它们都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它们都依靠非传统的抗议形式，大多数是引人注目的静坐罢工，每一次罢工都导致了大型工业联合体的生产瘫痪，这有效地暴露出大型现代工业联合体由于劳动技术分工，对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实施的直接行动的脆弱性。在所有这些劳工抗争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人力量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国际间（或地区间）的移民，其有力的社区支持成为这些斗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后，汽车工人的斗争都超越了汽车这一特定产业及其工人的局限，对于该国家中其他的产业及其工人而言，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政治意义。正因为如此，这些劳工抗争的浪潮也代表着每一国家中劳动—资本关系的“转折点”。

汽车工业似乎还能够产生一种直接行动的独特形式。战略性罢工，尤其是针对汽车公司在总体劳动技术分工中的脆弱节点而举行的静坐罢工，是工人们在这些劳工抗争高潮中经常采用的武器。这一重复采用（并屡屡取得胜利）的策略与汽车工人在工作场所拥有的强大谈判力量有很大关系。汽车产业中大生产的复杂技术分工的劳动特征增加了资本对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

^① 日本没有被包括在表 2-1 所涉及的汽车工人劳工抗争浪潮的国家之中。日本汽车工业的迅速扩张，并没有导致重要的汽车劳工运动浪潮——这也是第三节所要重点讨论的一个特例。不过，我们的数据库发现：日本在二战后紧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劳工抗争。那次劳工抗争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包括汽车产业。但是由于汽车产业并非二战刚结束后日本的主要产业，在报道工人的罢工浪潮时，报纸索引并没有将汽车产业单独列出。所以，尽管其在战后发生了汽车产业中的劳工抗争，日本还是未能被包括到表 2-1 之中。

的直接行动的脆弱性。

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那样，这些高潮点的劳工抗争浪潮不仅在其独具特色的形式和斗争方式上十分相似，而且也遭遇了相似的围堵政策，即由于其胜利而引发了管理层采取一系列策略，从结构上削弱了工人运动。从短期来说，“负责任的工会主义”的推行和集体谈判的制度化被用来诱使工会领袖与雇主合作，从而限制了普通工人对生产的破坏。从中短期来说，工作过程日益自动化，新的投资倾向于远离那些工会力量强大的地方。这一资本重组，不仅削弱了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谈判力量，还侵蚀了工人抗争所凭借的各种资源。

公司通过周期性的空间调整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劳工控制问题的各种努力，意味着上述抵达高潮点的劳工抗争浪潮不仅仅是一个整体过程中的一系列独立的个案，相反，由于生产不断地远离具有战斗精神的劳工力量并实施重组，这些劳工抗争的浪潮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上的联系。因此，下一节所叙述的，同样是一个关于劳工抗争和资本转移的同一历史过程的故事。随着资本从既有的生产场所撤离，原有工人的谈判力量被削弱了，但是，新的工人阶级又在新的工业扩张的生产场所被打造出来。结果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汽车大生产技术和劳工抗争的独特斗争形式得以在全球范围扩展，先是从美国到西欧，再到一组迅速工业化的国家。

第二节 从美国的弗林特到韩国的蔚山：汽车 工人大罢工浪潮的历史再现

美国

1936年12月30日，工人们占领了通用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弗

林特的费雪车身制造厂的第一和第二分厂。到1937年3月12日，通用汽车公司，这一拥有巨额财源和反工会的密探网络的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被迫向汽车工人联合会屈服并与其签订了合同。这一罢工事件是导致美国大规模生产行业实现工会化的一连串罢工的开端，而当时不仅存在着很高的失业率（即以市场为基础的谈判力量薄弱），劳工的组织化程度也很低（即组织力量薄弱）。

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拥有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工人们有能力利用其在以劳动分工复杂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导致通用汽车公司费雪车身制造厂瘫痪的弗林特静坐抗议罢工，其计划和实施者是汽车工人当中“富有战斗精神的少数派”，他们“出人意料地停止装配线并在工厂内静坐……促使绝大多数最初无动于衷的工人产生了支持工会的情绪”（Dubofsky 和 Van Tine, 1977: 255）。这次罢工浪潮表明，装配线对劳动力的技术控制有其局限性，人数相对较少的激进分子就可以使整个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正如爱德华兹（1979: 128）所言：“（技术）控制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联系在一起，当装配线停下来时，每个工人必然参加到罢工中去。”

此外，正如具有战斗精神的少数工人可以使整个工厂的生产中断那样，如果这家工厂是一体化企业帝国体系中的关键链条，那么，占领它就能使整个公司陷入瘫痪。通过占领大批量生产雪弗兰汽车发动机的费雪车身制造厂和弗林特工厂，汽车工人成功地使整个通用汽车公司陷于瘫痪。这家公司的生产速度从12月份的每月5万辆汽车，骤减到来年2月份第一个星期的125辆。为了结束罢工和恢复生产，通用汽车公司被迫放弃了它一贯的毫不妥协的反工会立场，并与汽车工人联合会进行了包含12家工厂工人的谈判（参见 Dubofsky 和 Van Tine, 1977: 268 - 269；

Arrighi 和 Silver, 1984: 184 - 185、194 - 195; Rubenstein, 1992: 235 - 237)。

汽车产业的这一早期经历表明，资本转移的策略并不是在全球化的最近阶段（20 世纪后期）才被采用的新鲜事物。事实上，“即便是在汽车产业发展的早期，避免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的集中就已经在影响着资本投资选址的决策”。20 世纪初，导致美国的汽车业集中于底特律地区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底特律雇主协会推行的“自由雇佣”（Open Shop）运动，它使得该市成功地形成了反工会的环境。“到 1914 年，当福特公司的移动装配线将汽车生产从一个技术性的职业转化为非技术性的简单操作的时候，自由雇佣的观念……在底特律就已经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汽车业。”（Rubenstein, 1992: 234 - 235）

在汽车工人联合会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把生产迁离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据点就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各汽车公司遵循的惯用策略之一。就在 1937 年的大罢工之后不久，通用汽车公司在布法罗市收购了一家发动机工厂以减少它对弗林特发动机厂的依赖，而在此后不久，它又开始将生产地点分散到农村地区和美国南方（Rubenstein, 1992: 240 - 241）。

但是，在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汽车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并不是一个主要发生在美国国内的现象。世界市场的解体（从 1929 年的崩溃直到 1958 年欧洲重新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封闭了资本的国际逃逸之路。但是，一旦二战后欧洲趋于稳定，尤其是在共同市场成立和恢复货币自由兑换的条件下，美国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们）就带着投资涌向欧洲。

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取得胜利之后的几十年里，雇主采用了三种应对措施——生产场所的空间转移（在工会力量强大的

地方缩减投资)、生产过程的创新(主要体现为生产的自动化)和“政治交易”(推动“负责任的”工会主义并压制“不负责任的”工会主义)——这从总体上日益削弱了美国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对汽车工人而言。20世纪60年代末,普通工人的新一轮抗争猛增(以“洛兹敦蓝调”为象征^①),促使汽车工人联合工会采取“阿帕契行动”(Operation Apache)(一种短期、小型但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罢工运动)并重新回到对抗性的战术上,汽车制造商则放弃了对“负责任的工会主义”的推动并积极投入到新一轮的生产的空间转移和自动化上来。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南方,主要是在农村地区或小城镇,建设或规划了14家工厂。但通用汽车公司回避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的“南方战略”,由于1979年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摊牌而废止,后者在摊牌中成功地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通用汽车公司的全国性协议扩展到通用在南方的所有工厂。在这次对抗中,汽车工人联合工会再次利用了汽车工人在复杂的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即通过在7家具有战略地位的工厂组织罢工,从而有效地威慑通用公司,它有能力中止该通用公司两种畅销车型的生产。一旦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与通用)的雇佣合同也适用于所有南方工厂,美国南方就失去了它对资本的主要吸引力(Rubenstein, 1992: 240-241)。于是,美国各大汽车公司的应对措施,就是抓紧落实它们正在实施的战略,将生产迁移到美国以外的具有更多剩余劳动力的地区。已经因数十年的产业调整而不断受到削弱的美国汽车工人的谈判力量,在20世纪

^① 原文为“Lordstown Blues”,洛兹敦市位于俄亥俄州,通用汽车公司在那里设有重要工厂。“洛兹敦蓝调”特指在20世纪7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中的工会与资方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在这一短语已经在汽车工业中被广泛引用,来描述被隔离的工人在不称职的管理者的监督下制造质量低劣的汽车。——译注

80年代消耗殆尽。而与“里根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针对被组织起来的劳工的政治攻击不过是雪上加霜罢了。

西欧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里，在汽车生产中应用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技术方面，西欧远远落后于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汽车行业的特征是，众多小型企业从事专为顾客定制的汽车生产，没有一家企业拥有在“赶超”美国所必需的对固定设备和专用机械进行巨额投资的资源或充分的市场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凭借政府的支持，汽车行业的资本集中化程度进展迅速，对内在于福特式方法中的规模经济优势的利用能力则完全付诸阙如。欧洲内部的贸易壁垒加上工人普遍的低工资意味着并不存在真正的大众汽车消费市场。美国汽车工人有能力购买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哪怕是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工人却并不具备这种能力（Landes, 1969: 445 - 451; 亦可参见Tolliday, 1987: 32 - 37）。

鉴于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推广程度有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工人所具有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相对薄弱。比较而言，其结社力量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则相对较强。不过，虽然斗志昂扬的劳工运动和左翼政党激增，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在工作场所和在选举中的重大胜利，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胜利果实中的大多数都遭到了破坏。例如，1919 ~ 1920年意大利的“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那场运动中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的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法西斯政府在意大利和德国执掌政权，而在英国，工党被赶下台，由保守党取而代之。即便是法国工人在“法国人民阵线”

执政期间所取得辉煌战果——法国的劳工运动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斗争在时间上最为接近（而且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还鼓舞了后者的斗争）——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在1936年“马蒂尼翁协议”签订后不久^①，卷土重来的雇主们开始反攻，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全国性集体谈判协议的实施。在两年之内，通过马蒂尼翁协议而实现的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也因通货膨胀而消失殆尽；而在三年之内，法国劳工总联合会（CGT）的会员人数跌落到1936年它所宣称的500万会员人数的1/4左右。到1940年，随着法国的参战，“农奴式的规章制度……约束着战争生产工业中的工人，”用肯德尔的话说，在维希政权执政之前很久，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在抵抗希特勒的伪装下”蓄势待发了（W. Kendall, 1975: 43-48; Arrighi 和 Silver, 1984: 186-190）。

除了美国罢工浪潮取得的更为成功的中期战果之外，法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浪潮的基础显然也是不同的。两次罢工浪潮的显著特征都是利用了静坐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战术。但在巴黎，罢工力量的基础是大规模和政治化的群众运动，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得到了“巴黎红色郊区的工人居民们的热情支持”，其中还包括那些与反共产主义工会有关联的人们。相比之下，“美国通用公司的大罢工是一次少数派的运动”，它不得不与严重的“回去工作”的对抗运动进行斗争。总之，巴黎工厂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相对薄弱，却因为有着强大的组织力量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① Matignon agreement（法文为 Accords de Matignon），马蒂尼翁府是法国总理府的代名词，这些6月7日在工会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被统称为“法国劳工大宪章”，其中包括罢工权利、废除针对工会组织的所有障碍、所有工人提高工资7%~12%等（凡尔登的女工甚至成功地使工资增长了400%），6月13日起雷诺汽车工厂复工；国民议会随后批准实行带薪假期（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期限为2个星期，6月20日投票通过）、每周工作40小时按48小时支付工资以及集体谈判权等。——译注

了补偿；而美国通用公司的大罢工，其情形恰恰相反。弗林特公司中的罢工者的组织力量相对薄弱，但他们有能力“使高度一体化的汽车大生产的循环中断”，因此，工人薄弱的组织谈判力量由于其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而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补偿（Torigian, 1999: 329 - 330）。

尽管如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西洋两岸汽车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水平开始趋同。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汽车工人的劳工抗争运动之后，世界汽车产业的增长中心逐渐转移到西欧。对于阿尔什那等人来说（Altshuler等, 1984: 第2章），汽车产业的第一次重要扩张浪潮从1910年一直持续到1950年，其中心是美国；而第二次重要的扩张浪潮则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其中心是西欧。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西欧的汽车产量增长了5倍，从1950年的110万辆增长到1960年的510万辆；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产量翻了一番，在1970年达到1040万辆（参见Altshuler等, 1984: 19）。

存在于这种扩张背后的动力机制是“美国挑战”与欧洲响应的结合。为避免关税壁垒和节约运输与劳动力成本，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欧洲汽车产业进行直接投资。这一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激增。在1950~1955年间，通用汽车公司在德国欧宝（Opel）的重要扩建项目上的投资，超过了1亿德国马克，此后，它每年继续向该厂追加投资。在1952~1956年间，通用汽车还向英国的沃克斯豪尔投资了3600万英镑，以便扩建其卢顿工厂并在邓斯坦波尔建设一家新工厂。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福特公司迅速扩建其在英国达格南和德国科隆的工厂（Dassbach, 1988: 254 - 255, 296 - 300）。在欧洲，企业与政府的反应结合在一起使得欧洲汽车企业通过兼并和引进最

新的大规模生产技术而获得迅猛增长。譬如，意大利的汽车业（它很少获得外国汽车制造商的直接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其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其产量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到1970年，意大利的机动车产量达到了近200万辆，其中，菲亚特汽车公司所生产的汽车占绝大多数（Laux, 1992: 178, 200）。

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西欧的迅速推广对劳工造成了各种相互矛盾的影响，这与美国汽车工人在20世纪初所经历的颇为相似。一方面，随着技术工人（及其工会）在生产中被边缘化和新的储备劳动力的使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劳工的谈判力量被削弱了。另一方面，汽车产业的扩张与演变打造出了一个新的、具有半熟练技术的工人阶级，它由刚刚被无产阶级化的移民工人所组成。就20世纪初美国的情形而言，其移民来自东欧和南欧（以及美国南部）；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西欧，移民工人主要来自欧洲的周边地区（意大利南部、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和南斯拉夫）。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第一代移民工人普遍没有对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表示抗议。当时，汽车工厂中的工会力量薄弱，管理层在诸如雇佣、开除、提拔和工作分配之类问题上的专断权力，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反抗。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第二代移民工人都成为了反抗斗争的骨干分子，他们的抗争成功地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存在于工厂和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欧罢工浪潮大大出乎工会、管理层和政府的意料。在这些罢工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工人就像他们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同行一样，能够充分利用其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谈判力量。遍及西欧汽车工厂中的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工厂里进行适时的罢工，可以给公司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还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工

人自己的牺牲。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也许莫过于1969年在菲亚特公司发生的“热秋”运动：

对意大利罢工者来说，他们在大规模生产的部门内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抗议活动，着眼于在工人付出最小代价的情况下使生产瘫痪。罢工者们明智地运用“暂停”（*singhiozzo*）（生产车间的罢工）和“棋盘”（*scacchiera*）（协调一致的厂内停工）等罢工行动策略，很快就导致了生产的混乱（Dubois, 1978: 9）。

通过把斗争目标指向生产链中最为敏感的环节，现场罢工（*spot strikes*）、轮流罢工（*rolling strikes*）（一个工会的不同分会在不同时段的停工）、闪电式罢工（*lightning strikes*）（短暂、明显、针对特定目标的罢工）被设计出来，旨在对生产流程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整个欧洲的汽车工人都采用了类似的战术（譬如，参见Crouch和Pizzorno, 1978）。

由于成功使用了上述各种战术，工会的作用得到了迅速扩展，工人对车间的控制增强了，汽车工人的工资也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得到极大的增长。管理层的各种特权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例如，在菲亚特公司，工厂层面的“工人代表委员会”（*consigli dei delegati*）得以成立，目的是（通过工人代表）来使工人能够对生产组织实施某些直接管理，并对工厂中的日常管理拥有发言权，例如分配工作任务、工作量和生产进度，生产组织的变革以及新技术的引进。而在此之前，这些一直是管理层的基本特权。管理层被要求将与车间现场的组织有关的所有决策告知工人代表，并与之进行磋商和谈判（Silver, 1992: 29 - 30；

Rollier, 1986)。不过，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欧洲西北部和欧洲西南部这两个地区加以区分。在欧洲西南部，汽车工人的斗争模式比欧洲西北部更具有爆发性，更为猛烈。此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汽车工人斗争（包括其象征意义），在当时这两个国家的更为广泛的全国层面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中处于更为中心的地位。

这两个地区所存在的各种差异都与其流动劳动力的来源的不同性质有关。欧洲西北部的产业所依赖的是非本国公民的流动劳动力（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人），而欧洲西南部的产业所依赖的流动劳动力却是本国公民。这种差异不仅具有劳动力市场的意义，还具有社会—政治方面的意蕴。欧洲西北部各国拥有多种移民劳动力的来源，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却只能依靠本国内部的劳动力来源——而且，其他一些国家同时也能够利用自己的内部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综合状况使得意大利和西班牙对最初的劳工抗争的反应更缺乏灵活性，从而也造成这两个国家的罢工程度更为激烈。

此外，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人同时也是该国公民的事实为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开辟了空间，这些社会运动借助汽车工人的斗争，使其成为争取更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民主化斗争的一部分。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随后加以讨论）一样，这两个地区的劳工运动都促进了旨在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其他社会运动，并且反过来也受到了这些社会运动的促进（Foweraker, 1989; Tarrow, 1989; Martin, 1990: 417 - 426; Perlmutter, 1991; 参见 Fishman, 1990）。

面对工人运动的惊人成就，西欧汽车制造商的反应与美国汽车企业对产业工人联合会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取得的胜利的反应十分相似。他们积极通过“生产流程创新”（包括劳动密集型工作的迅速自动化）、推动“负责任的工会主义”以及

对生产进行空间转移，来对付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对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来说，生产的空间重组战略——即将投资转移到更为边缘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在巴西和墨西哥——占据着优先地位。总的说来，从1967年到1975年，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1；Ross，1982；Silver，1992：80）。而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则重视大规模的自动化项目，包括发动机装配线的完全自动化（Volpato，1987：218）。

这些应对措施对工人谈判力量的影响也类似于美国的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欧的劳工运动（包括汽车工人）普遍处于守势，而对“负责任的工会主义”的推动则被废弃。到1980年，菲亚特公司能够绕过工人委员会并单方面执行积极实现自动化与合理化的政策，使雇员人数从14万缩减到9万（Rollier，1986：117，129）。20世纪60年代末所取得劳工运动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不过，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汽车产业扩张所偏好的地区形成（并加强）了新的汽车产业的无产阶级。^①

① 阿根廷的情况与这里所叙述的故事基本相同，但有一点是不同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阿根廷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促成了大规模生产的汽车行业早期的迅速增长。无论是汽车产业扩张和劳工抗争重大浪潮的时机与模式，它都类似于所描述过的西欧；不过，阿根廷的富裕水平相对更低，这使得它更难以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契约解决方案筹措资金（这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通过改革来缓解劳工抗争所具备的空间选择之间的显著对比，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详细讨论）。对阿根廷来说，正如对日本而言，劳工抗争是一个早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过，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劳工抗争并没有引发对福特主义的严重背离（参见本章稍后部分中我们对日本的讨论）。在阿根廷，虽然汽车制造业的增长是断断续续的，但它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重大起义中达到高潮，以著名的科尔多瓦事件（Cordobazo）为标志（指1969年5月在科尔多瓦等地发生的工人与学生的反抗运动——译注），紧随其后的是军事政变和一段无情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时期（Jelin，1979；James，1981；Brennan，1994）。

巴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EOI）的福特主义

巴西从1968年到1974年的“经济奇迹”，恰好与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日益寻求逃避其国内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抗争的时期是相对应的。巴西似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投资场所：1964年的军事政变建立了一个极端高压的政权，它成功粉碎了旧的社团主义工会运动，并在工厂和全国政治两个层面，有效地镇压了工人阶级的反抗。^①

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汽车产业经历了相当迅速的扩张。到1974年，巴西已经位居世界十大汽车生产国之列。从1969年到1974年，其汽车产量以平均每年20.7%的速度增长；从1974年到1979年（尽管受石油危机和劳工抗争的影响，主要核心国家的汽车产量锐减），巴西汽车产业仍保持着每年4.5%的增长速度（Humphrey, 1982: 48 - 50）。跨国公司虽然在核心国家里缩减了生产经营活动，却在20世纪70年代向巴西大量投资，比如说，福特公司在巴西的投资就超过3亿美元，且将其在巴西的工厂产能提高了100%（Humphrey, 1987: 129）。

制造业的普遍扩张，尤其是汽车产业的扩张，造就了巴西的新工人阶级，这一阶级不仅具有新的规模，还拥有新的经历。从1970年到1980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翻了一番（Humphrey, 1987: 120）。在汽车产业集中的圣贝尔南多市的郊区，制造业中雇佣工人数量从1950年的4030人，增加到1960年的20039人，到1970年为75118人（Humphrey, 1982: 128 - 129）。这一新的工人阶级，往往集中在规模巨大的工厂内。例如，大众、梅赛德

^① 此外，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尤其是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努力导致了主要的劳工抗争浪潮（参见本章第七个脚注），也进一步增加了巴西作为投资替代场所的吸引力。

斯和福特在圣贝尔南多市的三家工厂总共雇用了6万人以上 (Humphrey, 1982: 137)。

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斗争中担任主力的汽车工人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欧罢工浪潮中处于核心的汽车工人一样,巴西的汽车工人也在汽车工厂内部复杂的技术分工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巴西新的工人阶级也在巴西经济的关键出口部门中占据着战略性地位:在1988年,运输设备是巴西出口额最大的商品,价值达39亿美元 [经济学家信息部 (EIU), 1990: 3]。汽车产业中的罢工和斗争,不仅影响到其所涉及的特定企业的赢利能力,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巴西政府向国外银行偿还巨额债务的能力。

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结束的岁月里,正当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普遍经历了重大失败的时候,新的工会运动突然在巴西爆发,结束了将近15年的工人沉默期。1978年所发生的激烈罢工浪潮,标志着激进主义时期的开始,这一激进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整整10年的镇压之后,虽有所衰退却依然幸存下来 (甚至得以发扬光大)。巴西的汽车工人成为这场新的劳工运动的关键核心,在1978~1986年这一期间,巴西的汽车和钢铁工人发动的罢工几乎占了该国所有罢工数量的一半 (Seidman, 1994: 36)。

1978年5月12日,众多日班工人进入了位于圣贝尔南多市的萨博—斯堪尼亚工厂的工具间,但他们拒绝开动机器。罢工迅速蔓延到整个工厂,数以千计的工人抱着双臂,静静地站在其机器旁。从斯堪尼亚开始,停工蔓延到其他汽车工厂:梅赛德斯、福特、大众和克莱斯勒。在数日之内,工人们抱臂旁观,拒绝在所有重要的工厂内干活。这一情景,令人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那些罢工和20世纪60年代末西欧的罢工浪潮,这些罢工

都主要采取静坐的形式，即工人每天按时到工厂报到并在食堂吃饭，却拒绝干活（Moreira Alves, 1989: 51 - 52; Humphrey, 1982: 166）。这些罢工的结果是工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包括工资的显著提高和迫使雇主承认新的独立工会（不同于正式的、政府支持的工会）。而向来反对工会的顽固雇主们，则被迫与新的独立工会谈判并签订各种集体合同。

当然，各汽车跨国公司并不甘心接受这种失败，它们展开了压制罢工以及在工厂中消灭工会的反击。它们认为，1978年工人的胜利是由于公司自身缺乏防范，而并非由于工人拥有什么内在的力量。但是，压制仅仅导致了工会的战术变化：从大规模的公开对抗转向规模更小（但破坏性非常大）的车间抗议（怠工、现场罢工、普遍的与管理层的不合作）。这些战术，令人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西欧罢工浪潮中所使用的那些战术，正是这些战术使工人们以最小的代价，给企业造成了最大程度的破坏。

到1982年，主要的汽车产业雇主们不得不接受了工会化的必然性，工会开始参与车间的管理，并致力于提高工人的工资。福特是第一家接受在车间维持生产秩序需要推动“负责任的工会主义”的公司。在1981年，福特公司承认由车间选举出来的工人所组成的工厂委员会，承认它们与独立工会的关系，承认它们有权就工人关心的问题 and 工人的抱怨不满与管理层展开谈判（Humphrey, 1987: 125; Humphrey, 1993: 111 - 112）。虽然德国大众公司继续反对工会，但到1982年，它也被迫承认独立工会，并且接受了类似福特公司推行的厂级工人委员会。

1987年，巴西的罢工活动达到顶峰，有900万名工人参与其中（Moreira Alves, 1989: 67）。在从1985年到1988年的4年内，圣保罗大都市区的实际行业工资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增

长 [经济学家信息部 (CIU), 1990]。因此, 这场罢工运动实际上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成的巴西政府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成为废纸一张 (Moreira Alves, 1989: 67)。新的工会运动也在推动更广泛的民主化进程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尤其是在争取将那些民主化条款包含进新宪法的斗争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年通过的新宪法赋予工人以罢工、组建独立工会以及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新宪法还保障了工人的基层代表权。正如玛格丽特·凯克 (Margaret Keck, 1989: 284) 所指出的, “在国民议会中, 人们高度关注劳工问题……这也显示出了巴西劳工政治影响力的变化。”

虽然战果累累, 但这场劳工运动未能取得他们所艰苦争取的条款之一: 将就业安全保障写入新宪法中去。实际上, 在汽车产业集中的圣保罗市, 随着新的投资流向其他地方以及既有的就业岗位的增加, 工业市郊的劳工运动的基础逐渐受到了侵蚀。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的 10 年间, 随着汽车业跨国公司新投资的枯竭, 巴西不再是受投资者青睐的地方 (Gwynne, 1991: 75 - 78)。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尤其是在 1994 年卡多佐 (Cardoso) 取得总统选举胜利之后, 外国投资开始再度流入巴西汽车行业, 但跨国汽车公司的新投资扩张地点, 都选择在冶金工人工会的传统据点圣保罗/圣贝尔南多市之外的地方。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对里约州、米纳斯吉拉斯 (Minas Gerais) 和东北部的重大的新投资的报道, 经常夹杂着对作为巴西劳工运动大本营的工厂中所发生的大规模裁员的报道 (Brook 1994; New York Times 1995; Rodriguez-Pose 和 Arbix 2001)。举例来说, 在德国大众的圣贝尔南多工厂, 工人人数从 1978 年的 4 万名减少到 1996 年的 2.6 万名, 而且这一数字预计还会进一步缩减, 因为德国大众同时在里约州的雷森迪

(Resende) 和圣卡洛斯 (Sao Carlos) 的未开发地区建设新工厂。同样，菲亚特公司开始在米纳斯吉拉斯建设其新厂，因为那里的工人尚未组织起来，而且工资比其在圣贝尔南多的工厂要低40%。作为这些新投资策略的结果，在ABC+（即圣保罗市郊）地区的钢铁工人工会的会员人数从1987年的20.2万名减少到1992年的15万名，并继续减少到1996年的13万名 [巴西社会经济研究和统计协会 (DIEESE)，1995：44；Bradsher，1997：D1；Sedgwick，1997：3；《汽车新闻》，1996：9；本书作者对德国大众圣贝尔南多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和圣保罗大都市区钢铁工人联合工会主席的采访 (Sindicato dos Metalurgicos do ABC)，1996年6月13日]。

南非

同巴西一样，南非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成为汽车跨国公司投资的理想场所，尽管其规模不如巴西壮观。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外国投资从南非急速抽逃。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在非洲大陆上达到顶峰；而在南非国内，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大规模抗议正在蔓延——其中包括南非工会代表大会 (SACTU) 在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61年组织的全国性“缺勤” (stayaways) 运动。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已经证明它有能力成功地粉碎民众反抗，此外，为了确保廉价劳动力的稳定流动，它还制定了压迫性和种族主义的法律，此后，外国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末激增。正如《财富》杂志在1972年刊印的一篇文章所观察到的那样，南非被外国投资者视为一座“金矿”：

(南非) 是罕见而令人振奋的投资场所之一，在那里投

资利润丰厚，麻烦甚少。资本不会受到政治动荡或国有化的威胁。那里的劳动力廉价，市场繁荣，货币坚挺且可以自由兑换（Blashill, 1972: 49; Seidman 和 Seidman 所引用的文献, 1977: 76）。

从 1965 年到 1969 年，南非的外国资本净流入额为平均每年 3.08 亿美元；而在 1970 ~ 1976 年间，资本流入额激增到平均每年 10 亿美元（Litvak 等, 1978: 40）。汽车行业是这些流入资本的主要目标之一。从 1967 年到 1975 年，汽车行业每年的增长率为 10.3%（Litvak 等, 1978: 24; Myers, 1980: 256）。

一个数量庞大的、集中在大规模生产行业的半熟练岗位上的城市黑人无产阶级就此形成了。在 1950 ~ 1975 年间，从事制造业的黑人人数翻了一番。而且，尽管种族隔离法为白人工人保留了熟练和支领薪俸的岗位，制造业中关键岗位上的半熟练工作却基本上由黑人工人来完成。

同巴西的情况一样，这些新的无产者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南非劳工抗争浪潮中的骨干。阶级力量的平衡有所改变的第一个迹象，是 1973 年集中发生于德班市各工厂中的罢工浪潮，这一罢工浪潮打破了 10 多年来劳工的沉寂状态。这些罢工大多以胜利而告终，工人赢得了工资的大幅度增长；而新成立的（非法）黑人工会的成员数量激增。不过，面对工人取得的这些胜利，国家和雇主们并没有听之任之。

事实上，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雇主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激烈抵制承认工会。冶金业雇主协会建议其成员“在任何法律与秩序看起来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都可以报警（Seidman, 1994: 179）。而且，几乎在所有的争执事件中，警察都得到了动用，罢工者被逮捕，工会领导人被剥夺自由行动及与他人联系的权利，

参加罢工的工人被开除并被迫离开城市地区。然而，“过去被证明在压制黑人工会化要求方面非常有效的”各种镇压措施，在20世纪70年代并不能够成功地瓦解独立工会（Beittel, 1989: 3）。考虑到南非工会所面临的“敌对的政治环境”，马利认为，新工会能够设法在20世纪70年代幸存下来，其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成就”（Maree, 1985: 294）。

不仅劳工运动得以幸存下来，而且它还迫使南非政府对其镇压性的劳工政策加以反思。事实上，盖伊·塞德曼认为，“1979年发生于东开普（Eastern Cape）地区的汽车产业罢工运动，成为促使政府将非种族工会合法化的最后一根稻草”（Seidman, 1994: 185）。因为政府意识到这些罢工“似乎预示了新的和无法控制的劳工运动浪潮，只有通过让工会拥有表达工人要求的一些合法渠道，才能防止这些劳工运动浪潮的发生”。

在1979年黑人工会合法化之后，南非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浪潮。政府签发的承认工会的协议数目，从1979年的5个增加到1983年的不下403个（Maree, 1985: 297）。在1985年，这些独立工会被联合起来，组成了南非工会代表大会（COSATU）；到20世纪80年代末，它被誉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工会运动”（Obrery, 1989: 34）。

和巴西一样，南非的罢工浪潮证明，新兴的工人阶级拥有强大的工作场谈判力量，工人们有效地利用了其在复杂的技术分工中所处的重要位置。这种谈判力量在汽车工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汽车工人是产业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①事实上，从1979年到1986年初，南非的钢铁和汽车部门

^① 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在矿工当中也表现得颇为明显，他们在日益机械化的行业中劳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在持续的劳工抗争浪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的罢工，占了因劳工运动而失去所有出工日的 30% (Seidman, 1994: 37)。某些罢工，使得成千上万名工人卷入到大规模冲突之中 [例如，1980 年在福特、大众、日产达特桑和宝马；1981 年在雷莱德 (Leyland)；1982 年在福特和通用]；而另一些罢工，其所使用的则是具有破坏性但低调的战术，例如怠工和局限于工厂内的关键部门的小型罢工。例如，在 1984 年 8 月的一次大众公司的罢工中，虽然工人把他们的停工局限于油漆车间，但由于后者在该厂的劳动分工中具有重要地位，整个工厂被迫关闭了 5 天。在管理层同意了工会要求的情况下，该厂才得以重新开工 (Southall, 1985: 321, 329)。^①

南非罢工运动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是在该国汽车行业和国民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巴西的情况相似，大规模的解雇并没有扑灭劳工斗争。恰恰相反，它们使罢工要求再次集中在就业安全的问题上，抗议裁员的罢工变得常见。此外，与巴西的情况类似，新兴的南非工会在达成承认工人代表权利的协议方面取得了进展，在经营工厂的重要决策问题上（包括雇佣和开除的决策），管理层必须与工人代表进行磋商 (Lewis 和 Randall, 1986: 71 - 73; Maree, 1985: 12)。

南非和巴西的劳工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历，与它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个

① 南非汽车工人的力量，不仅来自其在南非汽车业的劳动技术分工中所处的关键地位，而且还来自他们在其企业雇主的世界范围的劳动组织当中所处的地位。通过谋求该公司总部所在国的汽车工会的支持，南非工人往往能够给当地的管理层造成压力。因此，举例来说，1979 - 1980 年发生于伊丽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分厂的罢工，“因受到来自福特（底特律）的美国汽车工会和非裔美国政治家的压力”，福特被迫取消了大规模开除罢工者的决定，并恢复了相关雇员的工作 (Southall, 1985: 317)。在这种情形下，工人的组织力量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的集聚/集中（关于工人的组织力量与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之间的比较分析，参见第一章第 10 个脚注）。

国家早期的激进的劳工运动，因缺乏强大的车间基础而屈服于政府的镇压；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逮捕和其他形式的镇压，不但不能扑灭工人的斗争，还往往只会给工人斗争火上浇油。在对1988年进行总结的时候，奥博莱利和辛格对南非政府对工人的大规模镇压行为编制了一览表，然后断定：“基层的……战斗性和愤怒，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因政府多年来对工会的打击和紧急状态的统治而消退。”（Obrery, 1988: 37）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与之结盟的共同体和其他各种政治团体相比，工人运动组织更能够经受住政府对反种族隔离活动加以镇压的打击。南非工会代表大会发现自己被推到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位置上，这也给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独特的工人阶级的视角”（Obrery, 1989: 34-35；亦可参见Adler和Webster, 2000）。

在政府的镇压不能成功地维持对劳工实施控制的情况下，资本开始从南非汽车业向外转移。当地生产的汽车销量在1981年达到顶峰（Hirschsohn, 1997: 233）。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已经大部分从南非抽资。正如格温所指出的：“虽然政治因素（反种族隔离运动）一直被重点强调，但是……福特和通用之所以从南非撤退，（还有）重要的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Gwynne, 1991: 50）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南非本土从事汽车生产的地方，其市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来自全世界的进口整车（CBU）所充斥 [Cargo Info（《运输信息》），1997]。

韩国

韩国“经济奇迹”所发生的时间，与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奇迹”的消退是重叠在一起的。1973年，韩国政府把汽车业确

定为优先发展的产业之一。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的轻工业产量和就业增长迅速，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在劳工斗争、工会化和提高工资成为巴西和南非的汽车业特征的那些岁月里），韩国的汽车业才得以腾飞。与巴西和南非在汽车产量急速增长之时所出现的情形一样，韩国的独裁政权禁止成立独立工会和进行罢工活动，逮捕劳工活动家并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帮助雇主压低工人工资并允许严酷而暴虐的劳动条件的存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被组织起来的劳工找不到合法的活动空间，劳工运动被迫进入表面上沉寂状态”（Koo, 1993: 149, 161; 亦可参见 Rodgers, 1996: 105 - 110; Ezra Vogel 和 David Lindauer, 1997: 98 - 99; Koo, 2001）。

这种环境对于得到政府允许而生产汽车的 3 家国内大型企业（现代、起亚和大宇）相当具有吸引力，也对其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分别是三菱、福特/马自达、通用/五十铃）十分具有吸引力。在仅仅 7 年时间里，韩国的汽车产量就增长了 8 倍，从 1980 年的 123135 辆，增长到 1987 年的 98 万辆 [Wade, 1990: 309 - 312; AAMA（亚杰商会），1995: 60; Bloomfield, 1991: 29]。

美国和日本的跨国汽车公司，都通过合资企业进入韩国。1981 年，通用公司获得 50% 的大宇股权。通过这家合资企业，通用开始在北美以庞帝克勒芒（Pontiac Le Mans）为名销售韩国制造的廉价汽车。通用和大宇在 1985 年签订协议，要求后者为通用在全球范围的业务供应发动机和交流发电机。在 1986 年，福特支付 3000 万美元以换取起亚的 10% 股权并开设了“福特国际业务发展”的韩国分支机构，以便在韩国拓展其汽车零部件的来源（Gwynne, 1991: 73 - 74）。到 20 世纪 80 年代，包括钢铁、造船和汽车在内的“重工业产业带……沿着蔚山海岸线绵

延 40 英里，并从全国各地招募了数十万名新工人”（Ezra Vogel 和 David Lindauer, 1997: 106）。

随着韩国的汽车产量达到每年 100 万辆（而且超过了巴西的产量），《纽约时报》在 1987 年 8 月 12 日发表了如下报道：

一轮劳工抗争席卷了这个国家……这次抗争导致该国最大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关闭工厂，其中包括现代、大宇、三星和乐喜金星集团（LG）。生产大众化的超优牌（Excel）汽车的现代汽车公司解决了一起导致其工厂关闭的争端，但它声称，由于其供应商那里所存在的劳工问题，从今天开始现代公司不得不暂停汽车出口。

在 1987 年 8 月 18 日，《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是“工人占领现代在韩国的工厂”。其报道如下：

超过 2 万名工人越过路障并占领了工厂建筑和现代集团经营的一家造船厂……在大型综合性企业中，现代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这场斗争的核心，是现代的工人要求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会。长期以来，现代采取了强硬的反工会立场，而一直到最近的这场暴动为止，现代的雇员没有工会。

随后，在 1987 年 8 月 20 日，仅仅在最初的报道之后的 8 天，英国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张照片，标题为：“现代集团创始人和名誉主席郑周永，穿白色套装者，昨天在汉城与新成立的工会领导人举杯祝贺协议的签订。”所附文章的标题是：“韩国公司同意承认工会”。

工人初步胜利的取得是迅速而令人瞩目的，且导致了独立

于政府和雇主的新的民主工会的成立。在随后的两年里，蔚山重工业区的工人们获得了45%~60%或以上的工资增长，“因为管理层试图用钱买太平并控制局势”（Ezra Vogel 和 David Lindauer, 1997: 108）。尽管如此，同发生在巴西和南非的最初的罢工浪潮和劳工胜利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韩国汽车制造商并不愿意接受劳资关系平衡的这种变化。“管理层……无法消除这样一种信念，即开除肇事者会使他们摆脱罢工这个肿瘤。”雇主往往把劳工斗争浪潮归咎于外界煽动者尤其是激进学生的作用。在1987年，韩国政府最初避免镇压罢工运动；但到1989~1990年，却对劳工抗争采取了镇压措施。政府通过“恶意”的集体谈判、镇压劳工积极分子（解雇、逮捕、绑架）、使用准军事部队破坏罢工等手段来抵制工会（Kirk, 1994: 228; Koo, 1993: 158-159; Ezra Vogel 和 David Lindauer, 1997: 110）。

不过，与巴西的情形一样，雇主和政府的反扑并未能成功地压制劳工运动。根据沃格尔和林道的说法，即便是在罢工活动受到了部分遏制的情况下，“大批工人和反对镇压的普通公民，其对政府的疏离更为强烈”（Ezra Vogel 和 David Lindauer, 1997: 110）。此外，韩国的经验充分展示了大规模生产的弱点：它不仅因工人的直接行动而被迫中断，还因为雇主和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性对抗措施而被中断。在1990年现代集团的一次罢工中，汽车装配线工人描述了如下情形：

“起初，只有少数（现代汽车的）工人在阻断道路（以声援现代公司下属造船厂的罢工工人），”一位年轻的汽车装配线工人卢圣守（Roh Sang Soo）说……“然后警察向我们正在工作的大院中投掷催泪瓦斯。我们无法工作……当时我正在生产‘超优’汽车的流水线上。我闻到了催泪瓦斯

的气味。我走出工厂，参加了示威活动”……第二天，上班的那些人再次受到催泪瓦斯的攻击。“由于瓦斯气味，我们无法工作”，装配线工人李翔辉（Lee Sang Hui）说，“如果有一个人无法工作，整个装配线就会停下来。我于是也参加了示威，唱歌并鼓掌。”（Kirk, 1994: 228）

为了应对镇压，工人也转向规模更小、不那么公开但破坏性很强的抗议形式。怠工、暗中破坏和拒绝加班，都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汽车公司在产量上的严重损失。于是，现代公司在先进的固定设备上进行了大量投资。现代汽车的强硬立场，加剧了“其他主观的或不那么容易量化的各种问题”（Rodgers, 1996: 116；亦可参见 Kirk, 1994: 257, 262）。

面对劳工抗争的重大浪潮，雇主所反复采取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实施自动化。明显的是，正好在1987年蔚山大罢工爆发一年之后，现代集团在这个综合性企业中增设了一家新公司：“现代机器人产业”（Kirk, 1994: 344 - 345）。此外，韩国的汽车制造商们迅速采取行动，组建了跨国公司。在研究了韩国在巴西东北部、乌克兰、波兰（大宇）；中国（现代）；印度尼西亚（起亚）建设汽车厂的各项计划之后，《汽车新闻》得出的结论是：韩国的汽车公司处于“国际扩张的前列”（Johnson, 1997: 14）。

虽然面临着工资上涨和普遍的劳工抗争，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尽管不包括其跨国公司伙伴）继续扩大它们在韩国国内的汽车生产。虽然产能利用率因罢工和怠工而受到不利影响，但基于年度基础的汽车实际产量从1987年（第一次大罢工那一年）的约100万辆，攀升到1991年的接近150万辆，到1993年超过200万辆〔亚杰商会（AAMA），1995: 60〕。到1996年，韩国的总体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300万辆，而预计的增产计划将使韩国的

汽车生产能力到2002年超过600万辆 (Treece, 1997b: 4)。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这些计划过于野心勃勃的性质。虽然这些计划得以持续,但这种扩张只会进一步强化劳工抗争的强度和效果——尤其是在雇主继续对独立工会心怀敌意的背景下。1996年12月到1997年1月举行的为期20天的总罢工使得劳工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场罢工中,汽车工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政府通过的进一步侵犯劳工和民主权利的新法律的激发,这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导致韩国政府“实际上向工人阶级投降”。劳动法被再度修订,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独立工会联盟的法律地位。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雇主最终不得不接受工会制度化和集体谈判的现实。此外,由于政府以非民主的方式,在没有告知反对党的情况下,在黎明时分秘密通过了最初的法律,总罢工也赢得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广泛的民众支持。工人被看做“为了普通大众的利益”而斗争,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更为广泛的斗争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Sonn, 1997: 125 - 128)。

新一轮资本的空间转移与劳工抗争的浪潮?

总体而言,尽管汽车巨头们似乎一直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停地追逐其臆想中的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却发现它们只不过是在新的投资场所不断地再度创造出新的充满斗争精神的劳工运动。生产的空间转移,与其说是为资本的利润率和劳工控制问题提供了一种长久的空间调整策略,倒不如说这种资本在空间上的转移只不过是在地理上成功地将矛盾从一个生产场所转移到了另一个场所罢了 (亦可参见 Silver, 1995b: 173 - 185)。^①

^①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将每一次劳工抗争浪潮置于控制之下所需花费的时间减少了;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修正后的产品周期理论框架内,重新阐述这一进程。

最近的趋势，也许可以被解释为新一轮资本的空间转移与新的劳工抗争浪潮周期的开始。为了实现快速的扩张，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已经圈定了至少两处新的廉价劳动力的地点：墨西哥北部和中国。如果说，过去的劳工运动的动态发展机制能够作为预测未来的指南的话，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言：在未来的10年里，墨西哥和中国将出现强大而独立的汽车产业的劳工运动。

在这两个国家中，汽车产业都得到了快速扩张。墨西哥汽车产量增长近4倍，从1984年的357998辆到1994年的1122109辆再到2001年的1755000辆（AAMA 1995：28，257；Standard & Poor's 2002）。

中国的汽车产量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番，从1991年的708820辆增长到1994年的1353368辆，2001年则达到1995500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1998：11；Standard & Poor's 2002）。中国政府将汽车产业定为其经济发展的7个“支柱产业”之一，并且预计这一产业将会随着跨国公司竞相在中国投资兴建生产整车和零部件的工厂而继续迅速增长（Treece, 1997a）。到1996年，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清单上，榜上有名的28家汽车企业中已经有8家在中国投资进行汽车生产（Zhang, 1999：表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是转向创建更大规模的生产单位以及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集中生产，这与以前中国汽车行业强调生产在地理上的分散和地区性的自给自足政策正好相反（Harwit, 1995：26-37）。在中国，排名前10位的汽车企业所生产的汽车占全国生产总量的比重，从1987年的66%增加到1996年的78%。一旦主要的汽车业界的跨国公司（包括通用、雪铁龙、大众和丰田）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新投资投入生产，那么，预计这一

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 (Zhang, 1999)。^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 还出现了另一种趋势, 或许, 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同一种关于劳工抗争和资本重组的动态机制的延续。汽车业的跨国公司在经历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后, 开始重新将生产迁回到它们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所撤离的那些核心地区 (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就美国而言, 大湖以南地区再度成为汽车整车生产和零部件生产的偏好之地; 尽管如此, 汽车企业还是回避了先前的工会势力强大的区域, 而倾向于在没有汽车生产历史的小城镇进行投资生产 (Rubenstein, 1992: 171 - 182)。这种汽车生产在核心地区的重新集中, 至少可以被部分地解释为劳工抗争和资本空间转移的漫长轨迹的继续——换言之, 由于过去几十年间资本的撤离, 核心地区的大规模生产行业性工会遭到了持续破坏, 这使得汽车制造商们再度选择向劳工运动乏力的地区转移投资。^②

此外, 这种生产在核心地区的重新集中, 还伴随着过去 20 年以来在生产组织和劳动过程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 它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新一轮资本转移与劳工抗争的周期的发生? 现在, 让我们转向对这些转变的性质与影响的讨论。

① 不过, 应该指出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汽车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与雇佣人数的增长, 与国有企业 (包括汽车生产企业) 的大规模下岗是同步的。下岗 (以及更为普遍的打破“铁饭碗”这一社会契约的举措)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中国激起了广泛而显著的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 (譬如, 参见 Pan, 2002), 在以后的几章里, 我们将回到这个论点上。正如我们在这里的分析所推断的, 这些劳工抗争浪潮是否预示着在跨国公司控制的中国汽车产业扩张的过程中将兴起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 则有待观察。

② 应该指出的是,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尤其是针对日本进口汽车的措施) 是推动汽车生产在美国和英国重新集中的主要动机 (关于这一点, 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再次加以讨论)。

第三节 后福特主义的技术调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巴西和韩国的汽车产业中出现了激进的劳工运动；很显然，对汽车公司而言，仅仅凭借资本的空间转移并不能长期而稳定地解决利润率下降和劳工控制的问题。意识到这一点，再加上受到日本汽车企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取得非凡成就所构成的竞争威胁，美国和西欧的汽车公司将注意力集中到实施重大的流程创新方面来，亦即通过技术调整来解决利润率下降和劳工控制的问题。结果是，人们普遍认为，在汽车产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日本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迅速扩张，被认为是后福特式组织转型的先驱。为了应付国内工资高涨的局面，日本汽车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工资低廉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参见下文的相关讨论）；而为了应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抬头的形势（最明显的是公开或隐蔽地实行“自愿的”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北美和西欧迅速扩张。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日本跨国汽车公司的产量，差不多占美国汽车总产量的 25% 和英国客车总产量的 20%，而且，其所占的比重预计会进一步提高（AAMA, 1995: 199, 272）。

日本汽车制造商将日本生产汽车的许多组织实践带到这些新的生产地点。随着美国和西欧汽车企业通过选择性地模仿日本的组织实践以应对日本的竞争威胁，这些做法得到了广泛传播应用。^① 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灵活的工作规则、即时（just-in-time）供应系统、团队作业、质量圈，以及从垂直一体化迈向

^① 关于美国汽车业对日本生产方法的模仿，参见安保（Abo, 1994）。

大量使用转包供料（外包）的实践，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不过，在最初的日本模式与美国和西欧跨国公司所采纳借鉴的模式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即美国和西欧跨国公司所采纳借鉴的模式并不向其核心劳动力承诺就业安全。换言之，它们采纳了日本式精益生产的削减成本的措施，却并没有采用日本企业的有关就业政策。因此，这种模式被贴上了“精益一刻薄”（lean and mean）的标签（参见 Harrison, 1997）。相比之下，最初的“丰田”模式则向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方面的安全，以换取核心员工的合作，但同时也通过使用大量不享有同样权利和好处的工人而制造了一个很大的缓冲地带，这可以被称为“精益一二元”模式（lean and dual）。我们认为，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当代世界汽车产业中劳工抗争的动力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精益一刻薄”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跨国公司在核心国家的运营倾向于采用其在本土形成的模式（Florida 和 Kenney, 1991: 390 - 391），而美国公司则普遍走上“精益一刻薄”模式的道路，就像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运营生产的日本制造商那样。迪尤认为，“威权政治和镇压性的劳工体制”构成了产业扩张主要地点的低工资国家的特征（Deyo, 1996a: 9）。在泰国，三菱并不向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安全（Deyo, 1996b: 145 - 146）。在韩国，国内汽车制造商们（起亚是一个例外）继续实施大规模生产的低工资、高离职率的战略，而且采取反工会和专制的管理风格（Rodgers, 1996: 115 - 119）。而在中国，随着中央政府推动“工业的减员增效”政策，以使中国汽车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符合国际“市场规则”所确定的标准，“裁员正在成为令人痛苦的现实”（Treece, 1997c）。同样，日本跨国公司在墨西哥所采用的是传统的福特式大生产技

术，它们发现，“（在墨西哥）更加强调低工资的策略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哪怕随之而来的高离职率扰乱了质量圈和其他精益生产技术的推广”（Shaiken, 1995: 248 - 249, 254）。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空间调整的情形一样，通过“精益一刻薄”模式的生产技术调整显然并不能稳定持久地解决劳工抗争的问题。事实上，在缺乏就业保障的情况下，汽车制造商们发现要得到其劳动力的积极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种生产模式下的劳资冲突的动力机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福特模式下的机制是相同的。因此，在那些不提供就业安全保障而只实施质量圈的地方，管理层根本无法成功获得工人的合作。例如，三菱的泰国工厂就被工人的高离职率所困扰，并且，由于缺乏工人合作，该厂被迫放弃了质量控制圈（Deyo, 1996b: 145 - 146）。虽然福特汽车公司在墨西哥的埃莫西约（Hermosillo）工厂——被誉为精益生产技术的引领者——采取了及时（JIT）生产和团队合作的实践，却并没有采取能够激发培养工人对企业的奉献和忠诚的措施，结果，该厂的离职率很高，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罢工事件并导致大批工人被开除（Shaiken, 1995: 248 - 249、254）。

此外，基于及时生产的转包体制并没有削弱汽车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恰恰相反，及时生产甚至比福特式大生产更容易受到零部件工厂和运输业罢工的影响。正如1992年10月8日《纽约时报》（第五版）上的一篇文章在谈到美国的经历时所指出的：

由于汽车业大多采用了保持生产低库存的日本生产体系，零部件工厂的罢工具有比过去更为重大的影响……工会有能力仅仅通过组织数千名工人进行罢工就能够中止生产，

而工会通过这种方式给企业所带来的损失，也许要高于企业通过自动化、业务外包等方式裁减工作岗位所节约的成本（亦可参见 Rubenstein, 1992: 198; Schoenberger, 1997: 57-61）。

及时生产的弱点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系列罢工中暴露无遗。比如，1997年7月，底特律市郊的一家通用变速器厂（该厂向除“土星”车以外的通用公司在北美的所有装配厂提供零部件）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人抗议公司将业务外包，要求更高的就业水平和工作安全性。到该厂2800名工人罢工的第三天，通用被迫关闭了4家装配厂，致使总数为19.3万名工人无活可干。如果那次罢工持续2~3个星期，它“实际会使通用汽车公司的北美装配业务陷于瘫痪”。在该厂工会宣告胜利的情况下，那次罢工在3天内得以平息（《纽约时报》，1997年）。

因此，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斗争到更近期的巴西、南非和韩国的劳工抗争浪潮，在汽车工业扩张的许多主要地点的雇佣政策依然保留着激发和推动汽车工人斗争历史浪潮的特征。考虑到“精益一刻薄”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在未来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汽车公司在每一个新生产地点迅速扩张所造成的新的充满斗争精神的劳工运动的动态机制，很有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第四节 边界划分和“精益一二元” 生产模式的悖论

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些工业分析家开始注意到被广泛采用的精益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各种局限性。正如汤姆斯·考臣

(Thomas Kochan)、若塞尔·兰斯伯瑞 (Russell Landbury) 和约翰·麦克尔达非 (John MacDuffie) (1997: 307 - 309) 所指出, 一些汽车制造商之所以未能将精益生产技术成功地转化为生产绩效, 根源就在于未能实行那些能促发工人与雇主进行主动合作的雇佣政策。要想获得成功, 企业需要建立“一个以灵活性、解决问题、激励机制为特征的组织, 这也是精益生产制度一直鼓励倡导的”。然而, 在那些引入精益生产实践的同时又进行大规模减员裁员的公司和工厂, 精益生产在“激发工人生产积极性和行动方面的益处”被抵消了。这些事实暗示我们, 存在于“精益生产之外”的雇佣关系需要更多关注诸如“如何实现改善工人的工资、就业安全保障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特别是涉及菲亚特的论述, 亦可参见 Camuffo 和 Volpato, 1997)。事实上, 正如以上讨论所表明的那样, 对核心劳动力的就业安全保证, 是区分“丰田式”的精益—二元模式和广泛采用的精益—刻薄模式的主要不同之处。

日本企业管理层对保证核心劳动力就业安全感的坚持, 来源于日本在紧随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历。战后日本由于解雇工人而频频引发的罢工行动和抗议形成了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劳工抗争浪潮, 而日本试图实现的汽车工业的腾飞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应对这一劳工抗争浪潮以及有限的资金和贷款给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限制, 日本汽车公司选择了一种与福特式大生产模式显著不同的生产模式。他们放弃了早期试图建立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 转而建立了一种多层次的分包体系, 从而使日本汽车公司能够在为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安全保证 (并在此基础建立合作关系) 的同时, 从次级供应网络那里获得低成本和雇佣的灵活性。这一分包体系, 使得丰田汽车公司的产量在 1952 ~ 1957 年间增加了 5 倍, 然而其劳动力

只增加了15%。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生产体系使丰田和日本的其他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避免了解雇工人（以及由于解雇而引发的激进工人的对抗）（Smitka, 1991: 2-7）。^①

日本企业管理层对核心劳动力就业安全保证政策的坚持，被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进一步强化。70年代精益生产的组织创新帮助日本的汽车产业平安渡过了石油危机，并且在80年代崛起为世界汽车业中的巨人，如果没有企业为核心劳动力所提供的就业安全保证，这一组织创新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只有当工人和管理层都能够“认识到工人提高生产率和质量的努力不会导致工人失业”时，工人才能对企业降低成本和持续改进生产效率和质量的各项措施采取主动合作的态度（Sako, 1997: 8; Chalmers, 1989: 132）。因此，对核心员工就业安全的保证，是解释战后日本汽车产业迅速扩张却没有引发重大劳工抗争浪潮的关键——这与所有其他经历过汽车产业迅速扩张的国家都不同。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极度经济衰退压力的影响下，大型日本整车汽车企业引入了修正版的“终身雇佣”体系，即在一个扩展的企业集团内（包括装配厂和初级供应商），而非在一个单独的公司中，为核心工人提供就业方面的安全保证。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反复预言日本“终身雇佣制度”的消亡，贯穿整个90年代，日本企业管理层依然坚持“终身雇佣”的中心原则。因为管理层相信，“如果没有了对就业安全的保证，工人和

① 战争刚结束时所发生的罢工浪潮对日本管理层的长期影响，甚至可以从加利福尼亚的中小型日本独资企业的“无解雇”政策中窥出。若斯·缪柯曼（Ruth Mikman, 1991: 85-86）发现，那些日本独资企业很少采取精益生产措施；但她发现，公司管理层相信，“解雇会引发工会主义”，因此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之。

工会与管理层进行合作的激励基础将被动摇” (Sako, 1997: 11; 参见 Pollack, 1993)。

在 90 年代末, 面对精益一刻薄模式的种种局限性, 美国和西欧的汽车制造企业似乎也在转向精益一二元的策略 (Kochan 等, 1997)。但是无论如何, 精益一二元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一策略的成功, 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缓冲带”的基础之上的, 身处其中的是缺乏就业安全保证、处于分包体系中的低层公司的工人, 以及上层公司的非全日制和临时性工人。以日本为例, 在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在多层次的分包体系中, 位于最底层的工人主要是由大量的农村储备劳动力和妇女所组成的。妇女在填充大企业及其附属企业中非全日制和临时性工作岗位方面, 显得尤其重要, 因为她们倾向于在结婚之前工作, 婚后一段时间不再工作, 然后在孩子达到上学年龄后重返劳动力市场, 并主要是从事一些非全日制的性工作。通常, 她们是那些享受就业安全保证的男性工人的妻子或女儿, 因此, 女工和其雇主之间的劳工—资本的矛盾, 通过家庭内的权力关系得以调停和缓解。事实上, 成为“合作的工人”的激励机制被延伸到整个家庭, 因为妻子和女儿们也会出于对负担家计的主要男性的“终身雇佣安全”的考虑, 而承担起与雇主合作的责任 (Sachiko, 1986; Sumiko, 1986; Muto, 1997: 152 - 154)。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农村储备劳动力的枯竭, 以及分包体系中底层工人谈判力量的增强, 日本企业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来克服精益一二元模式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 日本不断增长的财富, 使其有能力从整体上实现劳动力的升级。主要的供应商 (和一些次级供应商) 在就业安全性和工人工资水平方面, 都开始向主要的汽车整车企业看齐 (Smitka, 1991)。另一方面, 为了降低成本和保持国际竞争力, 日本汽车制造商们将转包金字塔

体系中的底层生产，转移到了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元的迅速升值，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汽车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亚洲的低成本地区（Ozawa, 1979: 76 - 110; Machado, 1992: 174 - 178, Arrighi、Ikeda 和 Irwan, 1993: 48 - 65; Steven, 1997: 215）。

通过将分包体系中的低层次生产转移到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低收入国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们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复制其竞争力，并同时确保其核心劳动力对企业的忠诚。事实上，根据石田光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丰田开始实施一项对工人友好的技术创新项目，该设计使汽车生产更加人性化，以吸引和保持其主要生产部门中高技能熟练技术工人对企业的忠诚（Mitsuo Ishida, 1997）。

然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采取了新的空间形式——多层次转包体系中的低层级和高层级生产被分离到不同的国家中进行——位于底层的工人继续保持沉默的可能性减少了。首先一个原因在于，父权制家庭（由男性“贵族工人”帮助对妇女和年轻工人进行规范）已经不能再作为该体系的支柱而发挥作用。一旦这种二元分割制不再仅仅是“家务事”，其他诸如性别、国籍、公民权、种族等分割标识就极有可能成为动员（而非消解）劳工抗争的重要因素。

因此，精益一刻薄和精益一二元这两种模式都有其矛盾与局限性。这些矛盾，为我们理解公司和产业层面的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间的持续紧张状态提供了例证（参见本书第一章）。劳工抗争的压力，迫使汽车制造商们试图保护其部分劳动力免受缺乏规范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最残酷的摆布，以此来强化劳工—资本的等级体系的合法性。但是，激烈的竞争压力又不断制造出利润率危机，迫使汽车制造商们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从而不断威

胁着对该部分劳工保护的深度和广度。考虑到这些充满矛盾的压力，我们很难预言精益一刻薄和精益一二元这两种策略，哪一个将会在未来占据相对更大的优势。回顾既往，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精益一刻薄模式首先发挥其使传统的大生产企业（从美国的“三大”巨头到中国的国有汽车企业）“减员”的历史功能，在此基础上，精益一二元模式才能够有利可图地发挥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在本章第二节中所揭示的那样，在精益一刻薄模式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激进的劳工斗争和资本转移的动力机制将极有可能重复出现。在这些生产场所，比如中国和墨西哥，工人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和深重的委屈不满将并行发展，从而制造出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此外，尽管汽车工人的收入要高于该国工人收入的平均水平，他们仍然是工人阶级共同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在全国的劳工运动中起到类似于我们之前所描述的 20 世纪劳工抗争浪潮中汽车工人所起到的领导作用。

然而，世界汽车产业的主要趋势已经在向精益一二元的生产模式发展，因此，未来最有可能发生汽车工人劳工抗争的地方，将会是那些在转包生产体系中处于较低层级的地方。然而，这些地方的工人虽然有强烈的怨愤，却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而且，虽然位于转包生产体系上层的工人更有可能具有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他们的委屈不满也相对较少，同时，他们也越来越有可能与具有深重不满和较少结构性力量的较低层级的工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相分离。随着汽车产业变得越来越“精简”，主要产业部门的工人在汽车工人以及整个工人阶级中将会占据一个极小的比重。最后，（有就业安全的）上层工人和（没有就业安全的）底层工人的分布，极有可能与核心—边缘的地理分割相对应并强化这种地理分割，并且，

这一工人间的分割也会与工人在种族、居住地和国籍方面的差异相重叠——所有这些，都对世界范围的劳工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无论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精益一刻薄模式还是精益一二元模式，全球汽车工人都不可能在 21 世纪的世界劳工运动中起到其在 20 世纪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汽车产业被广泛认为是 20 世纪的典型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引领部门”。但是，很少会有评论家认为在 21 世纪还会保持同样的情形。因此，除了我们先前提到少数几个重要个案外，未来的汽车工人的斗争，不太可能具有其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所产生的同样的象征性和实质性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追溯了 20 世纪世界汽车产业中的劳工抗争的发展轨迹，重点分析了劳工抗争与资本主义通过连续的空间和技术调整来维持利益率及劳工控制的策略的互动关系。然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率最大化和工人控制的策略，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资本的空间转移或是对现有生产线的重组。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和对工人更强的控制，资本也“进入”到新的产业和生产线。如果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资本到哪里，矛盾冲突就跟到哪里”，那么，我们应该更有希望在 21 世纪的新兴主导产业中，首先听到劳工运动复兴的隆隆雷鸣。换言之，我们所预期看到的，不仅仅是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劳资冲突在同一个产业内部的空间上的转移（正如本章所叙述的汽车产业的情形），还包括劳资冲突在其发生地的长期的、产业之间的转移。正是这种存在于劳工抗争和我们称之为产品调整之间的动力机制，构成了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

劳工运动与产品周期

在上一章中，我们重点分析了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劳工抗争。我们追踪考察了汽车工业机械化大生产的兴起、全球化过程及其转变。我们发现，在工人运动和资本转移之间，存在着一种似曾相识的循环模式——即在每一个资本转移所偏爱的、具有新的廉价劳动力的汽车工业生产基地，都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换言之，不论资本转移到哪里，其空间调整总会再次创造出相类似的工人阶级和阶级矛盾冲突。

本章将扩展这一分析的时间范围。一方面，我们将回溯到 19 世纪，比较分析汽车产业和 19 世纪的主导产业——纺织产业的动态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我们将展望未来，试图确认 21 世纪的主导产业，并将这些产业所可能具备的动态机制同过去的动态机制加以比较分析。

本章的主要观点有两点：第一，在任何一个单独的产业之

中，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发生的主要地点的变化，将随着生产的地理位置的转移而发生变化。换言之，我们认为：在世界范围的纺织产业中，同样能够发现我们在世界汽车工业中所观察到的、反复出现的主要罢工浪潮的类似模式。第二，我们认为：正如某一特定产业中的劳工抗争浪潮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一样，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劳工抗争的主要地点，也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主导产业的兴起或衰落，相应地从一个产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产业部门。上述第一个观点所涉及的是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在产业内部的发展轨迹，而第二个观点所涉及的，则是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在产业之间的动态规律。

为了分析这种不同产业间的动态规律，我们创造了“产品调整”（product fix）这一概念。在某一特定产业中，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利润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包括产业的地理重组（空间调整策略）或生产过程的创新（即技术或组织的调整），他们还同时试图将资本转移到新兴的、富有创造性且更有利可图的生产线和产业。这种产品调整的策略，包括将资本从竞争激烈的产业和生产线迁移到新的、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产业和生产线。伴随这种迁移的是接踵而至的新劳工运动兴起，以及原有劳工运动的衰落。

为了有助于将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动态机制联系起来，并为产业内部周期（intra-industry cycles）的比较性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基础，本章对产品周期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从这一经过重构后的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将看到：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一系列彼此重叠的产品周期（产品调整）为特点的，即某个产品周期的最后阶段总是与新产品周期的最初阶段相重叠，而新的产品周期的启动几乎总是无一例外地发生在高收入

国家和地区。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劳工抗争，是导致生产周期内部发生阶段性变化以及从一生产周期转向下一个生产周期的关键。

空间调整（即最初的生产周期理论所强调的生产的地理转移）和技术/组织结构调整（即生产流程的创新），通过各种特定的历史方式与劳工抗争联结在一起。但是，这些联结的方式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因此，它们对 19、20 和 21 世纪的世界劳工抗争演进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力图揭示蕴涵其中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 21 世纪工人所可能面临的处境作出有意义的推断。

本章第一节将从经过修正的“产品周期”的理论视角来重新叙述世界汽车工业的故事。以此为基础，第二节和第三节对纺织工业和 21 世纪的新兴主导产业分别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微观角度来看，在任何给定时期内，都有难以计数的产品周期开始或结束。但是，正如我们前文已经说明的，之所以选取纺织工业和汽车工业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由这两大工业综合体所构成的两个“宏观”的周期是过去 200 年间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重要基础。以英国为中心的纺织工业是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马克思将其视作现代工业的典型代表。纺织工业在 20 世纪初叶所经历的“边缘化过程”，与具有革新性的大机器生产的汽车工业（以美国为中心）的崛起是同步的。而且，不论是就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而言，还是从确立了 20 世纪的社会和文化标准的角度来看，汽车工业都堪称 20 世纪的主导产业部门。遵循这一逻辑，本章在最后一节中，试图探寻并确认继汽车产业之后，哪种（些）产业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兴领导产业，并探究这种产业的变化对劳工谈判力量以及未来的世界劳工抗争运动的意义。

第一节 汽车产业的产品周期

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所描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轨迹，可以被重新概念化为一种产品周期，不过，在这一产品周期中，劳工抗争构成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年最初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种创新性产品，其生产往往首先在高收入国家进行，而随着产品经历其“生命周期”，各种生产设备就会越来越向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转移。在该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即“创新”阶段，竞争的压力较小，因此成本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随着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并最终达到“标准化”，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数量就会增加，从而降低成本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第二章第二节中所描述的汽车工业在地理位置的转移——至少就其福特式生产模式的复制转移来说——大体上是符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即汽车工业的大规模生产相继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不过，产品周期理论的分析倾向于关注各种“经济”变量（如竞争力、生产要素成本），并将它们视作产品周期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而在我们所叙述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社会变量”——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抗争——具有重要的地位。^①劳工抗争的每一次重要浪潮都构成了导致每一轮生产扩散新阶段的“推动”因素之一，而每一轮生产扩散的新阶段，又会引发新一轮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因此，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斗争，使美国的汽车工业在其产品周期的创新阶段遭遇瓶颈；

^① 大部分有关产品周期的理论文献，都存在着技术决定论和单向分析的特点，对这一观点的批判参见泰勒（Taylor, 1986）。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爆发劳工运动浪潮，则使汽车工业在其产品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成熟阶段遭遇到瓶颈；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各类劳工激进运动的兴起，汽车工业在其产品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标准化阶段，开始遭遇到其瓶颈。图3-1描绘了汽车工业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劳工运动浪潮以及资本迁移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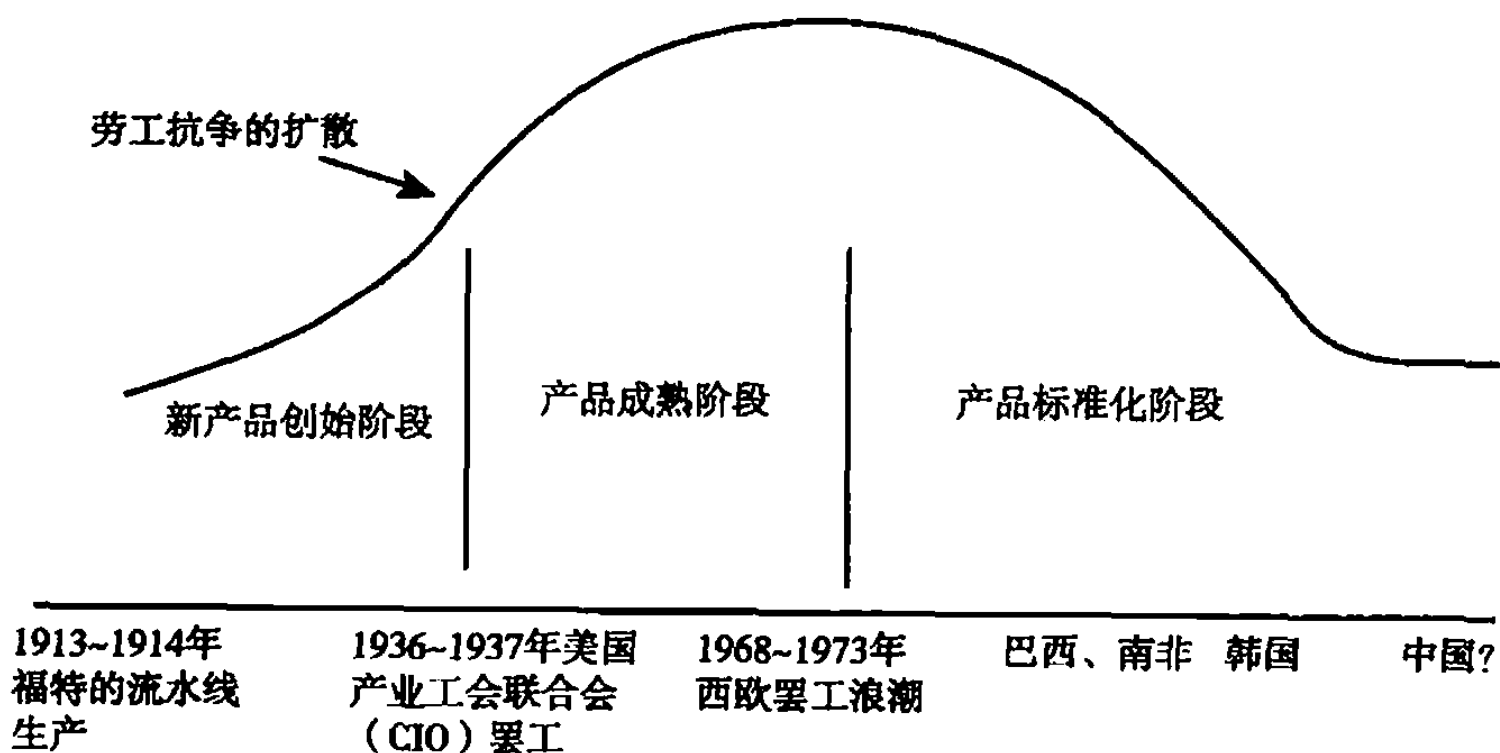


图3-1 汽车产业的产品周期与劳工抗争浪潮

我们在第二章中指出，汽车工业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并未导致工资和工作环境“冲向底线的竞赛”，原因就在于汽车工业扩张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工人阶级，哪里就可能爆发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也就是说，我们所强调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循环过程。而关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诸多文献，其所强调的是随着某种产品生产的地理位置的扩散以及生产的日益常规化，产品周期的各个阶段如何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下发生。因此，第二章所描述的工人抗争和资本转移的重复的动态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下的再次展现。通常，生产的创新者能获得不断积累的垄断性暴利——约瑟夫·熊彼特称之为“壮观的奖赏”（1954：73）。在经历了产品周期

发展的不同阶段后，我们会发现生产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而且，由于生产的新一轮扩张往往倾向于转向低工资地区，因此，产品的生产地点将越来越转移集中到相对贫穷的国家。

这种趋势反过来会对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汽车工人的劳工抗争所能取得的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劳工运动中劳资双方所能达成何种协议以及这种协议能否持久产生重要影响。在第二章中我们重点指出，汽车工人的每一次罢工浪潮都能够在工资、工作场所条件的改善以及扩大工会运作合法领域等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不过，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在产品创新阶段，较早进入产品周期的创新者们由于能够享受生产所带来的不断积累的垄断性利润，从而使他们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负担较为优厚稳定的劳资协议。因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罢工斗争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所获得的垄断性利润，使其能够签署稳定的劳资协议和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而这一协议与社会契约持续存在了超过40年的时间。与此相反，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末期阶段，生产迁移至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巨大的竞争压力使生产利润处于较低水平，劳资双方的社会契约在经济上越来越难以维持。换句话说，汽车工业机械化大生产的“后来发展者”遭遇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却无法获得妥善处理这些社会矛盾的好处。我们在其他研究中将此现象称为“半边缘化成功的矛盾”（Silver, 1990；亦可参见Arrighi, 1990b）。

缺乏稳定的劳资协议，工人运动反复爆发，反过来为生产的进一步地理转移提供了更大的诱因。由于上述原因，加之产品周期末期所存在的巨大竞争压力，“加快了”致使汽车工业的产品周期从一个阶段向下一阶段发展的社会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罢工之后，汽车工业生产地点的

转移和重构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伴随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与劳工抗争的激增相伴随的生产地点的转移和重建过程越来越迅速，并且对老工业基地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例如，参见第二章所描绘的20世纪80年代巴西圣保罗地区汽车工业就业水平的急剧下降）。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在产品周期的最初两个阶段并不存在激烈的“竞次”趋势，但在产品周期的最后阶段，却确实存在着这种趋势。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重点分析了生产的空间调整策略。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汽车制造商来说，技术/组织结构的调整策略与生产场所的空间转移策略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正如第二章所分析的，汽车制造企业大力追求生产流程创新的行为，在根本上改变了汽车产品周期的空间动态机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引入的生产流程创新，使得高人工成本地区的生产恢复了其相对于低人工成本地区的竞争优势地位。机器人的引入和即时（JIT）生产方法的应用，使得除中国、墨西哥北部地区等人工成本最低的地区之外的低人工成本地区的生产都受到了影响。^①

在产品周期的末期阶段，高收入地区有能力重新夺回竞争优势，这一现象与最初的产品周期模型的某些论述是吻合的。最初的产品周期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和决定论的，在这种模型

① 企业也试图通过寻求政府支持以及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以使产品周期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转变。无论是对打造新的汽车工业生产地（进口替代工业化）而言，还是对于保护甚至复兴衰败的汽车工业生产地来说，这种策略都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章中所探讨的汽车工业的后福特主义阶段发展轨迹，受到了美国对日本汽车向美国出口的配额限制的极大影响——美国美其名曰“自愿的出口限制”。在世界纺织工业中，该保护政策对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的发展，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中，竞争压力有效地使企业将生产重组（或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地方。正如其后关于产品周期模型的论述所强调的，企业并不仅仅是被动的行动者，而是积极地试图影响产品周期的方向和进度。用伊恩·吉迪（Ian Giddy, 1978: 92）的话来说就是：“产品周期模型”与其说是一种对真实事件加以描述的模型，不如说是一种“战略性经营理念”。产品周期模型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能够为敏锐的国际生产主管所预测、仿效甚至逆转”（亦可参见 Singleton, 1997: 22; Dickerson, 1991: 129 - 143; Taylor, 1986）。

尽管一直都强调了生产企业在决定产品周期的发展轨迹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产品周期理论的各种文献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同样敏锐的企业家们都具备影响产品周期并使之依其意愿发展的同等优势地位。产品创新最有可能在高收入国家发生，因此，同一产业的高收入国家的工人与低收入国家的工人，他们在面对雇主时处于完全不同的结构性位置之上。由于能够在企业层面上采取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的创新，加之在宏观层面上国家比较富裕，这使得核心地区的汽车生产企业能够支付得起高额工资并实行终身雇佣制，尽管其汽车工业的就业人数处于日渐萎缩状态。而那些处于更边缘地区的汽车生产企业，则不得不以更密集的劳动和更具镇压性的劳工政策为基础与之展开竞争。^①

因此，我们可以将两个阶段区分开来。在这两个阶段中，都没有出现显著的“竞次”的趋势。在生产的前期阶段，之所以

① 同样，同等精明的企业家从保护主义政策中获得好处的能力（参见前脚注），取决于国家对过境人员和商品实施限制的能力，这种能力随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由于全球化对边缘国家国家主权的侵蚀速度要远快于核心国家，因此，核心国家的企业家在利用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时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关于全球化是否会侵蚀国家主权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一章）。

避免了“竞次”这种趋势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福特的流水线大生产扩张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新的工人阶级，哪里就会爆发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劳工运动，而在生产的后期阶段，主要原因则在于生产流程的创新，以及成功地重新强化南北分裂的各种政治保护措施的实行。

这些不同策略的结合——空间调整以及技术/组织调整等策略——可能会重新整合空间分化的过程。一方面，新的组织和技术上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创新者所垄断，从而能够为更合理的劳工—资本—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的建立提供更良好的基础，以保持合法性与利润率之间的相对平衡，尽管就业劳动力的数量在不断缩减。另一方面，在相对贫穷的国家，由于其竞争优势有赖于持续不断地降低成本，对利润率的追求将会导致其持续的合法性危机。最终，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三节将要讨论的，产品调整的动力机制将进一步加深这一分化过程。

第二节 比较视角中的纺织工业产品周期

早期纺织工业产品周期中的劳工抗争和资本转移的动力机制，与汽车工业产品周期中的动力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纺织资本流动到那里，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就发展到那里；并且，一旦冲突发生，资方就会通过资本的空间调整和技术调整来进行应对。但是，与汽车产业不同的是，虽然全世界的纺织工人都非常激进，但他们的斗争基本上都遭遇了失败。在所有失败的记录中，有两个个案却是例外。一个发生在创新的始创地英国，那里的纺织工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创新者获得的垄断性巨额利润有助于其承诺负担一个相对长期的、稳定的劳资契约。另一个例外则是参与到殖民世界高涨的国家解放运动浪潮中的纺织工人。纺织工

人和汽车工人抗争结果大相径庭，可以归咎于这两种工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工人谈判力量的差别。

表 3-1 世界上纺织行业和汽车行业的劳工抗争高潮 (1870 ~ 1996)

时 间 国 家	1870 ~ 1979	1880 ~ 1989	1890 ~ 1999	1900 ~ 1909	1910 ~ 1919	1920 ~ 1929	1930 ~ 1939	1940 ~ 1949	1950 ~ 1959	1960 ~ 1969	1970 ~ 1979	1980 ~ 1989	1990 ~ 1996
纺织产业													
英国	(X)						(X)						
俄罗斯				X									
美国					X		X						
西班牙					X		X		X				
波兰						X							
中国						X	X						
德国						X							
澳大利亚						X							
印度						X							
法国							X						
比利时							X						
加拿大							X		X				
墨西哥							X						
埃及									X				
巴基斯坦									X				
汽车工业													
美国							X						
加拿大							X						
英国									X				
法国										X			
意大利										X		X	
德国											X		
西班牙											X		
阿根廷											X		
南非												X	
巴西												X	
韩国												X	

注：该表中所列的国家，都是劳工抗争数量占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记录的纺织行业或汽车制造业劳工抗争总次数 1% 以上的国家。“X”标记的为劳工抗争的高峰年代，即该国劳工抗争最激烈的年代，以及（或）在这些年份中发生的纺织或汽车工业劳工抗争的次数，要大于该国所有被记录的纺织或汽车工业劳工抗争次数的 20%。亦可参见本章第 4 个和第 5 个脚注。

表 3-1 所提供的, 是 1870~1996 年间,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记录的纺织工人和汽车工人抗争浪潮的时空分布状况的一幅鸟瞰图。该表中涉及的国家在这两个产业的发展中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劳工抗争。^① 其中, 那些经历了劳工抗争高发的年份被用“X”标示出来。^② 图 3-2 则对纺织部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劳工抗争高潮以及资本转移情况予以描绘。之后, 我们将分阶段逐一比较纺织产业和汽车产业的产品周期, 重点描述这两个产业中劳工抗争机制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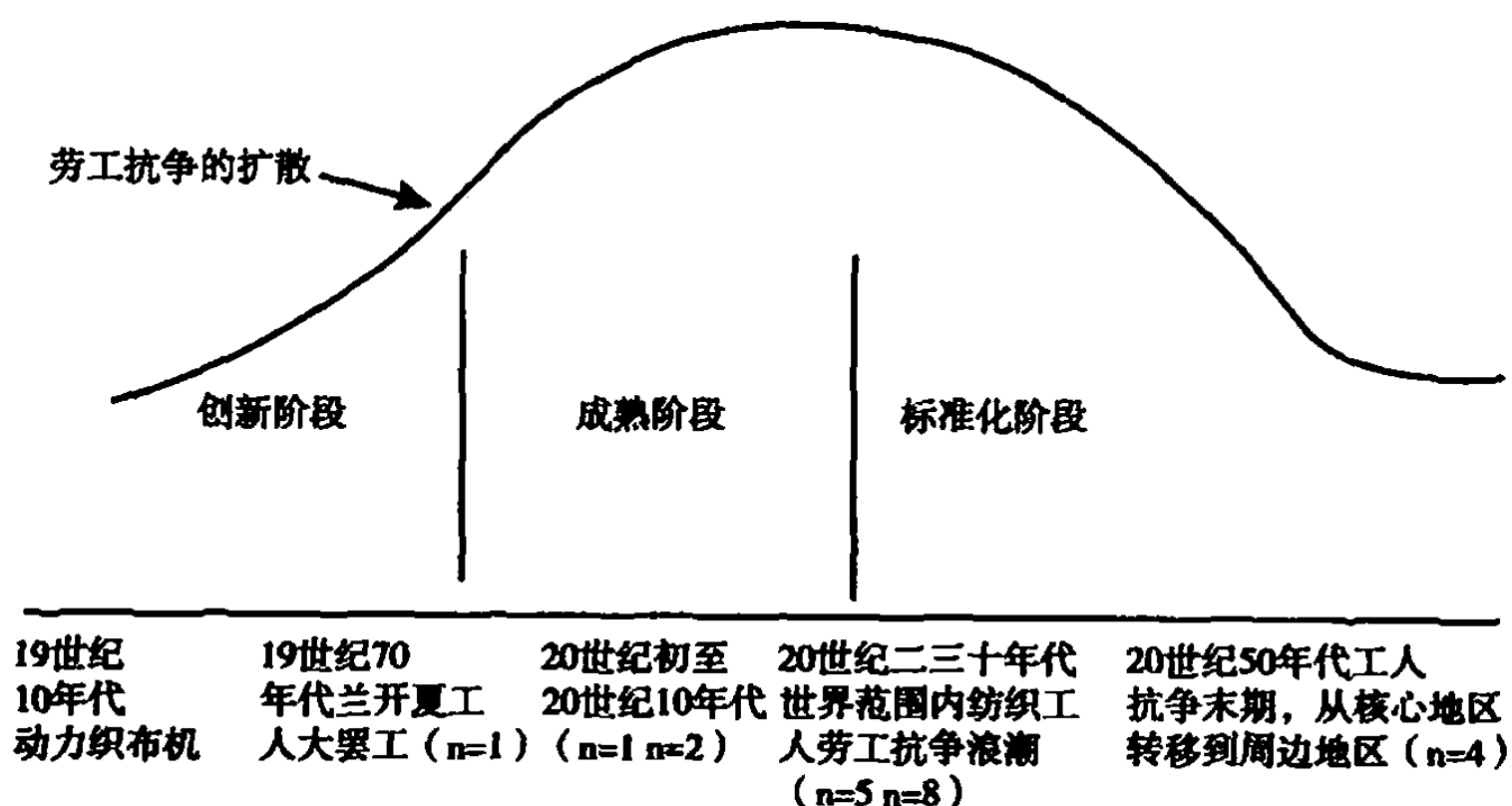


图 3-2 纺织产业的产品周期和劳工抗争的变动情况

(n = 每 10 年中的罢工高潮点时的罢工次数)

- ① 那些被认为是经历过大规模劳工抗争的国家, 指那些在该产业中的劳工抗争次数至少占世界劳工小组所记录的劳工抗争总次数的 1% 以上的国家。
- ② 所谓劳工抗争高发年份, 指该国家劳工抗争最激烈的年份以及/或在这些年份中发生的劳工抗争次数, 要多于该国家所有的被记载的劳工抗争次数的 20%。由于 19 世纪末期英国的数据仅来自一个数据库 [即纽约时报 (NYT) 指数], 且该指数是两个数据库中相对较弱的一个 (参见本书后的附录 A), 因此, 对英国我们采用了另一个标准。鉴于在关于英国的数据里没有任何一个年份的劳工抗争次数等于或超过有所记载的英国纺织产业劳工抗争总次数的 20%, 因此我们将其中两个最高年份标注为劳工抗争高发年份。

无论是在纺织产业还是在汽车产业的产品周期中，劳工抗争的首次重大成功都发生在第一个生产该产品的国家（例如，纺织产业的兴起是在英国，而汽车产业是在美国）。美国汽车工人构成了20世纪中期劳工抗争的先锋，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了工作和报酬的基本标准；与之相类似，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纺织工人工会是最强大的工会之一。

不过，无论是美国的汽车工人还是英国的纺织工人，其抗争力量都是在旧的、以工匠为基础的运动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才取得的。在19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①英国兰开夏纺织工人发动的重大劳工抗争浪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阻止新技术的引入（例如动力织布机和走锭细纱机等），因为新技术的引入会降低工人建立在技能基础之上的谈判力量（Sarkar, 1993; Chpman, 1904; Lazonick, 1990: 81; Thompson, 1966）。然而，正如一个世纪后金属行业中技工的抵制未能阻止汽车业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扩张一样，本次罢工和其后的纺织工人罢工（包括1842年的工人大罢工），也未能阻止纺织行业的机械化进程的扩张以及相应的工资普遍下降的趋势。

作为上述劳工抗争失败的副产品，一个新兴的职业——机器操作工——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在纺织行业，纺纱工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世纪前半叶，由于技术革命经常导致失业并不断创造出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纺纱工这一新兴工人群体的工会力量十分微弱（Lazonick, 1990: 90），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纺纱工才有能力组建有效的行业工会，并在1869 - 1875年间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行业罢工（参见表3-1），迫使

^①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始于19世纪70年代，因此，不能用它来把握19世纪早期和中期遭受失败的劳工抗争浪潮的情况。

纺织工业资本家不得不整体作出重大妥协让步。1870年，在家庭作坊式生产的繁荣走向衰落之际，纺织操作工联合会成立了，并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成为英国势力最强大的工人组织之一（Lazonick, 1990: 103）。因此，尽管在纺织行业中这一过程的发展要显得更为漫长，但无论是在纺织行业还是汽车行业中，重大劳工抗争胜利的首次取得，都发生在产品创新阶段的所在地，并且都发生于产品创新阶段即将终结之时。

除此之外，这两个行业的工人都通过劳工抗争取得了稳定的劳资协议，从而确保工人能够获得实质性的物质利益，并为此后几十年中的产业关系的相对和平奠定了基础。美国劳工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取得的劳资协定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与之相似，19世纪70年代的兰开夏斗争所最终形成的一套得到广泛认可的薪酬体系，其应用更是长达几十年之久。“通过这种薪酬合同，纺织工人可以通过照看更长和更快的纺纱机以及付出更多的劳动，来分享更多的利益。由于获得了工会力量的支持来强制实施这种计件工资制，纺织工人就能更努力地工作以增加其收入，而不必担心其个人获得的单件产品的回报率会被缩减”（Lazonick, 1990: 113；关于与美国的对比，亦可参见Cohen, 1990）。

在产品周期的创新阶段即将终结之时，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工人都有能力赢得巨大的、长期的利益，这说明，创新者在特定产品生命周期的创始阶段所获得的巨额垄断利润，也为稳定的劳资妥协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至少提供了物质资源）。然而，至少在汽车行业和纺织行业，一旦劳工运动开始显示出其力量，资本家就会采用空间调整的策略，从而加速生产向新区域的地理扩散并推动该产业向成熟阶段发展。然而，两个产业的生产的地理转移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产品周期的成熟阶

段，纺织行业的地理扩散范围要远比汽车行业在其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甚或更早阶段）的扩散更为广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汽车的大规模生产还主要限于高收入国家^①；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具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化纺织生产就已经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大陆，还出现在印度、中国以及日本。

纺织业的机械化生产的地理扩散范围之所以较汽车业更广，是因为它和汽车工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不同。首先，纺织业的准入门槛较低。纺织业的启动成本即对固定资本的要求相对较低。其次，由于纺织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对而言并不显著，且标准化生产所必需的机器也较容易获得，因此，小企业也可以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再次，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西欧尚未出现汽车的大众消费市场，但在19世纪末，即使贫穷国家也存在着对纺织品的旺盛需求，这使得纺织品生产的进口替代战略显得更为可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纺织品的机械化生产是工业革命的新产物，但纺织品生产本身在前现代时期就已得到传播。在工业革命之前，许多国家都有着悠久的纺织品生产历史，它们很快接受了纺织业新的机械化生产模式，并且，有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竞争力甚至超过了欧洲的纺织品生产商。事实上，在18世纪，英国的纺织行业深受从印度涌入的质优价廉的纺织品竞争的冲击，只有在受到政府保护后，它才开始腾飞。因此，面对从英国进口的廉价纺织品的冲击，那些具有纺织品生产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具备采取本土生产以替代进口的能力和动机。这一点与英国纺织品制造商的空间调整战略相结合，导致了纺织产业迅速而广泛的扩张。

^① 仅有的例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较大的中等收入国家经历了进口替代导向的增长，而这些国家的生产不但在世界市场上不具竞争力，而且其占整个世界生产的比例也并不很大。

至少新英格兰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该地区纺织业机械化生产的扩张以及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兰开夏纺织行业中的劳资冲突的发展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从兰开夏迁移到该地的企业家和技术工人，对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并引发了最初的、同样的劳资冲突模式（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东北地区的纺织工人绝大部分是从英国其他纺织工业发达地区迁移过来的熟练工人，他们同时还带来了组建工会的传统。其中的一部分移民工人已经上了雇主的黑名单或因从事工会活动而赋闲在家，但大部分工人的流动得到了其原先的工会的支持，因为他们的迁移本身就是工会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目的是降低兰开夏地区的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Cohen, 1990: 140 - 4）。虽然这些迁移工人从未取得像兰开夏地区纺织工人所拥有的那么大的控制权，但其努力也有助于使得兰开夏纺织行业的劳资关系标准成为该行业中的劳资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他们常常就技工权力以及工资等问题举行多次罢工。就在兰开夏爆发最重要的一次劳资纷争的时期，在秋河地区——“美国的曼彻斯特”——也发生了一次最艰苦的劳资纠纷。但是，与兰开夏劳资纠纷的结果截然不同，“在秋河所举行的每一次罢工，最终都以资方完全战胜劳方而告终”（Cohen, 1990: 116 - 7）。

不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劳工抗争也取得过一些成功。例如，1919年发生于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罢工，使20世纪10年代成为美国纺织业劳工抗争的高发时期（参见表3-1）。这些胜利，加上由于罢工（常常是失败的）而导致的频繁的生产中断，使资方采取措施降低其对该地区劳动力的依赖，尤其是纺纱工，他们生产着整个纺织业活动所必需的原料（棉纱）。正如伊沙克·科恩所指出，由于纺纱工负责必需的棉纱供应，因此，“无论是在兰开夏还是在秋河，一旦所有的纺纱机停止工作，迟早都会导致

包括织布工人、设计师、印花工人以及预备工等的停业，总之，整个纺织工厂的劳动力的停工”（Isaac Cohen, 1990: 127）。

因此，为了解决其劳工控制问题，美国纺织企业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追求一种综合了技术调整和空间调整策略的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罢工之后，资本家开始用环锭纺纱机来强制性取代走锭纺纱机。环锭纺纱机主要依靠无组织的女工和童工来照看。秋河地区的制造商们意识到，从走锭纺纱机转向环锭纺纱机，正如其中一位制造商所指出的，可以最终摆脱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的走锭纺纱机工人（转引自Cohen, 1990: 131）。事实上，制造商公开威胁工会组织，声称，工会如果“非常不明智地使用其权力”，将会不可避免地加速环锭纺纱机替代走锭纺纱机的速度。在1879~1904年间，秋河地区的资本家继续降低着走锭纺纱机的数量，其占纺纱机总体数量的比例从73%降低到24%。相应地，从1879年到1909年，该地区的走锭纺纱机的使用量从1000台下下降到350台（Cohen, 1990: 133）。

同一时期，在美国南部开始大规模兴建使用环锭纺纱机的纺织工厂。从1880年到19世纪末，美国南部地区的纺织产业产出值，从1300万美元上升到8500万美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飙升到超过8亿美元。到1930年，美国南部地区的纺织品总产出比北部地区的两倍还要多（南部地区为8.74亿美元，北部地区为3.69亿美元）（Cohen, 1988; Sarkar, 1993: 16）。南部纺织工业的扩张，一方面受益于北方资本家为解决其劳工和利润率问题而采取的空间调整策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南部精英阶层在独立战争后也希望通过投资于纺织工业，为其在南方的社会和政治权力谋求一个新的经济基础（Wood, 1991）。

19世纪末期的美国南部地区，仅仅是许多受益于进口替代策略和资本转移策略而得到快速扩张的重要纺织中心之一。到世

纪之交，在世界各地都有了大规模的纺织工业中心——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都比兰开夏或新英格兰地区要更为便宜。

以印度为例，印度本土商人率先实现了印度棉纺织业机械化。在其纺织工业中心孟买，第一个机械化的棉纺厂于1856年开业。到1860年，一家孟买当地报纸夸耀说：“孟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方的利物浦，现在她已经成为东方的曼彻斯特（转引自 Morris, 1965: 18）。”虽然这有些夸张（当时当地只有6家纺织厂），但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孟买的棉纺织工业确实发展迅猛。早在1862年，一个英国观察家 R. M. 马丁就曾经不无担忧地指出，“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也能见证到印度竞争者对兰开夏的纺织制造商所造成的打击”（转引自 Morris, 1965: 25）。到1900年，孟买的纺织工厂达到86家，并且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其规模和数量都保持着快速的扩张态势（Morris, 1965: 27 - 28；亦可参见 Chandavarkar, 1994）。

而在日本，自明治政府将其列为优先发展项目之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生产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开始快速扩张。到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已经有34家棉纱厂，其中10家拥有超过18000个纱锭（参见 Tsurumi, 1990: 35 - 36, 104）。到1890年，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棉纺织品出口国，且其棉纺织行业的快速扩张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反映该产业迅速扩张的一个指标，是平均每年生棉的进口和消费量从1860年和1879年间的1000吨上升到1900年和1919年间的29.4万吨；在1920年到1939年间，平均每年的生棉进口和消费量则达到66.5万吨。除此之外，日本占世界纺织品和成衣出口的比例，从1899年的2%上升到1937年的22%（Park 和 Anderson, 1992: 23, 25）。

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其19世纪后期纺织行业的扩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中国有着“廉价”

而“顺从”的劳动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896年，从英国派到上海的布莱克伯恩代表团（Blackburn mission）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的纺织业发展会对英国的纺织品出口构成潜在威胁，并且针对兰开夏的劳工问题，他们提出一种空间调整策略：

比较东方中国的劳动力和我们本国劳动力就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数量充足，顺从听话，勤劳肯干，他们还拥有我们所提供的最好的机器；而在英国，劳动力价格高，苛求多，桀骜不驯，并且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机器。谁还会认为两个国家的工厂生产条件是相同的呢？相比之下，上海的资本家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会发现，雇用本地劳工来生产纺织品，会比从英国进口纺织品更有利可图（转引自 Honig, 1986: 16）。

在1895年和1896年，英国公司相继在上海开设大型纺织工厂（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并开放上海作为外国投资地点之后）。一年之后，德国和美国也开始在上海设立棉纺织工厂。1911年以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急剧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棉纺织品进口被禁止，一些显赫的中国家族开办了大型工厂，并成为主要的纺织工业家。到1929年，中国有61家纺纱工厂，雇用了110882名工人；另有405家织布厂，雇用了29244名工人（Honig, 1986: 16-17, 24-25）。

到20世纪20年代，机械化纺织生产的全球化致使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加剧。和20世纪70年代的汽车生产商在面临类似竞争压力时所采取的方法一样，纺织业的制造商们致力于寻求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并降低生产成本，这些手段反过来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全球范围的纺织工人劳工抗争的主要浪

潮。和汽车产业一样，响应这些生产的理性化措施的激烈劳资冲突兴起于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不过，纺织行业中所发生的更广泛的生产扩张，其所引发的劳资冲突也更为普遍。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发生于汽车产业产品周期成熟阶段末期的劳工抗争现象，主要集中于核心地区（西欧），而纺织工业成熟期的终结，却是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全球范围的劳工抗争作为标志的。大规模纺织工人罢工的地点遍布于曼彻斯特、孟买、加斯通里亚（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以及上海等地（参见表3-1）。

发生于纺织工业产品周期成熟阶段的更为广泛的纺织工人劳工抗争，并不意味着工人有了更多的谈判力量。相反，虽然纺织工人的战斗性不容置疑——事实上，科尔和思艾格尔将纺织工人参与罢工的倾向性划分为中—高水平，仅次于处于最高层次的矿工和海员/码头装卸工——但是，纺织工人的抗议却很少能获得成功（Kerr和Siegel，1964）。这与汽车工人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的劳工抗争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的纺织工人战斗性所导致的，几乎是普遍的失败。即使在英国这个纺织工人力量的堡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劳工抗争也大多以失败告终。^①虽然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的罢工所赢得的长达40年的社会契约相比，20世纪60年代汽车工人运动所赢得的社会契约所维持的时间并不算长（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推翻了），然而，与纺织工人的抗争在其产业的产品周期的相似阶段所取得的结果相比，汽车工人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很令人瞩目了。

^① 在1926年工人大罢工之后，又发生过五次纺织工人罢工。从1927年到1933年因罢工而损失的3000万个工作日中，有超过18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可归咎于这五次全国范围的纺织工人大罢工（Singleton，1990；Sarkar，1993：14）。

关于这一点，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南部地区纺织工人的主要劳工抗争浪潮的命运，包括纺织工人在1934年的总罢工，这一总罢工比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汽车产业中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时间仅仅早了两年而已。虽然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这些罢工最终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失败，包括1934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次大罢工，它最后还是以劳工的“决定性溃败”而告终（Truchil, 1988: 94 - 103; Irons, 2000）。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同一时期参加罢工的纺织工人的境遇相对来说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有更强的组织谈判力量，且该地区的政治环境更为宽松。但是，该地区的罢工最终只是加速了纺织资本向南部转移的趋势（Truchil, 1988: 102 - 103）。

在纺织工业的成熟期，工人所取得的胜利几乎全集中在那些可以得到民族运动支持的地区。在印度，一战之后爆发的孟买纺织工业罢工浪潮，包括1919年和1920年举行的大罢工，就发生在纺织行业蓬勃发展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这次罢工浪潮并没有完全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成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纺织行业的繁荣逐渐被激烈的竞争所取代，工厂主们开始致力于减少工资和雇佣的人数，并加快工人的工作节奏。工厂主们的这些努力，遭到了1924年和1934年的工人激烈罢工的抵抗。同样，这一轮罢工也并非完全失败。民族运动领导者开始越来越将工人斗争融合到民族运动之中。并且，英国政府所奉行的旨在维持印度市场对兰开夏纺织品的出口保持开放的政策，以及印度本身在工资和就业上的困难状况，足以导致印度工人参加各种民族主义运动（Chandavarkar, 1994）。随着1937年印度国大党在孟买省当政，政府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协调纺织工业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以期同时控制工人和资方的行为。最初，国大党通过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行业工会建立联盟来实

现这一点。但到了1945年，考虑到印度即将独立，一个由国大党控制的工会——RMMS (Rashtriya Mill Mazdoor Sangh) 成立了。到1951年，RMMS已经成为孟买纺织行业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并且有能力有效地将工人的抗议纳入官方政府所认可的渠道 (Morris, 1965: 191-195; Sarkar, 1993: 28)。

在中国，纺织工人的劳工抗争也与民族运动紧密相连。起初，这些联系加强了劳工抗争的力量，但是，这也使劳工运动更容易受到政治气候重大变化的影响。1925年，中国的棉纺织工人在著名的五卅运动中被镇压。这次运动的起因是一个棉纺织工人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被日本卫兵枪杀。该事件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政府的控制，本次游行被殖民警察力量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1925年5月31日那天，为了抗议殖民警察枪杀游行者的行径，中国总商会宣布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及商人罢市。此次抗争所提的要求包括：上海的警察力量应由中国政府加以控制；中国人应在市政府部门中有自己的代表以改善上海工厂的劳动条件。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以上海的棉纺织厂为主力，罢工行为持续升温。在1927年2月，工人发动了一次总罢工并获得巨大胜利，工人们在闸北区成立了临时自治政府。这也是当时作为国民革命军领导人的蒋介石能够在3月底一枪未发就进驻上海的一个原因。当时，纺织工人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通过罢工来增加工资和增加工会的知名度 (Chesneaux, 1968; Honig, 1986)。但是，中国的经验也表明，工人运动如果与政治运动相联系，并且依赖基于跨阶级联盟的组织谈判力量来赢得战果，那么，其易受政治因素影响的脆弱性也就表现出来。到了4月12日，纺织工人运动的这种易受政治风向转换影响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天，蒋介石的士兵在青帮武装成员（类似黑手党）的协助下，发动政变摧毁了工人运动，开始了白

色恐怖的时期 (Honig, 1986: 27)。

总之, 通过比较汽车工业和纺织工业在其各自成熟期的劳工抗争, 我们发现: 两者之间既存在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 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这两个行业中, 针对利润率和劳工控制的地方性危机而实施的空间调整策略, 不仅仅是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 同时也是劳工抗争的产物。而且, 这两个行业所采取的空间调整策略, 只不过是成功地实现了利润率和劳工控制的危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而已, 它同时也使得通过稳定的劳资契约来解决这些危机变得愈加困难。

不过,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 这两个产业的劳工抗争在行业内部的扩散过程存在着两个重大差别。首先, 与汽车行业相比, 纺织行业在产品周期的成熟阶段所发生的劳工抗争高潮, 在地理上的扩张更为广泛。从表 3-1 对纺织行业和汽车行业成熟期劳工抗争浪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有 12 个国家出现了纺织行业劳工抗争的高潮, 而在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只有 5 个国家出现了汽车行业劳工抗争的高潮。其次, 正如此前所述, 汽车行业中工人通过劳工抗争而迫使资方妥协所赢得的成功, 整体上要大于纺织行业。两个行业的劳工抗争在整体成功率方面的不同, 很有可能与第三个差别联系在一起, 即在任何给定的国家, 纺织业都更有可能重复发生劳工抗争的高潮 (我们从表 3-1 中能够看出来这一点)。^① 这就相应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工人的谈判力量和工人的战斗性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稍后来讨论这一问题。

汽车工业和纺织工业劳工抗争的成功率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

^① 可以看出, 在汽车行业, 只有意大利出现了超过一次的劳工抗争浪潮的高峰点; 而在纺织行业, 有 5 个国家出现了劳工抗争浪潮的高峰点。

差别，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到这两个行业在组织模式方面的差别及其对工人谈判力量的不同影响。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组织模式的某些差别与纺织品大规模生产的地理扩张之间存在着联系。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其对工人谈判力量尤其是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影响。纺织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要明显弱于汽车工人。在纺织产业中，持续的流水生产所赋予工人的破坏性力量是很小的。与福特式大规模生产的垂直一体化及不间断的流水线生产不同，纺织行业的生产是垂直分割的，其劳动生产过程被分割为各个离散的阶段。一台纺纱机或者织布机的工作，并不要求另一台纺纱机或者织布机先完成其工作，因此由少部分纺织工人停工所造成的并行的破坏，其影响力是很小的。纺织工厂中一台或者几台机器停止了运转，并不会减缓或导致其他机器停止运转，因为每一台机器（和每一个机器的看管者的工作）都可以独立于其他机器（和工人）而运转——这是汽车行业以及其他流水线生产行业所不可能具备的组织特征。^① 此外，由于纺织工厂一般规模较小且生产过程是垂直分割的，单个工厂的罢工不会造成大量固定资本的闲置，罢工所造成的破坏也不会波及整个行业或整个地区。^②

① 在美国的纺织业罢工中，雇主能够在走锭纺纱机工人完全罢工时维持着环锭纺纱机的生产。相关论述，参见科恩（Cohen，1990）。

② 在某种程度上，纺织工人的谈判力量的状况，与后福特汽车生产时期供应商企业中的生产工人的状况相似。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汽车行业的产品分包和及时（Just in time）生产方法的采用，使得其更易遭受来自供应商零部件供应中断的威胁。同样，由于在纺织行业中，棉纱是涉及很多岗位的基础产品，大规模的棉纺行业的完全罢工会中断下游企业的生产。但是，由于纺织行业的工人工作的环境是数以千计的众多小企业，拥有这些小企业的是不同的雇主，因此，想要组织一场如此完全和广泛的罢工，需要强大的（工会）组织力量。即使在这一相似之处上，汽车工人所需要的补偿性组织力量也要小于纺织工人，因为在汽车产业中后福特式供应链的特点是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一对多”的关系，而在纺织行业，则是“多对多”的关系（参见 Gereffi，1994）。

纺织工人不但具有相对较弱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其基于稀缺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总体而言也不很强。即使在兰开夏地区操作走锭细纱机的纺织工人，其技工地位的获得也是更多地建立在工会力量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他们真正垄断了稀缺技能。除此之外，纺织产业对工人技能水平依赖的减少已经是大势所趋。与手工纺纱相比，走锭纺纱机需要更少的技能，而环锭纺纱机对工人经验和体力的要求就更少了。

当然，汽车行业工人基于稀缺技术的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大概也不比纺织工人强多少。不过，纺织工人的市场谈判能力总体上要更弱一些。第一，在纺织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流动的剩余劳动力储备更大，因为其机器化生产已经取代了大量的非机器化生产的制造者，而汽车产业由于是一个新兴产业，尚未发生这种情况；第二，纺织行业的兴起和扩张发生在广泛而普遍的对原有生计活动的瓦解破坏时期，这导致依靠工资生活的、新的无产阶级劳动者被持续不断地一再生产出来；第三，纺织行业的进入门槛更低，这导致新的、更低成本的竞争者持续涌入，并逐渐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而结果就是在任何纺织业聚集的社区，其就业都是很不稳定的；第四，因技术更新而产生的周期性失业，也会进一步降低纺织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最后，对生产固定资本的低要求，使得纺织企业更容易将生产转移到新的地点（例如，采取空间调整策略或进口替代策略等），也更有利可图，从而扩大了潜在的劳动力储备，并进一步削弱了纺织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

鉴于纺织工人所具有的结构性的谈判力量相对较弱，组织谈判力量成为此前所描述的纺织工人抗争运动获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末期英国纺织工人运动的胜利，主要是

基于坚实的工会组织，它不但能组织并从经济上支持长时间的区域性总罢工，并且还能组织剩余劳动力向外迁移。如前所述，英国的纺织工人还具有一些其他地区纺织工人所不具备的特征，尤其是英国作为纺织工业的创新地（在其持续其间），其工厂可以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奖金。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英国纺织行业工会的组织能力，因为工人能够依靠他们的工会成员身份而获得经济支持，这使得他们在面临一系列经济萧条时得以捍卫自身的利益。^① 与之相类似，围绕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起来的、以跨阶级联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强大组织力量（在这种联盟的存续期间），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纺织工人所取得的胜利来说，具有关键作用。然而，这些是特例，更普遍的情况是工人的结社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弥补较弱的纺织工人的结构性谈判力量的地步。

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早期的罢工浪潮标志着汽车工业成熟期的结束一样，纺织行业成熟期的终结，与发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世界范围的纺织工人劳动抗争浪潮是一致的。这两个行业成熟期的结束，都以劳工运动激进程度的增强和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为标志，这导致了企业家们全力实施空间调整和技术调整策略，并导致了各种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产品周期标准化阶段的空间调整策略导致了生产的进一步扩散，另一方面，该阶段的技术调整所引入的广泛的自动化生产方式，使高工资生产地区的竞争力在部分程度

① 英国纺织工人对车间的控制权力，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其工会力量强大的基础，关于对这一点的强调，参见莱苏尼克（Lazonick, 1990：第三章）。除此之外，英国与其他地区很不同的一点在于，其纺织行业是由很多小型家庭企业组成。结果是，个体雇佣者很少有资源与工人进行斗争，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创造“劳工贵族”来换取产业关系的和平。

上得到恢复。^①

这些调整策略所导致的共同的后果是：核心地区所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剩余下来的工人（大部分在边缘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进一步下降，以及相应的劳工抗争的消退。就纺织产业而言，正如我们从表3-1所看到的那样，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其所记录的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些“残留”的劳工抗争高潮点，主要发生在一些非常边缘的地区，而在此之后，纺织行业劳工抗争浪潮的高潮点消失了，即无法达到数据库记录的筛选标准。^②汽车工业是否会遵循类似的发展轨迹？目前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一方面，如果在汽车行业的标准化生产阶段所发生的劳工抗争也遵循着纺织行业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将表3-1所记录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汽车业劳工抗争的高潮，理解为“残留”的汽车产业劳工抗争的最后喘息；另一方面，考虑到汽车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较强，即便是在其标准化生产阶段，在汽车工业扩展的新兴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依然有可能发生劳工抗争的浪潮。此外，考虑到中国疆域辽阔且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

① 以汽车制造为例，在标准化阶段，高工资地区之所以能维持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参见本章第二个脚注）。在美国，工会联合纺织业制造商来游说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立法，以期能减缓纺织业就业下降的趋势。而由美国汽车行业工会发起的“购买美国产品”运动，最初也是由纺织以及制衣工会发起的。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却促进了纺织、汽车生产商受限于出口配额，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有配额的工资更低的地区，因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竞争压力，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所始料未及的。在日本，这种因配额限制而发生的产业转移情况非常普遍。首先，20世纪30年代，日本纺织业生产转移到亚洲的其他低工资地区，而后，到20世纪80年代，其汽车制造业也开始转移到亚洲的其他低工资地区。

② 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放宽视野将世界政治纳入分析视野之中，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战后纺织行业劳工抗争的消退，部分原因在于纺织产业的成熟期和标准化阶段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汽车产业存在着根本不同。

位，我们也许能够预期，中国所可能发生的，将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汽车工人劳工抗争的高潮点的到来，而非“残留”的汽车工人劳工抗争的“最后的喘息”。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关注的，是对发生于纺织业和汽车业内部的劳工抗争机制进行分阶段比较。但是，存在于纺织行业和汽车行业产品周期内的劳工抗争的兴起与衰落并非两个独立的现象。这两个行业劳工抗争的发展轨迹，本身通过一种产业之间的动态机制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称这种机制为“产品调整”策略。从这个角度来说，纺织行业和汽车行业的产品周期相互重叠，相互影响。当纺织工业达到其成熟阶段（此时劳工抗争及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资本就开始转移到那些新兴的、具有创新性的产品线，从而使资本能较少地受到劳工抗争的威胁和竞争的压力，而在这些产品线中就包括汽车产业。并且，随着纺织产业进入标准化阶段、汽车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劳工抗争浪潮的高潮点就开始在纺织产业中消失，转而在汽车产业中兴起。这一劳工抗争的中心随时间的推移而在不同的产业间转移也能够从表3-1中看出。

因此，如果我们将这两个产品的周期看做相互关联的现象，就可以发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于每一个主导产业内部的劳工抗争周期的兴起与衰落是嵌入到行业之间劳工抗争的转移过程的，而这一转移过程，则随着新的产品周期的兴起而发生。并且，劳工抗争从纺织行业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即汽车行业的过程，还伴随着劳工抗争动力机制的根本性转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新兴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中，产业工人的结构性谈判力量要远远强于此前的主导产业（纺织产业）工人的谈判力量。由于汽车生产更易遭受工人罢工的影响，汽车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也就更为强大。而汽车工人的

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之所以更为强大，则是因为汽车生产比纺织品生产更难以进行空间上的转移。

汽车工人更为强大的谈判力量，与其斗争的高成功率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与斗争的激进程度无关。事实上，从表3-1中对劳工抗争高潮点年份的记录可以看出，纺织工人斗争的激进程度要强于汽车工人。这种激进程度和谈判力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雇佣者在面对结构性的强大（或弱小）的劳工运动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资本更易遭受工人直接行为的影响，如果资本寻求空间调整策略的解决之道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那么，雇佣者就会感到更多的压力去回应工人的要求和抱怨。而这种回应，反过来也会减少工人一再采取激进行动的动机。^①

总而言之，世界劳工抗争的总体动力机制，与产品周期的兴起和衰退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人谈判力量的程度和性质的改变，是深深嵌合在一起的。^② 我们要想进一步理解目前以及未来劳工抗争的动力发展机制，就需要去探究哪种（些）产业最有可能接替汽车工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以及身处这一（些）新兴主导产业中的工人的谈判力量的本质所在。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简要讨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由于我们过去集中关注的是制造业，该部门曾经被忽略了。但是，它对理解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世界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的动力发展机制，都是十分重要的。

① 劳工抗争的激烈程度和工人议价能力之间的反向相关在之前的多个叙述中被提及。迪奥（Deyo, 1989: 79-81）同样指出，在韩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劳工运动中，纺织女工的抗争最为激烈。事实上，她们比汽车行业工人运动更为激烈。然而，汽车工人（包括其他重工业）所赢得的利益却要远大于纺织工人（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 我们将在第四章引入世界政治机制时进一步发展该论断。

第三节 产品周期、调整策略与运输 产业中的劳工抗争

运输业把“出售地点变化”作为自己的产品（Harvey, 1999: 376）。纺织和汽车产业（事实上包括所有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在几个“特定时点”都需要依赖运输业，包括原材料的获得（其中包括使工人到达工作场所）、将中间产品从某个生产场所转移到下一个工作场所以及将最终产品运到市场上，等等。历史上，任何地区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都有赖于新的交通和通讯网络的发展，以便分送货物和获取各种原材料（Riddle, 1986: 3、7、33、37-38; Hartwell, 1973: 373）。^①

鉴于运输业在历史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种中心地位，从我们的理论框架出发我们可以预期，运输行业的劳工抗争，应该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涵盖的所有历史时期的劳工抗争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此外，就像制造业内部的劳工抗争中心从纺织业转移到汽车业一样，我们也能够作出这样的预期：在运输业内部，随着各种不同运输方式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劳工抗争浪潮也会出现类似的转移。^②

世界劳工小组的数据支持了我们的上述两个判断。从图3-3

① 关于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运输业的定义，参见切坎特尔和本克尔（Cicantell 和 Bunker, 1998）。

② 同样，关于产业中心地位（及其转移）的相关推论也适用于能源产业。可以同样预期，煤炭、石油和其他能源产业中工人的中心地位的形成，也会影响到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形成及劳工抗争。我们在此不打算对此进行分析；不过，要想了解世界能源体制中（尤其是煤炭和石油产业）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及其与劳工/社会抗争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波杜尼克（Podobnik, 2000）的相关研究。

可以看出，从 1870 年到 1996 年，运输业的劳工抗争数量占所记载的特定产业劳工抗争总量的 35% 左右。因此，运输业是劳工抗争数量最多的产业，其比重甚至超过了制造业（占整个时期所记载的特定产业劳工抗争总量的 21%）和采矿业（占 18%）。^① 实际上，运输业劳工抗争数量所占的比例，几乎在每一个十年里都超过了所有其他产业；只有在三个年代中出现了例外，那就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纪 30 年代，制造业的劳工抗争数量所占比例最高，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服务业的劳工抗争数量所占比例最高。^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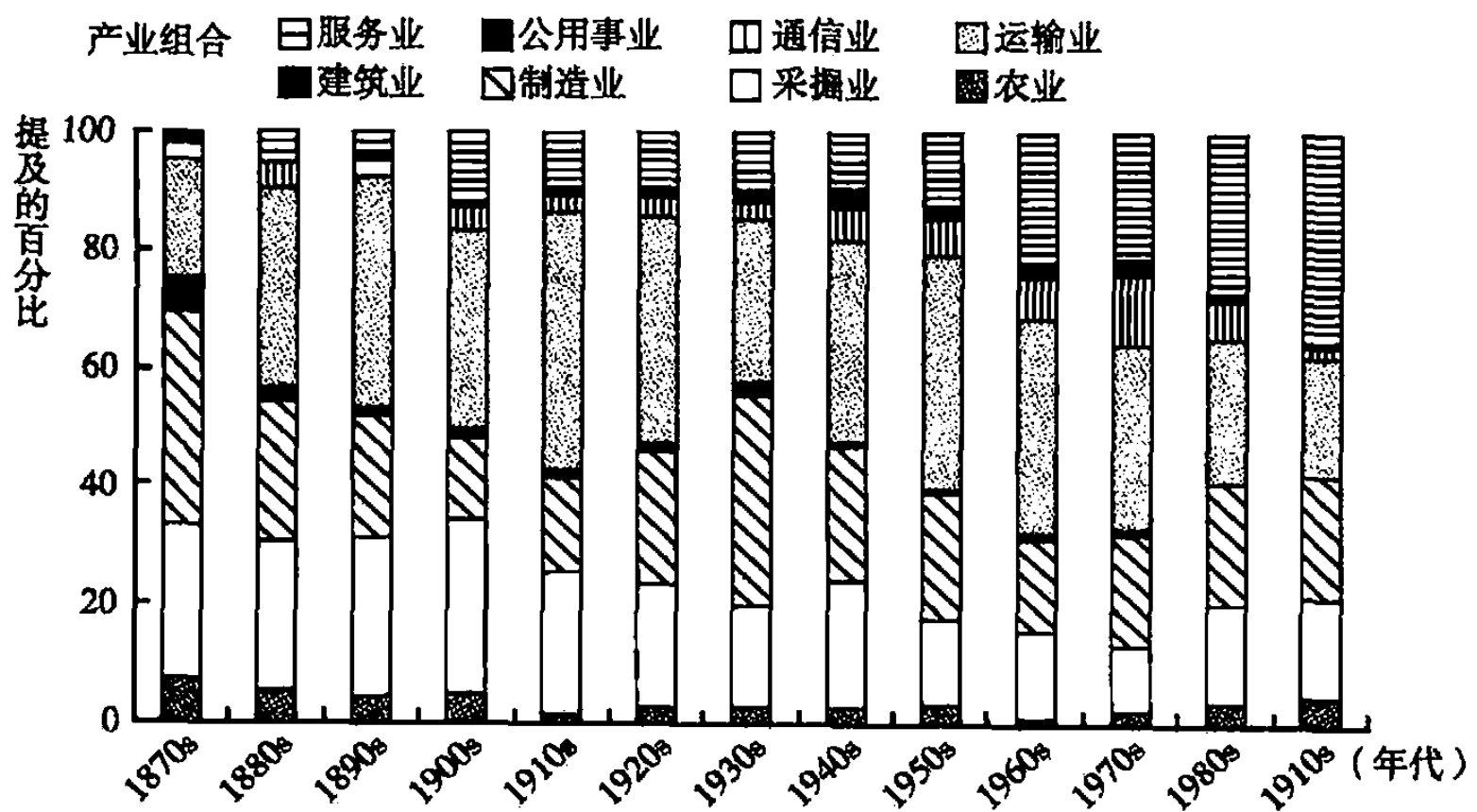


图 3-3 世界劳工抗争在不同产业中的分布, 1870 ~ 1996 年

而且，正如图 3-4 中运输产业的三个子部门的劳工抗争分布情况所显示的，在整个 20 世纪里，运输业内部的劳工抗争数

① 在采矿业中，煤矿是最重要的部门。波杜尼克（Podobnik, 2000）利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分析了采矿业中的世界劳工抗争模式。

② 从图 3-3 可以看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服务业中劳工抗争数量所占比重稳步提高（稍后会更详细地加以讨论），这使得运输业中劳工抗争所占比重在同一时期内出现稳步的相对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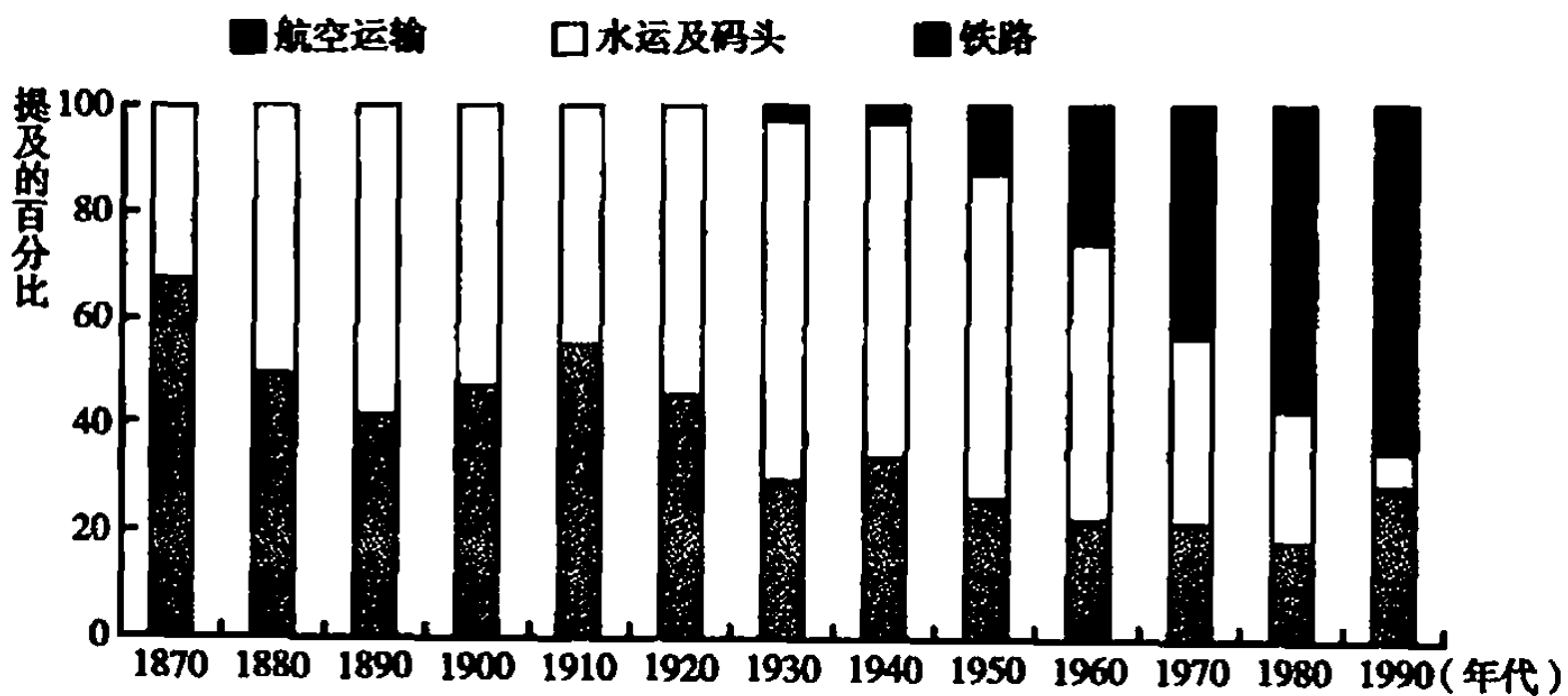


图 3-4 运输产业中劳工抗争的变迁, 1870 ~ 1996 年

量所占比重的总体分布发生了一个转变。其中, 最显著的是水运业相对于民航业劳工抗争的比重变化。从 1870 年一直到 1996 年, 水运业中的劳工抗争数量占运输行业的比重为 52%, 铁路业和民航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35% 和 13%。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民航业劳工抗争数量所占的比重达 42%, 超过了同一时期水运业所占的 35% 的比重; 此外, 相对于码头和水运业, 民航业劳工抗争数量的这种上升趋势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民航业为 55%, 码头和水运业为 24%) 和 20 世纪 90 年代 (民航业为 63%, 码头和水运业为 7%)。铁路工人抗争的比重虽有所下降, 但不是很剧烈, 不过从图 3-3 仍然可以看出, 其比例从 20 世纪上半叶的 43% 下降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 25%。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运输工人都有着很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如果我们将其工作场所界定为他们工作其中的整个物流网络体系, 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也就是说, 他们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 并非源自其行动对直接 (经常是公共) 雇主的直接影响; 而是源自其行动对产业上游 (或下游) 的影响, 一旦商品配送、服务和人员无法实现正常运输, 运输业工人的谈判能力就

大大增强了。“位于不同地点的资本家的相对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运输网络发展的影响”（Harvey, 1999: 378）；同时，也受到现存运输网络的中断（包括因工人抗争而引起的中断）的影响。

此外，在运输产业中，通过空间调整策略来削弱劳工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并非易事（更不用说在实际中应用该策略了）。或许，人们能够将某些总是制造麻烦的节点从配送网络中完全剔除——即将那些难以控制和不赢利的运输线路从贸易和生产网络中剔除。但是，由于在交通运输业中实行这种空间调整对于该地区上下游产业带来严重后果，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当整体上被剔除的特定区域并未受到普遍存在的利润率和劳工控制问题困扰的时候。此外，“如果内在于它们之中的价值并未丧失，那么，公路、铁路、运河和机场等设施是不能够被移动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资本的流动需要在各运输产业中进行相对固定的投资（Harvey, 1999: 380）。因此，即使是与那些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制造产业相比，平均而言，运输产业进行空间地理转移的动机也是极其微弱的。事实上，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关于运输业工人抗争的报道显示，在整个1870~1996年期间，运输业的劳工抗争在全球都呈现持续一致的广泛分布。这一事实也表明，空间调整策略并非资本用以应对运输业工人抗争的主要方式。^①

不过，另一方面，技术调整则构成了雇主对付运输业劳工抗

① 通过以下对比，可以看出运输业劳工抗争地理分布的广泛性。按照我们用来确定汽车业劳工抗争显著性地点的1%标准，在纺织业有15个国家超过了这一标准，而在运输业的三个分行业中，有27个国家超过这一标准（铁路业中有17个国家，水运、码头业中有20个国家，民航业中有17个国家）。

争的更为重要的武器。其中一个得到广泛研究的案例是发生于航运业中的集装箱化和码头自动化。正是这些技术创新过程，导致了20世纪下半叶具有激进历史传统的码头工人数量的急剧下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上文提到的运输工人劳工抗争在这一时期的减少。在那些随后较少发生彻底改变运输工人劳动过程的地方，产品调整策略则成为资本家最为常见的反应方式。譬如，铁路和铁路工人日益面临着来自新的运输替代方式的竞争压力，如卡车和航运对铁路货运的挤压，公路运输和民航对客运市场的抢占。

最后，和其他产业相比，国家管制对于运输业劳工抗争动力机制的影响要更为重要和直接。由于运输体系的平稳运转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再加上运输工人拥有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而且资本对运输体系进行空间调整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政府对运输工人抗争的介入非常广泛。例如，在很多国家，铁路工人是最早获得合法权益的（如工会的合法化），但与此同时，限制铁路工人活动的法律也得以通过（例如，铁路工人的罢工是非法的）。

对于制造业，我们认为，随着产品周期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因此，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拥有较少的资源来与劳工抗争达成和解。与之相反，在运输网络（如铁路和航运）的不同部分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竞争关系（或这种竞争的性质非常复杂），因此，对于运输业劳工抗争结果在地域上所存在的各种差异，产品周期假说的解释力似乎非常有限。因此，与制造业劳工抗争的结果相比，我们可以预期，运输业劳工抗争在核心—边缘地区之间分布的空间差异应该是相对较小的。此外，这种工人之间更少的直接竞争和更小的空间差异或许意味着，与制造业工人相比，运输业的劳工抗争拥有更强大的劳工国际

主义的物质基础。^①

与我们这一预期相一致的是国际飞行员联盟的成立——这是20世纪90代末和21世纪初，世界主要航空公司纷纷建立全球联盟以共享航线、航班和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在每一个重要航空公司中，飞行员都建立了他们自己与之相对应的飞行员联盟（比如，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主导的星空联盟中，有星空联盟飞行员联合会）。这些飞行员的联盟组织非常活跃。例如，世界驾驶舱职工联盟就吸纳了美国航空和英国航空（引领着世界联盟的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并于2001年在迈阿密举行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美国航空公司工会的飞行员们，与智利航空公司和爱尔兰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团结在一起，分享信息并讨论有关世界驾驶舱职工联盟的策略。对于航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说，这种航空公司飞行员之间的国际团结合作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世界性趋势”（Michaels, 2001: 23, 28）。

以上我们所强调的，是运输行业中的共同特点。那么，运输行业内部的产业转移（或产品调整）策略，对于当代劳工抗争意味着什么呢？由最新一轮全球化所导致的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密集程度日益提高，意味着运输业工人对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重要性，至少与过去相比并没有丝毫的减弱。此外，也没有理由认为，航空业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没有码头/航运或铁路工人强大——实际上，尤其是考虑到其对全球网络的影响程度，

^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作为雇主或调停者）在运输行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于富国政府比穷国政府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如更多的税收）来调解劳资纠纷，因此不同国家劳工抗争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无论如何，这一机制与处于不同地点的工厂（和工人）之间的直接竞争所导致的机制是颇为不同的，因此，它对建立跨国劳工合作与团结的阻碍作用是比较小的。

航空运输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可能更为强大。不过，整体而言，航空业工人并没有铁路和码头/航运工人那样激进。^①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将证明，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劳工运动所运行的不同的全球政治背景有关——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报道的劳工抗争中，上述三个年代分别是铁路、码头/水运和民航业劳工抗争的高峰期。就像本章前面所讨论的劳工抗争从纺织业向汽车行业转移一样，这或许与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增强有关，这迫使公司和政府作出更多的让步，从而减少工人继续进行劳工抗争的动机。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劳工抗争向航空业的相对转移，代表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不断增强的趋势。

不过，正如我们在本章下一节中即将看到的，在运输产业之外，后福特时代的产品调整策略对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换言之，尽管本节证明了运输业工人继续拥有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第二章也指出汽车工人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但是，在很多就业增长迅速的其他行业，则产生出具有相对较弱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工人。就21世纪初的工人们所面临的整体处境而言，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那些拥有强大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工人会怎样利用这种力量？他们是在能够使更多的工人（包括那些具有较弱谈判力量的工人）受益的斗争中使用这种力量，还是仅仅局限于在更为狭隘的斗争中使

① 因为很难对运输产品的产品周期进行有意义的界定，所以也很难对不同阶段进行比较（如成熟阶段）。如果将运输业中三个次级部门的劳工抗争的高峰值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民航业中的劳工抗争水平是最低的。因此，水运业的劳工抗争高峰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记载的劳工抗争事件是1887起；铁路业的劳工抗争高峰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1165起；而迄今为止民航业的劳工抗争的高峰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有637起。

用这种力量?^①我们将在本章和本书的结论部分重新回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 一种新的产品调整策略?

本章已经指出：劳工抗争浪潮的中心，不仅随着特定时期内资本主义主导产业内部生产的地理转移而发生转移，它也随着特定时期内不同产业之间的、重叠的产品周期的相继兴衰更替的转移而转移。接下来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找出继汽车工业之后哪一（些）产业有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并探讨在这一（些）产业中的劳工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然而，我们很难确认某种单一的产品，其所扮演的角色能够与19世纪的纺织业和20世纪的汽车业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相提并论。正如后福特主义的观察家们所强调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灵活性和兼容并包性（eclecticism），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可供选择的消费品、新商品的迅速涌现以及用新方式来消费旧产品，都是这一显著特征的体现。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将辨别出几种值得加以认真关注的“产业”，它们很可能是正在进行中的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形成和劳工抗争的潜在的关键领域。

半导体产业

上述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的制造之所以是可能的，在很大程

^① 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起初汽车工人的劳工抗争往往与劳动者及穷人的更广泛斗争交织在一起，与民主运动交织在一起。无疑，这种趋势植根于各种结构性条件（譬如，汽车工人居住在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社区之中）和政治选择机会的结合。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今天是否还存在着这种类似的、有利的结构性条件，以便赋予工人强大的谈判力量，并运用该力量来反映超越其自身特定利益范围之外的各种诉求。

度上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产品，即半导体产品。事实上，彼特·迪肯（Peter Dicken, 1998: 353 - 4）指出，微电子产业已经取代汽车制造业，成为今天“各产业的产业”。像“之前的纺织、钢铁和汽车”一样，微电子“已经被认为是产业成功的试金石”。和汽车产业相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在大量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中使用半导体元件，微电子业对各产业所产生的最为显著的影响是间接的。汽车产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辅助性变化，包括居住地点和产业的郊区化、获取能源的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时代的文化符号的变化，等等。半导体产业则通过“将一切都计算机化”（包括汽车和纺织品的生产），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着至少是与汽车产业同样深远的影响。

不过，半导体行业中的就业本身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直接影响，无法与历史上纺织业和汽车业的影响相提并论。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半导体产品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但由于制造晶片的工艺都是自动化的，半导体产业所创造的制造性工作岗位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产品设计和晶片制造这些半导体生产的创新和尖端技术环节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这些环节的生产需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工程人才，同时需要昂贵的工厂和设备以提供一个“纯净”的生产环境，而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直接劳动力投入则非常有限。^① 半导体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是电路板装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环节就已经被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尤其是亚洲（Dicken, 1998: 373）。

因此，一方面，半导体产业的扩张在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制造

^① 2003年，IBM将在纽约费西基尔（Fishkill）新建一条高度自动化的半导体生产线；其中，300毫米的硅晶片需要经过超过500道工序的加工，历时20多天，但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手工操作（Lohr, 2002）。

业工作岗位较少，另一方面，该产业在低工资国家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更具体地说，是促成了青年女性工业无产阶级的快速增长——这一现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曾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全球的生产流水线”的标题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例如，参见 Fernandez Kelly, 1983; Lim, 1990; Ong, 1987）。不过，近年来电路板装配环节本身也越来越被自动化了，因此，该产业在低工资国家所创造出的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也在减慢（Dicken, 1998: 383 - 386）。^①

同样，电子消费品的发展（及其相关产品的扩散）所带来的就业模式也十分相似，即工业无产阶级在核心发达国家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工业无产阶级在被选中的一些低工资国家则进一步扩大。尽管研发、市场营销和生产协调等工作岗位依然掌控在跨国公司手中并在高工资国家完成，几乎所有的生产和装配环节却集中在低工资国家。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非常典型。以电视机为例，中国“从无到有”开始发展，到 1987 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基地（Dicken, 1998: 357）。^②

上述模式，可以说是复制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纺织业和汽车业的模式：在高工资国家，产业工人阶级不断萎缩，而同时在低工资国家，产业工人阶级迅速发展，结果是，在低工资国家，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产业工人的规模和集中程度都继续得到了迅速增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中国）成为工业扩张和新兴产业工人形成的重要基地。按照我们对过去的劳工运动浪潮的分析，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中

① 在印度，就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软件业（而不是硬件业），这一点我们会随后讨论。

② RCA 的电子消费品生产设施，在 20 世纪中不断地向北美的更低工资和工会力量较薄弱的生产地点转移，关于这一点，参见 Cowie, 1999。

国将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并且，考虑到中国的规模以及它在亚洲乃至全球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这种工人运动一旦出现，将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与 20 世纪中叶中国的农民革命所产生的影响相当。

事实上，根据报道，中国的劳工抗争正在不断增加，例如，一份官方报道估计，仅仅在 2000 年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出现了约 3 万次示威游行。不过，这些示威中的大部分，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而引发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以及与之相随的国有企业破产，导致关于工人失业、拖欠工资和退休养老金的抗争。因此，迄今为止中国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所采取的形式，主要还是我们称之为波兰尼式的运动，其所反抗的是对既有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破坏。一方面，促使这种波兰尼式的反抗的动因并未结束。目前，中国已经有了 4500 万 ~ 5000 万下岗工人，而随着中国加入 WTO，还会有 4000 万国有企业工人加入到下岗失业工人的大军中去（Solinger, 2001；亦可参见 Solinger, 1999）。另一方面，我们的既有分析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未来也会出现我们称之为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运动。不同行业的工人所拥有的谈判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某些行业的工人将具有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如汽车业工人）。究竟何时这种马克思式的工人抗争运动能够兴起，以及这些工人将如何与下岗工人的抗议进行互动，这些仍然是未知的问题。无论如何，中国产业工人阶级对于世界劳工抗争的未来而言具有重要地位，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生产性服务业

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伴随着全球性的“命令和控制”功能的增长与集中，同时也伴随着资

本的日益增加的金融化过程。^① 萨斯基亚·萨森这样写道：“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产生了一种服务于各种生产的需求，以确保为那些新的生产组织和金融提供管理、控制和服务。”（Saskia Sassen, 2001: 24）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其范围涵盖了从通信业到专业服务业（如法律、金融、广告、咨询、会计）等行业。萨森认为，尽管这些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着各种商业组织的运行，以管理包括工厂、办公机构和金融市场在内的巨大全球网络系统，生产服务行业自身也是集聚经济的产物。因此，制造业生产在空间上的扩散和金融资本的极强的流动性，也产生了另外一种集中效应，即跨国公司的总部及其所要求的生产服务行业越来越集中在核心城市。正是在这些地方，“全球体系的运转工作得以进行”（Sassen, 2000: 1）。并且，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指出的，对于正在进行的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以及正在浮现的劳工抗争而言，这些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性场所。

自1970年以来，在大多数核心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就业增长大大超过了其他经济部门中的就业增长（Sassen, 2000: 62-64；亦可参见 Castells 和 Aoyama, 1994；Marshall 和 Wood, 1995: 9-11）。譬如，从1970年到1996年，美国就业总人数从7680万增长到1.02亿，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则从630万增长到了1760万。相比之下，制造业中就业人数从1990万仅仅增长到了2040万（参见 Sassen, 2000: 图4-1）。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数字表明，后工业化社会正在创造主要是高收入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管理性工作岗位。丹尼尔·贝尔早在30年前就在

^① 在第本书第四章中，我们将重新定义这一日益增长的资本金融化过程，将其称为一种金融调整策略。可以将这种金融调整策略看做产品周期通过其他方式的继续进行。随着竞争的加剧，资本被从贸易和生产中完全抽离出来，并再投资到金融交易和投机之中（Arrighi, 1994；Arrighi 和 Silver, 1999）。

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了这种论断，他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在产生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以及更加缓和的劳资关系（Daniel Bell, 1973）。在20世纪90年代对所谓“新经济”的讴歌声中，这种观点被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然而，事实与这种论点越来越相矛盾。这是因为，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离不开大量传统的粉领和蓝领工作岗位的支持——这些岗位的范围，包括文秘、电话接线员、建筑维修工、清洁工，以及饭店侍者、洗碗工、婴儿护理工等。因此，在生产性服务行业快速增长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劳动力的两极分化过程，即高工资的专业人员和低工资的工人之间的分化（Wall Street Journal 2000；Greenhouse 2000）。^①

根据本书所发展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应该关注那些就业增长迅速的领域，将其视作工人阶级形成及其抗争出现的重要领域。我们无法从世界劳动小组数据库中的其他服务业中，将生产性服务业单独分离出来。不过，图3-3勾勒出了劳工抗争在不同行业中的分布情况，它揭示出一种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的模式。如果将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能够发现，在19世纪后40年中，服务业作为世界劳工抗争发生地的相对重要性迅速增加。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在有记载的特定产业劳工抗争总量中，服务业中所发生的劳工抗争数量所占的比例介于9% ~

① 史蒂芬·格林豪斯（Greenhouse, 2000）在刚刚出版的一份关于纽约市就业趋势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纽约市的经济恢复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一份最新研究表明，低收入工作（年薪低于25000美元）的增长要比中高收入工作的增长快得多。研究发现……尽管近年来纽约市已经增加了很多的华尔街和硅谷的高薪工作，增长最快的工作岗位却是低工资的服务性岗位，如餐馆工人、保安、护工以及家庭老年护理等。”该研究“还发现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城市的低工资工人1999年的中位数收入水平比1989年下降了2%”。在欧洲，就业岗位的增长也主要集中在收入相对较低的兼职性就业岗位上（参见Sassen, 2000）。

12%，该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猛增到21%，在80年代，又增加到26%，到90年代则达到了34%。^①

从表面上看，许多处于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低报酬的辅助工人并没有多少谈判力量。但是，萨森指出了一种常常被忽视（甚至是被故意贬低）的力量。如果说，生产性服务业运作的逻辑是一种集聚经济，那么，卷入到全球经济（包括其支持部门）的命令和控制功能之中的各产业部门，它们自身相对而言也受到了地域的限制。此外，那些能使世界性城市运转的特定类型的投资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②，这些投资包括通信网络、拥有先进通信设施的现代化的写字楼，等等。这些投资是无法被轻易放弃的，因为一旦放弃就会造成沉淀的固定资本投资的巨大损失。换言之，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很难通过地理转移的空间调整策略来应对劳工抗争。萨森解释道：

有意思的是，主流的经济观点认为：地理位置已经不再重要了，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可以建立在任何地方，现在主要的产业都是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因此不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这种观点认为……上述情况使公司能够仅仅以撤资和转移到其他地方为筹码，迫使市政部门和工人作出重大妥协；但是，对于整个的企业联合体而言，情况远非如此

① 与此相联系，指出以下事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美国，服务业职员国际联合会及其前主席约翰·斯温尼（John Sweeney），一直都站在第一线，努力谋求在劳联—产联中实现新的、积极的工人运动转折。

② 生产性服务业有不断向普遍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趋势。里德就认为：“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非劳动密集型的。”（Riddle, 1986: 8）基于雇员人均资本存量，卡斯齐（R. E. Kutscher）和马克（J. A. Mark）（1983）对145个行业门类进行了排名，在位于排名前20%的30个行业门类中，服务行业门类占了其中的近一半（转引自 Riddle, 1986: 29）。

(Sassen, 2000: 14)。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生产性服务业所具有的受地域限制的特点。如果生产性服务业在某一集中地的成本上涨超过了资本所能承受的临界点，就可能最终促使资本以极其高昂的成本进行空间调整。此外，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已经意识到，要想吸引生产性服务业（产业新星）的投资，就必须提供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因此，很多政府现在也已经开始组织建设并对诸如此类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行补贴，以提高其城市和地区吸引生产服务行业投资者的竞争力。

同样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并不一定需要在核心办公室中完成。在生产性服务行业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过程：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劳动过程而言，空间调整策略事实上并非一种现实的选择，而对第二种类型的劳动过程而言，空间调整策略确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因为，公司总部的办公楼不可能每夜都送到低工资国家进行保洁工作，清洁工作必须在现场进行。相反，诸如数据录入、文字处理等大量日常工作，通常就能够被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这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将分别对这两种类型的劳动过程加以讨论。

以洛杉矶市中心商务区的摩天大楼的清洁工为例。从表面上看，这些保洁工人似乎并没有什么谈判力量，其工作并不需要什么稀缺技能，这种工作大多是兼职性或临时性的，缺乏福利、晋升机会和工作保障，而且流动性很大。从事这种工作的工人，大多是移民或者少数族裔的女性，她们常常打着第二份工并（或）担负着照看小孩的责任，因此很少有时间参加工会活动。此外，这些清洁工的“雇主们”大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转包组织，它们成立的目的是通过消除工人与现有工会之间的合同来降低成

本。不过，即便如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这些清洁工人与美国其他城市的处于生产性服务业底层的工人一起，取得了劳工抗争的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包括：巴尔的摩市的“基本工资运动”，该运动扩散到了美国其他 30 多个城市；还有在许多城市中取得胜利的“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运动发生在洛杉矶市。通过这些运动，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人（如在主要办公大楼工作的清洁工人）争取到了有保障的、得到改善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在美国劳工抗争处于历史低潮时，激发了劳工运动社会行动主义的高涨。

这些劳工抗争胜利的基础何在？一方面，工人们可能从其雇主所具有的受地域限制的特点那里，获得某种程度的结构性谈判力量。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虽然雇主可以寻找低工资的移民来从事大楼的清洁工作，却不能把大楼送到其他地方去保洁。尽管如此，结合本章上文所作的分析，同时考虑到这些工人总体上较弱的结构性谈判力量，我们认为，上述理由并不足以解释这些抗争之所以能够获得（哪怕是有限的）胜利的原因。毋宁说，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建立在对一种重大战略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即如何合理利用“组织力量”。尤其是，这些运动都包含着对既有的、以工作场所为中心的组织模式的重新评估，同时，还包含着向一种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模式的转变。由于工人们散布于各个工作场所，且其雇佣关系具有不稳定和流动性高的特点，因此，以各个工作场所为单位来组织工人将是一项徒劳无功的工作。鉴于此，巴尔的摩市的“基本工资运动”试图在整个城市范围内提高低收入工作者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正如一个运动组织者所指出的，这场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劳工组织，而这个组织的功能发挥，“并不受其成员工作地点转移的影响”（转引自 Harvey, 2000: 126）。因此，正如面临多个雇

主的英国纺织工人一样，区域范围的组织谈判力量是十分重要的。

同样的，“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也没有基于工作场所展开活动，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能够真正改变他们境况的力量并不在于与表面上的“雇主”（清洁分包公司）交涉，而是与那些利用分包公司来规避工会的力量的产权所有者们交涉。因此，“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并没有寻求通过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的选举程序来认可组建工会，因为即使能成功地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分包公司成立工会，那些公司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关门，然后转换门庭重新开一家没有工会的新外包公司。所以，该运动强调采取针对写字楼业主和租户“面对面的”街道抗议（Waldinger 等，1998：110）。类似地，“基本工资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求政府、公司和大学在直接雇佣过程中负责任地对待工人，还要求他们规范和约束其所聘用的分包公司的行为。日益发展的劳务外包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掩盖责任和义务的拜占庭式系统”（Needleman, 1998：79）。这些成功的劳工运动能够与这种状况相对抗的策略，就是确认并将运动目标瞄准那些“应承担责任的”、有力量改变他们现状的主体。^①

所有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倚重于“与该问题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阶层进行结盟”（Harvey, 2000：125，对马克思的复述）。在巴尔的摩市的“基本工资运动”中，一个以教会为基

① 在服装加工业中也存在着这种拜占庭式的转包结构。在该行业中，让劳工组织起来的一种关键的、相似策略，就是让零售商和专卖店来约束其分包商的行为（参见 Bonacich 和 Appelbaum, 2000；Ness, 1998）。尼德尔曼指出，在家庭健康护理行业（私有化的社会服务工人的一个例子）中，也存在着类似现象（Needleman, 1998）。

础的不同宗教信仰者的联盟最先发起了这项运动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Harvey, 2000); 在“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中, 一个复兴的和 (现在) 集权化的工会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总部, 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影响力压倒了更为保守的地方工会组织的领导。“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不仅需要进行广泛的草根动员 (没有这种动员它就不会取得成功), 而且还需要广泛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只有通过具备汇聚和再分配能力的某个大型组织才能够提供。瓦尔丁格尔等曾经指出, 某项运动所需要的成本包括: 广泛的研究 (至少需要一位专职人员来研究该行业的产业结构及其弱点), 律师的密集工作 (不仅需要高风险的对抗策略, 还需要“游击式的法律技巧”), 以及广泛的组织 (Waldinger 等, 1998, 112 - 113)。仅仅在洛杉矶, “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一年就花费了近 50 万美元。^①

最后, 因为发生于生产组织中的这些变化, 同时也伴随着工人阶级在性别和种族构成方面的变化, 这些运动必须同时面对种族、性别、国籍、阶级等问题。成功的运动已经使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从抛头露面转换为去更好地反映工人们的心声。并且, 这些运动已经开始重视这一新兴的劳动力大军的特定需求和要求, 比如, 充分的婴儿护理, 更多的英语课程, 等等。^②同时, 由于新兴劳工力量同时提出了很多关于性别、种族、国籍和阶级压迫的问题, 这些运动也更自然地能够从各种社会运动组织中获得支援, 比如民权组织和妇女组织 (Bronfenbrenner 等,

① 瓦尔丁格尔 (Waldinger) 等还指出, 工人从他们原来的国家 (主要是中美洲) 所带来的阶级意识具有一定作用 (Bronfenbrenner 等, 1998)。同样, 我们在上文的讨论中曾经提到过一个类似的个案, 即从兰开夏迁移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工人也带来了那里的激进传统 (尽管并不是导致胜利的结构条件)。

② 关于劳工社区中心的重要性, 参见尼德尔曼 (Needleman, 1998) 和尼斯 (Ness, 1998)。

1998)。

因此，资本相对较难流动似乎不足以完全解释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不过，如果在未来数十年中工人们能够继续保持他们斗争胜利的成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无疑在于资本采取空间调整来应对劳工抗争所面临的各种障碍。

那么，对于生产性服务行业劳动过程中那些流动性较强的环节而言，诸如日常数据的录入工作，情况又将如何呢？在这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部门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印度投资建立的数据处理中心、电话呼叫中心以及其他基于信息技术的工作场所，其中，还包括各种从事高端生产服务活动（如软件和工程设计）的工作机构。目的是利用当地受过教育的、说英语的工人。尽管爱尔兰、牙买加和菲律宾也为外国公司提供一些低成本的“后台”职工，但在印度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工人数量超过了上述三个国家的总和。据估计，目前印度大约有4万人在这种所谓的远程服务产业中工作，预计该产业还将继续迅猛增长，到2008年其就业人数将会达到70万人（Filkins, 2000）。

“国外公司通过卫星将业务数据传送到印度，印度工人负责数据的录入、分类和分析，然后再把工作成果传输回去……其成本要比在本国处理这些工作低廉得多。”例如，英国航空公司“每年把其所售出的3500万张机票中的每一张都扫描后传送到印度，印度的工人们则将这些机票的信息与旅行代理公司传送的账单信息一一核对。”通用电气公司目前在印度新德里雇用了1000多个工人，“负责处理信贷和会计业务，并且给美国的那些拖欠贷款的客户们打电话”，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里将新德里的雇员人数提高4倍（Filkins, 2000）。

于是，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21世纪初新的工人阶级形成以

及潜在的劳工抗争的重要产业部门和地理场所。然而，这些工人所可能依赖的谈判力量将是何种类型呢？这些工人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和其他先进的通信系统来接收原材料，传输其工作的最终产品，或者在很多情况下完成生产过程中的某个中间环节。与传统生产线和即时生产方式相比，信息空间对破坏的敏感性更强，这一点只要经历过黑客和病毒攻击的人就不难想见。如何将信息空间对破坏的脆弱性转化为有效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仍然是一个问题——它取决于工人创造性的发挥，以便在新环境下创造出各种新的斗争方式（参见 Piven 和 Cloward, 2001）。

在具有如此高流动性的产业中，工人的任何抗争都可能立刻引发资本的地理转移。确实，如果我们听信管理方的一面之词的话，就会认为这种生产过程本身是高度流动的。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一家为美国辛辛那提保险公司服务的公司主管（其手下有120名员工负责争议的远程处理）声称：“我可以将这项业务转移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它完全是可以转移的。”（转引自 Filkins, 2000: 5）当然，要想实现对劳工抗争的永久空间调整策略，这种论调或许包含了某种程度的自吹自擂。该产业已经转移到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它还能再往哪里转移呢？而且，一旦工人发现了各种新形式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并将其运用在这些以信息为基础的产业中的时候，雇主们是否将发现以下情形，即正如他们在汽车产业中所看到的一样，在每一个资本扩张的新乐土，都会重新出现工人阶级的斗争？

确实，这些工作的流动性比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清洁工的工作要大得多。这一点也的确对工人的组织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上文所讨论的，清洁工所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基于社区的组织力量——当雇主不能转移出社区的时候，这种组织

力量是特别有效的。对工作岗位可以被轻易地转移到其他社区或国家的时候，这种社区层次的组织力量对工人来说效果就会差很多。一旦工作岗位被转移出该社区，任何通过社区层次的组织力量所争取到的短期利益都会丧失殆尽。在这种状况下，组织谈判力量要保持其效力，就不得不超越社区层面，上升至资本流动的同一层面即全球的层面。反过来，这又使我们回到建立劳工国际主义的需要这一问题上来，回到建立劳工国际主义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及其局限性的问题**上来。本书第一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中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

上述以信息为基础的劳动力就业的扩张，其前提之一是大众教育的扩张。有人甚至认为，“教育产业”已经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重要的“资本—商品—制造”产业。以下，我们将转向对教育产业及其工人的讨论。

教育产业

在尝试把握后福特主义时代经济转型的总体性质的过程中，很多研究都强调了“信息”所具有的新的中心地位，以及知识经济的浮现。曼努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1997）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89: 186）认为，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于“去动员知识劳动力的力量，作为进一步的积累的工具”；彼特·达克尔则认为，“基本的经济资源”已经不再是资本、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Peter Drucker, 1993: 8）。不过，正如米切尔·哈德（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力（Antonio Negri）所强调的那样，知识本身也需要生产，而且，知识的生产“意味着新的生产和劳动方式的出现”（2000: 461 - 2）。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教育已经成了21世纪最重要

的“资本商品产业”之一，该产业不仅制造“知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制造出为新的知识密集型的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拥有必要技能的工人。^① 就像 19 世纪的纺织工人和 20 世纪的汽车工人一样，在 21 世纪，教育行业的工人（即教师）对于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教师是无产阶级的成员。事实上，从数量众多的教师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到现在，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而为了生存，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般是出卖给国家）。不过，社会科学家往往并不把教师划分为工人，这也许是因为教师工作被看做技能性工作，他们在课程设置方面和课堂上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他们属于公共雇员。此外，尽管国家所面临的经常性财政困难会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条件，但是，教育系统很大程度上并非严格按照“赢利”标准来运作的。从本书的观点出发，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的教师所具备的各种特征（假定它们是准确的），能否完全使教师免受劳动力商品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们预期这些负面效应也会引发“抗争”，并将其划分到“劳工抗争”的范畴内。^②

① 教师制造的是“一种劳动力，是一种价值得到提升的商品”（Lawn 和 Ozga, 1988: 84）。

② 关于将教师概念化为工人的观点，参见奥兹加所收集的相关论文（Ozga, 1988b）。珍妮·奥兹加（Jenny Ozga, 1988a: x）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教师作为工人的经验，在不同时期会发生极大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存在财政危机，或者整个资本主义是否面临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央政府倾向于用直接有力的管理来控制教师的招聘、培训、薪酬、身份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在资源充裕的时期，管理则“主要依赖对教师职业主义的推动，来作为一种控制形式”。除了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还存在一种世俗化的趋势，即教师在创造价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如培训劳动力），其教学的劳动过程就越是被分析和重组以提高其效率（生产率）（Lawn 和 Ozga, 1988: 87）。奥兹加的经验研究对象是英国的教师。在世界历史的范围，重新组织并验证这些假设是一项很有吸引力的建议。但这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的教师数量开始迅速增长，从1950年的800万增加到了1990年的4700万（Legters, 1993）。^①在教育产业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就业增长，它还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世界劳工抗争增长迅速的一个领域。根据国际劳工小组的数据，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里，教育产业是劳工抗争出现增长趋势的少数几个产业之一。而且，教师劳工抗争的地理分布领域比历史上的纺织和汽车行业都要广泛得多。正如表3-2所显示，有23个国家的教师劳动抗争达到了世界劳工小组的临界标准而被纳入统计表中，相形之下，在纺织产业中只有15个国家，在汽车产业中只有11个国家，被纳入统计表中（与表3-1、表3-2比较）。与铁路产业中、民航业和水运（码头）业相比，教师劳工抗争的地理分布领域就显得更为广泛了（23个国家），因为使用同样的临界标准，上述三个产业中达到标准的劳工抗争国家，分别只有17、17和20个。

或许，教育系统在本质上所发生的很多重要变化，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还将提及。不过，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至少到目前为止，教师的谈判力量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其他行业的劳工的谈判力量相比有何异同。一方

^① 由于教育是一个劳动密集性的产业（学生越多，需要的教师就越多），因此，学生入学人数的增长率是反映教师就业增长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各个教育层次的学生入学人数，尤其是小学的入学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70年代的非洲和中东，以及80年代的亚洲，都有迅猛增长。在高收入国家，小学的入学率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近乎100%；到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的中学教育增长显著，到90年发达国家的中学教育已经基本普及，低收入国家的普及率也达到了50%左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转引自Legters, 1993: 6-7）。教育产业的重要性，还可以用一个美国案例来说明：在1990年，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就业人数占整个政府就业人数的将近一半（Marshall和Wood, 1995: 11）。

表 3-2 世界教育产业中的劳工抗争高潮 (1870 ~ 1996 年)

时 间 国 家	1870 ~ 1879	1880 ~ 1889	1890 ~ 1899	1900 ~ 1909	1910 ~ 1919	1920 ~ 1929	1930 ~ 1939	1940 ~ 1949	1950 ~ 1959	1960 ~ 1969	1970 ~ 1979	1980 ~ 1989	1990 ~ 1996
爱尔兰								X		X			
日本								X	X				
比利时									X			X	X
意大利									X	X	X		
玻利维亚									X	X		X	
智利									X			X	
墨西哥									X			X	
印度									X				
美国										X	X		
瑞典										X	X		
英国										X			
希腊										X			X
阿根廷										X			
肯尼亚										X			
加拿大											X	X	
法国											X		
西班牙											X	X	
澳大利亚												X	X
新西兰												X	X
以色列/ 巴勒斯坦												X	
南非												X	X
俄罗斯/ 苏联													X
尼日利亚													X

注：由于数据收集的限制，20 世纪 90 年代的数据只包括 1990 ~ 1996 年。该表中所罗列的 23 个国家，都是占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记录的教育行业劳工抗争总次数至少 1% 以上的国家。“X” 标记的为劳工抗争的高峰年代（每 10 年为一个单位），以及（或）是在这些年代中，劳工抗争的次数至少占该国家所有记载的教师劳工抗争总次数的 20% 以上。

面，与汽车工人相比，教师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似乎是比较弱的。与汽车工人不同，教师在生产过程中并非身处一种复杂的劳

动的技术分工体系中。通常，教师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教室中工作。如果一名教师停止工作（如罢工或者请病假），同一学校的其他教师仍然可以继续工作，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而且，在某一教育系统中，不同学校之间的互相依赖也很小。因此，不像在汽车行业中，一个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工厂的停工可能导致整个公司陷入瘫痪，一个学校的罢工对其他学校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在纺织产业中，纺纱车间的总罢工都能够最终造成纺织部门以及其他下游部门的生产活动停滞，但是，中学教师的总罢工本身并不会导致小学的教学工作停止，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教师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却处在一种战略性的位置之上。在纺织业和汽车业中，进入到生产中的原材料投入在罢工时能够被储存起来，但在教育产业中，投入其中的原材料（即学生）却无法同样被储存起来。教师的罢工会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产生连锁反应——它会中断家庭的日常运作，使工作着的父母们难以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此外，如果在某个地方的教师罢工持续时间特别长或表现得极其频繁（或众多教师对雇主表现出敌对态度），那么，人们就会担忧，教师劳工抗争对其最终产品——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其作为公民的适当的社会化过程——会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无论是与纺织业工人还是汽车业工人相比，教师通常具有更多的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力量。迄今为止，技术调整对教育产业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这意味着教育体系的扩张将导致教师就业人数的增加。在纺织和汽车产业，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采用，会持续导致一轮又一轮的技术性失业，从而削弱在职工人的谈判力量；而在教育产业中，至今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这种机制的影响。事实上，拉里·古班（Larry Cuban, 1984）对近一个世纪的教育活动的研究表明，教育的实践和教学技术很少发生什

么改变。^①

很难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教育产业的生产效率，这一事实意味着，要想控制教育产业的成本只能增加教师的劳动强度，比如延长工作时间，提高每个教师所负责的学生数量，等等（Danylewycz 和 Prentice, 1988; Lawn, 1987）。然而，这些措施本身引发了著名的教师劳工抗争浪潮——比如，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在核心国家的教师劳工抗争，就指向国家由于面临财政危机而增大教师工作强度的各种举措。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及 90 年代的私有化浪潮，都曾导致教师劳动强度的迅速提高和教育经费的缩减，从而引发了教师的重大劳工抗争。

教育产业不仅很难进行技术调整，而且还特别难以进行空间调整。虽然制造业（和许多服务业雇主）能够利用来自全球劳动力储备的竞争（或通过生产资本的重组，或通过引进流动劳动力），来有效地威胁其在职工人，但是，这种威胁对教师来说并不是特别有效。一方面，学校通常必须建在距离关键的原材料——学生——不远的地方，因此，地理空间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教师，使其免受来自更廉价的移民教师的竞争。当然，我们在教育行业中并不能识别出任何有意义的通过地理空间转移而引起的产品周期。除了部分精英大学教育外（其中有大量的学生“迁移”的现象），在各种国家（甚至地方）教育机构（竞争）之间并不存在可替代性。最后，尽管教师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地点（跟纺织工人一样），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雇主（即国家，或者最起码是城市层面的政府部门，更常见的是国家层面的政府部

^① 拉里·古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其发现无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门),这使得协调教师劳工抗争的组织任务具备某种一致性。因此,教育行业很难出现空间调整和技术调整,特别是很难出现地理上的转移和自动化,这是教师所拥有的大量谈判力量的根源所在。^①

目前的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寻求增加教师竞争压力的另类办法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教育券计划使学生能够更容易流向其他学校,从而瓦解了公共教育系统并对公立学校的教师带来了威胁;基于业绩的学校资源分配方式,使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彼此竞争必要的资源,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工作经历;而学校私有化和教育的社区控制,则使政府不再是教师的唯一、可见的庞大雇主。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调动市场给教师施加压力。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教育产业动员全球劳动力储备大军使其与现有教师进行竞争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毕竟,即使是教育券计划,也不过是开启了城市之间或者国家内部某一层面的教师竞争之门。^②

尽管在历史上教师很少面临技术转型的威胁,但是,很难预料互联网和先进的通信技术的应用,将会在何种程度上给教师带来有效的竞争压力。这种情形类似于自动化给制造业工人所带来的影响(Traub, 2000)。然而,正如我们在对汽车产业的讨论中所提到的,削弱工人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的同一过程,往往也会

① 本书第一章已经指出,在很难控制劳工的谈判力量的时候,(为了解决系统层次的问题)界限划分就成为降低成本的特别重要的策略。实际上,界限划分在教师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比如通过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通过基于社会性别的边界划分。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的工资高,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的工资高。然而,界限划分是一把双刃剑。譬如,20世纪60年代纽约中学教师罢工,起因就是那些有研究生学历的中学教师,认为自己丧失了相对于小学教师(主要是女性)的优越地位(Cole, 1969)。

② 关于教育券作为阶级策略的讨论,参见波尔(Ball, 1993)。

增强其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因此，教学劳动过程中的任何技术性变革，都将使教师陷入到一种复杂劳动的技术分工中去，而这种劳动的技术分工对劳工抗争破坏的敏感脆弱性是自主的课堂教学模式所不具备的。

个人服务业

最后一个出现快速的就业增长的领域是个人服务业。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一领域称为再生产服务领域，因为它实际上是过去的家务劳动（包括做饭、婴儿护理以及娱乐等）的商品化。与20世纪就业增长所带来的工人劳动场所谈判力量总体增强的趋势相比，个人服务业中的工作类型的增长，似乎是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反趋势的最清楚的例证。在这个行业中，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和劳动场所谈判力量都比较弱，他们大多从事兼职或者临时性工作，被迫接受一些非正规的工作实践。

个人服务行业的工人其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之所以较弱，部分程度上与该行业在地理上的分散有关。个人服务业的对象是个体消费者，因此其就业分布深受人口分布和（或）财富分布的影响。^①因此，该行业的工作地点往往是分散的和小规模，这使得不同地点的劳工行动很难进行统一协调。而且，和教师行业不同，个体服务业较弱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并没有像教师那样能够因为其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占有重要位置而得到补偿。

以个人服务行业中的快餐业为例，与汽车行业不同，一个或数个分店的工人罢工，不会影响到连锁店其他分店的营业。而

^① 由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常常得到政府承诺的支持，即为每个人都提供这种服务；因此，这种服务的实际分布，与相应的人口分布的理论标准是很接近的。而就个人服务业而言，其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财富的分布状况，而非人口的分布状况。

且，即使整个连锁店的罢工可能会伤及整个公司，由于快餐店的工人不像教师那样，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所以即使是整个快餐连锁店都举行了罢工，人们也不会因此而挨饿。不像公共教育，快餐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快餐竞争性替代品。而且考虑到快餐店分散众多，要协调所有工人以实现快餐业的行业总罢工，以影响到劳动的社会分工的难度非常大。而且，考虑到快餐店数量众多，要协调所有工人以实现快餐业的行业总罢工（并以停工来影响到劳动的社会分工），其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在个人服务业中即便没有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失业，但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具备必要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该行业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通常还是很弱的。

我们已经指出，在工人结构性谈判力量较弱的地方，胜利的取得需要依赖工人的组织力量（如英国纺织工人的自主的工会组织，或者是印度和中国纺织工人的跨阶级政治联盟）。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人服务业工人劳工抗争的历史模式，与我们的上述推论是一致的。以旅馆和饭店业的工人为例，我们发现，在整个20世纪期间，该行业的劳工抗争浪潮的发生，几乎都与这些工人所集聚的城市或地区的广泛罢工浪潮同步。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罢工所依赖的是一种“反射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社区层次的组织以及（或）处于更有利战略地位的工人所具备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同样，20世纪90年代美国个人服务业（由工会所组织）的罢工胜利的取得（如从事家庭护理、健康保健等工作的工人），其基础同样是这种类型的组织力量，即我们在上文所讨论过的“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组织力量（Needleman, 1998）。

因此，20世纪后期个人服务行业的迅速增长，反映出一个重要趋势，即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在整体上正在被削弱。如

果我们考虑到 20 世纪末很多原来由国家资助的社会服务都被“私有化”或者转包了，很多社会服务工作越来越与私人服务模式相似（例如，没有一个单独的、可见的雇主作为斗争目标），上述趋势就更为明显了。然而，另一种与之相反的力量也值得我们关注，即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得个人服务的生产与配送之间“脱钩”，以便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哪里存在着规模经济；哪里的工人通常就具有较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

事实上，现在很多个人服务业的空间组织模式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而分散的模式了。从服务的生产到最终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众多中间环节，对个人服务业而言，这些中间环节的营利性非常强而且增长迅速。以娱乐业为例。在 20 世纪早期，多数娱乐业都是与最终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如现场表演），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看，娱乐行业的劳工抗争历史模式与旅馆、餐饮业的劳工抗争模式是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劳工抗争与特定城市中更广泛的劳工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今天的电影行业中，只有最终阶段——影院放映阶段——是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对于电视而言，则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直接的接触）。现在，把电影推向银幕的生产过程，包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劳动的技术分工，它服从于规模经济而非分散经济的逻辑。

因此，好莱坞最近的罢工以及罢工威胁与我们此前描述过的个人服务业的抗争模式有很大区别，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该行业的技术变革的浪潮（比如有线电视、录像、DVD、互联网传播下载以及电影和电视节目市场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关于薪酬和地位的新的抱怨与不平。而且，随着劳动的技术分工与新的规模经济的复杂性的增加（包括娱乐业在好莱坞的高度集中），某一工种（比如编剧）的罢工，就可能就会产生巨大的“连锁

反应”。因此，最近的一项估计认为，在有 27.2 万娱乐业从业人员的洛杉矶，娱乐行业的任何一场罢工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可能导致一个月 6.8 亿美元的工资损失。^①

总之，即使是在个人服务行业，劳工谈判力量的变化趋势并不像其最初看起来的那样一目了然。应该指出的是，娱乐业的工人抗争更像是该行业中拥有更多特权的一部分人为争宠而进行的吵架拌嘴。而且，这种工人抗争使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些身处具有较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行业中的工人，将怎样与那些谈判力量较弱的工人进行互动——不论他们是处于不同行业的、同一社区的工人，还是位于同一行业的、不同国家的工人？

第五节 结论

本章指出：随着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工人阶级形成和抗争的地点在各个产业内部发生转移；与此同时，随着新产业的兴起和旧产业的衰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抗争也在不同产业之间

① 关于好莱坞的劳工抗争，参见布尔纳德·威拉布（Bernard Weinraub, 2000: A1, A25）。除了上文所提及的那些问题，威拉布还强调指出，娱乐业现在已经被企业联合体所掌握。该文引用了 Ken Ziffren 这位娱乐业高级律师的话：“时代华纳是有线电视公司，索尼是电子消费品公司，福克斯则是一个电视网络和卫星运营商，环球公司是音乐公司，迪斯尼是主题公园、有线频道，ABC 网络也一样，等等。任何一部电影或者电视，都是这些公司业务的一小部分的集成。在这些公司中，现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利益，远远不只是管理者与劳工之间的对立那么简单”。威拉布还指出，“公司的庞大规模，可以使其在与劳工谈判中表现非常强势。例如，当福克斯或迪斯尼的电视业务部门的年景很差的时候，他们会在劳工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因为电视业务的损失（并非其主赢利业务）并不会为其母公司造成多大损失。这些大企业联合体本身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过程，从财务上来资助其电视业务部门。但是，如果华纳公司的电视业务是成功的，而时代华纳公司的杂志和有线电视部门的业务（主赢利部门）较糟糕，那么，公司可能会优先很快解决罢工问题，以保证其他一系列部门的运转与繁荣”（Weinraub, 2000: A25）。

发生转移。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预计，21 世纪的劳工抗争的主要地点将出现在那时的新兴产业之中。不过，在本章第四节我们也指出，很难确认哪一种新兴的制造行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与 19 世纪的纺织业和 20 世纪的汽车业相类似的领导产业的作用。

从某些方面来讲，唯一堪当新兴领导产业头衔的制造业是半导体产业，但是它向较低收入国家实施连续的地理转移的轨迹，其特征与纺织业和汽车业是根本不同的。在半导体产业中，制造岗位几乎从起始阶段（即创新阶段）就集中在低收入国家，而研发、管理及其他高附加值的工作，则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将来也将如此）。此外，半导体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板装配）变得日益自动化，因此，其在世界范围内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增长是有限的。

于是，在 21 世纪初，无论是新兴领导产业（如半导体产业）还是已有的产业（如汽车和纺织），其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低、中收入国家。因此，在 21 世纪，制造业中世界劳工抗争的中心，也将极有可能同样集中在这些国家。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与劳工抗争数量则增长迅速，预计将来仍然会持续增长。但是，由于服务业种类繁多，其就业的增长对工人整体的谈判力量的影响很难一概而论。一方面，我们已经论述到，在某些得到快速发展的服务行业中（如民航），工人被赋予了很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而其他一些服务产业部门（如教育和生产服务业），其对生产的空间调整和资本地理转移的抵抗力，则远远胜于大多数制造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讨论到，生产活动的垂直化分工和相应的生产地点的分散化，以及工人所面对的雇主（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影子雇主）的现实，都削弱了劳工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劳工的结构性谈判力

量的削弱，使得劳工的组织性力量变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与20世纪汽车工人面临的处境相比，21世纪初工人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与19世纪纺织工人所面临的处境更为相似。

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讨论劳工抗争在未来可能的动态发展规律。但是，在那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拓宽分析的视野。20世纪世界劳工抗争的演化轨迹不仅与产品周期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全球的政治周期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将讨论世界劳工抗争的动力发展规律与全球政治之间的交互关系，以丰富我们对20世纪劳工抗争的认识，并为我们对劳工运动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的评估，打下更加稳固的基础。

第四章

劳工运动和世界政治

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所关注的，是劳工和全球经济的动态发展机制，特别是生产组织和地点的变革、工人的谈判力量以及劳工抗争的世界一历史模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本章中，我们将转换视角，重点关注全球政治和劳工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深深嵌入到全球政治的动态发展机制之中的，这种全球政治动态发展机制的范围包括从国家的形成、公民义务到国家间的冲突以及世界战争。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也指出，从波兰尼的理论视角来看，21世纪的发展轨迹就像是一种钟摆式运动，在钟摆的一侧，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各种旧的社会契约的解体；在钟摆的另一侧，则是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和各种新的社会契约的建立。第一轮钟摆运动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运动的方向是迈向“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不断发展的劳工运动对这种倾向的最初的反向运动，这构成了本章第二节所关注的内容。而本章第五节则将关注钟摆的回摆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约束劳方、资方和政府的各种新的国家和国际社会契约得以建立，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中，这些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工免遭未受管制的全球市场变幻莫测的影响。

这一轮的钟摆过程也是对 40 年的世界大战、经济衰退、爆发性的劳工抗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动荡的一个反应。而这一中间阶段的特点就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战争和劳工抗争的恶性循环，本章第三节和第四节重点关注了这一轮钟摆摆动的过程。

二战以后钟摆向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方向的回荡运动，其持续时间是短暂的。该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契约，由于成为不断限制资本追求利润率的一种束缚而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这种对资本追求利润率的束缚被 20 世纪晚期的全球化浪潮所瓦解——这构成了本章第六节和最后一节的主题。其他学者关于二战后各种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矛盾的分析，比如有关“自由社团主义”的局限性（Panitch, 1977, 1981; Apple, 1980），和“霸权工厂体制”的讨论（Burawoy, 1983: 602 - 603; Burawoy, 1985），成为本章第五节分析讨论的基础。

在我们描述第一轮钟摆运动之前，第一节将利用来源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资料，首先展示一幅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的实证图景。一方面，该图景指出，世界大战在形成 20 世纪世界劳工抗争的整体发展轨迹方面具有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它也揭示出 20 世纪可以被划分成两个时期，与我们所说的波兰尼式的钟摆运动相对应，同时，与之相联系的，也与世界霸权的阶段相对应。

第一节 世界大战和劳工抗争

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来看，在 20 世纪世界范围的劳工抗

争的总体图景中，一个最直接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世界劳工抗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图4-1所显示的，是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记录的从1871年至1990年的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数量的时间序列。图4-2和4-3所描绘的是同样的时间序列，只是将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分别加总。这三张图所展示的时间序列趋势，都以三年的动态平均值为依据（关于这三张图中所包含的国家清单，参见附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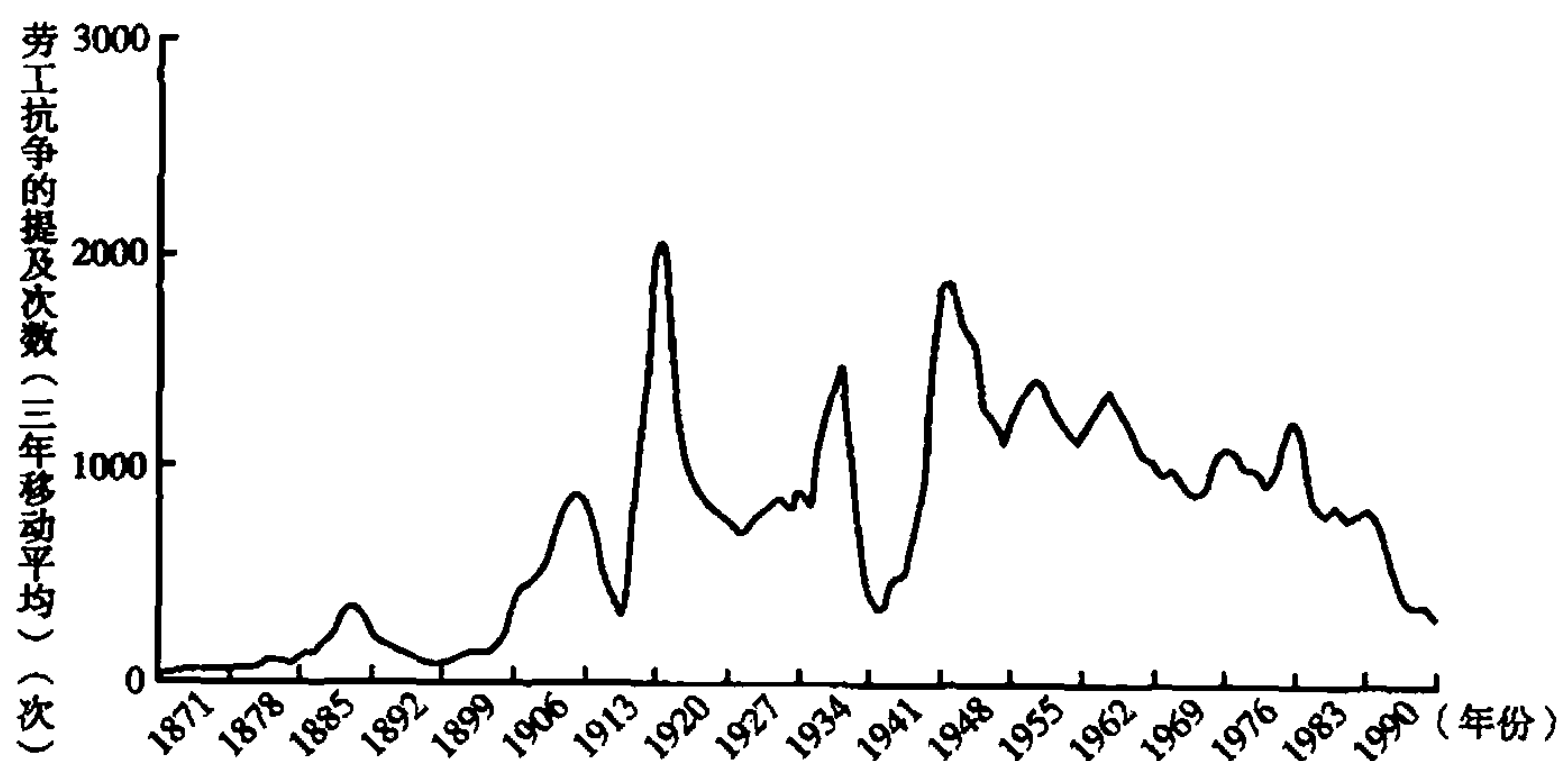


图4-1 世界劳工抗争 (1870~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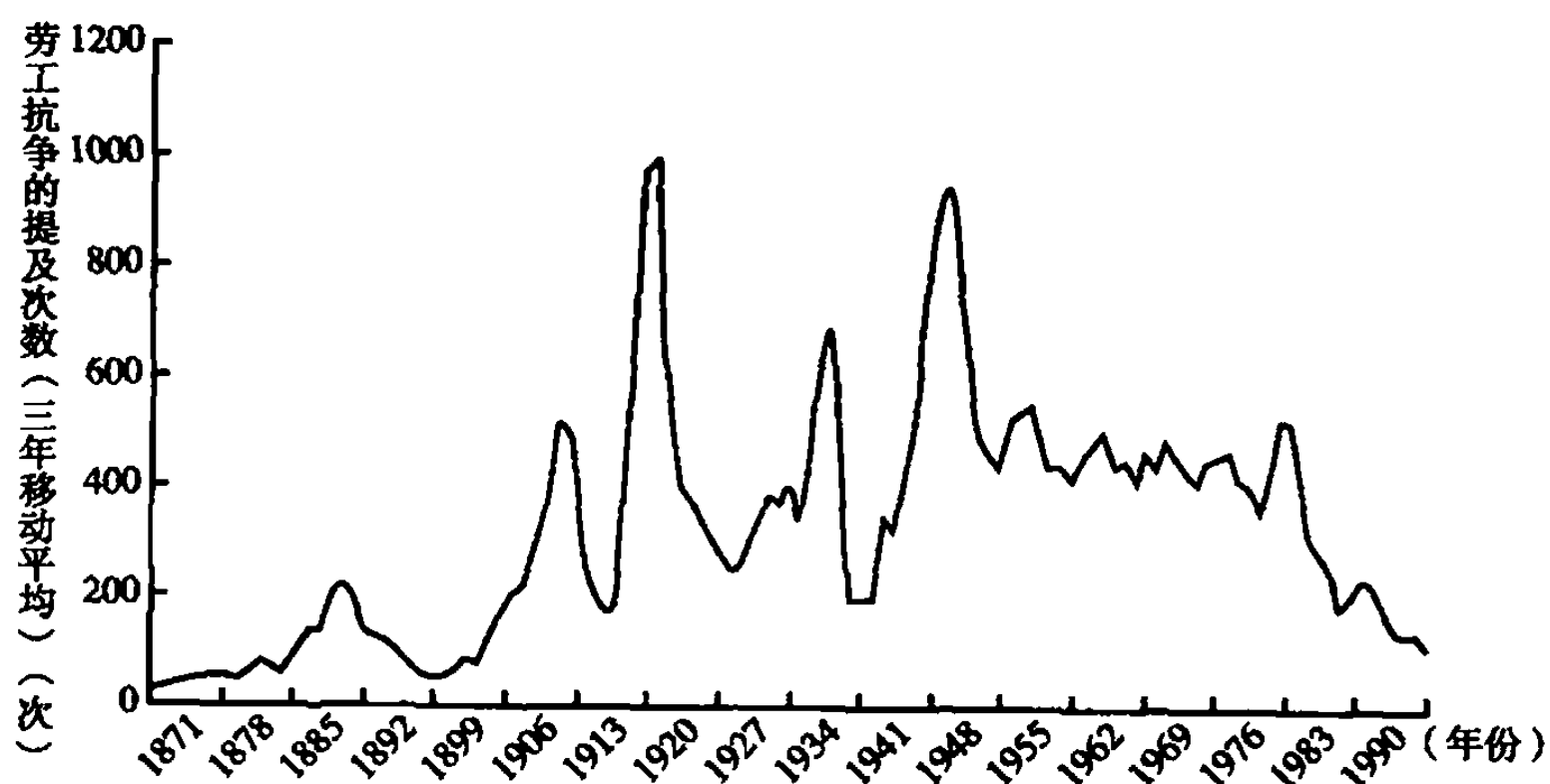


图4-2 宗主国国家中的劳工抗争 (1870~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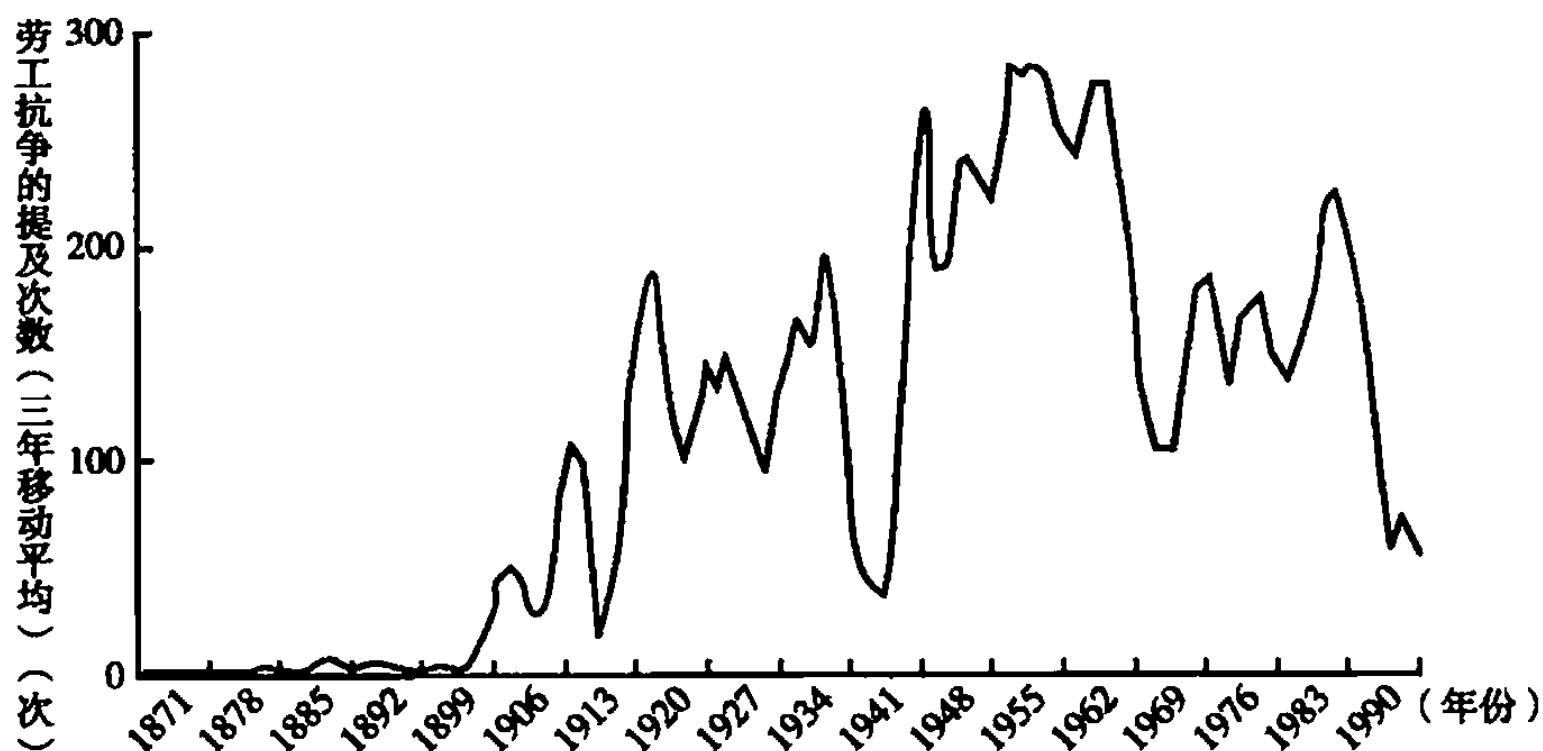


图 4-3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劳工抗争 (1870 ~ 1996 年)

这三张图都表明：两次世界大战对劳工抗争的时间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世界劳工抗争中的两个最高峰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份。可以看出，在时间序列中，1919 ~ 1920 年是劳工抗争的高峰年份，其有记录的劳工抗争总数分别是 2720 件和 2293 件。接下来的劳工抗争高峰年份是 1946 年和 1947 年，其有记录的劳工抗争总数分别是 1857 件和 2122 件。

在时间序列中，战争早期年份里的劳工抗争都处在低潮点。^① 这些低潮点可以划分为三类：从 1898 年到 1904 年；战争年代（1915 年记录的劳工抗争数量只有 196 件，1949 年和 1942 年则各为 248 件和 279 件）^②；最后，是 20 世纪 90 年

① 我们关于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期的这些发现，与道格拉斯·海布斯（Douglas Hibbs, 1978: 157）的发现是一致的。在对 11 个西欧和北美国家所发生的罢工活动的长时段分析中，他发现，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劳资冲突都“明显减少”。他还发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或者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爆发性的罢工浪潮”。

② 劳工抗争的浪潮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并未消失。例如，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显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尤其是 1917 ~ 1918 年的德国和俄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地方）发生了劳工抗争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在美国（转下页注）

代中期^①(1995年和1996年记录的劳工抗争数量分别是301件和302件)。

最后,从时间序列来看,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年份,正好是劳工抗争迅速发展并导致区域性劳工抗争高潮的年份。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0年时间里,有记录的劳工抗争的总数从1905年的325起增加到1909年的604件,到1913年达到875件。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0年,有记录的劳工抗争总数也在增加(从1930年的859件增加到1934年的1101件,到1938年达到1186件)——尽管这种增加的程度不如一战之前那么迅猛,但正如我们将在第三节中所要讨论的,其中的原因却并不那么简单。

这一世界大战和劳工抗争的时间模式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宗主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参见图4-2)。而且,即使在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种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夕劳工抗争都在增加,并且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公开的劳工抗争有短暂而大规模的减少,而在战争结束后又有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兴起(参见图4-3)。在劳工抗争的宗主国模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模式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世界大战之后的两次劳工抗争浪潮的相对规模不同。对宗主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劳工抗争浪潮的规模要大于(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于)第二次

(接上页注②)(1941年,1943年)、加拿大(1943年)和英国(1943年)出现了劳工抗争浪潮,在某些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赞比亚(1940~1941年)和新加坡(1940年)。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的总体影响,是削弱了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劳工抗争的激进程度。关于世界大战对劳工运动抑制性影响的程度及其持久性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本章第三节和第四节。

① 我们将在本章第六节中,继续对20世纪末期(20世纪90年代)的劳工抗争低谷和19世纪末期(19世纪90年代)的劳工抗争低谷之间的相似性进行讨论。

世界大战后的劳工抗争，但是，对整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而言，情况刚好相反，其二战之后的劳工抗争规模比一战后的规模更大，且持续时间更长。^①

或许，世界战争和劳工抗争之间的这些联系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就有把战争和劳工抗争（或更普遍的社会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传统。^② 迈克尔·斯都勒（Michael Stohl, 1980: 297）认为，“预设的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之间的联系”，是“社会科学文献中最为古老的假设之一”——尽管他同时也指出，围绕这种联系的确切形式以及这种联系在时间—空间上的适用程度，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斯都勒（Michael Stohl, 1980: 297 - 298）确认了关于这种“关系”假设的三个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的次级假设，它们在学术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参加战争在国家层面上提升了社会凝聚力并因此带来了国内的和平；

（2）参加战争在国家层面上增加了社会冲突并增加了爆发革命的可能性；

（3）国家层面上的社会冲突促使各国政府参加战争。

奇怪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模式，可以被解释成对上述三个假设都提供了支持（等式的两边分别是劳工抗争和世界

① 《泰晤士报》（伦敦）在二战后遭遇纸张短缺，这很可能是造成我们对二战后的劳工抗争浪潮有所低估的潜在原因，相关讨论参见附录一。但是，上文所指出的这种（存在于宗主国—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比较性的差异，并不会受到纸张短缺的影响。

② 譬如，可参见列宁（Lenin, 1916, 1971）、萨缪尔（Semmel, 1960）、拉奎尔（Laqueur, 1968）、海布斯（Hibbs, 1978）、梯利（Tilly, 1978）、斯考切波（Skocpol, 1979）、曼恩（Mann, 1988, 1993），亦可参见歌德斯图（Goldstone, 1991）。关于这部分文献的深入而广泛的评论，参见列维（Levy, 1989, 1998）和斯都勒（Stohl, 1980）。

战争)。^① 尽管这三个假设通常会被当做相互排斥的替代性选择，但是我们在这里认为，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假设，只是在时间上的适用程度不同而已。上述假设（3）（常常被称为是替罪羊或者转移注意力假设），能够很好地描述导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一时期；假设（2）则能够很好地描述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而假设（1）则能够很好地描述充满敌意的战争期间的情形。

因此，正如本章第二节所论证的那样，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过程逐步破坏了已有的各种社会契约，并创造（和壮大了）新的工人阶级，为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以及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舞台。^② 而且，正如本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将要论证的，这种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一方面受到了帝国主义之间敌对竞争的刺激，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最终导致在20世纪上半期，战争和劳工抗争之间不断扩展和深化的“恶性循环”。

20世纪上半期存在于战争和劳工抗争之间的恶性循环，与

① 斯都勒引用的这三个假设的陈述是模糊的，在等式的一边是一般性的战争，而等式的另一边则是社会冲突和（或）革命。实际上，斯都勒也指出，这种模糊性是存在于这些文献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对等式一边的战争而言，是否能够用同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所有的战争，在这种与“联系”有关的文献（以及更一般的战争研究文献）中，其争论是相当充分的。关于这些争论中的一个例子，可参见曼德拉斯基（Midlarsky, 1990）编辑的题为《大战争，小战争——一个单一的理论？》（*Big wars, Little Wars—A Single Theory?*）的论文集。类似地，列维（Levy, 1998）也曾抱怨道，在关于国内—国际冲突的研究文献中，采用了各种不同方式来对相关变量的进行概念化和测量，结果导致了一种根本性的混乱状态。人们用各种标准来测量国内冲突，从对总统受欢迎程度的调查到爆发革命。而对国际冲突这一变量的测量，其标准也是五花八门，从公开的战争到政治表态到军事威胁。应该澄清的是，在这里所测量的等式两边的变量是劳工抗争和世界战争。

② 关于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之间的区别，参见本书第一章。

20 世纪下半期的世界劳工抗争发展轨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 20 世纪上半期，世界劳工抗争呈不断上升趋势并具有爆发性的特征；而在 20 世纪下半期，世界劳工抗争不仅呈下降趋势且远没有那种爆发性的特征。这一鲜明对比的模式，可以在图 4-1 和图 4-2（不过，显然图 4-3 并不遵循这一模式）以及表 4-1 所提供的概括性描述统计中清楚看出。在这两个时期，每年劳工抗争数量的均值水平大致相同：其劳工抗争数量的年平均记录，分别是 935 件和 984 件。但是，20 世纪上半叶期间劳工抗争的上升趋势，和 20 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劳工抗争的下降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尽管劳工抗争在 20 世纪上半叶表现出很强的爆发性特征（用均值的标准差来进行测量），但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期间劳工抗争就很少表现出这种爆发性的特点。

劳工抗争从一种数量不断增长和极具爆发性特点的模式，转变为一种劳工抗争数量不断下降且相对平和的模式，与二战结束时新世界霸权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参见本章第五节）。这种转变对宗主国总体来说表现得尤为明显（比较图 4-2 和图 4-3）。劳工运动——尤其是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通过公司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各种彼此联系的社会契约（以及支持这些社会契约的各种结构性改变）而得到了缓和。在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尽管整个宗主国国家中的劳工抗争还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这些社会契约所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部分去商品化，宣告了核心国家中密集的、具有政治革命色彩的激进劳工运动的终结。^①

^① 西尔弗和斯勒特对社会冲突的不断增长（和相应的不断减少）时期的讨论，其概念化的方式是将这种冲突置于世界霸权转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即从 17 世纪荷兰霸权到 20 世纪美国霸权的霸权转移周期的背景下（参见 Silver 和 Slater, 1999）。

表 4-1 20 世纪的世界劳工抗争 (描述统计)

	1906 ~ 1949 年	1950 ~ 1996 年
趋势 ^a /显著性	0.257(0.09)	-7.8(0.00)
有记录的劳工抗争平均数量	935	984
爆发性特征:劳工抗争时间序列的标准差	537	352

注: a 为标准化线性系数。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50 年时间里,劳工抗争并未遵循某种单一的模式。正如本章第四节中将要讨论到的,作为稳定劳资关系基础的各种社会契约,从一开始就充满各种矛盾。当这些社会契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瓦解后,核心国家中的公开劳工抗争先是出现了增加,之后也趋于瓦解。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劳工抗争的瓦解还只是发生在核心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现象(参见图 4-2)。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这一类似的(和被延迟的)劳工抗争模式也在后殖民地国家出现了——换言之,公开的劳工抗争先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较大幅度地)增加,但随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趋于瓦解(其程度要小于核心国家)(参见图 4-3)。

我们要重述的最后一点是,第三章讨论过的产品周期的动态机制和这里所介绍的世界战争(或霸权)的动态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品周期和世界战争动态机制对世界劳工抗争的整体时空状态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世界战争的动态机制具有一种集聚效应,能够导致激进劳工抗争在特定时期出现世界范围的急剧爆发,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期。相反,与产品周期动态机制相伴随的持续空间调整策略,则具有一种“舒缓”效应,因为生产的地理转移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抗争的中心也不断发生空间上的转变。劳工抗争在一个地区的增长被其他地区的

(相关的) 劳工抗争的减少而抵消。在 20 世纪上半叶, 世界战争影响劳工运动的动态机制, 压倒了产品周期影响劳工运动的动态机制。相反, 在战后的美国霸权时期, 世界市场的重建以及世界政治环境的转变, 使得产品周期的动态机制得以活跃起来。^①

第二节 19 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和 现代劳工运动的兴起

世界经济在 19 世纪中叶的主要扩张——即所谓的资本的黄金年代——在 1873 ~ 1896 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达到其顶峰, 这是一个资本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激烈竞争的时期。这种竞争压力, 反过来促进了资本积累世界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正是在这些深刻而急剧的各种转变的背景下, 诞生了西欧和北美的现代劳工运动。

这些重大转变包括四种类型的资本调整策略, 其中三种调整策略 (空间调整策略、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和产品调整策略) 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予以介绍, 第四种调整策略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第一次介绍的金融调整策略。我们将要讨论, 这些调整策略的实施所引发的各种变化, 逐渐破坏了既有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并在工匠和农民中产生出波兰尼式的自我保护运动。但是, 与此同时, 这些变革也产生并壮大了新的工人阶级, 这些处于全球经济资本不断扩张和赢利部门中的工人阶级具有战略性的谈判力量,

① 在本书第三章中, 我们发现了密集的劳工抗争浪潮 (譬如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的纺织业) 的出现, 我们将其归结为生产组织和产品周期的变化。换言之, 我们认为, 机械化纺织生产的大范围扩张以及同时发生的地理位置上的扩散, 产生了同步的、广泛的劳工抗争浪潮。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世界政治环境, 本章对其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从而为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奠定了基础。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1850~1875年），随着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加剧，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利润萎缩（Landes, 1969: 213）。很多公司综合采用空间调整策略和技术（组织）调整策略来对此作出回应。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在19世纪晚期的纺织行业中，机械化的纺织生产迅速扩展到工资更低廉的地区，与此同时，环锭纺纱技术代替了走锭纺纱技术，由此造成已有生产地区的纺织工人的失业激增。该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生产首次大规模地迈向水平整合和垂直一体化。这些组织创新减少了资本家面临的竞争压力——尤其是那些实现了生产的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可以成为行业内一道强加的“准入门槛”（Chandler, 1977: 285, 299）——同时也增加了与工人及工人运动相对抗的各种资本主义组织的规模和资源。

寻求产品调整（即资本流入到新的产业或较少竞争的产品线）的趋势也在加强。起初，资本货物似乎是为资本的这种调整策略提供了一种出路。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涌入到资本货物部门，那里的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加，从而迫切需要资本共同努力以降低各种成本并增加控制，尤其是通过技术调整策略来实现这一点。在19世纪晚期的经济大萧条结束时，资本货物部门已经成为劳动过程变革的重要部门，用大卫·蒙哥马利的话来说，资本货物部门成为“科学管理”的“摇篮”（David Montgomery, 1987: 56）。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产品调整策略则发生在军工产业中。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升级，“全球性的工业化军工产业”（McNeil, 1982: 241）成为利润丰厚的私人投资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并且，正如我们将要在本章下一

节中所讨论的，军工产业也成为新的工人阶级快速形成和工人战斗性快速成长的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最后，军备竞争也为资本寻求另一种调整策略（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金融调整）开辟了空间。^① 金融调整策略和产品调整策略有诸多相似之处——因为，正如资本家可以试图通过产品调整策略将资本转移到具备较少竞争压力的新贸易和生产线之中一样，资本家也可以将资本从贸易（或生产）部门，完全转移到货币借贷、金融中介业务和投机买卖中去。19世纪后期的金融调整策略之所以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与军备竞争的升级密切相关。由于军备竞争导致各国之间为了获取借贷资金来支付增加的军备费用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因而增加了金融业的赢利能力（Arrighi, 1994: 171 - 173）。这种资本的金融化过程，削弱了那些“过度拥挤”的产业活动中的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因为这些产业正是资本撤离的产业。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削弱会在何种程度上因军工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得到补偿。

不过，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金融调整策略和其他调整策略的结合，开始降低资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同时却增加了劳动力面临的竞争压力。物价上涨的速度开始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结构性失业成为一种常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Gordon, Edwards 和 Reich, 1982: 95 - 99; Boyer, 1979; Phelps Brown 和 Browne,

① 该概念来源于一个相关的概念：金融扩张，即指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金融扩张（Arrighi, 1994; Arrighi 和 Silver, 1999）。作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19世纪晚期的金融扩张（或调整）策略和20世纪的金融扩张（或调整）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相似之处，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结尾部分和第五章中进行讨论。

1968; Silver 和 Slater, 1999)。对欧洲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来说, 从 1896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一时期, 在历史上可谓是一个美好年代 (Hobsbawm, 1987: 168 - 169)。

面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调整, 宗主国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最初反应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劳工抗争高潮 (参见图 4-2)。之后, 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晚期, 劳工抗争开始减少——这在时间上刚好与金融扩张开始的时间一致。^① 不过, 在紧随其后的 10 年时间里, 劳工抗争再次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不断增长的劳工斗争精神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结束的时候, 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在整个欧洲和美洲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国际建立起来, 众多社会主义者被选入议会, 工会会员的数量也迅速增长 (Abendroth, 1972: Chapter 3; Hobsbawm, 1987: 130)。

与 1848 (或 1871) 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镇压该时期工人运动高潮的任何成功都只是暂时的。在 19 世纪下半叶, 产业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分布范围都出现了极大的增长。在德国, 1850 年在采矿和制造业中只有 60 万名雇佣工人 (约占整个劳动力的 4%), 而到了 1873 年, 其数量就增长了 3 倍, 到 1900 年达到 570 万, 占劳动力总数的 22% (Kocka, 1986: 296 - 297)。在美国, 从 1840 年到 1870 年, 制造业的雇佣工人数量增加了 5 倍。在波士顿, 主要产业中的雇佣工人数量从 1845 年到 1855 年增加了两倍, 并且从 1855 年到 1865 年又增加了两倍。在南北战争后的 30 年时间里, 工业产出和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工业巨头的

① 究竟这种劳工运动的减少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还是 19 世纪晚期的金融调整真的削弱了劳工运动, 我们将在本章最后一节讨论 20 世纪晚期的金融调整及其对劳动运动影响时再来回答这一问题。

出现速度以及各种手工作坊的消失速度都变得更快了（Gordon 等，1982：82 - 83；Shefter，1986：199 - 200；Bridges，1986：173）。

各种各样的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对工匠的行业标准造成了打击，并粉碎了“劳工贵族”的“赞同”，迫使技术工人加入到不断增长的非技术工人的行列中。在英国，工匠精英阶层的不满，加上非技术工人规模和力量的不断增长，共同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新工会主义”的诞生。在1888年之后的短短4年间，工会会员的比例就从5%增加到11%，其中领头的是采矿业和交通业的各种产业工会。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雇主侵犯，在一战爆发之前的10年间又引发了新一轮工会主义浪潮，工会成员数量猛增到400多万，工会密度也达到了25%。^① 工会主义变得更具战斗性，更具政治色彩，而且更少行业分割性，“非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以及技术工人都被吸纳到工会中来”（Mann，1993：601 - 609）。

在所有那些旧的工匠精英感到威胁且新的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增加的地方，这种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人迈向更为团结的行动和更一致的目标的趋势，都表现得很明显。在法国，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主义骚动及其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爆发”，同时，该时期也是“工厂工人和手工工人首次被整合到一个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的运动中去”（Sewell，1986：67 - 70）。在美国，在1880年到1890年间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了4倍，与此同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10年时间里，罢工运动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罢工的导火索常常是技术工人的各种传统权利受到了

^① 宗主国国家在这些年份中存在类似的劳工抗争增加（或减少）的时间变动规律，从图4-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侵犯。但是，各种罢工往往迅速扩展并囊括大型工厂中的所有工人。在那些制造业城市中的罢工工人所得到的广泛的社区支持中，也能够看到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男工和女工）的合作。19世纪晚期的罢工运动经常伴随着跨工厂、穿越工人阶级社区的示威游行，呼吁对罢工予以支持。这些工人阶级社区中没有参加罢工的成员们，通常也会加入到这些示威游行和户外集会活动中去（Shefter, 1986: 217 - 218; Brecher, 1972; Gordon 等, 1982: 121 - 127; Montgomery, 1979）。

非技术工人规模的急剧增加及其在工厂中心区和工人阶级社区的集中，不但促进了跨工厂和跨行业的工人抗议行动的迅速扩展，还促进了共同的阶级意识的不断增长。某一个工厂或社区中发生的抗议行动，会迅速地蔓延到其他工厂或社区，这使得当代观察家们用“传染病”这一流行病学的隐喻来描述工人抗议行动的扩散。戈登等（1982: 126）写道：“这种‘会传染的’抗议行动的密度和强度，都植根于大量雇佣工人彼此之间日益趋同的工作状况，同时也有助于这些工人传播他们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工作状况的意识。”

最引人注目的工会发展出现在英国，最激烈的阶级战争爆发于美国，而最令人震惊的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个案则发生在德国。1890年德国废除了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法律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SDP）迅速成为最大的政治党派。从1887年占选票总数的10%到1893年占选票总数的23%，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力量是原来的两倍多。“在1890年，他们吸引了接近150万张选票，在1898年超过了200万张，在1903年所有900万张选票中获得了300万张，而在1912年则获得了425万张。”在这一（工人阶级政党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德国这一案例最引人注目。虽然直到1880年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还很少存在，但到了1906

年，只要是在工人阶级政党被认为是合法的地方，其存在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正常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已然是最大的政党（尽管还不是多数党）（Barraclough, 1967: 135; Piven, 1992: 2）。

工人阶级政党的兴起和争取公民普选权的整体运动风潮，意味着对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挑战。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在英格兰内外……没有哪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念，即大众民主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威胁”（Polanyi, 1944, 1957: 226）。对这种挑战的一种通常的反应就是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9年被宣布为非法），但是纯粹的镇压已然不足以应对挑战。1890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禁令被取消，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扩大选举权的斗争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取得重大胜利。诚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各种各样的防范策略也在被不断引入（譬如，限制被直接选举的主体的宪法权力，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等等）（Hobsbawm, 1987: 85 - 99, 116 - 118）。尽管如此，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应对这一变革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而且是其策略的根本性改变（Therborn, 1977: 23 - 28）。

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或许可以被称为“国家的社会化”。到19世纪晚期经济大萧条结束之时，波兰尼（Polanyi, 1944, 1957: 216 - 217）写道：“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论其具有何种民族精神或历史”，都开始去执行各种政策，以保护其公民免受自我调节的市場所带来的破坏。社会保险体系（养老金、健康和失业保险）被介绍引入，以在部分程度上帮助国家缓解爆发社会主义动乱的压力。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第一个采取了这些措施，而其他国家则很快纷纷效仿（Abbott 和

DeViney, 1992)。^①

这些措施构成了更普遍的跨阶级联盟发展的组成部分，而这一联盟支持建立一个强大而积极干预的国家。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激烈竞争引起了各阶层对国家保护的强烈要求，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农民阶级，由于进口谷物的大量流入而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这是由于蒸汽船的使用和铁路的开通（以及自由贸易政策），使廉价的美和俄国商品能够大量涌入欧洲大陆市场而导致的（Mayer, 1981）。而且，欧洲大陆国家的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还倾向于认为国际自由贸易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英国都是有利的，但在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他们加入到农业精英阶层的行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获得在垄断性领域的影响力，保护国内市场，并对原料供应实行特许经营。

在美国，农业中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致使农民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便扩大农产品市场并为农场主们提供廉价的铁路运输（LaFeber, 1963: 9 - 10; Williams, 1969: 20 - 22）。1893年的经济衰退（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一次对制造业的打击比对农业的打击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农场主和工业家紧密联合起来，一致倡导侵略性的海外扩张政策。这次经济衰退伴随着大范围的社会动荡的事实，更加强了这种海外扩张的紧迫感。正如威廉姆 A. 威廉姆斯（Williams, 1969: 41）所指出的，

① 当1873~1879年间的经济衰退重创德国时，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工抗争的蔓延和社会主义者们的宣传鼓动，加之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严重金融危机，迫使首相俾斯麦采取干预政策以保护德国社会，以避免不受干预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灾难摧毁他刚刚辛苦建立起来的帝国体制。同时，农业和工业利益的日益趋同不断迫使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使其免受国外的竞争压力，这给俾斯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使其能将政治权力赋予帝国行政部门“以确保德意志帝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力量的一种新的平衡……并通过将帝国与各种经济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完成民族的统一”（Rosenberg, 1943: 67 - 68; Arrighi 和 Silver, 1999: 124 - 125）。

“（发生在1893的）衰退的经济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产生的一种对广泛的社会动乱甚至社会革命的真实恐惧”，使得美国的商业和政府首脑们最终接受了“海外扩张政策，并将其作为解决美国国内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战略方案”。作为该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决定在1898年对西班牙发起两条战线的进攻——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扩展美国在亚洲的市场。

这些殖民战争和不断升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反过来为“国家的社会化”提供了另一种动力。出于帝国主义扩张和战争的需要，统治者们越来越依赖于其国民的积极主动的合作。在19世纪以前，各国主要依赖于被支付报酬的职业雇佣兵和“绅士们”来作战，这种战争可以持续数年而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拿破仑战争时期对国民军队的动员是一个前兆，它使得欧洲统治者结束了军队模式的试验并在战后恢复了旧的军队模式。正如威廉姆·麦克尼尔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时期的战事经历使欧洲统治者确信，“1793~1795年间法国应征士兵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以及1813~1814年间德国国民战士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热情，不仅可以挑战已经建立的权威，还可以用于巩固和强化这种权威。”通过恢复旧的军队模式，欧洲统治者“避免使用在革命年代显示出能量的深层次的国民力量”，同时，这也使他们不再惧怕“革命骚乱的幽灵”（McNeil, 1982: 221）。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各个国家再次倡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并将其作为新的公民信仰，作为调动公民参加战争的一个基础（Tilly, 1990; Mann, 1988）。此外，随着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战争的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增长（McNeil, 1982: 第七章和第八章），工人成为战争机器中至关重要的齿轮，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战争前线，在敌后的工厂中也是如此。因此，战争的

成功推进越来越需要工人—公民们的支持。统治阶级对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的扩大，其目的是换取工人阶级的忠诚，并使得国家远离革命的幽灵；但是，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破坏性，上述措施最多只能说是一项权宜之计。

因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世界政治和劳工政治就已经深深地（且不正常地）交织在一起了。如果我们从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几十年间的大规模劳工抗议的方向来判断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融合了国家与社会保护措施的各种国家霸权工程，似乎并未成功地控制各种社会紧张局势。正如图4-2所示，各宗主国国家中的劳工抗争，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10年间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所谓的美好年代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工人阶级在规模上继续快速增长。而且，这些工人阶级利用其所处的战略性地位，以一种越来越具有计划性和有意识的方式，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脉部门发动大规模罢工，尤其在煤矿产业、航海交通和铁路部门。

第三节 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恶性循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各种行动及其反向行动，已经被广泛地用来支持所谓“替罪羊假设”的有效性〔即本章第一节所列举的假设（3）〕的有效性。换言之，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一些领导人试图“转移注意力”的行动所促发的。A. J. P. 泰勒（Taylor, 1954: 529）曾经对这种直接的联系作过阐述，他认为，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政治家们相信“战争将会延缓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样的，凯瑟尔（Kaiser, 1983）也认为，“现在人们已经达

成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共识，即认可德国在 1897 年以后的对外政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对其国内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威胁的反应。”

除了这些直接的联系，在发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和 20 世纪初的各种殖民主义冒险活动中，也可以看出劳工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更多的间接曲折的联系。这些冲突——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努力转移不断增加的阶级冲突而引发的——直接造成了各种紧张局势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Semmel, 1960；Fischer, 1975；Mayer, 1967, 1977；Berghahn, 1973；亦可参见 Levy, 1998；Rosecrance, 1963；Lebow, 1981；第四章；Ritter, 1970，第二卷：227 - 239）。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不断发展的社会—保护主义者的角色，只有通过市场的扩展和资源的获得才能被成功地实施，尤其是当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对手国家当时正在追求同样的战略这一事实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到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的时候，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小小胜利的战争，就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和巩固政府地位的作用。西班牙—美国战争（对美国来说）和南非战争（对英国来说）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不过，紧随 1905 年俄国被日本打败之后的那场动摇了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暴动，也显示出失败的战争（或不受欢迎的战争）所可能具有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后果。在 1904 年俄—日战争爆发前夕，俄国内务大臣就已经公开声明，“这个国家需要……一场短暂的、胜利的战争来阻止革命的浪潮”（Levy, 1989：264）。如果欧洲统治者们在 1914 年还期望用一场受欢迎的小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那么，他们显然是对由于战争的工业化和国家化所带来的、被改变的局势，作出了严重的错误判断。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酝酿时期，统治者们的行为被

广泛认为是支持假设（3）的，那么，与世界大战的爆发相伴随的第二国际的瓦解和劳工战斗性的普遍下降，则被广泛看做对假设（1）（在战争和社会凝聚力之间建立联系）的强有力支持。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中欧洲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大多数当代观察家都会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的公民们（包括大部分的工人阶级成员）是带着明显的热情加入到1914年的战争中去。现在看来，当时宗主国国家的统治精英们似乎成功地策划实施了各种国家霸权主义计划，这导致了捍卫国家的跨阶级联盟。事实上，一旦民众处于要求他们各自的国家对其实施社会和经济保护的立场的时候，工人们就会支持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就会高涨，而国际社会主义也就瓦解了（Carr, 1945: 20 - 21; 亦可参见 Abendroth, 1972; Haupt, 1972）。

令战争策划者们惊讶的是，几乎不存在被征入伍者逃避服兵役的现象。在战争开始的几年里，交战各国中的劳工抗争和社会主义动乱的数量都急剧减少（参见图4-2）。诚然，这种减少部分程度上有被强制的原因^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积极努力以确保工会成员与政府达成共识并进行合作。工会、雇主和政府之间达成三方协议，工会领导承诺确保不再进行罢工；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和雇主则承认工会并建立集体谈判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对很多国家的工会运动来说（譬如，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雇主们第一次消释了其对工会的势不两立的敌意态度

^① 梯利（Tilly, 1989: 441 - 442）发现了一种普遍性趋势，即政府的镇压能力在战争时期增强。他认为，随着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被削弱，结果是国家的这种增强的镇压能力被进一步强化了。当没有组织传统的新无产阶级被整批整批地送进工厂时，有组织传统的工人们则被招募进军队或被转移到与战争相关的产业中。

(Hibbs, 1978: 157; 亦可参见 Feldman, 1966; Brody, 1980; Dubofsky, 1983; Davis, 1986; Giddens, 1987)。

在战争期间，不但工会的权利得到了扩大，而且选举权的大幅度扩大也发生在战时和战后。因此，约翰·马科夫强调指出，在战争期间，“国家最重要的利益”在于保持劳工和平，这使得战争时期成为成功扩大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后者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战争时期的工厂中）的选举权的大好时机。举例来说，在比利时，1886年、1888年、1893年和1902年都有大规模罢工活动，在1913年普遍选举权更是一项核心的要求；但是比利时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选举制度中还规定拥有财产的年长男性享有3票的选举权。不过，到战争结束时，比利时已经建立了平等的男性选举权(John Markoff, 1996: 73 - 74, 85)。^①

无论如何，20世纪早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所有这些国家霸权协议都具有极度的不稳定性。战争的残酷性很快就使人们从确信已经找到了保护公民的成功方案的观念中醒悟过来。而一旦（历史的）方向盘从民族主义转向革命的热情，曾经被用来保护既有秩序的军队，就被用来挑战既有的秩序。被遣散的士兵和逃兵从战场返回到他们所在的城镇和农村，他们不仅带来了革命的消息，还带来了为革命而战斗的枪炮（Wolf, 1969）。一场重大的叛乱和革命的浪潮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爆发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以后。

① 从对立的一方来看待这种现象，可以发现军事战略家们发动了各种运动，目的是用来削弱敌国民众中的“大众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新的军事战略（如海上封锁）的目的是切断粮食供应，并在非参战人员中增加民众受饥饿的威胁。这些战略的出发点，是在敌国前线创造其国内不稳定，此类战略认识到了保持作战国国内的大众忠诚（和失去大众支持的危险）对于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Offer, 1985）。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瓦解可以看做支持假设（1）的最生动的例证之一，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以及战后所发生的范围广泛的革命危机，则是支持将战争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假设（2）的最为生动的景象。事实上，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战争对劳工抗争上的抑制效应并非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到1916年，迅猛发展的罢工、士兵逃跑和反抗，表明那种认为稳定的国家霸权已经形成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到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欧洲人民的反战情绪可能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情绪。而到了1918年，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就要席卷整个欧洲。

1905~1914年期间的罢工揭示了资本对交通业和采矿业劳工运动的脆弱性。在战争时期，大规模和迅速扩张的军工产业（参见本章第二节）被证明是劳工运动最为脆弱的产业部门。战争的工业化，意味着在武器制造业有大量的私人 and 公共投资。那些在金属加工产业中工作的工人们成为战争机器中至关重要的齿轮，他们为在前线的士兵们提供武器供给。但是，战争的工业化首先需要努力推进军事生产的机械化，这意味着会存在来自技术工匠们的反抗。正是在金属加工产业中，三方协议的推行首次处于困难重重的境地，因为正是在这里，“劳工组织的传统力量”（技术熟练的工匠）“与现代工厂相遭遇”。庞大的军工产业——无论是在英国、德国、法国，还是在俄国和美国——都变成了技术和非技术工人进行产业抗争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中心。工厂里的金属加工工人在战时和战后都转向了革命，正如在喀琅施塔得和基尔的“新高科技海军舰队”或“流动工厂”里的工人一样（Hobsbawm, 1994; 1987: 123 - 124; Cronin, 1983: 33 - 35）。

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革命的深深恐惧折磨着欧

洲的统治精英们。所有被打败的国家——德国、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俄国——都深受革命和国家垮台的折磨。而且，即使是那些战胜国也面临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观察到，“整个欧洲充满了革命精神。工人们不仅感到深深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战前的境况充满了愤怒感和反抗。整个的现存秩序，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方面，都受到来自整个欧洲的人民大众的质疑”（转引自 Cronin, 1983: 23）。列宁在1916年就预言帝国主义将会加剧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并由此标志着“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夕”，这一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Lenin, 1916, 1917: 175）。

然而，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政党对意大利的接管，劳工抗争和革命的浪潮开始消退。在波兰尼（Polanyi, 1944, 1957）称之为“保守的二十年”中，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倾向于让政策重新回到19世纪的政策措施上去。这一复辟项目的支持者认为，重新回到金本位和国际自由贸易，对于重建国际和国内和平的良性循环是必要的，而这种良性循环正是19世纪中期的典型特征。但是，正如当时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人所预言的那样（Keynes, 1971, 1920），这样的一种努力注定会制造新一轮社会混乱的局面，并再次开启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的恶性循环。

与19世纪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想建立一个全球性自我调节的市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乌托邦规划。那种曾经在19世纪一个短暂时期内化解了由自由放任政策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紧张状态的种种机制，此刻俨然已不复存在了。首先，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即高度自给自足和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美国），相对于原有的贸易中心英国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替代，因为英国在19

世纪随时准备吸收世界很大一部分非工业产品的出口；其次，最大的工业国家（即居于首位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美国）禁止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进入美国，从而关闭了“19世纪国际秩序的最有效和最必要的安全阀之一”（Carr, 1945: 22 - 23；亦可参见O'Rourke 和 Williamson, 1999: 第十章）。

美国这一移民政策上的改变，在部分程度上是对劳工运动要求保护本国工人不受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威胁的反应。但这一政策本身也反映出一个差异，即20世纪20年代尝试经济复苏的环境，与19世纪中期英国所推行的世界经济自由主义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同。换言之，尽管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很大范围内遭遇到了失败，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阶级抵抗放任自由政策的力量，要远远强于其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力量。各民主政府现在不得不关心本国工人（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而这些是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很少关心的。

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利的环境中，日内瓦的国际黄金委员会开始向一些国家施压，迫使这些国家采取今天众所周知的“结构调整”政策，以促进健康的（可兑换的）货币流通。这些政策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政府被迫进行各种两难选择，如：在健全的货币流通和促进社会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在信任国际金融市场和信任民众之间作出选择，在遵从日内瓦的强制规定和遵从民主投票结果之间作出选择。对于那些被诱导而作出错误选择的政府而言（即听从日内瓦的结构性调整政策），这种惩罚不服从者的机制是最为有效的。“资本的外逃……在1925年和1938年法国自由主义政府的两次垮台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在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也扮演着同样角色。”在1923年的澳大利亚、1926年的比利时和法国、1931年的德国和英国，

在试图“拯救货币”的徒劳努力中（Polanyi, 1944, 1957: 24, 229 - 233），劳工政党被从政府中清理出去，社会服务和工资被削减，工会则被破坏。

恢复金本位制度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团结的象征”。但是在华尔街崩溃后的一到两年时间里，很明显，复辟主义者们的各种努力已经全面失败。尽管不成功，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尽管自由政府被牺牲掉了，但是自由市场并未得到恢复。”“可能避免法西斯灾难”的各种民主力量被“顽固不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削弱；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正是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倡通货紧缩政策，支持（通常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独裁主义政策（Polanyi, 1944, 1957: 16, 233 - 234）。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再多的镇压也不可能重建 19 世纪的世界秩序，国际精英团结的表象也随着复辟主义者们的努力一起坍塌了。

在 1929 年的经济崩溃之后，随着巨额融资和自由政府的政治信誉的瓦解，各种尝试将国家霸权规划和社会霸权规划结合起来的实验，其推进程度要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斯福新政、苏联的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为了摆脱解体的世界市场而搭上国家经济救生艇的不同方式。这些竞争的国家计划具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摒弃了自由放任的原则；第二，它们推进了快速的工业扩张，以在部分程度上努力克服市场体系的失败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危机，尤其是大规模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Polanyi, 1944, 1957: 第二章）。

但是，快速的经济扩张虽然缓解了失业，却加剧了其他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的紧张关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增加了帝国主义国家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材料来源的压力。反过来，这些压

力又重新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独占并保护其海外势力范围的竞争再度升级。英国正由于占据了抢先向海外领地扩张的巨大优势，才得以在亚洲和非洲控制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大陆帝国，并且它通过取代英国而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帝国中心，可以在拉丁美洲轻而易举地进行扩张。同样，俄国就其领域而言也是一个大陆帝国，但它并没有自己的非正式的帝国，并且它的边境地区也远没有美国那样安全。与之相反，所有一战时的轴心国，都感到，它们作为帝国建立者，受到了其相对落后的状态和相对较小的国土范围的限制，因此，它们开始积极地、带有侵略性地挑战现有的政治—经济空间的分配格局 (Neumann, 1942)。

当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被再次挑起时，由于各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工业化的压力加剧。在爱德华时代不断升级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恶性循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核心国家中再次出现，而且程度更甚。图 4-2 所显示的近乎是同一种模式的重演，先是在战争前夕劳工抗争不断增长；其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公开的劳工抗争减少；而在战争结束后劳工抗争又大规模爆发。然而，劳工抗争和战争爆发之间的因果联系 [即假设 (3) 所提到的“转移注意力”的作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这种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表现得更为间接。发生劳工抗争的主要核心国家（如美国、法国）并非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国家。相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这种因果联系似乎体现为某些国家的劳工抗争重大浪潮与革命危机之间的联系，如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这些国家中，劳工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反劳工和反革命联盟所带来的，是各种富有侵略性和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政权的

上台。

第二轮的恶性循环与第一轮相比，其涉及的地理范围更为广阔。在战争期间，各种大型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所带来的对抗和冲突具有无法比拟的更大破坏力量。”一个相关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工抗争和革命暴动在全球范围所占的比例要远为庞大。接下来，我们将对这种发生于 20 世纪中期的劳工抗争的全球化过程和革命进程予以讨论。

第四节 劳工抗争，世界大战和殖民地 世界的国家独立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都集中在宗主国或核心国家。但是，在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不断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殖民主义扩张所带来的混乱和变革，也导致了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激进抗争和社会冲突的不断增加。从 19 世纪晚期的经济大萧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其特征是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的新浪潮。随着铁路和蒸汽轮船的普及，标志着 19 世纪晚期经济大萧条的激烈竞争，也动摇了从南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当地的阶级关系。从墨西哥莫雷洛斯的蔗糖种植园到阿尔及利亚西部的葡萄种植园，一直到越南南部的橡胶种植园，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经济作物的新机会，使外国和本土资本主义企业家相互之间在争夺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方面展开了一场竞赛。结果导致了农民的生存危机，以及作为政治稳定基础的既存社会契约的合法性危机（Wolf, 1969; Walton, 1984）。

在 19 世纪晚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诱发劳工抗争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正在进行的被无产阶级化的抗争，这种抗争的

一种类型被我们称为波兰尼式的抗争类型。^① 但是，与此同时，新的、具有战略地位的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因而为未来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奠定了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10 年时间中，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殖民地半殖民世界的劳工抗争纪录，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交通运输行业。劳工抗争的增长（参见图 4-3），发生在由西化的精英们领导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抗争浪潮的背景下，这些西化的精英们对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以及西方的霸权越来越不抱什么幻想。^② 虽然在战争期间劳工抗争减少了，但是世界战争本身对殖民世界中的劳工运动具有一种激进化的效应。欧洲国家将其长手伸向殖民地并招募工人组成殖民地军队，奔赴遥远的战场上作战。对这种征兵动员形式的憎恨，激起了工人的激进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情绪（Chandavarkar, 199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所记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劳工抗争的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参见图 4-3）；其中，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工抗争数量仍占

① 我们把反抗无产阶级化的抗争定义为劳工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各种报纸倾向于将这些抗争行动报道为“当地的叛乱”，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我们并没有将其纳入记录（参见附录一）。结果是，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19 世纪殖民地世界的劳工抗争的总体程度无疑被低估了，图 4-3 所记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劳工抗争，情况也是如此；就同一时期的欧洲而言，对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抗争，也构成了其劳工抗争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农业部门对各种破坏作出回应而进行的抗争（Mayer, 1981）。

② 1905 年，日本取得对俄国的军事胜利，该胜利对整个亚洲的殖民地精英所产生的震撼效应，甚至超过了 1905 年的俄国革命本身。根据孙中山的说法，“俄国被日本打败，（被看做）西方被东方打败。我们把日本人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加瓦哈拉·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当时还是一名印度学生，他回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我脑子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我想象着印度独立自由……我梦想着自己的各种勇敢行为——我手握长剑，为了印度而战并帮助她取得独立自由”（引自 Stavrianos, 1981: 389）。

所记录数量的大多数。在紧随战后的劳工抗争的高峰之后，其数量有一个轻微的下降；但是，随后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被记录的劳工抗争数量再次开始上升。在整个过程中，出口产业（尤其是采矿业）和联合的交通运输产业中的劳工抗争，都具有重要地位（Bergquist, 1986; Brown, 1988; Silver, 1995b: 179）。不过，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被记录的工厂工人的劳工抗争的总数量也出现了增长，这反映出在20世纪前30年时间里，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在殖民地半殖民世界的扩张（参见本书第三章）。^①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经被紧紧卷入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供应结构体系中（作为人力和原材料的供应方），这一事实，强化了这种大规模征兵动员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战争的筹备过程）导致了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以及各种与战争相关的出口飞地数量的迅猛增长，并为这些飞地中的工人们提供了强大的谈判力量。正如宗主国国家军工产业中的工人们交战国的军工和工业复合体中占据着战略性地位一样，殖民出口飞地中的工人们也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源需求结构体系中占据着战略性位置（Bergquist, 1986; Brown, 1988）。

诚然，战争不会在每个地方都导致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上海曾经是纺织业的中心，也是工人阶级形成的中心；但随着工厂的关闭以及工人为了生存重新回到农村，战争从根本上彻底清除

① 回顾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对纺织行业的讨论，我们现在就能够发现，全球政治环境在扩大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范围的纺织行业劳工抗争浪潮方面，确实具有重要作用。类似地，除了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论及的纺织产业与汽车产业在结构特征方面的差异之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与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的迥然不同的世界政治环境，也为汽车业和纺织业的劳工抗争模式在成熟期的差异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了工人阶级 (Honig, 1986)。^① 不过, 在那些被战争吸纳为资源提供地而非资源掠夺地的地方, 战争增强了工人的战略性谈判力量。其中一个显示这些部门的罢工有效性的例子,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决定在其整个帝国辖区内引入工会制度以及各种安抚和仲裁机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工会、雇主和国家之间的三方协议仅仅出现在宗主国国家, 且在战后被迅速废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持续时间更长; 在宗主国国家, 这种协议对劳工所作出的妥协更大, 且覆盖的地域更广 (关于英国的殖民地工会政策, 参见 Cooper, 1996; Brown, 1988; Burawoy, 1982)。^②

不断增长的劳工的战斗性与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密切交织在一起。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中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们, 很少努力去动员 (或根本就没有去动员) 人民群众参加到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去。但是,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里, 部分程度上是出于对 1917 年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响应, (成功的) 民族主义领导者——无论是共产主义者抑或是非共产主义者——开始“扩大……抵抗外国殖民势力的基础, 其方式是建立工农大众组织并加强领导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各种联系” (Barraclough, 1967: 178)。

在印度, 从“以相对狭隘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在 1920 年开始转向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在这一年, 甘地发动了第一次全国的公民不合作运动。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的杰出贡献, 使得国大党转向民众, 并因此使这场运

① 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样的社会错位培养了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的基础。

② 确实, 工人权利的理念随着帝国主义霸权的扩张而向殖民地世界的扩展, 带来了系统层面的利润率问题, 从而促进了各种新的边界划分框架的出现——关于这一问题, 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提及,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动成为一场群众运动”（Barraclough, 1967: 180; 亦可参见 Chatterjee, 1986）。

中国在 1924 年左右，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当时中国的劳工武装斗争浪潮促使孙中山去反思人民大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角色，其后，他改组了国民党。在 1924 年以前，社会问题在孙中山的规划中几乎不占任何位置。但到了 1924 年，他就已经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取得了联系，将经济问题作为其规划中的首要问题，并和共产党结成联盟，将国民党改组成一个以革命军队作为其先锋队的群众性政党（Barraclough, 1967: 182）。

类似地，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非洲主要的民族主义运动（如黄金海岸国家和尼日利亚）也已经从“与民众很少有联系的中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运动，转变为群众性的政党运动，并通过将国民和各种社会目标结合起来以达到激发全体人民投身到运动中去的目的，这种群众性的政党运动获得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支持（Barraclough, 1967: 189）”。因此，非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多地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显然，一场成功的独立运动需要动员群众的参与。正如科委姆·尼克努马哈（Kwame Nkrumah）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未受教育的群众的破城槌，中产阶级的精英就永远别指望能摧毁殖民主义的势力。”但是，要想确保人民大众对运动的忠诚，就必须将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承诺（“建立一个新社会”）置于民族主义运动议程的显要位置之上（Barraclough, 1967: 190; Nkrumah, 1965: 177）。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工抗争的重大浪潮蔓延到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但相比之下，二战后的劳工抗争浪潮更为剧烈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参见图 4-3）。

1949 年，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镇压或者化解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成为新的霸权力量的全球战

略中的焦点问题。直到 1949 年，人们的注意力还都集中在欧洲，正如一位美国商业部副部长在 1947 年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报告的那样，“大部分……国家都处于（革命的）悬崖边缘，并随时可能被推下悬崖；其他的国家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转引自 Loth, 1988: 137）。到了 1949 年，社会革命的威胁已经表现得颇为明显。不只是“一个单独、羸弱且被孤立的苏联，而是十几个类似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从全球革命的第二次巨大浪潮中浮现出来……全球革命的推动力也并未衰竭，因为旧的帝国主义海外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进程仍然在全面进行中”（Hobsbawm, 1994: 82）。

第五节 美国霸权、大众消费以及 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其世界霸主地位，战争和劳工抗争之间的恶性循环也随之结束。在 20 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劳工运动在力量和战斗性方面都有所加强，调解和（或）镇压它们的努力也都失败了。劳工抗争的浪潮和大范围的革命起义交织在一起，席卷全球。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此时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 20 世纪上半叶期间的不断上升和具有爆发性的状态，转变为二战之后一段时间中的趋于稳定或持续下降状态（参见图 4-1 和表 4-1）。

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二战结束之际世界军事和经济力量空前集中在美国手中有关，因为它结束了大国间的竞争，而正是这种竞争曾不断推动着战争和劳工抗争之间的恶性循环。然而，经济和军事力量高度集中于美国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解释

这种转变。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在公司、国家层面尤其全球层面发生的各种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去商品化。本文所列举的这些改革是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劳工力量的回应，也是对在20世纪上半叶获取国家政权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苏联和中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功的回应。^①

全球层面的制度变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为国家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契约提供了环境。在20世纪上半叶，正如我们前面所证明的，建立国家社会契约的种种努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促发了迈向全球经济不稳定和世界大战的运动。通过支持全球性的制度变革，从而使劳动力在公司和国家层面能够部分程度地实现去商品化过程，美国因此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国家。美国领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整体上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并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它所引领的这一方向，能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应对20世纪上半叶剧烈的社会动乱和劳工抗争所提出的某些挑战和要求（参见 Arrighi 和 Silver, 1999, 尤其是第三章）。

尽管各种改革都试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调节不断增长的劳工力量与谈判能力，这种调节的发生却建立在极不稳定的基

① 如果我们对比英国坐拥世界霸主时期面临的情形和美国坐拥世界霸主早期面临的情形，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正在进行的全球革命挑战对于决定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实行改革偏好的战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英国开始成为世界霸主的时候，法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遭遇革命挑战的核心强国的代表）已经遭受了一次决定性的军事失败，正如英国国内的劳工抗争遭受的失败一样。英国并没有面临一场严重的人民革命的挑战，因此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所采取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最初目标，对内是实行镇压，对外是恢复欧洲大陆的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英国的改革政策只是在以后才出现的。相反，在美国开始成为世界霸主的时候，苏联（20世纪上半叶遭遇革命挑战的主要强国的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不过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更加强大。此外，劳工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世界战争后都变得强大而激进。轴心国的反革命挑衅在战争中被打败了，而革命性挑战的力量和声望则得到了加强（参见 Silver 和 Slater, 1999: 202-203）。

础之上。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其推进是沿着刀尖进行的：在刀刃的一侧，是由于各种改革的成本而导致的利润率的重大危机；在刀刃的另一侧，则是由于无法完全实现所承诺的改革而造成的重大合法性危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中，这一矛盾最终爆发出来。^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深受空间的差异化战略的影响。与宗主国相比，在平衡改革和镇压的策略上，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更倾向于采用镇压的方式。^② 结果是，与宗主国相比，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明显出现得更早，表现得也更为严重。我们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所推导出的时间序列和这一分化是相吻合的（参见图 4-2 和图 4-3）。在整个宗主国国家中，尽管劳工抗争的平均水平在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内都保持在历史较高水平上，但是，被报道的劳工抗争的数量却呈现一种缓慢而稳定的下降趋势。此外，劳工抗争的浪潮日益与革命危机相脱离。与之相反，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劳工抗争浪潮保持在历史高位上，只是当去殖民化的浪潮完成其历史进程之后，劳工抗争的浪潮才出现过一次下降，但随后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开始上升。

在本节的剩余部分，我们将对影响战后劳工抗争模式的各种变革因素作更详尽的分析：我们首先关注各国追求的改革的程度及其本质，然后集中讨论镇压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我们将审视世界经济重建过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空间、技术（组织）和产品调整策略是通过哪些方式削弱了存在于“工人背

① 参见本书第一章所陈述的存在于历史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即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间的紧张状态。

② 在殖民地/后殖民地世界中，统治者之所以在这种平衡的权衡中更倾向于采用镇压手段，联系本书第三章关于产品周期的相关论述，可以得到部分程度的理解。

后”的劳工谈判力量的。反过来，这种经济的重建过程以及劳工力量的弱化过程，又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给劳工尤其是宗主国国家的劳工运动所带来的极其不利的结果做好了准备。

改革

战后时期持续不断的全球性革命挑战，加之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经历，使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确信，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一场认真的改革必须成为战后重建战略中的一个主导因素。按照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hurman, 1974: 4-5）的理解，就是：

资本主义的瓦解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让人们确信，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发展的和平与进步的体制最终陷入了绝境。即使是站在统治阶级最高利益的角度，也亟须进行能够带来新的社会和世界秩序的实验，尽管底层人民的悲观情绪更为严重。

当时的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和自由放任的政治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两次大战期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这一共识又反过来促进了指导国际体系建设的理念的转变。因此，伊尼斯·克洛德（Inis Claude）认为，激励着国际联盟建立者的形象是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而对联合国而言其所支持的形象，则是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为了完成维护和平的任务，不得不授权各国际组织来处理“有关战争的普遍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结构上的问题”（Claude, 1956: 87-89）。

同样，国际货币和贸易制度也按照这一方向进行改革，这一

导向就是要认识到各民族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以便保护其工人、商业和货币免遭不受管制的世界市场力量的毁灭。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没有哪个国家试图回到 19 世纪式的自由贸易上去。相反地，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的多轮谈判，建立了一套多边协商体制，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促成一种可控的贸易自由化进程（Ruggie, 1982; Maier, 1987: 121 - 152; Ikenberry, 1989; Møjset, 1990; Burley, 1993; Kronin, 1996）。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意这样的做法，即政府能够使用货币政策作为减少失业和减轻通货紧缩压力的一种手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对巨额融资的管理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Ingham, 1994: 40）。正如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自己后来吹嘘的那样，他和罗斯福“将货币资本从伦敦和华尔街转移到了华盛顿，（大银行家）为此而憎恨我们”（转引自 Frieden, 1987: 60）。

为了能够与国家层面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追求相匹配，各种全球性经济制度被设计出来。用阿尔伯特·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的经济顾问们热衷于宣传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其布道甚至能达到美国所能控制的全球最偏远的角落——他们的布道，得到了战败国的军事政府以及旨在帮助同盟国的马歇尔计划的支持（1989: 347 - 356；亦可参见 Maier, 1978, 1981）。当时，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在苏联的集中计划模式（该模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20 世纪 40 年代期间被实施并赢得了声望）和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些政策因经济大萧条和大萧条时期相关的社会—政治灾难而信誉扫地）之间，提供了一条极富吸引力的第三条道路。

但是，在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凯恩斯主义所开出的经济药方是不同的。尽管凯恩斯主义是作为针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良方而得到推行的，但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凯恩斯主义意味的新

型发展经济学却在贫穷国家得到了推行。让我们首先来关注针对核心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之后，再来讨论其所开出的经济药方在核心—边缘国家中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广义的凯恩斯主义方案预先假定：劳资冲突的解决建立在政府、工会和工商企业之间三方交换的基础之上。政府和大企业认可工会主义的永远存在，同时工会承认管理层对生产组织进行不断变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权力（这一点我们会在随后的“重建”小标题下加以讨论）。政府承诺利用其所能够利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来促进充分的就业；同时，各企业也会通过不断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的方式，与工人分享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利润，反过来，这又确保不断增加的工业产出能够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为寻求产品调整策略开启了广阔空间。同样的，提高实际工资有助于消除劳资冲突的政治化色彩，并通过对“高水平的大众消费”的许诺——换言之，通过许诺人人都能实现“美国梦”——来遮掩劳资冲突（Aglietta, 1979; Gordon 等, 1982; Arrighi 和 Silver, 1984; Harvey, 1989）。

这些权衡让步的目的是试图在改革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调节劳工力量并平息劳工的激进抗争。但是，完全就业政策和对工会的强制性认可，不仅削弱了劳动力后备军对被雇佣者的影响，也削弱了管理方在工作场所中的专制力量，有效地增强了更深层次的劳工谈判力量。因此，为了让这些协议与资本的积累过程保持协调一致（例如，使企业生产的产品有利可图并避免极度的通货膨胀），必须在国家层面和公司层面上创建新的制度结构。

在国家层面上，里欧·帕尼特（Leo Panitch, 1980: 174）强调“自由法团主义”架构的重要性，这种架构给工会在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席之地，作为交换条件，工会领导人同意保持增加工资的要求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一

致。工会领导者们（通常是社会民主党派的合作者）被期待有责任向其成员施加工资方面的限制，主动控制普通工人的激进行动，以换取他们在政策制定圆桌上的一席之地（亦可参见 Panitch, 1981）。在基层车间层面，迈克尔·布洛维（Burawoy, 1983: 589）强调了一种相关的转变，即从“专制型”工厂政体到“霸权型”工厂政体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工人的生产率越来越依赖于对工人的积极共识的动员，而非对工人高压强制。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晋升阶梯为工人的合作与忠诚提供了一种激励，而详细的工作规定和抱怨申诉程序，则在公司层面创建了一种解决冲突的法律框架。

但是，布洛维和帕尼特都强调了这些制度性解决方案所具有的各种局限性。对布洛维而言（Burawoy, 1983: 602），霸权型的工厂政体施加给“资本积累过程这样的各种限制”，即来自具有更大车间灵活性的企业和（或）国家层面的竞争，会威胁到霸权型工厂政体的存在（利润率）。相反，帕尼特强调了劳工运动内部所产生的内在压力，其原因在于劳工运动参与到法团主义架构之中去了，被赋予给工会领导者的规训普通工人的角色，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危险，即在工会领导者和其成员之间制造了一种裂隙。当这一裂隙被扩大到一定程度，工会领导就无法再有效地控制普通工人的激进武装运动了。而当工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自基层不断提出的申诉作出回应，他们就不得不从法团主义的架构中撤出。因此，这两种途径都导致了相同的结果，即没有能力去控制普通工人的激进抗争（Panitch, 1981: 35 - 36）。考虑到这些矛盾，布洛维和帕尼特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些基于共识的架构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发展趋势，它们要么趋于瓦解，要么越来越表现出独裁主义的色彩（更少的共识），由此而导致其合法性功能的弱化甚至是瓦解（Panitch, 1977: 87；

Burawoy, 1983: 590; 亦可参见 Apple, 1980; Burawoy, 1985)。

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这种利润率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随时间而发展的方式，是与空间上的差异化战略以及边界划分的策略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受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那些工人处于保护墙之内而免受商品化的全部影响时，大多数拥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公司，都保留了一部分处于保护墙之外的外围工人，用他们作为权利和福利要少很多的兼职工或临时工。对于这一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方来说，很关键的一点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心国家的已婚妇女大量进入雇佣劳动力市场。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意识形态观点认为妇女是次要的和（或）临时的养家糊口者，这种观点使女性更容易被吸纳进那些所谓的更具“灵活性”的工作岗位中去。但是，随着她们所从事的“临时性”雇佣劳动岗位明显地变成了永久性岗位，这种观点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Arrighi 和 Silver, 1984: 203 - 204）。

另外一个旨在减少处于“保护墙”中工人比例的同样重要的企业战略，是资本向更低工资地区进行跨国扩张，而这一战略凭借的基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南北国家之间在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在现实中的继续发展。这种资本的跨国扩张发生在针对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世界范围的一系列改革的背景之下。应当指出的是，上文所讨论的凯恩斯主义方案所开出的药方，只是对“发达”国家才有意义。高水平的大众消费和完全就业这些福利国家的检验标准，被认为是超过了“不发达”经济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同样，国家层面或车间层面的共识政治，都被看做奢侈品，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些东西常常不得不被牺牲掉（Huntington, 1968; 但亦可参见 Rostow, 1960）。然而，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战后全球改革的努力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宗主国国家。劳工运动已经证明，它们本身就

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能够为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革命提供群众力量（参见本章第四节）。此外，冷战的竞争越来越在第三世界展开。用阿图克鲁·伊斯克巴的话来说，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真正斗争，已经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能把贫穷国家从贫困中解脱出来，那么，它们将屈从于共产主义”（Arturo Escobar, 1995: 33-34）。^①

但是，很快摆脱贫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霸权下建立起来的、被改革的国际体制，是建立在美国所宣扬的大众消费（美国梦）普及化的基础之上。然而，当第一世界国家中的工人被承诺他们将立即分享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时候，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人却被告知，这里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发展”而努力奋斗。这一具有霸权色彩的承诺——在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 1960）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得到了清楚的阐述^②——就是全世界人民都能实现美国梦。在通往相同的（值得向往的）最终目的地——“高水平的大众消费时代”——的道路上，每个国家都将经历一系列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这种关于发展的话语^③，是通过拖延

① 冷战的各​​种影响迫使美国政策一度迈向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方面，与苏联、中国的竞争，鼓励美国支持社会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努力去证明，资本主义在创造社会福利方面具有比共产主义更高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在第三世界实行民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以及它对第三世界独裁政权的广泛支持，都深受所谓的冷战竞争的紧急需要的影响，尤其是当美国在那些国家争夺“人心向背”的斗争失败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关于“镇压”的段落中加以讨论。

② 冷战竞争对美国官方和半官方关于第三世界的思想和政策所产生的压力，在罗斯托著作的副标题中（“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宣言”）体现得非常清楚。

③ 关于战后发展的讨论，参见艾斯克巴（Escobar, 1995），伊斯地瓦（Esteva, 1992）和麦克迈克尔（McMichael, 1996）。

问题来含蓄地应对大众消费普遍化所带来的系统层面的问题。换言之，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提高第三世界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作场所的权利推迟到将来，就能够从时间上延迟利润率危机，并且，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人相信对未来的承诺是能够实现的，合法性危机就同样有可能被延迟。

无论如何，这样的承诺是不足以控制劳工的激进抗争的，尤其是一旦牺牲的冲动被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浪潮所稀释的时候。正如在核心国家，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呼吁工人作出牺牲，并不足以以为自由法团主义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一样，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发展的名义呼吁实现跨阶级的合作，其影响本身就是微弱的。但是，同核心国家一样，第三世界国家所实行的国家和公司层面的各种改革，至少保护某些工人阶级的成员免受商品化的完全冲击。这些改革为工人的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它们虽然形式各异，却存在着某些盛行的共同趋势。

因此，尽管没有针对第三世界的马歇尔计划，但是在那些和美国结盟的国家中，进口替代工业化得到了允许甚至是鼓励，只要那些国家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敞开大门。同样的，在那些要么与美国结盟要么与苏联结盟的地区，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增长和就业方面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Hirschman, 1979: 1 - 24）。最终，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也复制了某些在核心国家中由内部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保护（Stark, 1986; Walder, 1986; Cooper, 1996; Solinger, 1999）。

与核心国家一样，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成本控制也是通过边界划分的方法来实现的，这种边界划分把劳动力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处于保护墙之内，而另一部人则处于保护墙之外。但是，与核心国家相反，由于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相对贫穷，其处于保护墙之外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因此，举例来说，正如我

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在殖民统治晚期和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的非洲，统治阶级作出各种努力去界定一小部分具有稳定社会契约的工人阶级，并将其与乡村大众、城市底层阶级区分开来（Cooper, 1996; Mamdani, 1996）。同样，正如布莱恩·罗伯斯特（Bryan Roberts, 1995: 4）所指出的，在拉丁美洲那些“农民城”中，只有极少数城市平民能够在正式的企业部门（其产生有赖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促进）中工作，或者是受益于国家赞助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同样主题的一种不同表现形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那里，户籍登记制度（户口）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地区，从而保护了一小部分城市工人阶级，避免和被束缚于乡村地区的汪洋大海般的农民在工作和住房等方面展开竞争（Solinger, 1999）。^①

镇压

考虑到提供给第三世界工人一揽子改革方案要比提供给第一世界工人的方案空洞得多，因此，我们应该并不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与第一世界相比，在第三世界对劳工实施镇压是一项重要得多的控制机制。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宗主国国家中，政府在与劳工运动的“负责任”的一部分人进行合作的同时，还辅之以对“不负责任”那部分人的残酷镇压。在美国，激进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被从有组织的劳工力量中清除出去，这种清除始于1947年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规定

^① 放松对城市—农村之间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是后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改革之一，这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灵活性”。这一改革，相继伴随着国有企业工人大规模下岗，以及长期存在的既有的城市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的瓦解。这种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反过来引发了国有企业工人的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Eckholm, 2001; Pan, 2002; Solinger, 2001）。我们将在本章第六节再次关注这个问题。

的忠诚誓言，到麦卡锡主义达到高潮。在西欧，改革和镇压也是交替使用的，富有责任感的美美国劳工领袖被邀请去帮助美国政府在欧洲进行战后重建，他们通过建立各种非共产主义的工会，来与既存的工会运动展开竞争（McCormick, 1989: 82 - 84; Radosh, 1969; Rupert, 1995）。

然而，在改革和镇压的权衡中，镇压的手段在第三世界中占据着重要得多的地位。去殖民化的过程——使所有国家享有国家主权——即直接的全球性改革，是殖民地国家从战争和革命时代中所取得的胜利。对那些从未拥护过社会革命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或对那些仅仅将联盟看做一种权宜之计的派别来说），他们的核心目标即政治独立和主权独立已经得到了实现。即使是那些认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被分开的民族主义精英们，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要满足人民需要，发展（真正的工业化）是一个前提。由于缺乏针对第三世界这一整体的马歇尔计划^①，贫穷国家被“教导要去寻找私有资本，无论是国外的私有资本还是国内的私有资本”。但是，为了吸引私有资本，国家就有必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确保有一批经过规训且勤奋工作的劳动力（Walton, 1984; 亦可参见 Escobar, 1995: 33; Bataille, 1988）。^②

① 除却少数几个国家，它们作为展示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样板国家而得到建设外（Arrighi, 1990b; Grosfoguel, 1996），美国很少拨出公共资金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这与重建欧洲中美国资金所发挥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奇怪的是，美国为了其在亚洲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在亚洲购买军需用品，这种购买对于促进该地区从属盟国的经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② 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挑战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挑战性。苏联的“发展”模式也优先发展工业化，并以此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提；因此，苏联模式同样强调经过规训且工作努力的劳动力的重要性。随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种对工人的规训和努力的工作将得到收获。

因此，去殖民化过程瓦解了殖民地世界中劳工运动力量的重要基础。随着每一个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民族主义运动中各阶级之间的联盟也趋向瓦解。一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控制了国家政权，工人和农民的斗争难免会失去其先前的、来自社会其他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例如，关于肯尼亚的论述，参见 Walton, 1984；关于越南的论述，参见 Post, 1998；关于埃及以及更普遍的国家的论述，参见 Beinin 和 Lockman, 1987: 14 - 18）。此外，作为全球反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美国的政策通过积极支持独裁政权——从巴西的军事政府到伊朗的君主政府以及越南南部的傀儡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反劳工的镇压趋势。

但是，单靠镇压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统治形式，并且考虑到各种改革的代价甚高，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应对劳工抗争的解决方案带有引发危机的倾向。一旦我们考虑到在第三（或第二）世界的迅速工业化地区资本积累过程在世界范围的重建所带来的影响时，这种倾向就变得尤为突出了。

重建

战后应对强大劳工运动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过程的大规模重建。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些重建过程在速度和规模上都增长迅猛，这后来也被视作 70 年代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实，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这些重建过程——除了金融调整策略外——就已经发生，并对劳工的谈判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将货币政策的控制从私人掌控转为公共掌控的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极大地减少了追求利润的金融调整策略的范围，迫使资本重新回到贸易和生产投资之上并远离投机。不过，与此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便能极大地扩展追求赢利的空间、

技术/组织及产品调整策略的范围。我们已经提到，战后核心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之上的，即工会支持引进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并且，我们还提到，大众消费为实施有利可图的产品调整策略开启了灿烂前景。同样的，我们已经提到，美国对第三世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该条件同时也为资本实施空间调整（针对核心国家的工人）和技术/组织调整策略（针对那些位于跨国企业资本流入地区的工人）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在西欧，美国政府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形成，这一足够大的市场能够使得美国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并能够支持作为福特式大众生产特点的各种形式的技术/组织变革。此外，美国政府创造出各种财政和其他形式的刺激手段，来促进美国资本流向西欧（以及更广泛的其他国家）。然而，由于流动性短缺以及政治的不稳定，私有资本对各种刺激措施反应迟缓。只是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美国资本进入西欧的跨国扩展才开始加快。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其后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国会不得不改变以前不情愿的态度，拨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来支持建设一个美国的全球军事计划，由此克服了曾经困扰欧洲的资本流动性短缺问题，并帮助创建了有利于私有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环境（Block, 1977: 114; Arrighi 和 Silver, 1999: 87; Borden, 1984: 23; McCormick, 1989: 77-78; Maier, 1978, 198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在西欧进行的企业投资浪潮，加之欧洲对“美国挑战”的回应，共同促进了福特式大生产技术在西欧的迅速推广。正如本书第二章中特别针对汽车工业所论证的那样，这种生产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无论是在西欧还是美国，劳工运动中最强大的部分被不断削弱了。随着机器大生产技术在西欧的广泛传播，技术工人——他们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激进劳工运

动的中坚力量——在生产中被不断地边缘化，他们的谈判力量被削弱了。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企业资本地理转移的推进，从事机器大生产的半熟练工人——他们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也被削弱了（亦可参见 Arrighi 和 Silver, 1984; Edwards, 1979; Goldfield, 1987; Moody, 1988）。

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社会学的文献开始论及“罢工的衰退”，这被看做“现代化”不可避免却有益的结果（Ross 和 Hartman, 1960）。我们在这一节的分析表明，这种衰退是改革、镇压和重建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就在这种“衰退”主题在工业社会学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论调的时候，一波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席卷了西欧的机器大生产行业。这种重建过程的一个方面，是导致了欧洲技术工人的削弱；但其另一方面，则是产生了一个由半熟练工厂工人组成的阶级及其力量的壮大，他们成为这一波劳工抗争浪潮中的骨干力量（参见本书第二章）。^① 反

^① 在图4-2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劳工抗争数量是明显下降的，尽管其下降的幅度不如“衰退”论题所期望的那样剧烈；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劳工抗争的高涨，其上升程度也没有关于西欧“阶级冲突复兴”的文献所预期的那样显著。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国家拆分这些数据，那么，在我们预期的时间和地点，确实出现了劳工抗争的浪潮（例如，1968年的法国，1969~1970年间的意大利）。对宗主国国家而言，其整个时间序列中没有显现出这种预期的趋势，这一事实可能要归因于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劳工抗争的爆发，并非同时在所有欧洲国家同步进行的；因此，在整体的时间序列中，各国的数据倾向于彼此的平均。第二，这种劳工抗争浪潮，尽管程度激烈，但持续时间却相对短暂。第三，这一时期的很多社会抗争，都和学生抗议、女权运动以及越南反战抗议联系在一起。这些其他的运动，有时是由劳工抗争的某个因素而引发的。尤其是，在战后几十年中，随着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大规模进入雇佣劳动力的队伍，女权运动的某些刺激因素来自诸如“同工同酬”这样的要求。同样的，美国的一些黑人人权运动中，存在着重要的劳工抗争内容（Arrighi 和 Silver, 1984: 204; Piore, 1979: 160~161）。然而，这种抗议活动的绝大多数并不能划为劳工抗争，即便它们是劳工抗争，报纸也不会将其当做劳工抗争予以报道，因此，它们就没有被纳入世界劳工小组数据中。

过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这一波劳工抗争浪潮，又成为促使西欧企业资本开始跨国扩张，将生产转移到较低工资地区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同时，也是促进美国海外直接投资范围不断集中和扩大的重要刺激因素。

总之，本节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在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各种调节和控制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努力，都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和矛盾。各种改革措施——假定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完全实现，并且不仅仅是将世界劳动力中的极少数人包含进去——的代价是高昂的。而且，通过保护工人免受各种市场力量的完全冲击，各项改革会增强工人的谈判力量，并制造出各种张力，而这些张力本来是法团主义架构被设计出来所要解决的张力。镇压——依然是劳工控制诸多手段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样是一种不稳定的解决之道。最后，在战后十几年时间中所发生的全球资本积累过程的世界范围的重建，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的效应。空间调整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劳工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和战斗性，从一个地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点；而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和产品调整策略并不能明显削弱劳工的谈判力量（在一些情况下反而是加强了劳工的力量）。同样，我们还指出，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中，明显存在着各种相同的矛盾——尽管这些矛盾在基本问题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也就是说，这些矛盾不会在某个孤立的国家中展现出来，却毋宁是作为这些国家之间动态互动的结果而展现出来。通过贸易和投资而形成的经济联系固然重要，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也推动了劳工调节和劳工冲突的进程。

因此，在一个经历过改革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尽管劳工运动的力量得到调节，但这一调节的方式中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僵局。这一僵局注定会导致另一场世界范围的危机。这场危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爆发了。起初，这场危机的表现形式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美国的世界霸权的危机，但是，到了 80 年代末，危机已经转变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的危机。

第六节 从美国的霸权危机到 世界劳工的危机

美国支持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建，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 20 年的持续而赢利的增长提供了基础。这种史无前例的增长和收益，反过来又为战后几十年间社会契约的资金提供了物质来源。但是，和 19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一样（参见本章第二节），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贸易和生产的快速增长，最终激起了一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其特征是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利润率的普遍下降。正是在这一危机的背景下，战后各种调节劳工的社会契约迅猛增长。

最初，企业资本试图通过增加工人的工作强度来解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利润率危机，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些生产提速措施激起了工人的公开反抗和不合作。“洛兹敦蓝调”（Lordstown Blues）（继位于俄亥俄州的洛兹敦市通用汽车工厂劳工抗争之后而得名）这一短语被用来象征这种不合作的策略。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席卷西欧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和劳工激进主义抗争（上文已经提及）主要集中在福特式的大生产行业，同样的，这种罢工和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工厂生产提速（以适应资本家之间激烈竞争的要求）的刺激所致。这一劳工抗争浪潮导致了工人工资的空前增加，也使人们普遍感到，资本家、国家和工会已经失去了对工人和工作场所的控制（Crouch 和

Pizzorno, 1978; 亦可参见该卷的第二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资本和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反击采取的是间接的方式, 这表明劳工运动太强大了 (或者至少被认为是过于强大), 以至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攻击。在西欧, 普通工人的激进抗争浪潮首先导致了自由法团主义架构的危机, 因为工会领导人“追随其成员, 他们不仅仅是通过一种愤世嫉俗的方式来保持其对组织的控制, 还常常对来自基层的要求作出真正的反应” (Panitch, 1981: 35)。当各种强制性措施 (例如, 宣布罢工为非法) 无法控制劳工激进抗争的时候, 各种新的法团主义协议达成了, 它们所折射的是劳工所具有的更为强大的谈判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工会要求的回应, 这种新的法团主义架构将工会整合到基层车间层次的决策过程之中, 产生或强化了布洛维所说的“霸权型工厂政体”。^① 作为参与车间决策过程的一种交换条件, 工会领导被要求对普通工人进行规训。然而, 由于这些“霸权型工厂政体”构成了对资本灵活性的真正的限制, 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仍然是这些工厂政体的主要特征。因此, 作为解决危机的一种方法, 它们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是暂时性的 (Dubois, 1978: 30; Panitch, 1981: 35 - 38)。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 大公司和 (或) 政府要想公开否定关于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在私有部门, 各种集体谈判机制被保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各种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一些公司层面的策略, 尽管被业务转包而削弱了, 但并未受到直接的打击。最后,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要想直接打压工人的实际工资仍然是不可能的。相反, 名义工资

^① 尽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西欧, 参与到法团主义架构中的工会就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意见是很普遍的, 但工会参与基层车间的决策过程, 则在很大程度上是 60 年代末劳工抗争浪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水平继续快速增加，虽然通货膨胀抵消了实际工资的购买力（Goldfield, 1987; Moody, 1988）。

这种关于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其前提条件不仅是实际工资会稳定增加，而且还要求将失业人数控制在一定水平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政府扩大雇佣来确保这一点。但是，要实现这些带有霸权色彩的承诺，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面临着深度的财政危机，导致税收水平的不断攀升，从而进一步地降低了资本的利润空间。在美国，上述困难由于越南战争不断攀升的（财力和人力方面的）开支而进一步恶化。随着反战情绪的增加，以及动员起来的公民权利运动将注意力转向贫困和失业问题，美国政府又朝着“国家社会化”迈出了一大步，以此来作出响应。“向贫困开战”（各种社会福利项目的重大拓展）和越南战争一起，加速了美国政府的深层次的财政危机。它们也帮助创造了全球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从而增强了世界许多地区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宗主国国家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满足来自下层人民的需求，去实现带有霸权色彩的承诺；要么满足来自资本家的需求，恢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环境。面对这一选择，宗主国国家试图不作任何选择。作为回应，资本开始“罢工”。不断增加的流动资本“用脚投票”，其方式不仅是不断加剧和深化生产性资本的空间转移（转向工资较低的地区），还包括以流动的形式在不断增长的境外避税港中积累资本。并且，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工业生产仍然保留在核心国家进行，但技术调整和不断增加的对移民劳动力的依赖，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战略。

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调整、技术/组织调整和金融调整结合在一起，严重削弱了工人“背后的支持力量”，从而为80年

代国家和资本对核心劳工运动的公开攻击创造了条件。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在基层车间中所取得的种种胜利，已经被极大地推翻了。自由法团主义的架构，要么由于无法履行给工人承诺的各种好处而极大地丧失了工人的信任（例如，整个西欧失业人数激增），要么随着政府战略转变为对工人的完全镇压（例如，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当选）而彻底坍塌。为了保护已经建立的社会契约，工人们奋起战斗——在 80 年代初，这种战斗在整个宗主国国家的劳工抗争高潮中表现得很明显（参见图 4-2）。英国矿工罢工、美国空中交通指挥人员的罢工以及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工人的最后摊牌，都是 80 年代早期被报道的劳工抗争高潮中的重大事件。这些罢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斗争（例如，抵制对已经确立的生活方式和既有社会契约的破坏），或者，我们可将其称为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这些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陷入深度危机之中，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立刻在其他地方重现。相反，在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劳工激进抗争的重大浪潮“重创”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中那些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样板国家。这些劳工抗争浪潮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而不是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跨国企业资本追求空间调整的策略，加之现代化国家努力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进程，其综合的结果是产生了强大的新工人阶级运动。在一些个案中，比如巴西汽车工人，其劳工激进抗争的根源是新近的耐用消费品大生产行业的不断扩张（参加本书第二章）。在另一些个例中，像波兰造船厂团结工会的兴起，其激进抗争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本商品的巨型企业中（Silver, 1992: 第二章；Singer, 1982）。在另外一些个例中，像伊朗的石油工人，劳工的激进抗争则集中在关键的自然资源的出口企业中

(Abrahamian, 1982)。

最初，金融调整进一步增强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谈判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与在80年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借贷资本能够自由流入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随着第一世界资本“罢工”的进行，以及用于再流通的石油美元的过度积累，第一世界的银行家们急于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譬如，在1981年（债务危机的前夕），第一世界的银行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贷出了将近400亿美元（净值）（UNDP, 1992）。因此，借贷变成了一项重要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战后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各种矛盾得以在短期内得到控制。例如在波兰，大量的海外借款使得波兰政府能够促进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波兰政府还利用借款来化解20世纪70年代劳工激进抗争的周期性高潮，使政府能够同时增加工资和食物补贴、扩大就业并保持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在70年代，波兰政府希望工业化能够带来出口的高涨，从而使政府不仅能够偿还贷款，还能够增加国家财富，并最终履行向不驯服的工人阶级作出的社会主义承诺（Silver, 1992：第二章；Singer, 1982）。

毫无疑问，通过借款来应对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矛盾，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解决办法。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贷款来促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并（或）扩大国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以及潜在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如果这些国家试图化解这种日益增强的劳工力量，它们就要冒以下的风险：如无法更多获取海外投资，并（或）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因而无法通过出口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而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够化解这种日益增强的劳工力量，它们则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它们无法向民众兑现其

所期待的、由于国家主权独立（或社会革命）以及工业化（现代化）而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社会契约，也面临着与不断困扰着核心国家的社会契约相类似的诸多矛盾。

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要求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这种要求反映出它们对这种依靠债务来解决其社会契约矛盾的脆弱性的清醒认识。此外，在70年代，第三世界呼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似乎很有可能获得成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失败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胜利，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对实力似乎已经较为强大。第三世界中的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战斗精神，反过来重新创造了某些适宜的政治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增强了劳工运动的力量。随着一次重大的国有化浪潮横扫整个第三世界，劳工的激进抗争（尤其是直接抵制外国企业的行动）在70年代再次获得了跨阶级的广泛支持。

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令人印象至深的强大劳工运动，绝大多数在90年代陷入了自身的危机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劳工运动的衰退是资本空间调整的结果。但是，正如本书自始至终所论证的，这些空间调整策略并不能解释劳工运动的普遍衰退，因为尽管劳工运动在资本输出地区会被削弱，但在资本流入地区，新的劳工运动应该会被激发并得到强化。^① 毋宁说，要对劳工运动危机的严重性和普遍性进行解释，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应该是植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调整的极度膨胀及其特征的转变。

^①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种推理方法让我们作出这样的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重大的、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

国际银行的借贷规模急剧扩大，从1980年仅占有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内生产总值的4%，到1991年的达到44%（*The Economist*, 1992）。与此同时，出现了金融资本流动方向的重大逆转，美国开始吸收来自全世界的流动资金。在1981年，资本从北方到南方的净流入数额大概是400亿美元（参见前述），到1988年，则转变为净流出资本将近400亿美元（UNDP, 1992）。借贷资本的突然匮乏，加速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第一轮债务危机。反过来，这一债务危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债务国强制推行“结构调整”的一揽子计划打开了大门，并以此作为重新提供资金支持的条件之一。国家开销的大幅削减意味着大量的裁员、失业人数的激增以及劳工市场谈判力量的削弱。贸易壁垒的消除，则导致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大型国有企业或得到国家补助的企业的倒闭，非正式部门企业的增长，以及劳工的市场和 workplaces 谈判力量的削弱。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扩张特点的转变，与美国政府政策的急剧转变有关系（Arrighi, 1994: 314-324）。在7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试图阻止资本转变成流动资金而外流，尽管这种努力未能奏效；而到了80年代，美国就积极加入到争夺这种流动资金的竞争中，以便同时为其在国内缩减税务和在国外进行新一轮冷战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尽管在与苏联的较量中，美国赢得了冷战的最后胜利（后者在资金和军事基础方面都无法与美国抗争），但美国进入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第二世界）的资金则近乎枯竭。美国政策的转变不仅仅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从本质上讲，它还包括一场“全球的反革命运动”，即战后一段时期对劳工和发展相对友好的国际体系的瓦解，和类似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所谓美好时代的国际体系的再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危机，已经转化成

了一场全球性的劳工运动危机。

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展示的，20世纪末的这种金融调整并非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期，重大的金融调整就已经是其中一个核心内容了。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两次金融扩张开始后，紧随其后的都是劳工运动的危机。尽管劳工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当金融调整开始实施的时候）就遭受了一次挫折，但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劳工抗争就再次兴起，并在20世纪上半叶促进了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力量和战斗性的增强。从2002年的最新观点来看，20世纪末的劳工运动的危机，似乎要比19世纪末所经历的劳工运动危机持续的时间更长，程度也更深。

无论如何，就我们在这里所进行的历史分析而言，我们能否期望当代劳工运动的这种普遍危机也是暂时性的呢？换言之，考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相似性，我们是否有可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前夕，其间劳工的抗争（结合了波兰尼式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浪潮）正在升级——就像20世纪上半叶劳工运动所经历的那样？毕竟，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伴随着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瓦解，因为结构调整的一揽子方案的实施，激起了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动乱”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Walton和Ragin, 1990）。这些劳工抗争的浪潮一直持续到21世纪早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的阿根廷。同样，中国由于打破了工人的“铁饭碗”，也激起了大范围的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浪潮，其发动者是那些既有生活方式和生计被打翻的工人们（Solinger, 1999, 2001; Eckholm, 2001; Pan, 2002）。与此同时，从美国的西雅图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核心国家反全球化抗议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波兰尼式劳工抗争的激发。

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代全球化和劳工抗争的进程不会简单地回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发展道路上去。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随着主导产业的兴起和衰落，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本章则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的世界政治和特定的战争在决定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以及劳工抗争的模式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思考劳工运动的未来的时候，一个关键问题就凸显出来：21 世纪初的战争和世界政治的动态机制，是否与在 20 世纪深刻影响劳工抗争全球模式的动态机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第五章即本书最后一章中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第五章

世界—历史视角下

当代劳工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

我们在这本书开头所提出的预设是：通过将劳工研究置于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中进行重构，我们能够对当代劳工运动的全球性危机得出新的洞见。本书的几个核心章节，试图从连续的视角出发，将各种重复出现的劳工运动的发展动力机制，与全球劳工抗争轨迹中的那些全新的、史无前例的动力机制区分开来。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基于我们对过往的研究，我们来重新审视本书第一章中所强调的关于劳工运动当代危机的成因、深度及其性质的诸多争论。

第一节 一场冲向底线的竞赛？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对全球汽车产业大规模生产的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产品生产的地理转移，并没有导致一场简单的冲向底线的竞赛。相反，我们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生产的空间地理转移倾向于在每一个资本偏

好的新的投资场所创造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并加强了其力量。当跨国资本被廉价而易于控制的劳动力的承诺所吸引时，产业扩张所导致的转型同时也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平衡。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兴起，成功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强化了工人的权利。而且，劳工运动通常在民主运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将社会变革的议程推进到远远超越赞成民主的精英们所预想的程度。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从现有生产地的迁移会倾向于削弱那些地方既有的工人阶级。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人们“在没有国际保护的条件下从事无望的单调工作”（Greider, 1999: 5）的图景，掩盖了资本所面对的随着每一次空间调整而重复出现的种种矛盾。因为随着产业的地理位置的扩散，工人阶级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也随之扩展。从而，在各个新的低工资的投资地的工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能够依赖于他们自身的结构谈判力量。因此，我们对全球汽车工业的描述显示，在假设产业活动的地理迁移是正在进行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再调整的主要推动力的情形下，我们将无法证实普遍性的劳工力量的结构性弱化。更进一步，如果说既往的模式对预测未来有什么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在那些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的地区（就此而言，中国这一个案具有最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将发生各种（马克思式的）产业劳工抗争的浪潮。

另一个替代性解释，则是将劳工危机与生产组织的变革对工人谈判力量所造成的影响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在第二章中对全球汽车产业的分析也表明，这样的技术调整策略并不具有显著弱化工人谈判力量的作用。相反，由于及时生产体系增加了资本对生产流程中断的脆弱性，从而使劳工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得到了提高。

因此，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解释 20 世纪晚期的全球劳工危机和劳工运动危机。在本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中我们将转到产品调整和金融调整的影响上来。

第二节 南北差距的终结？

我们在第二章的分析中显示，既有的大规模生产产业的空间调整，并没有导致直接的冲向底线的竞赛，这或许可以被解读为存在着一种全球劳工工作条件同质化的倾向，从而模糊了南北之间的分隔。因为，我们的叙述强调了汽车产业的大规模生产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创造出各种相似的社会矛盾，包括相似的工人谈判力量的来源以及斗争形式，其结果是，从美国的底特律到意大利的都灵再到韩国蔚山的半个世纪的斗争，都呈现一种惊人的似曾相识之感。

尽管我们在第二章中关于似曾相识的故事的叙述强调了资本转移所具有的同质化影响，我们在第三章中对一种经过了批判性重构的产品周期模型的应用，则强调了各种系统性的反向趋势，在这些趋势的作用下，南北分隔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对于不同地区的劳工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每一种似曾相识的劳工运动模式的再次出现，都是发生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竞争环境之中的。无论是汽车产业还是纺织产业的产品周期，当生产的中心（以及工人的斗争）被转移到工资低较的地区时，资本家将不再能够获取产品周期创新阶段的“垄断性超额利润”，建立各种稳定劳资协议的操作空间从而也缩小了。

更普遍的情况是，各种技术和产品调整策略都具有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倾向，即垄断性超额利润总是周而复始地在创新比较集中的高收入国家产生，而低收入国家则很少能分享到这种超额利

润。而且，在保持和恢复高工资生产区域的全球竞争地位方面，保护主义也扮演着一个显著的角色。换言之，我们发现空间调整倾向于消解南北之间的分隔，而技术调整、产品调整以及保护主义则倾向于不断地重构南北之间的分隔。

从本书第三章所持的视角而言，第三世界工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不是由于缺乏维持劳工标准的国际压力。毋宁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存在着一个不断被复制的南北分隔的系统性过程。空间调整策略转移了大规模生产（包括强大的工人阶级）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但它们并没有实现财富的重新转移，正是凭借这种财富，那些高工资国家才能够在历史上对这些相同的矛盾加以调适。结果是，强烈的不满、怨恨和强大的谈判力量并存，这为大多数后殖民地国家中持久性的社会危机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工人结构性谈判力量的削弱？

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汽车工业——赋予了汽车生产工人强大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其根源在于工人们在一个资本密集和劳动技术分工复杂的生产体系中居于战略性地位，从而能够使生产流程的中断，导致重大的损失（参见本书第二章）。此外，我们认为，与后福特主义相伴随的技术/组织调整策略，并没有弱化汽车产业工人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最后，我们认为（参见本书第三章）汽车产业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要远远强过纺织产业（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工人。总之，20世纪似乎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即劳工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总体上在朝着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

但是，无论是从象征性意义来看还是从实际雇佣人数的增长上而言（在高工资国家情况尤其如此），汽车产业（以及更一般的耐用大众消费品产业）都已不再是 21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这使得一些观察者将劳工运动的危机归咎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消失（参见本书第一章）。我们对全球工人阶级的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关注，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根本不同的结论。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认为劳工抗争的中心，并不只是沿着各产业内部的连续的空间调整路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还沿着产品调整的路线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从纺织产业到汽车产业的转移。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中，纺织产业的劳工抗争先是被边缘化，然后又出现了衰退。但是，与此同时，新的主要工人阶级则在 20 世纪的新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中被打造出来，并且力量得到增强（参见表 3-1）。同样，尽管汽车产业的劳工抗争在 21 世纪也愈加被边缘化（且可能最终被消解），但我们应该期望看到在 21 世纪新的主导产业（一个或多个）中，将会形成新的工人阶级，并浮现出各种劳工运动。换言之，就这里所持的观点而言，劳工运动在 20 世纪晚期所遭遇的危机只是暂时的，并且，随着“正在形成中”的新工人阶级地位的巩固，这种危机将有可能被克服。

但是，新的主导产业（一个或多个）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如何，依然是一个问题。换言之，这一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是否会在 21 世纪持续下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书第三章力图识别出 21 世纪的某些新的主导产业，并将这些产业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与纺织产业和汽车产业中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和程度进行比较。无论是就有可能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的潜在的产业类型而言，抑或是就劳工谈判力量

的意义而言，都出现了一幅高度异质性的图景。我们发现，尽管在一些当代的关键部门（如交通业和通信业）中，工人拥有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与汽车工人曾经拥有的同样强大；但在另一些部门中，工人拥有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则要少得多（如旅馆和餐饮业工人）。另外一些工人，如教师，他们缺乏显著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即他们并不是在一种劳动的复杂技术分工体系中工作），但是，凭借其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处的战略性位置，他们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谈判力量。

总体而言，尽管没有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具有直截了当的负面影响，或许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20世纪这种倾向于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趋势，在21世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逆转了。今天，许多从事生产和个人服务业的低工资工人的谈判力量，更类似于19世纪的纺织工人所具有的谈判力量，而非20世纪的汽车工人。

从这一视角来看，当代劳工激进性的下降，或许可以从劳工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总体弱化的趋势中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对纺织和汽车产业中劳工抗争的历史动力机制的比较表明，在强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和劳工的激进性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关关系。事实上，尽管纺织工人的抗争较少能够成功实现其各种直接诉求，他们却始终比汽车工人更富有激进性。不过，这两个产业中的工人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纺织工人的成功，更多的是依赖其强大的（具有补偿性质的）结社组织谈判力量（工会、政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跨阶级联盟）。有鉴于此，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在劳工运动的总体力量策略中，结社组织力量所占的比重将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最近，快速增长的核心服务业中的某些最成功的工人运动的策略，与19世纪晚期

和 20 世纪早期纺织工人的斗争策略有颇多相似之处。纺织工人 在一个由众多的小企业所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的产业中工作，他们的就业很不稳定，因此他们不得不以广泛的城市性或区域性政治和工会组织为基础，以发展出一种补偿性力量。同样，今天至少在表面上^①实现了垂直一体化的服务业工作的低工资工人，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模式，而不是依赖于工人在生产中的位置性力量而形成的组织模式。美国的“基本工资运动”和“清洁工公正权益运动”都是以社区劳工组织为基础的，从而避免了劳工组织对任何特定的公司或公司群体中的稳定雇佣关系的依赖。因为，正如纺织工人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的，主要依赖工人独立的结构谈判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胜利的取得，要依靠与更广泛社区中的各个群体、阶层形成联盟，以及从这些群体和阶层那里所获得的诸多资源。^②

如果工人结社谈判力量的重要性正在增长的话，那么，劳工运动的未来发展轨迹，将受到其所处的更广泛的政治背景的强烈影响。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对 20 世纪早期纺织工人的讨论，使得我们有必要去强调存在于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而存在于当代工人运动与其他各类运动之间的类似联系，则

① 关键是，这里所发生的并不是对过去的一种简单的回归，因为垂直一体化通常只是一个表面特征。隐藏在众多小企业背后的是诸多大企业、政府以及大学，为了降低成本和规避其责任，它们经常将任务转包出去。

② 这里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在核心国家中，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合法或非法的）移民。这一事实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着可用来建立组织谈判力量的资源的数量和类型。显然，各种法律约束是其中的一个产生消极作用的影响因素。种族共同体的纽带和潜在的获得跨国资源的渠道则构成了其中的积极影响因素。和 20 世纪早期的情况一样，今天在国际范围内流动的工人阶级（就他们事实上能够流动的程度而言），为劳工抗争的国际扩散提供了结构性基础，他们不仅是各种意识形态和斗争形式的传播者，还可以通过结社组织谈判力量的跨国形式的发展（例如跨越边界的团结以及跨国组织），来做到这一点。

需要加以探索。

而且，对工人的谈判力量的当前趋势进行全面评估，要求我们出于另一个理由去强烈关注世界政治背景。到目前为止，本节强调了生产组织中各种变化对工人谈判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正如第四章所强调的，20世纪工人的谈判力量至少是建立在两种同等重要的因素的基础之上：一种因素是工人在国家的全球力量战略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另一个因素是工人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中心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21世纪工人运动的发展轨迹，将继续与（变动着的）战争和世界政治之间的动态机制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第四节 战争与工人权利将何去何从？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证的那样，20世纪的全球劳工抗争深深地陷入到世界政治和战争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中。有几个重要趋势凸显了出来。首先，在19世纪晚期，工人的力量相对于其国家的力量开始急剧增长，因为国家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越来越依赖于被送到前线的工人—公民的自愿甚至是热情，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来支援前线。正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和武装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工人们（尤其是宗主国国家的工人们）成功地推动其国家在工人权利以及更广泛的民主权利方面的迅速扩展。但是，在使工人保持忠诚方面，这种国家的社会化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现代工业化战争所导致的恐惧和混乱，使得这些旨在建立国家层面的社会契约的各种努力愈加不稳定，最终引发了战争、劳工的抗争以及革命危机的恶性循环。20世纪上半叶的这种总体的系统混乱，只是通过二战后在全球层面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才得以解决。

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国际货币和贸易体制的成功建立，这些体制的各种规则都含蓄地承认：劳动力是一种虚拟性商品，需要保护它使其免受不受管制的世界市场的最严酷的裁决。这些全球性的改革措施，为大众消费和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建立开辟了空间（参见本书第四章）。

从这一视角来看，20世纪下半叶劳工抗争的衰退和劳工运动的去激进化过程是一种局面转型的结果，即战争得到了更多的控制且更为有限度，同时，出现了一个对劳工更为友善的国际环境。而且，我们在21世纪是否会回到一个劳工抗争不断升级并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局面，则取决于我们是否会回到与20世纪上半叶相类似的那样一种局面，即国家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以及世界大战。

就这一点而言，越南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越战的经验愈加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成本巨大且不受欢迎的战争具有使劳工运动激进化的效应；它还使得国家倾向于通过将国家进一步社会化来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参见本书第四章）。但越南战争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引发了美国全球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一场重大危机，引发了一系列将美国的全球政策的反革命性推向顶点的一系列反应。这一反革命的核心在于，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和美国的全球社会—经济战略都发生了重大的转移。

军事战略中的反革命在于，美国（及其他宗主国国家）认识到，任何可能危及大量本国工人—公民的战争，将构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对这一事实的认识，首先严重阻碍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行动范围。相反，在80年代，通过从劳动密集型战争向资本密集型战争的急剧转换，这种严重的阻碍得到了克服。对于那些能负担这种高科技战略的国家来说，资本密集型战争的种种优势，首先被英国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

战争中表露无遗。在海湾战争中，这种优势得到了引人注目的证实，并再次在科索沃战争中被不那么引人注目地证实。在第一世界国家中，针对这些战争的内部反对声音一直很低，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得他们自己的工人—公民—战士中受伤害人数降到最低（趋向于零）。此外，研究和发展领域中的大量精力被用于战争的自动化（也就是说，不仅使得第一世界国家的人们完全免于被杀的危险，同时，还使得他们完全避免与大规模杀伤发生直接接触）（Greider, 1998）。

与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导致工人激进化并制造出全球劳工爆发性抗争的战争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是十分不同的。近期的战争使得大多数贫穷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其土地被高科技炸弹炸毁、经济基础设施被摧毁并因此而导致各地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被破坏——但是，这些破坏并没有引起第一世界国家中“社会大众的强烈反响”。因此，如果各战争国家继续将第一世界国家的工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公民）与更为恐怖的当代战争隔离开来，并摧毁其他地区的稳定的工人阶级，那么，就不太可能产生那种标志着20世纪上半期劳工抗争特点的强大而具有爆发性的劳工抗争。^①

与此同时，第一世界国家越是迈向战争的自动化，它们也就越是将自己从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依赖于战争中的工人—公民的局面中解放出来。有鉴于此，隐藏在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扩张背后的一个最强大的过程正在被逆转，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种逆转是否会促使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的重大缩减？事实上，

^① “反恐战争”将如何影响战争与劳工抗争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观察。关于“反恐战争”对美国劳工的影响的一个较早的评估，参见库塔利克（Kutalik, 2002）。

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军事领域中的反革命的另一面，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反革命。对劳工和发展相对友好的国际体制，在80年代被一种对劳工和发展不友好的国际体制所断然取代。在战后的全球新政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大众消费和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被从上层摒弃了。国家层面的各种社会安全网，与国际层面的允许/促进这些社会安全网的各种制度一起，在世界范围内被削减或废除了。因此，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反革命，可以说是引发了使国家去社会化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全球政治军事背景，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导致激进和爆发性的劳工抗争的全球政治军事背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随着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废除，当代的全球社会—经济背景具备了与较早历史时期的全球社会—经济背景的某些相同的重要特征。在这两个时期，人们都信奉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各国一致推行将资本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措施，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全球进程的重组（各种范围广泛的调整策略）加速，这导致了尚未被商品化的和得到社会保护的各种生存资源被破坏。关键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一个投资从贸易和生产领域撤离并转向金融和投机领域的重大转移——我们称之为金融调整策略。^① 在这两个历史时期，这些变化（包括资本的金融化），导

① 金融调整和国际体制中的这种转变构成了关键性的解释因素，因为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化进程，与二战后的30（或40）年的时间区分开来。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述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特征在于，资本通过持续的空间调整、技术调整以及产品调整策略，从而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节点上造成工人运动的弱化，却在总体上产生了一种工人运动力量不断增强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劳工运动的转折点是80年代，在这一阶段同时发生了金融调整的启动以及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解体。

致结构性失业的不断增长、不平等的加剧以及世界范围内工人原有谋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破坏。最后，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金融调整的启动伴随着雇主反劳工的重要攻势的增长和劳工抗争的消退。在19世纪晚期，这种消退是短期的。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增长的不满以及工人结构谈判力量的增强（发生于生产场所和世界政治当中），共同产生了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的强大浪潮（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四章）。反过来，这些劳工抗争的兴起，在迫使世界的精英统治阶级推行全球层次的重大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参见本书第四章）。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后期之间的各种相似之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当代劳工抗争的衰退将是短期的（或至少是暂时性的）。事实上，许多观察者从西雅图以及其后的反全球化示威中，看到了不断上升的强烈反应的迹象。人们对“别无选择”（TINA）的信念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对世界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有利于劳工的变革的各种建议，正在得到强有力的推行。建立一个新的、对劳工友好的国际体制的机会何在？建立一个来源于（并且在本质上反映出）真正的劳工国际主义的国际体制的机会何在？我们将在下文以及本章的结尾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第五节 新劳工国际主义？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进程，不仅伴随着不断增长和具有爆发性的劳工抗争，同时还与第二国际的垮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劳工国际主义的瓦解与帝国主义和国家的社会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些进程将工人生

计安全与其民族国家的力量联结在一起。随着 20 世纪晚期各国开始迈向国家的去社会化进程，各种潜在的条件是否正变得更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的兴起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另外一个类比能够给我们以启发。在这两个时期，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意味的国家保护主义，构成了工人们（以及其他的人）对不受管制的全球劳动力市场所引发的混乱状态予以反应的一个重要部分。^①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指出，没有理由预期，仅仅因为资本发现将所有工人视为可以互换的等价物是有利可图的，工人们自己就会认为这种资本对待他们的方式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并接受它。相反，处于不安全状态中的人们（包括工人）有充分理由去维持各种非阶级界限和边界的显著存在（例如种族、公民权、性别），并以此来作为他们要求特权保护、在大动乱中免受伤害的一种手段。因此，国家的去社会化进程，本身并没有为劳工国际主义提供扎根的肥沃土壤。事实上，人们有理由认为，今天，第一世界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少取决于其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力量，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国家通过实行进口和移民限制来使得其工人免遭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劳工竞争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论述的，20 世纪的世界劳工抗争被嵌入到一种钟摆式的摆动中，钟摆的一侧是利润率的危机，而另一侧则是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以 19 世纪晚期的大萧条为标志的利润率危机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得到了解决，这些调整措施破坏了全世界的既有的生活和谋生方式，其后果是一场深

^① 就这一点而言，美国劳工运动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晚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的种种相似之处十分引人注目（参见 Silver 和 Arrighi 2000；Saxton, 1971；Cockbrun, 2000）。

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以及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革命危机和世界大战的恶性循环。在半个世纪的不断增长的系统性混乱后，战后的社会契约都明确意识到：必须保护工人使他们免受不受管制的全球自由市场力量的伤害。尽管利润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位于工人的生计，但已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除非资本主义能够显示其有能力提供物质和经济安全，否则，它将不能在来自底层的不断增长的革命挑战中幸存下来。工人们不能被当做简单的商品来按照市场力量来决定其使用与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哲学和政策已经被认为是构成了对利润不断增长的束缚，并在80年代被世界的精英们所摒弃。由于20世纪晚期这一钟摆重新摆向不受管制的市场所带来的既有生活和谋生方式被打乱，又一次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深刻的社会合法性危机。这种社会合法性危机对世界精英们来说是否已经（或将是）足够麻烦以至于导致钟摆重新摆向对生计和安全的重视，这一点仍有待观察。

然而，本书所作的分析清楚地指出：战后时代的各种全球社会契约，无论是对劳方还是资方来说都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外，简单地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许诺满足该时期不断升级的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愿望时，美国主导的全球体制回避了几个重要问题。无限制增长这一支撑全球新政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针对大众消费和发展主义的社会契约的资本主义限制和环境限制都是可以忽略的。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和环境危机（以那10年的油价震荡为显著标志）共同揭示出世界霸权所作承诺的种种内在限制。此外，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发展——所谓的第三世界工人进入高度大众消费的前提——仅仅是在美国世纪终结之前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在收入和资源使用/滥用上的不平等。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分化和财

富分化之间的重叠被强化，环境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恶化。因此，21 世纪早期的世界各国工人所面临的终极挑战是进行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工人自身的被剥削和被排斥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使对利润的追求真正服从于对所有民众生计有所保证的新的国际体制而斗争。

附录一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概念化、 测量方法与数据收集程序

世界劳工研究小组（World Labor Research Group）数据库是本书中用来分析劳工抗争世界一历史模式的关键性实证资料之一。该数据库源自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宾汉姆顿大学）的一个由研究生和教职工组成的小组（即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该小组的成果曾由《评论》（*Review*）作为一期专刊发表（下文简称“专刊”，参见Silver, Arrighi 和 Dubofsky, 1997）。其后，本书的作者对产生于项目初始阶段的数据库进行了扩充和更新。

本附录所描述的世界劳工小组数据收集项目的内容，包括概念化、测量以及数据收集程序等相关问题（关于专刊中对这些问题更为深入的探讨，参见Silver, 1995a）。下文的第一部分，将讨论世界劳工小组关于劳工抗争的概念化问题（亦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部分讨论与测量有关的问题，第三部分讨论数据收集的程序，第四部分讨论各种信度研究的结果。最后，附录二中给出了用于建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数据收集指南。

一 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的概念

要想得到一幅劳工抗争的长期和世界范围模式的图景，就要面临概念化和测量等特殊的难题。随着世界经济的空间和时间的推移，工人的抗争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虽然劳工抗争最初凭直觉看上去是很显而易见的，但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劳工抗争概念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测量的问题，则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对这里所采用的关于劳工抗争的广义定义进行了讨论，这种广义的概念化方式取自马克思和波兰尼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虚构的商品”来加以定义的方式。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基于这种关于劳工抗争的概念化方式，来具体澄清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动，看它们是应该被包含进还是排除出劳工抗争事件的数据库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依次关注劳工抗争概念的两个不同的内容——劳工和抗争。

（一）劳工抗争

将劳工抗争与其他社会形式的抗争区别开来的，在于劳工抗争是根植于无产阶级化的状态；换言之，构成劳工抗争的，是人们由于被当成一件商品对待而产生的各种抗争和反应。

围绕劳工抗争而展开的抗争，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 劳动者对自己在生产中被当成商品的斗争（即马克思所关注的对榨取剩余劳动的斗争）；

2. 劳动者对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被当成商品的斗争（即波兰尼所关注的各种斗争，目的是寻求保护使得自己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蹂躏）。

在劳工抗争中，劳动者反抗自己被商品化的抗争类型包括：

1. 已经被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们作出的抗争，并且，他们在斗争时不会有任何摆脱雇佣劳动处境的想法；

2. 只是在最近才被无产阶级化或只是部分地被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们作出的抗争，其斗争带有这样一种目的，即摆脱无产阶级的状况。

总之，在“劳工抗争”的概念中，相关的行动者包括所有那些对其劳动力的商品化所产生的后果作出反抗的人们。

劳动力的商品化引发了广泛领域的斗争：

1. 在生产场所中，工人对延长工作时间、加重劳动强度以及消除其劳动技能的斗争；

2. 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人对低工资或工资减少以及大规模失业的斗争；

3. 对被迫进行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斗争，以及对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的斗争，无论这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是通过使用直接的暴力还是通过对雇佣劳动之外的其他谋生方式的破坏来达到的。

这些针对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抗争行动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

1. **这些抗争行动可以直接针对雇主：**如罢工、怠工或者蓄意破坏，以此来抗议劳动时间的延长、工作强度的加剧和工作的退化；同样，其他类似的行动的目标还包括要求增加工资，或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以保护企业中的工人免受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损毁机器，无地的农业工人占领土地，或者是寻求摆脱无产阶级状况的工人们逃往非雇佣劳动的农业部门。

2. **这些抗争行动可以针对国家：**工人寻求通过促使国家实施代表他们利益的干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或通过阻止国家偏袒资本家的干预）。这些抗争行动包括：示威、大规模罢工以及各种形式的骚动，目的是赢得各种政策，对工作时间的长度加以

限制或对生产中的其他工作条件加以调整。类似的针对国家的抗争行动中还包括旨在促使国家采取举措来减少“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建立法定最低工资，通过政府支出创造就业机会，或实施基本粮食补贴，等等。其他的类似行为还包括：社区造反和反抗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在协助强行制造无产阶级，其方式是通过课税、圈地以及军事行动来蓄意破坏各种既存的（非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

因此，这种无产阶级化的状态引起了广泛的抗争，其根源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所导致的各种负面影响。作为一系列社会行动的集合，这些抗争的形式构成了劳工抗争的范畴。

然而，在历史上，工人们常常被嵌入到种族、宗教、民族和性别的共同体或认同之中，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各种团结常常来自这些共同体。在各种斗争中，他们打出的旗帜，也常常是这些共有的共同体认同而不是专门的工人阶级认同。在一些情况下，阶级与种族、民族或者性别的重叠度非常之高，以至于那些发生在共有旗帜之下的斗争，能够很容易地被确认为劳工抗争（即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各种斗争）。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工人们与其他阶级达成联盟，他们的斗争被融入（有些时候被淹没在）各种跨阶级斗争中去了；这些跨阶级的斗争从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反抗中汲取了部分动力，但是，这也使得我们很难将这些斗争简单地贴上劳工抗争的标签。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个实际的难题，因为：一方面，我们不想忽略这种抗争的无产阶级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把非无产阶级的内容包含进我们的劳工抗争的概念中去。因此，这些运动必须被归到一个独立的中间范畴中去，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将其纳入劳工抗争的研究之中或排除在劳工抗争的研究之外。

（二）劳工抗争

在进行测量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我们概念中的抗争的内容。正如上文讨论的，劳工抗争由人们的这样一些抗争行动构成，即其目的是反抗被变成商品或被当成商品。这些抗争活动中的许多活动能够很容易地被确认为劳工抗争，因为行动者们自己公开宣称其目的在于挑战并（或）抑制剥削。某些类型的公开抗议（如罢工、抗争行动、骚乱、示威）伴随着特定类型的公开要求（如涨工资、减轻工作负荷、要求政府对基本食品和交通进行补贴、实现充分就业），能够很容易地被确认为劳工抗争行动。

然而，还存在关于抗争的隐蔽行动的一整个另类领域（这些抗争鲜为人知，是不被承认的阶级斗争），正是由于其处于人所不知的隐藏状态，这些常常并不容易被确认为劳工抗争行为。这些抗争行为正是被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1985）称为“弱者的武器”或“日常形式的反抗”的那些行为（如行为拖沓、磨洋工、劣质施工、消极怠工、小偷小摸、阳奉阴违、擅离职守、旷工、装傻卖呆、流言诽谤、蓄意破坏、“无事生非”）。根据斯科特（1985：33）的看法：

当然，抗争的日常形式与那些更为戏剧化的公开对抗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想缓和或拒绝任何强势阶层作出的要求，或提出与这些强势阶层所提出的要求相对立的各种要求。……使得日常反抗显著区别于其他形式反抗的地方在于，它暗地里拒斥各种公开的和象征性的目标。如果说，制度化的政治是正式的、公开的，其关注的是系统的、合法的变迁，那么，日常反抗则是非正式的，并且常常是隐蔽的，

其关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直接的、实际的好处。

这种以表面的顺从和一致来对事实上的抵抗加以掩盖的事实，常常使观察者忽视了这些形式的抗争。然而，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这些形式的抗争，比如在凡·安思伦（Van Onselen, 1976）对罗得西亚（Rhodesian）矿井中压制劳工的经济的研究，贝农（Beynon, 1973）对福特流水线的研究以及哈拉茨蒂（Harazti, 1977）对匈牙利机械厂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日常形式的抗争。

基于他自己对非洲劳工研究文献的总结，科恩（Cohen, 1980: 12 - 17）列举出了多种多样的“隐蔽形式的抗争”。其中包括：逃离（到非雇佣劳动部门或在雇佣劳动部门内进行系统的劳工流动）；社区的撤退或反抗以逃离无产阶级化状态；^①就工作任务、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进行谈判（比如，对配额加以限制、磨洋工、欺骗那些设定工作时间和生产节拍的人）；以及蓄意破坏（在被机器控制的工作节奏中给工人们以休息时间，或预先阻止企业引进省工减少工作岗位的新机器）。当这些抗争行为成为分布广泛的集体行为时，我们同样将所有这些形式的抗争纳入到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来。

然而，科恩在其关于工人抗争行动的各种隐蔽形式的概念中，将那些并非有意的抗争行为也纳入进来了。因此，他认为，诸如疾病和意外事故，即便它们并非出于个人意志的行为，但“都确实构成了抗争的各种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对不可接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作出的反应（1980: 18 - 19）。对这一点我们必

① 之所以将这一抗争行为称之为“隐蔽的”，是因为它常常被理解为平和的或者是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的战争，而其中的劳工要素则被忽略了。

须加以区分。在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只包括工人发动的、反抗其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的、有目的（尽管未必是公然）的抗争行为。

最后，科恩还将以下的行为方式纳入其关于反抗的隐蔽形式中来，如：工人们所创造的对抗文化、吸毒，以及对来世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的观点是：“一切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境中，这些行为确实是劳工抗争或反抗的形式，但在某些情境中，它们仅仅是工人对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适应罢了。这取决于这些行为的功能是作为抗争剥削的努力，还是为了淡忘剥削。^① 因此，宗教可以是“人民的鸦片”（比如，工作中的剥削是可以忍受的，因为逆来顺受者将在来世得到回报），也可以为被压迫者提供各种共同体网络以及一种关于正义和斗争的反向意识形态（比如，在波兰和巴西的工人斗争中，教会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同样，酒精和毒品可以是“大众的鸦片”（使得艰苦的劳作和工作中的各种权威关系变得更容易忍受），也可以是某一普遍抗争的一个部分，使得雇主们无法有效使用劳动力商品（因为旷工、劣质施工会给他们造成损失）。同样的区别也适用于工人中的各种对抗文化。

赫斯曼（Hirschman, 1970）关于退出、发声和忠诚的分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本书的劳工抗争概念。赫斯曼（1970：30）将“发声”定义为任何“试图去改变的尝试，而不只是从令人讨厌的状态中逃离出来”。在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包括了所有那些被界定为“发声”的行动。赫斯曼（1970：4-5）认为，“发声”和某些形式的“退出”行为扮演着一种“有恢复力的角色”：它们让资本家明白，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

^① 关于这些行为是否总是构成了抗争，科恩自己的态度也是含糊的。

其经营方式。在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中，包含了所有那些具有恢复性作用或变革作用的抗争形式。除了发声行为之外，其中包括某些类型的退出行为及抗争的日常形式。下文将依次讨论这些行为。

退出行为的类型包括：（1）高调退出，即各种通过集体叛乱或逃离来达到脱离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各种尝试；（2）默然退出，即在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下通过系统性的流动来达到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各种尝试。劳动力短缺时的系统性流动常常被资本家们认为是工人的一种抗争形式，需要予以积极的和变革性的回应。其中的例子甚多，从福特的“5美元一天”计划^①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都是典型的例证。相反，退出（或流出）劳动力过剩的公司或地区的行为，并没有被纳入我们劳工抗争的概念之中。工人的退出并非反抗剥削的一种相关联的体验。这些行为并未对公司和剩余劳动力流出的区域产生明显具有“恢复性”（或变革性）的影响。

上文讨论过的各种反抗的日常形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虚假的忠诚。这些行为包括：对批判性意见的有目的的沉默；对剥削的拐弯抹角的抗争。这种拐弯抹角和对公开抗议的沉默是弱势群体无力感的表现，是强势群体拥有对不服从者进行严厉处罚的能力的结果。根据赫斯曼（1970：96-97）的研究，如果组织通过严厉制裁（比如，丢掉工作甚至生命）的威胁而使得退出和发声（抗议）的代价过高，“这些组织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它们自身的这两种恢复性机制。”换言之，弱者的抗争由于它们都戴着虚假忠诚的面具，并不能够向资本家发出需要变革的信号，

^① 指福特公司从1914年底开始实行的一项福利措施，对公司工人实行5美元一天的最低工资制。详情可参见 <http://www-personal.umd.umich.edu/~ppennock/L-FiveDollarDay.htm> 等。——译注

亦即他们并不寻求以更为公开的反抗形式来影响对社会和经济关系进行重新变革的进程。

当劳工抗争的隐蔽形式是分散的和零星的个体行为时，赫斯曼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然而，当它们达到广泛的和常见的水平时，我们认为，工人们关于需要对社会和经济关系进行重新变革的明确信号实际上就已经被发送给雇主们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广泛的酗酒、旷工和粗制滥造等问题折磨着苏联的企业家们。或许，正是这些隐蔽形式的劳工抗争而不是公开的反抗，对促使苏联最初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当这些抵抗形式成为广泛的集体行为时，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就包含这些“弱者的武器”，但如果这些抗争被确认为孤立的或偶发的个体行为时，我们的劳工抗争概念就将其排除在外。

最后，各种劳工抗争的行为通常是阶级之间（劳工与资本家）的斗争行为（即抗争指向并反对资本家，或针对作为中介者或者资本代理人的国家）。然而，如前所述，工人们常常被嵌入到种族、宗教、民族和性别的共同体或认同感之中。这些认同也许被整合到各种动员口号当中，也许被用来打造各种跨阶级的联盟。但是，它们同样也可以被用来动员某类工人（比如白人、男性）来反对另一类工人（比如黑人、女性）的竞争。在这些情况下，工人们的斗争指向并反对其他的工人（比如白人/男性发动的划分工作界限的罢工来反对雇用黑人/女性）。不过，这些斗争也同样针对资本家。这些斗争试图限制资本家将所有工人作为同一商品的能力。因此，无论这些斗争是多么冷漠无情，我们还是将其视为劳工抗争的一种形式。

那么，该如何看待那些产生了种族主义的跨阶级联盟（比如种族隔离）的各种运动呢？或者，就此而言，该如何看待存

在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各种联盟呢（譬如，存在于美国纺织工人和汽车工人与各自老板之间的联盟，目的是鼓动政府对来自国外产业竞争加以限制）？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跨阶级运动（比如民族解放运动）一样，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运动贴上劳工抗争的标签，但同时，我们又不愿忽略其中所包含的无产阶级状况的内容。因此，它们同样必须被归入多阶级运动这一“中间”范畴中去，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或排除出我们的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旨在测量的劳工抗争概念，包含了所有那些人们对将他们当做商品而作出的（可观测的）抗争行为和反应，这些行为既存在于生产场所，又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之中。该概念包括所有那些有意识的和公开的反抗行为。它还包括各种隐藏形式的反抗，不过只有当其分布广泛且成为集体实践的时候才算劳工抗争。最后，当阶级和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清晰界限的时候，当斗争指向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时候，劳工抗争这一概念中，还包括那些由工人们自己组织的在共同（非劳工）旗帜下的行动。

二 对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的测量

这一部分将首先探讨此前存在的劳工抗争数据来源的局限性，然后再讨论利用报纸作为世界劳工抗争数据来源的各种利弊。

（一）对官方罢工统计数据的利用和滥用

政府收集的罢工统计数据是最为常用的劳工抗争或劳工战斗性的指标。各种罢工统计数据有诸多可取之处，但在研究劳工抗争时如果单单（甚至主要）依靠这些统计数据，也会带来几个主要困难，特别是当我们想将劳工抗争看做长时段的世界一历史

变迁的内在组成部分来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

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罢工的意义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不能够简单地将那些发生在罢工被认为是非法的时间和地点中的罢工，与那些发生在罢工被认为是合法的、常规的甚至程序化的时间和地点中的罢工相提并论。然而，罢工统计必须将这些罢工同等视之。以下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美国罢工运动的历史高峰期，然而，许多研究者将其原因归结于二战后劳资冲突的制度化。正式的罢工成为合同协商中一个正常的谈判工具。因此，大量的罢工未必就是相应的大量劳工抗争的反映。如果将发生于弗朗哥^①时期西班牙的一次罢工，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或就此而言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的一次“规模”大致相同的罢工视为具有同等“数量”意义，是一种靠不住的等同和做法。^②

此外，正如上一部分所讨论的，罢工绝不是劳工抗争的唯一（或者甚至是主要的）的表现形式。劳工抗争也可以主要通过非罢工的形式体现出来，其方式包括从怠工、蓄意破坏到反叛、示威，等等。非罢工形式的斗争的盛行在两种极端情况下也许显得尤其重要，即在那些罢工被视为非法以及不可能进行公开抗争的地方，和在那些罢工已经被常规化并失去其作为一种主要的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斗争形式的意义的地方。因此，人们惯常将罢工视为所有形式的劳工抗争的一个代表性指标的假设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具有相当大的潜在误导性。

最后，罢工统计数据的采集所依照的标准，常常将那些从劳

① 弗朗哥，20世纪40~70年代西班牙领导人。——译注

② 同样，皮文和克劳伍德（Piven和Cloward，1992）就曾批评过这样一种广泛的倾向，即在关于抗争的社会科学文献中，人们倾向于将常规化的罢工与非正规性的集体行为混淆在一起。

工抗争测量的角度来看或许是极其相关的罢工活动排除在外，比如，大多数国家不时将“政治罢工”排除在其对罢工活动的官方统计之外。然而，正如上一部分讨论的，工人们常常通过政治罢工向国家提出各种诉求，作为其反抗无产阶级化状态的努力的一部分。

除了关于“罢工统计是否是测量劳工抗争的好指标”的问题之外，或许在长时段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变迁研究中使用罢工统计，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明显的问题。这一局限性在于，既存的罢工系列数据在时间和地域范围上都存在着不足。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拥有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罢工数据。大多数国家根本就没有关于罢工的统计数据，或只是在二战之后才开始收集。此外，除了英国，所有国家的系列数据都有重大缺失（比如，法西斯时期和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或者在20世纪早期的某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决定不再继续收集罢工数据）。另外，涵盖非罢工形式抗争的数据收集也尤为罕见。^①

一些研究者（或明或暗地）试图作出这样的假定：能够从某些国家的个案（其数据是现成的）来概括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情况；通过这样做，它们回避了由于在罢工统计数据中地域范围上的不足所带来的众多困难。许多研究对这种从所谓发达工业国家进行概括的“明智”做法提出了质疑（如，Korpi 和 Shalev, 1979）。从这些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来推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似乎是一种更不可靠的做法。

^① 关于官方罢工统计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中所包含的各种方法问题的研究，参见爱德华（Edwards, 1981）、海曼（Hyman, 1972）、杰克逊（Jackson, 1987）、诺莱斯（Knowles, 1952）、沙莱夫（Shalev, 1978）以及弗兰佐西（Franzosi, 1995）等的论著。

而且，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在以国家为个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案的演进与其他个案之间都是独立的。假如按照我们的假设，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过程联系着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工人，那么，唯一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就是建立一幅完整的系统机能图景，以便我们理解（或预测）每一个案例的发展轨迹。所以，面对整体的世界情形，我们有必要按照时间顺序建立一幅劳工抗争模式的图景来进行我们的工作。

总之，我们发现，对于我们研究长时段的、世界一历史范畴的社会变迁，没有现成可用的劳工抗争的反映指标能够被接受。

（二）报纸：可靠信息的一个来源

面对这些难题，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的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决定建立一个关于世界劳工抗争的新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汇集整理了《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中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这两份报纸是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界霸权国家中的重要报纸。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采用重要报纸作为建构抗争指标的来源，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流行和成熟的做法。^① 正如伯斯坦

^① 布尔斯坦 (Burstein, 1985)、丹兹格 (Danzger, 1975)、杰金斯和佩罗 (Jenkins 和 Perrow, 1977)、库普曼斯 (Koopmans, 1993)、库兹涅茨 (Korzeniewicz, 1989)、科瓦勒斯基 (Kowalewski, 1993)、麦克亚当 (McAdam, 1982)、佩姬 (Paige, 1975)、斯奈德和凯莉 (Snyder 和 Kelly, 1977)、斯奈德和梯利 (Snyder 和 Tilly, 1972)、杉本 (Sugimoto, 1978a, 1978b)、塔罗 (Tarrow, 1989)、梯利 (Tilly, 1978, 1981) 以及梯利等 (Tilly 等, 1975), 都曾利用报纸来建构关于抗争的各种指标。关于其中的方法论问题, 参见弗朗索西 (Franzosi, 1987, 1990)。

(Burstein, 1985: 202) 所言：“近年来……一部分数量虽少但不断增长的社会科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政治的更为外在的诸多方面的有效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从一个明显的但迄今为止仍未被利用的数据来源获得——即主要的报纸”。通过《纽约时报》，伯斯坦收集到了关于公民权示威和其他反抗行动的数据，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自该报的数据，“形成了一幅关于被分析的事件和时间趋势的总体上比较精确的图景……从该数据得出的该图景，要远胜于其他任何实际的或潜在可用数据所得出的图景”。同样，梯利 (Tilly, 1975: 315) 从他们对法国的集体暴力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他任何可供利用的替代信息来源相比，通过对报纸进行信息搜索，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更为全面和一致的事件的样本。”

上述这些研究，都利用了从全国性报纸搜集到的信息对该国所发生的抗议活动进行测量。世界劳工研究小组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试图通过报纸的报道来建立可靠的世界范围劳工抗争的指标。我们否决了将来自全国性报纸的信息进行加和的操作思路，因为，要想依靠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某一家主要的全国性报纸，来对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劳工抗争的所有报道进行阅读和记录，其工作量之大可谓超出想象。此外，即便是这种数据收集的尝试是可行的，在试图将取自不同国家的信息综合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指标时，数据来源的可比性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以具有世界霸权地位国家的重要报纸作为信息来源。我们的操作缘由如下。

1. 在整个 20 世纪中，《泰晤士报》(伦敦) 和《纽约时报》都具有世界范围的信息搜集能力。因此，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段中，报纸报道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所产生的地理覆盖面上的偏

差，对于我们的研究的影响并不很大，对《泰晤士报》而言尤其如此（参见 Dangler, 1995, 专刊）。

2. 我们之所以选择《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还在于试图尽量减少由于编辑方针（这与上述技术限制形成了对照）而造成的地域偏差的影响。顾名思义，所谓世界霸权国家，指的是那些将整个世界当做其利益范围或影响区域的国家。这两家报纸的报道都是全球性的（参见 Dangler, 1995, 以及专刊中的附录 B）。

3. 尽管两者的报道都是全球性的，它们还是表现出区域上的偏好，它们都明显表现出对某些地区的报道偏爱（即历史上被认为是其势力或利益范围的区域），比如，《泰晤士报》（伦敦）偏爱报道南亚和澳大利亚，而《纽约时报》则偏好报道拉丁美洲（参见专刊中的附录 B）。通过将两种来源的信息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关于世界劳工抗争的指标，我们或许能够将单独使用每一来源的信息而产生的地域偏差抵消掉。^①

总之，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工作的前提在于：通过收集《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的数据，我们能够建构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模式的可靠指标。为了检验这一假定的有效性，本文第四部分将对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的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予以概括。

三 数据收集的程序

研究小组的每个成员都通过阅读《泰晤士报》（伦敦）和

^① 而且，当对劳工抗争浪潮进行报道时，这种地域上的偏差似乎并不显著。两家报纸都倾向于报道劳工抗争浪潮，即使是对那些常规报道的覆盖并不广泛的国家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纽约时报》的索引，来确认关于劳工抗争的各种报道。^① 第一轮数据收集涵盖了从1870年到1990年的《纽约时报》和从1906年到1990年的《泰晤士报》（伦敦）。在项目第二阶段，数据库在同样的方法下被更新到了1996年。另外，在项目的第二阶段，由于《泰晤士报》的官方索引仅仅始于1906年，因此，我们使用帕尔默索引（Palmer' Index）（在线）来作为《泰晤士报》（伦敦）在1870~1905年中关于劳工抗争报道的另外一个信息来源。^②

对于在报纸索引中发现的每一篇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我们使用特别设计的标准化记录表格，把年、月、日，文章的页码、期数，行动发生的地点（国家、城市），行动的类型

① 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尽可能地确保搜集到的来自索引的劳工抗争报道的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主要的难题在于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也许隐藏在整個索引之中（它们在国家、产业或其他主题名称下）。此外，就每一家报纸的信息来源而言，其索引的组织方式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因此，数据收集的第一阶段，包含一系列检验和编码程序的修订。为了使得编码员之间的结果的复现性能够最大化，我们对数据记录指南进行了不断的提炼。同样，编码员可信度也成为编码员培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拥有的资源有限，我们还是决定安排两个独立工作的数据收集员来收集每一年的《纽约时报》的有关信息，以便最彻底地寻找被报道的劳工抗争。当两个编码者都完成指定年度报纸索引的数据搜集工作后，我们会对编码表进行比较合并，以确保任何一个或两个编码员所确认出的数据信息都能被纳入数据库之中。一种类似于伯斯坦（1985：211-12）的“内在信度”测量方法，被用来评估编码员的个人表现以及每一年度数据的信度。在决定分配编码任务时，我们对每个编码员的表现进行了动态评估。换言之，我们尽力确保至少有一名能够“高度信赖”的编码员，被分配到某一年的数据编码工作中去。由于我们的资源有限，这种数据收集的方法并未完全被复制到《泰晤士报》（伦敦）索引的数据收集工作中去。不过，本书作者负责了几乎整个关于伦敦《泰晤士报》的系列工作，因此，这加强了我们对《泰晤士报》数据库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的信心。

② 关于该项目所使用的数据记录说明，参见附录-2。此外，我们还不断完善了预先准备好的系列训练工具，用来训练和评估编码员。

(比如罢工、骚乱), 以及产业或所涉及的产业等信息, 都记录下来。^①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于劳工抗争的报道, 我们都按照这种方法记录下来, 只有一种例外情况: 由于对其国内新闻完全不成比例地报道, 美国和英国所发生的劳工抗争事件的报道, 我们并没有分别直接从《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上进行记录。相反, 我们根据《泰晤士报》(伦敦) 对美国的报道和《纽约时报》对英国的报道, 来获得我们关于美国和英国劳工抗争的数据。

本项目的前两个阶段的最终成果, 是以指数的形式对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报道进行了完整的统计。特别要说明的是, 该数据库收集了《泰晤士报》(伦敦) 和《纽约时报》从 1870 年到 1996 年的信息。^② 具体来说, 我们使用标准化表格, 记录了总共 91947 个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报道”, 记录的信息有年份、行动类型、国家、城市、每一抗争的产业, 以及报道该事件的报

① 被用来记录的单位, 是索引中的关于劳工抗争的“提及”。比如, 同一场罢工因为被多篇文章报道而被报道多次, 因此, 每一次对这一罢工的报道(与不同的文章相对应), 都要被记录和单独统计。同样, 某篇单独的文章, 可能会报道劳工抗争一系列的行动(比如, 不同地区的不同罢工, 同一地区的罢工又引起了骚乱), 因此, 即使是同一篇文章, 其中所报道的每个行动都要被单独记录和统计。另一方面, 如果某一索引在两个不同地方所报道的乃是同样的信息, 那么, 这种重复报道则被从数据库中剔除。隐含在该数据记录程序之下的假设是: 劳工抗争的程度越激烈, 其被报道的频次也会越高。因此, 与仅仅被报道一次的行动相比, 我们的记录程序会给被报道两次以上的劳工抗争行动以更大的权重。将来我们可能将这些被报道的行动按照各个单独的事件进行汇总; 不过, 这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项目。对本书而言, 这些数据仅仅被用来确认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 而不是用来对特定事件的结果进行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 我们并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工作。

② 《纽约时报》的数据, 完全是基于官方的索引, 而《泰晤士报》(伦敦) 的数据, 其基础是对 1870~1905 年的帕尔默索引(Palmer Index)(在线)和 1906~1996 年的官方索引的综合。

纸的文章名、页码、日期、期数，等等。^①

然后，这些信息被输入到两个电脑文件中，其中一个文件针对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资料，另一个针对来自《泰晤士报》（伦敦）的报道资料。每个国家^②都有两个时间序列的资料，每一个序列来自一种报纸。对本书的分析而言，每个国家两个系列的数据被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序列当中——对每一年度而言，劳工抗争被报道的数量是两个系列数据之和。本书的图4-1、4-2、4-3以及表4-1，都是基于1870~1996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结果。

图2-1、3-3、3-4以及表2-1、3-1和3-2，则分别按照国家和（或）产业，对该综合性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区分统计。对于91947个劳工抗争报道中的每一个报道，我们都设置了国家和产业编码，因此可以分别建立分国家、分产业的数据统计。在

① 在项目的这一阶段，我们依靠报纸的索引作为信息来源。我们的假设是：报纸索引能够精确反映报纸的内容，或者，其误差完全是随机的，以至于对我们的整体结果不会造成显著影响。对样本年度（其编码来自报纸索引，报纸微缩胶卷和 Nexis 数据库电子文档）的比较表明：（1）通过报纸索引获得的信息，会导致轻微低估劳工抗争报道的文章数量；（2）这一低估，似乎持续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不会对我们后期基于数据库而建构的各种指标的类型产生显著影响；（3）从报纸索引中确认被报道的劳工抗争信息，要比从报纸或微缩胶卷中确认信息更为节省时间（至少节省了一半的时间）；（4）因此，这里所丢失的信息，并不值得我们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从报纸微缩胶卷上去收集信息。最后，虽然从 Nexis 数据库电子文档和报纸微缩胶卷中能够获得更多信息，但通过报纸索引来搜寻信息，常常会发现一些通过 Nexis 复杂的搜索命令以及其他各种方法所发现不了的重要资料。

② 这些国家的名称、边界都以1990年时的情况为准。对于那些名称和（或）边界在过去某些时间中有变化的地区，我们尽力确认劳工抗争行动发生的确切地点（比如城市、区域），然后，将这些报道与现在是某国一部分的“国家”划为一组。因此，例如，曾经被以“奥匈帝国”为标题报道的劳工抗争，如果发生在布达佩斯，就被划归匈牙利，如果发生在维也纳，就被划归奥地利。同样，尽管最近发生了边界变动的重大浪潮，我们还是将1990年的各国边界延续到1990年后的数据库中。

本书表 2-1、3-1 和 3-2 中，分产业、分国家的劳工抗争统计数据最高点的确定标准，在第二章（第 1 个和第 3 个脚注）和第三章（第 5 个脚注）中有所解释。

四 对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有效性的评估

必须强调的是，本数据收集项目的设计目的，并非去收集到 20 世纪发生的所有或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报纸报道的仅仅是所发生的劳工抗争数量中的一小部分。相反，我们的信息收集程序，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测量方式，以便可靠地显示劳工抗争的变动水平——与其他时间节点或地点相比，劳工抗争时间的发生，何时出现高涨？何时出现衰落？何时出现高潮？何时出现低谷？^① 我们尤为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世界经济的不同时空中确认劳工抗争的各个高潮点的浪潮。

在上文所提到的专刊中，已经发表了对 7 个国家数据有效性的研究。我们根据修特和梯利（Shorter and Tilly, 1974）计算罢工浪潮的方法的修订版，使用两个不同的标准来确认每一国家的劳工抗争的高峰年。^② 某一年份要想被确定为劳工抗争的高峰年，需要：

（1）在该年中，被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必须至少比此前 5

① 在数据库中，被记录的给定年份的劳工抗争事件的数目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绝对的意义。其意义（高/低、升/降）是相对于其他年份被报道的劳工抗争事件的数目来说的。

② 在本书和专刊中，用来确定劳工抗争浪潮峰值（最高点）和汇总两份报纸时间序列数据的程序，有些许的不同（参见 Silver, 1995a）。在划分劳工抗争的峰值（最高点）年份时，本书中采用的程序所得到的结果，并没有产生显著的不同（且还具有额外的优势，避免了烦琐的麻烦）。因此，信度研究的各项结果，对专刊和本书中数据的说明都是适用的。

年数据的均值高出 50%；并且，（2）该年被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必须远远高于该国整个 85 年中被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的均值（在这些研究被实施的时候，数据的序列只收集到 1990 年。）。

基于对关键年份的界定，研究团队的成员们开始了可靠性研究。他们把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得到的 7 个国家（阿根廷、中国、埃及、德国、意大利、南非和美国）的劳工抗争图景，与从其他已有资源（劳工历史文献资料和其他可用的系列统计数据）所得到的劳工抗争图景进行了比较。这些可靠性研究被收录在专刊的第二部分，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可以利用世界霸权国家的报纸来建立可靠的指标，从而反映世界经济随着时空推移而发生的劳工抗争浪潮的实际情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相当一致的能力，能够确认某一国家内部的劳工抗争浪潮——特别是那些代表着劳资关系历史转折点的劳工抗争浪潮。这种可靠地确认劳工抗争浪潮转折点的能力，与利用来自报纸的信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数据来源所具有的独特特征有着密切关系，这种特征就是：报纸拒绝报道常规事件的偏见（比如，制度化了的罢工活动），以及其偏爱报道非常规性劳工抗争的偏见 [之所以称之为非常规性的劳工抗争，在于它们“不仅仅规模巨大，而且还构成了劳资关系的分水岭（参见专刊，Arrighi, 1995）]”。因此，世界劳工小组的指标正确地确认出了几乎所有那些被普遍认为是在劳工抗争浪潮中具有数量或质量转折点意义的年份，这基本上与专刊第二部分所检验过的那些国家的劳工抗争转折点相吻合。

在专刊的第二部分所研究的那些国家中，出现了一个需要注意的系统偏差。对好几个被研究的国家而言，世界劳工小组的指

标低估了这些国家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劳工抗争的严重程度。对中国、埃及和美国而言，二战刚结束后的那几年被确认为劳工抗争高潮的年份，但是，其劳工抗争报道的相对数量，与整个世纪里其他峰年的数值相比较，要比预期的小。同样，对南非而言，世界劳工研究小组并没有将 1946 年确认为峰年，尽管它已经被基于其他资料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是一个劳工抗争的峰年。个中原因很简单：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泰晤士报》（伦敦）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纸张短缺并缩减了版面数量（因此降低了报道的覆盖面）。幸运的是，《纽约时报》并未遭遇类似的限制。

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劳工抗争的所有不同形式。这意味着我们的指标能够正确地确认那些有时被官方罢工统计排除或低估的劳工抗争的峰年。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理由预期（根据直觉以及其他研究者的经验），报纸会存在一种对劳工抗争报道的系统偏差，它们偏好于报道那些更为公开对抗的劳工抗争（相对于隐蔽的劳工抗争而言），那些使用更为激烈的策略的劳工抗争（相对于平和的劳工抗争而言），以及（或者）那些参与者数量更为巨大的劳工抗争（相对于小规模劳工抗争而言）（譬如，参见 Snyder 和 Kelly, 1977）。因此，尽管我们没有依照行动的类型对劳工抗争的分布进行研究，但相对于那些被报道的更为公开的抗争形式而言，我们过在“弱者的武器”和“抗争的日常形式”范畴下所讨论的各种劳工抗争形式，在我们所选择的报纸中被系统性地忽略。正如斯科特（Scott, 1985: 33 - 36）所指出的：

显然，实际的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经常与表面上掩盖这种抗争的象征性遵从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这些行动自身的本质及其对手为保自身利益的沉默，共同产生出一

种共谋的沉默，这种沉默会将这些抗争的日常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

我们的数据库不能被用来对隐蔽形式的抗争进行详尽的研究，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当隐蔽的抗争行动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它们确实也会被报纸报道，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雇主所抱怨的广泛的工人旷工、酗酒上班、损坏设备等行为，确实在我们的两个报纸资源中都有所报道。

综上所述，尽管同所有数据库一样，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也应该被慎重使用，但是，它已经被证明确实是一个可以用来确认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模式的相当可靠的信息来源。它在地域和时间范围方面的独特性，使先前无法进行的将劳工抗争作为世界历史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选择成为可能。

附录二

从报纸索引中记录数据的说明

本附录是给从报纸索引中记录数据的编码者所使用的说明。这里列出的，包括如何将事件进行分类的例子、指导语，以及作为寻找索引指南的索引标题的列表等。后者是一个包含许多页的关于产业、国家和其他主题标题的列表。

一 哪种类型的被报道的行为应该被记录

1. 记录任何具有劳工抗争意义的行动（参见定义）；
2. “劳动力”包括雇佣工人和失业者（其中不包括农民、学生、军人、共产主义者等，但包括农业雇佣劳动者）。对于失业者所发动的行动个案，请在编码表的产业一栏中，填写“失业者”。
3. 任何行动，即使它们仅仅是口头谣传，或是某种威吓，或只是在计划中，或者报道说行动已结束或终结的，都要记录下来。同样，那些已被取消的行动也要记录下来。

4. 无论这些行动是在编辑手记中被提到，还是关于行动的个人评论的报道，或者是对行动影响的一种分析（如，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都要记录下来。

5. 对于反对劳工抗争的国家行动的报道，应该以下列方式进行记录：

(1) 如果在索引条目中仅仅提及某一政府行为，如果它表明是针对劳工抗争的，就将其记录下来（如，禁止罢工的立法、仲裁）；

(2) 如果索引条目不仅提及某一劳工行动，还提及某一政府行动，除非以下两种情况，否则不要记录政府的行为：①政府的行为显示出这样一种状态，如围攻、军事政变，或针对劳工抗争而启用戒严法律（政府运送部队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实施戒严法律；而逮捕就不是）；②在政府行为中包括暴力行为（如，警察与罢工人员发生冲突）。

上述规则的目的在于，只有当政府行动意味着政府与工人的冲突逐步升级时，我们才将政府行为加以单独记录。如果你不能确定如何将一个政府行为编码，为安全起见，将其记录下来并写出索引中所运用的确切文字。

6. 不要记录《纽约时报》对美国发生的行动的报道，或《泰晤士报》（伦敦）对英国发生的行动的报道。

7. 从两份报纸索引中记录所涉及的发生在波多黎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行动。将以上记录与美国和英国的记录各自分开。

二 浏览报纸索引的范畴

需要浏览整个的报纸索引。相关的词条要通篇搜寻一遍。下

面是最有可能找到相关词条的范畴：

1. 劳工；
2. 劳工工会；
3. 罢工；
4. 国家（使用作为咨询指南的附录列表，通读报纸索引）；
5. 产业（使用作为咨询指南的附录列表，通读报纸索引）；
6. 追踪所有遇到的交叉引用。

三 如何运用数据记录表格

1. 一张编码表只能用于一个国家某一年的记录（除非该国在给定年份中有超过 35 件事件发生；如果是这样，你将不得不使用多张编码表）。

2. 在编码表的顶部“编码者”后，写上你名字的首位字母。

3. 编码表的每一行，只能记录一次被提到的劳工抗争行动。因此，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有两件被报道的事件（如罢工和骚乱；在汽车业和煤炭业的罢工），请用编码表中的两行进行记录。

4. 记录每一次关于某一事件的报道，即使在某天内关于这一事件有不止一篇报道文章，或者对相同的事件在多天、多个星期有连续的报道。

5. 索引页码应该被记录在编码表的第一列内；日期、页码及文章的期数，应该被记录在第二列上。行为类型应该被记录在第三列，行动的地点在第四列，产业（如果知道的话）在第五列。

6. 在页面顶部留出的空间中，记录下劳工抗争行动所发生的国家和年份。

四 记录行动类型的指南

1. 总罢工

(1) 当（且仅当）索引使用了“总罢工”这一词语时，记录为总罢工；

(2) 如果该罢工是发生于某一特殊产业中的总罢工，要确保将该产业记录在“产业/职业”门类之下；

(3) 一个例外：如果索引没有使用“总罢工”这一词语，只有在具有某些合理的、有力的证据条件下，你才能够将其推论为总罢工。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可以认为具有合理的、有力的证据：①三明治原则：报道一：总罢工被发动；报道二：工人涌上街头；报道三：总罢工结束。你就能推断，报道二是关于总罢工的报道。

②及时后续报道：报道一：总罢工在巴里（Bari）被发动；报道二：巴里的工人都涌上了街头。

否则的话，就记录为“罢工”，而不是“总罢工”。

2. 多起罢工

如果索引提及“多个罢工”而没有对其类型加以详尽的描述，则记录为多起罢工。如果文章的索引词条明确了不止一种特定类型的罢工（如，“汽车业、纺织业和轨道电车的工人罢工”），则将其分别记录在三行里，每行都记录一次“罢工”，并明确三次罢工所发生的产业（即1 - 汽车；2 - 纺织品；3 - 轨道电车）。

3. 罢工浪潮

如果索引运用了词语“罢工浪潮”或“罢工的浪潮”，则将其记录为“罢工浪潮”。

4. 单一罢工

(1) 那些并不适合纳入到上述范畴中的罢工，应当被记录为“单一罢工”；

(2) 如果某篇单一的文章提及多个产业中的罢工，一定要在编码表上用单独的一行来记录每一项罢工，并明确每一罢工所在的产业类型。

5. 骚乱

(1) 如果索引明确说明其为“骚乱”，则记录为骚乱；

(2) 仅仅记录那些被列在劳工或涉及的相关工人条目下的各种骚乱；

(3) 例外的情形：记录下面包骚乱、食物骚乱、住房骚乱及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骚乱，即使在对骚乱的报道中并未提及工人，但一定要写清“面包骚乱”、“住房骚乱”，等等，不要只写上“骚乱”或缩写为“R”；

(4) 当索引报道一件含有暴力的事件，不要将其编码为“骚乱”，除非报道中使用了“骚乱”这一词语。相反，要使用索引中所使用的确切词语（如，“罢工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罢工现场的暴力行为”）来进行记录。另外，在这样的情形下，要确保对两条单独的词条进行编码，亦即在编码表的一行中记录“罢工”，并在下一行中记录“暴力行为”或“与警察发生冲突”。

6. 失业者的抗议

(1) 在“行动”一列，记录失业者所参与的行动（如，游行示威，骚乱）；

(2) 一定要在“产业”一列写上“失业”字样。

7. 抗议、争议

如果索引运用了“抗议”或“纠纷”等词语，则分别记录

为抗议与争议。

8. 游行示威

如果索引使用“游行示威”的词语，则记录为游行示威；如果索引使用了“集会”一词，则记录为“游行示威”或“集会”都是可以的。

9. 停工

如果索引使用了“停工”一词，则记录为停工。

10. “弱者的武器”

记录下抗争的各种隐藏形式，例如工作中的旷工、敷衍了事、酗酒或怠工，使用缩写“WW”，并在其后写下索引所报道的行动。

11. 其他行动

用索引所使用的词汇，记录下其他任何此处并未列出的相关行动。

12. 行动类型的缩写

(1) 在编码表的末端，列出了关于行动类型的10个标准化的缩写。

(2) 如果某一行动并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缩写，则采用索引中的词语写下该行动。

(3) 你可以创造自己的缩写，但必须在编码表底部的备注空间中注明你所创造的缩写的含义。

五 记录位置的指南

1. 国家

(1) 将行动发生的国家地点信息，记录在记录纸的顶部空白处。

(2) 在索引所提供的地名下进行记录（当索引中存在不同的地名时，比如，遇到 Alsace-Lorraine 或 Silesia 这些截然不同的地名，请用单独的表格进行记录。）。不要尝试去根据你自己的判断和知识而将它们归入不同的国家中去。

2. 国家层次以下的地理区域

在第四列中，记录行动所发生的城市或区域（使用索引中的词语）。

六 记录产业的指南

1. 如果某种行动发生于特定的产业中，且在索引中被注明，则使用索引中的词汇在第六列中记录下来。

2. 如果该行动是由失业者所发动的行动，则在产业栏写下“失业者”。

七 如何推断

在有些情形下，你应该从围绕该行动的索引引文的语境中，推断出该行动的具体类型。例如，找到一个论及某一特定行为（如总罢工）的句子很容易，它后面紧跟着的句子显然还是指同一个总罢工，但它们并不使用“总罢工”这个词。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将其后的句子编码为“总罢工”。以下是一个相关的例子：

这些词条接连几天在报道中出现。词条 1：总罢工被发动；词条 2：政府和工人的谈判失败；词条 3：在市政当局无法结束罢工局面之后进入紧急状态；词条 4：罢工进行到第四天；词条 5：总罢工在继续。

很明显，以上每个词条指的都是同一次总罢工，特别是因为它们连续几天的报纸文章中出现。每个词条都应被记录为“总罢工”。而且，根据上文第一部分第5点中所给出的记录政府行动的规则，词条3应该被记为两行：（1）总罢工（GS）；（2）紧急状态。同样，词条2应该用1行来记录为总罢工（GS）。

附录三

国家的分类

图 4-2 和 4-3 对世界各国进行了一个十分宽泛但并不细致的分类。北美（墨西哥除外）国家，欧洲（东欧和西欧都包括在内）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被归并到宗主国的集合里（图 4-2）。位于亚洲（东部和南部的）、北非、中东、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国家，则被归并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集合里（图 4-3）。

被包括在宗主国集合里的国家有（图 4-2）（1990 年时的国家名；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少于 100 次的国家未被包括在内）：北美（加拿大、美国）；欧洲（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俄罗斯、南斯拉夫）；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被包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集合里的国家有（图 4-3）（1990

年时的国家名；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报道的劳工抗争次数少于100次的国家未被包括在内)：中东和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以色列、黎巴嫩、摩洛哥、苏丹、突尼斯、土耳其)；拉丁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圭亚那、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多黎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非洲(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亚洲(孟加拉国、缅甸、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

被包括在世界集合里的国家：图4-1包括所有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中所提到的、发生过劳工抗争的国家。

参考文献

- AAMA. 1995. *World Motor Vehicle Data, 1996 Edition*. Detroit: Americ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 Abbott, Andrew, and Stanley DeViney. 1992. "The Welfare State as Transnational Event: Evidence from Sequences of Policy Adop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 (2), 245-74.
- Abendroth, Wolfgang. 1972.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bo, Tetsuo, ed. 1994. *Hybrid Factory: The Japanese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brahamian, Ervand. 1982.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dler, Glenn, and Eddie Webster. 2000. *Trade Un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 1985-199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gence France-Presse. 2000. "International Unions at Odds on Need for Stricter Labour Standards," *Agence France-Presse*, April 6.
-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ltshuler, Alan, et al., 1984. *The Future of the Automobile: The Report of MIT's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pple, Nixon. 1980. "The Rise and Fall of Full Employment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4, Autumn, 5-39.
- Arrighi, Giovanni. 1990a. "Marxist-Century, American-Centur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179, Jan-Feb, 29-63.
- 1990b. "The Developmentalist Illusion: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emiperiphery." In William G. Martin, ed., *Semiperipheral States in the World-Economy*, pp. 11-42.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5. "Labor Unrest in Italy, 1880-1990."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8 (1), 51-68.

-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Silver. 1984. "Labor Movements and Capital Migration: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in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 Bergquist ed., *Labor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pp. 183-21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rrighi, Giovanni, Satoshi Ikeda, and Alexander Irwan. 1993. "The Rise of East Asia: One Miracle or Many?" In Ravi A. Palat, ed., *Pacific-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System*, pp. 41-65.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J. Silver with I. Ahmad, K. Barr, S. Hisaeda, P. K. Hui, K. Ray, R. E. Reifer, M. Shih, and E. Slater.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Beverly J. Silver, and Benjamin D. Brewer. 2003.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 (1), 3-31.
- Automotive News. 1996. "Automakers Stampede to Build Plants in Brazil," *Automotive News*, November 25, p. 9.
- Ball, Stephen J. 1993. "Education Markets, Choice and Social Class: The Market as a Class Strategy in the UK and US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4, (1), 3-19.
- Barraclough, Geoffrey. 1967.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arton, Ava. 1989. "Questions of Gender: Deskillling and Demasculinization in France, 1830-1871." *Gender and History*, 1, 178-99.
- Bataille, Georges. 1988.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New York: Zone Books.
- Beinin, Joel, and Zachary Lockman. 1987.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ittel, Mark. 1989. "Labor Unrest in South Afri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UNY, Binghamton, NY.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nería, Lourdes. 1995. "Response: Th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47, Spring, 45-52.
- Berghahn, V. R. 1973.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 Bergquist, Charles. 1986. *Labor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Essays on Chile, Argentina, Venezuela, and Colomb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lanstein, Lenard R. 1993. "Introduction." In Lenard R. Berlanstein, ed., *Rethinking Labor History: Essays on Discourse and Class Analysi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eynon, Huw. 1973. *Working for Ford*.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iernacki, Richard. 1995. *The Fabrication of Labor: Germany and Britain, 164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ashill, J. 1972. "The Proper Role of US Corporations in South Africa," *Fortune*, July.

- Block, Fred L. 1977.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The Vampire State: And Other Myths and Fallacies about the U.S. Econom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Introduction."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second edition), pp. xviii-xxxviii. Boston: Beacon Press.
- Bloomfield, Gerald T. 1991. "The World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ransition." In C. M. Law, ed.,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pp. 19-60. London: Routledge.
- Bluestone, Barry, and Bennett Harrison. 1982.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 Bonacich, Edna, and Richard P. Appelbaum. 2000. *Behind the Label: Inequality in the Los Angeles Apparel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rden, William S. 1984.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Boyer, Robert. 1979. "Wage Form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French Experi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 (2), 99-118.
- Bradsher, Keith. 1997. "In South America, Auto Makers See One Big Showroom,"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D1.
- Brecher, Jeremy. 1972. *Strik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1994/95. "Global Unemployment at Seven Hundred Million." In *Global Issues 94/95*, pp. 32-35. Guilford, CT: Dushkin Publishing.
- Brennan, James P. 1994. *Labor Wars in Cordoba, 1955-1976. Ideology, Work and Politics in an Argentine Industrial 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idges, Amy. 1986. "Becoming American: The Working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p. 157-9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ody, David. 1980. *Workers in Industrial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nfenbrenner, Kate. 1996. *The Effects of Plant Closing or Threat of Plant Closing on the Right of Workers to Organize*. 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Labor Secretariat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Labor Cooperation, September 30.
- Bronfenbrenner, Kate, Sheldon Friedman, Richard W. Hurd, Rudolph A. Oswald, and Ronald L. Seeber, eds. 1998. *Organizing to Win: New Research on Union Strateg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rooke, James. 1994. "Inland Region of Brazil Grows Like Few Other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 Brown, Carolyn A. 1988. "The Dialectics of Colonial Labour Control: Class Struggles in the Nigerian Coal Industry, 1914-1949."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3 (1-2), 32-59.

- Burawoy, Michael. 1982. "The Hidden Abode of Underdevelopment: Labor Process and the State in Zambia." *Politics and Society* 11 (4), 123–66.
1983. "Factory Regimes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5), October, 587–605.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Burbach, Roger, and William I. Robinson. 1999. "The Fin de Siècle Debate: Globalization as Global Shift." *Science and Society*, 63 (1), 10–39.
- Burley, Anne-Marie. 1993. "Regulating the Worl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jection of the New Deal Regulatory State." In J. G.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pp. 125–5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rstein, Paul. 1985. *Discrimination, Jobs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muffo, Arnaldo, and Giuseppe Volpato. 1997. "Italy: Changing the Workplace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homas A. Kochan et al., eds., *After Lean Produc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55–76.
- Cargo Info. 1997. "Motor industry turnaround impacts on Durban port," *Cargo Info: Freight and Trading Weekly* (South Africa), January 31 [<http://cargoinfo.co.za/ftw/97/97ja31j.html>].
- Carr, Edward H. 1945. *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vol. 2: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anuel and Yukio Aoyama. 1994. "Paths Toward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G-7 Countries, 1920–1990."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3 (1), 5–33.
- Chalmers, Norma J. 1989.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The Peripheral Workforce*. London: Routledge.
- Chandavarkar, Rajnarayan. 1994.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India: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Bombay, 190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dler, Alfred 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pman, Sidney J. 1904.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A Stud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ase-Dunn, Christopher. 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Chatterjee, Partha.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Press.
- Chesneaux, Jean. 1968.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1998. *Automotive Industry of China*.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Chossudovsky, Michel. 1997. *The Globalisation of Poverty: Impacts of IMF and World Bank Reforms*. Penang: Third World Network.

- Ciccantell, Paul S., and Stephen G. Bunker, eds. 1998. *Space and Transport in the World-Syste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Claude, Jr., Inis. 1956. *Swords into Plowshares: The Problems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ockburn, Alexander. 2000. "Short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Nation*, January 3, p. 9.
- Cockburn, Cynthia. 1983.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Pluto.
- Cohen, Isaac. 1990. *American Management and British Labo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tton Spinning Indust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Cohen, Robin. 1980. "Resistance and Hidden Forms of Consciousness Amongst African Worker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9, September-December, 8-22.
- Cole, Stephen. 1969. *The Unionization of Teachers: A Case Study of the UFT*. New York: Praeger.
- Collier, Ruth Berins.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Ruth Berins and David Collie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Frederick. 1996.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 The Labo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Farewell to the Category-Producing Clas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57, Spring, 60-68.
- Cowie, Jefferson. 1999. *Capital Moves: RCA's Seventy-Year Search for Cheap Labo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ronin, James E. 1983. "Labor Insurgency and Class Form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Crisis of 1917-1920 in Europe." In C. Siriani and J. Cronin, eds., *Work, Community, and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Labor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00-1925*, pp. 20-4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 World the Cold War Made*. New York: Routledge.
- Crouch, Colin,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eds. 1978.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2 volume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Cuban, Larry. 1984. *How Teachers Taught: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American Classrooms, 1890-1990*. New York: Longman.
- Cusumano, Michael A. 1985.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at Nissan and Toyot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angler, Jamie Faricellia. 1995. "The Times (London) and the New York Times as Sources on World Labor Unrest."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8, 1, 35-47.
- Danto, Arthur C. 1965.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nylewycz, Marta, and Alison Prentice. 1988. "Teachers' Work: Changing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Emerging School Systems of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entral Canada." In Jenny Ozga, ed., *Schoolwork:*

- Interpreting the Labour Process of Teaching*, pp. 61–80.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anzger, Herbert M. 1975. "Validating Conflict Da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L (5), 570–84.
- Dassbach, Carl. 1988. *Global Enterpris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d, General Motors and IBM, The Emergence of the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 PhD Dissertation, SUNY-Binghamton.
- Davis, Mike. 1986.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London: Verso.
- Deyo, Frederic C.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6a. "Introduction: Social Re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 Automobile Industry." In F. C. Deyo, ed., *Social Re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 Automobile Industry*, pp. 1–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6b. "Competition, Flexibility and Industrial Ascent: The Thai Auto Industry." In F. C. Deyo, ed. *Social Re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 Automobile Industry*, pp. 136–5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icken, Peter. 1998. *Global Shift: Transformatio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Dickerson, Kitty, G. 1991. *Textiles and Apparel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Macmillan.
- DIEESE. 1995. *Rumos do ABC: A Economia do Grande ABC na Visão dos Metalúrgicos*. Sao Bernardo do Campo: DIEESE (subsection of Sindicato dos Metalúrgicos).
- Drucker, Peter. 1993.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Dubofsky, Melvyn. 1983. "Abortive Reform: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ed Labor". In C. Siriani and J. Cronin, eds., *Work, Community and Power: The Emergence of Labor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00–1925*, pp. 197–22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Dubofsky, Melvyn and W. Van Tine. 1977. *John L. Lewis: A Biography*. Chicago: Quadrangle.
- Dubois, Pierre. 1978. "New Form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1960–1974." In C. Crouch and A.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Vol. 2*, pp. 1–34.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Dugger, Celia W. 1999. "Poor Nations United to Fight Clinton's Labor-Trade Linkag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8, p. 9.
- Eckholm, Erik. 2001. "Chinese Warn of Civil Unrest Across Country: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 Paints Picture of Disconten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3, pp. 1, 4.
- Economist, The. 1992. "World Economic Survey,"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9.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0. *Country Profile: Brazil*, # 1.
- Edwards, P. K. 1981.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97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Elson, Diane, and Ruth Pearson. 1981. "Nimble Fingers Make Cheap Workers: An Analysi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Third World Manufacturing." *Feminist Review*, 7, 87–107.

- Escobar, Arturo.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steva, Gustavo. 1992. "Development." In Wolfgang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pp. 6–25. London: Zed Books.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antasia, Rick. 1988. *Cultures of Solidarity: Consciousness,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rke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ley, Miriam S. 1950. *Aspects of Japan's Labor Problem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 Feldman, Gerald. 1966.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rnandez-Kelly, Maria Patricia. 1983. *For We Are Sold, I and My People: Women and Industry in Mexico's Frontier*. Albany, NY: SUNY Press.
- Filkins, Dexter. 2000. "Punching in the Future: Technology Puts India to Work from Afa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8–9, pp. 1, 8.
- Fischer, F. 1975.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 Fishman, Robert M. 1990.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Return of Democracy in Spa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lorida, Richard, and Martin Kenney. 1991. "Transplanted Organizations: The Transfer of Japanes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81–98.
- Foweraker, Joe. 1989. *Making Democracy in Sp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nzosi, Roberto. 1987. "The Press as a Source of Socio-Historical Data", *Historical Methods*, 20, 1, Winter, 5–16.
1990. "Strategies for the Prevention,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of Measurement Error in Data Collected from Textual Source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8 (4), May, 442–72.
1995. *The Puzzle of Strikes: Clas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Postwar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en, Jeffrey. 1987. *Banking on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Fröbel, Folker, Jürgen Heinrich, and Otto Kreye.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reffi, Gary. 1994.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In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eds.,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pp. 95–122. Westport, CT: Praeger.
- Giddens, Anthony. 1987.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y, Ian. 1978. "The Demise of the Product Cycl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y."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Spring, 90–97.
- Gill, Stephen, and James H. Mittleman, eds., 1997.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ls, Barry, and Andre G. Frank. 1992. "World System Cycles, Crises, and Hegemonic Shifts, 1700 BC to 1700 AD."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5 (4), 621–87.
- Godfrey, Walter. 1986. *Global Unemployment: The New Challenge to Economic Theory*.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Goldfield, Michael. 1987. *The Declin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stone, Jack A. 1991.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rdon, David M. 1996. *Fat and Mean: The Corporate Squeeze of Working Americans and the Myth of Managerial "Downsizing."* New York: Martin Kessler Books.
- Gordon, David M.,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enhouse, Stephen. 2000. "Low-Paid Jobs Lead Advance in Employmen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 Greider, William. 1998. *Fortress America: The American Milita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eac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The Battle Beyond Seattle," *The Nation*, December 27, pp. 5–6.
2001. "It's Time to Ask 'Borderless' Corporations: Which Side Are You On?" *The Nation*, October 26.
- Griffin, Larry. 1992.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 (4), May, 403–27.
- Griffin, Larry J., Holly J. McCammon, and Christopher Botsko. 1990. "The 'Unmaking' of a Movement? The Crisis of US Trade Un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aureen Hallinan, David Klein, and Jennifer Glass, eds., *Change in Societal Institutions*, pp. 169–94. New York: Plenum Press.
- Grosfoguel, Ramón. 1996. "From Cepalismo to Neoliberalism: A World-System Approach to Conceptual Shifts in Latin America."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9 (2), 131–54.
- Gwynne, Robert. 1991. "New Horizons? The Third World Motor Vehicle Industry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In C. M. Law, ed.,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pp. 61–87. London: Routledge.
- Hammel, E. A. 1980.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 (2), April, 145–55.
- Harazti, Miklos. 1977. *Workers in a Workers' Sta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Nigel. 1987.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Decline of an Ideolog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 Harrison, Bennett. 1997. *Lean and Mean: Why Large Corporations Will Continue to Dominate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artwell, R. M. 1973. "The Service Revolution: The Growth of Services in Modern Economy."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p. 359–96.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Rethinking Marxism*, 8 (4), Winter, 1-17.
2000.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Harwit, Eric. 1995.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Polic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rmonk, NY: M. E. Sharpe.
- Haupt, Georges. 1972.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eld, Davi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xter, J. H. 1979. *On Histori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bbs, Douglas A., Jr. 1978.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ong-Run Trends in Strike Activ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 (2), April, 153-75.
-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How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was Ex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mments." In Peter A. Hall, 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p. 347-5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sohn, Philip. 1997. "South Africa: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homas A. Kochan et al., eds., *After Lean Production*, pp. 231-5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ric.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Vintage.
- Honig, Emily. 1986.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ogvelt, Ankie. 1997.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opkins, Terence K. 1982a. "World-Systems Analysis: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erence K.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Associates. *World 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p. 145-5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1982b. "The Stud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 T. K. Hopkins, I. Wallerstein and Associate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p. 9-38. Beverly Hills: Sage.
- Humphrey, John. 1982. *Capitalist Control and Workers' Struggle in the Brazilian Auto Indust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conomic Crisis and Stability of Employment in the Brazilian Motor Industry." In W. Brierley, ed., *Trade Union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80's*, pp. 119-31. Gower: Aldershot.
1993. "Japanese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Brazil."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0 (1), October, 92-114.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yman, Richard. 1972. *Strikes*.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92. "Trade Unions and the Disaggreg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M. Regini, ed., *The Future of Labour Movements*, pp. 150–68. Newbury Park, CA: Sage.
- Ikenberry, John G. 1989.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4 (3), 375–400.
- Imig, Doug, and Sidney Tarrow. 2000. "Political Contention in a Europeanising Polit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3 (4), 73–93.
- Ingham, Geoffrey. 1994. "States and Markets in the Production of World Money: Sterling and the Dollar." In S. Corbridge, R. Martin, and N. Thrift, eds., *Money, Power, and Space*, 29–48. Oxford: Blackwell.
- Irons, Janet. 2000. *Testing the New Deal: The General Textile Strike of 1934 in the American South*.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Ishida, Mitsuo 1997. "Japan: Beyond the Model for Lean Production." In T. A. Kochan, R. D. Lansbury and J. P. MacDuffie, eds., *Beyond Lean Production*, pp. 45–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Michael. 1987. *Strik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James, Daniel. 1981. "Rationalisation and Working Class Response: The Context and Limits of Factory Floor Activity in Argentin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3 (2), 375–402.
- Jelin, Elisabeth. 1979. "Labour Conflicts under the Second Peronist Regime, Argentina, 1973–76."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0 (2), 233–57.
- Jenkins, J. Craig, and Kevin Leicht. 1997. "Class Analysi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In John R. Hall, ed., *Reworking Class*, pp. 369–9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J. Craig and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s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LII (2), 249–67.
- Johnson, Richard. 1997. "GM and Korea Dance a Two-Step in World's Automotive Ballroom," *Automotive News*, June 9, p. 14.
- Kaiser, D. E. 1983.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442–74.
- Kalb, Don, 2000. "Class (in Place) Without Capitalism (in Space)?"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57, Spring, 31–9.
- Kane, N. F. 1988. *Textiles in Transition: Technology, Wages and Industry Relocation in the U.S. Textile Industry, 1880–1930*.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Kapstein, Ethan B. 1996. "Worker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75 (3), May/June, 16–37.
1999. *Sharing the Wealth: Workers and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Katznelson, Ira, and Aristide Zolberg. 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argaret. 1989. "The New Unionism in the Brazilian Transition." In Alfred Stepan, ed., *Democratizing Brazil: Problems of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Chapter 8, pp. 252–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argaret E.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ndall, W. 1975. *The Labour Movement in Europe*. London: Allen Lane.
- Kerr, Clark, and Abraham Siegel. 1964.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Clark Kerr,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pp. 105–47.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Keynes, John Maynard. [1920] 1971.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Khor, Martin. 1999. "Take Care, the WTO Majority Is Tired of Being Manipulat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1, p. 4.
- Kirk, Donald. 1994. *Korean Dynasty: Hyundai and Chung Ju Yung*. New York: M. E. Sharpe.
- Knowles, K. G. J. C. 1952. *Strikes: A Study of Industrial Conflic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Kochan, Thomas A., Russell D. Lansbury, and John Paul MacDuffie. 1997. *After Lean Production: Evolving Employment Practices in the World Auto Indust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cka, Jürgen. 1986. "Problems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The Early Years, 1800–1875."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p. 279–35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o, Hagen. 1993. "The State, *Minjung*,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South Korea." In H. Koo,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Korea*, pp. 131–6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opmans, Ruud. 1993.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Waves: West Germany, 1965 to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LVIII (5), October, 637–58.
- Korpi, Walter, and Michael Shalev. 1979. "Strikes,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2), June, 164–87.
- Korzeniewicz, Roberto P. 1989. "Labor Unrest in Argentina, 1887–1907."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4 (3), 71–98.
- Korzeniewicz, Roberto P., and Timothy P. Moran. 1997. "World Economic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65–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4), 1000–39.
- Kowalewski, David. 1993. "Ballots and Bullets: Election Riots in the Periphery, 1874–1985."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4 (3), April, 518–40.
- Krishnan, R. 1996. "December 1995: The First Revolt Against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48 (1), May, 1–22.
- Kutalik, Chris. 2002. "September 11: One Year Later, U.S. Workers Still Feel Fallout," *Labor Notes* (Detroit), #282, September, pp. 1, 14.
- Kutscher, R. E., and J. A. Mark. 1983. "The Service Producing Sector: Some Common Perceptions Reviewed," *Monthly Labor Review*, April, pp. 21–24.
- Labor Notes. 2001. "AFL-CIO Pulls Out of Mobilization for Global Justice." *Labor Notes*, 271, October, p. 3.

- LaFeber, Walter. 1963.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ndes, David.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queur, Walter. 1968.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III, 501–7.
- Laux, James M. 1992. *The European Automobile Industr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 Lawn, Martin. 1987. "What Is the Teacher's Job." In Martin Lawn and Gerald Grace, eds., *Teach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Work*, pp. 50–64.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 Lawn, Martin and Jenny Ozga. 1988. "The Educational Worker? A Reassessment of Teachers." In Jenny Ozga, ed., *Schoolwork: Interpreting the Labour Process of Teaching*, pp. 81–98.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azonick, William. 1990.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bow, R. N. 1981. *Between Peace an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egters, Nettie. 1993. "Teachers as Workers in the World Syst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Baltimore, November 4–7.
- Lenin, Vladimir. [1916] 1971.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pp. 169–26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Levi, Margaret, and David Olson. 2000. "The Battles of Seattle." *Politics and Society*, 28 (3), September, 309–29.
- Levine, S. B. 1958.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Postwar Japa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evy, Jack. 1989. "The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A Critique." In M.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pp. 258–88.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98. "The Causes of War and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 139–65.
- Lewis, Jon, and Estelle Randall. 1986. "The State of the Union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5, May, 68–77.
- Lim, Linda Y. C. 1990. "Women's Work in Export Factories: The Politics of a Cause." In Irene Tinker, e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Development*, pp. 101–1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tvak, Lawrence, Robert De Grasse, and Kathleen McTigue. 1978. *South Africa: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parthei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 Lohr, Steve. 2002. "I. B. M. Opening a \$2.5 Billion Specialized Chip Plant,"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C1.
- Loth, Wilfried. 1988.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1941–1955*. London: Routledge.
- MacEwan, Arthur, and William K. Tabb. eds. 1989. *In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chado, Kit G. 1992. "ASEAN State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Japanese Regional Production Strategies: The Case of Malaysia's Motor Vehicle Industry." In

- C. Clark and S. Chan, eds., *The Evolving Pacific Basi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69–202.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Maier, Charles. 1978.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In P.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pp. 23–4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 "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86, 327–52.
1987. *In Search of Stability: Explorations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mdani, Mahmood. 1996.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nn, Michael. 1988.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ee, Johann. 1985. "The Emergence, Struggles and Achievements of Black Trade Unions in South Africa from 1973 to 1984." *Labour, Capital and Society* 18 (2), November 278–303.
- Markoff, John. 1996. *Waves of Democracy: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Marshall, Neill, and Peter Wood. 1995. *Services and Space: Key Aspects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Martin, Benjamin, 1990. *The Agony of Modernization: Labo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pa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959. *Capital, Vol. 1*.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67.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yer, Arno J. 1967. "Domestic Causes and Purposes of War in Europe, 1870–1956." In L. Krieger and F. Stern, ed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pp. 286–300. New York: Doubleday.
1977. "Internal Crisis and War Since 1870." In C. L. Bertrand, ed., *Revolutionary Situations in Europe, 1917–1922*, pp. 201–33. Montreal: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and the Great War*. New York: Pantheon.
- Mazur, Jay. 2000. "Labor's New Inter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79–93.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 Dieter Rucht. 1993. "The Cross-National Diffusion of Movement Idea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 July, 56–74.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996. "Introduction: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Framing Processes – 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In D. McAdam, J. D. McCarthy, and M.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pp. 1–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ormick, Thomas J. 1989. *America's Half-Centur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cMichael, Philip. 1990. "Incorporating Comparison within a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 Alternativ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385–97.
1996.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McNeill, William. 1982.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 July, 144–81.
- Michaels, Daniel. 2001. "Pilot Alliances Spook Airlines: Union Solidarity Isn't the Synergy the Carriers Had in Mi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June 1–2, pp. 23, 28.
- Midlarsky, Manus I., ed. 1990. "Big Wars, Little Wars – A Single Theory?"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6 (3), 157–224.
- Milanovic, Branko. 1999.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244*.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Milkman, Ruth. 1991. *Japan's California Factories: Labor Relations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os Angeles: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UCLA.
- Mittleman, James H. 1996.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Mjøsset, Lars. 1990. "The Turn of Two Centuries: A Comparison of British and U.S. Hegemonies." In D. P. Rapkin, ed., *World Leadership and Hegemony*, pp. 21–47.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Montgomery, David. 1979.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dy, Kim. 1988. *An Injury to Al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Unionism*. London: Verso.
1997.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London: Verso.
1999. "On the Eve of Seattle Trade Protests, Sweeney Endorses Clinton's Trade Agenda," *Labor Notes* (Detroit), #249, December, pp. 1, 14.
- Moreira Alves, Maria Helena. 1989. "Trade Unions in Brazil: A Search for Autonomy and Organization." In E. C. Epstein, ed., *Labor Autonom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pp. 39–72. Boston: Unwin Hyman.
- Morris, Morris David. 1965. *The Emergence of an Industrial Labor Force in India: A Study of the Bombay Cotton Mills, 1854–194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uto, Ichiyo. 1997. "The Birth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1970s." In Joe Moore, ed., *The Other Japan: Conflict, Compromise and Resistance Since 1945*, pp. 147-71. Armonk, NY: M. E. Sharpe.
- Myers III, Desaix. 1980. *US Business in South Africa: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oral Issu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Naroll, Raoul. 1970. "Galton's Problem." In Raoul Naroll and Ronald Cohen, eds., *A Handbook of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Chapter 47, pp. 974-89. Garden City, NY: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 Nation, The. 1999. "Democracy Bites the WTO" (Editorial), *The Nation*, December 27, pp. 3-4.
- Needleman, Ruth. 1998. "Building Relationships for the Long Haul: Unions and Community-Based Groups Working Together to Organize Low-Wage Workers." In K. Bronfenbrenner, S. Friedman, R. W. Hurd, R. A. Oswald, and R. L. Seeber, eds., *Organizing to Win*, Chapter 4, pp. 71-86.
- Ness, Immanuel. 1998. "Organizing Immigrant Communities: UNITE's Workers Center Strategy." In K. Bronfenbrenner et al., eds., *Organizing to Win*, Chapter 5, pp. 87-101.
- Neumann, Franz. 1942. *Beb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New York Times. 1995. "Layoffs at G.M. in Brazil,"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p. D-8.
1997. "Strike at G.M. Factory Halts Work at 3 Pla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5.
- Nkrumah, Kwame. 1965. *Autobiography*. New York: Nelson.
- Obrery, Ingrid. 1989. "COSATU Congress: Unity in Diversity." *Work in Progress* (South Africa), 60, August/September, 34-9.
- Obrery, Ingrid and Sharren Singh. 1988. "A Review of 1988: Labour." *Work in Progress* (South Africa), 56/57, November-December, 36-42.
- O'Brien, Robert. 2000.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Labour." In R. O'Brien, A. M. Goetz, J. A. Scholte, and M. Williams,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Chapter 3, pp. 67-1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ECD. 1981.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ecent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rends*. Paris: OECD.
- Offer, A. 1985. "The Working Classes, British Naval Pl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Past and Present*, 107, 204-26.
- Okayama, Reiko. 1987.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1945-70: The Case of Toyota." In S. Tolliday and J. Zeitlin, eds.,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Its Workers: Between Fordism and Flexibility*, pp. 168-8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Ong, Aihwa.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O'Rourke Kevin H.,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Ozawa, Terutomo. 1979. *Multinationalism, Japanese Sty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zga, Jenny. 1988a. "Introduction: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and Work." In Jenny Ozga, ed., *Schoolwork: Interpreting the Labour Process of Teaching*, pp. ix–xv.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Ozga, Jenny, ed., 1988b. *Schoolwork: Interpreting the Labour Process of Teaching*.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aige, Jeffery M.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 Pan, Philip P. 2002. "'High Tid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1, p. A1.
- Panitch, Leo. 1977.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sm in Liber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0 (1), April, 61–90.
1980. "Recent theorizations of corporatism: reflections on a growth indust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2), June, 159–87.
1981. "Trade Unions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125, January/February, 21–43.
2000. "Reflections on Strategy for Labour."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Working Classes, Global Realities)*, pp. 367–92. London: Merlin Press.
- Park, Y., and K. Anderson. 1992.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i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Kym Anderson, ed., *New Silk Roads: East Asia and World Textile Markets*, pp. 15–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rlmutter, Ted. 1991. "Comparing Fordist Cities: The Logic of Urban Crisis and Union Response in Turin 1950–1975, and Detroit 1915–1945."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Perrone, Luca. 1984. "Positional Power, Strikes and Wag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LIX (3), June, 412–26.
- Phelps Brown, Henry, and M. H. Browne. 1968. *A Century of Pay*. New York: Macmillan.
- Phillips, Anne, and Barbara Taylor. 1980. "Sex and Skill: Notes towards a Feminist Economics." *Feminist Review*, 6, 57–79.
- Piore, Michael J. 1979.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tcher, Brian L., Robert L. Hamblin, and Jerry L. L. Miller. 1978.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 February, 23–35.
- Piven, Frances Fox, ed., 1992. *Labor Parti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1995. "Is It Global Economics or Neo-Laissez-Faire?" *New Left Review*, 213, 107–14.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Normalizing Collective Protest." In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pp. 301–2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ower Repertoires and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28 (3), September, 413–30.

2001. "Disrupting Cyberspace: A New Frontier for Labor Activism?" *New Labor Forum*, 8, Spring–Summer, 91–4.
- Podobnik, Bruce. 2000. *Global Energy Shifts: Future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hD Thesi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 Polanyi, Karl. [1944]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 Pollack, Andrew. 1993. "Japanese Starting to Link Pay to Performance, Not Tenur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p. A1.
- Post, Ken. 1988. "The Working Class in North Viet Nam and the Launching of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3 (1–2), 141–55.
- Quadagno, Jill, and Stan J. Knapp. 1992. "Have Historical Sociologists Forsaken Theory: Thoughts on the History/Theory Relationship."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 (4), May, 481–507.
- Radosh, Ronald. 1969. *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eyes, Teófilo. 2001. "Will the Drive to War Kill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Labor Notes*, 271, October, 1–2.
- Riddle, Dorothy I. 1986. *Service-Led Growth: 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 Ritter, G. 1970. *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 The Problems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 Vol. 2*.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 Roberts, Bryan R. 1995. *The Making of Citizens: Cities of Peasants Revisited*. London: Arnold.
- Robinson, William I., and Jerry Harris. 2000. "Towards a Global Ruling Class?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cience and Society*, 64 (1), 11–54.
- Rodgers, Ronald A. 1996.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Auto Industry: The Implications of Industrial Sector Requirements and Societal Effects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F. C. Deyo, ed., *Social Re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 Automobile Industry*, pp. 87–13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odríguez-Pose, Andrés, and Glaucio Arbix. 2001. "Strategies of Waste: Bidding Wars in the Brazilian Automobile Sec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1), 134–54.
- Rodrik, Dani.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Roediger, David R. 1991.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London: Verso.
- Rollier, Matteo. 1986. "Change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at Fiat." In O. Jacobi et al., eds., *Technological Change, Rationalis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pp. 116–33. London: Croom Helm.
- Rose, Sonya O. 1992. *Limited Livelihoods: Gender and Class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lass Formation and the Quintessential Worker." Chapter 4 in John R. Hall, ed., *Reworking Class*. Pp. 133–66.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osecrance, R. 1963. *Action and Re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Little, Brown.
- Rosenberg, Hans. 1943.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1873–1896 in Central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3, 58–73.

- Ross, Arthur M., and Paul T. Hartman. 1960. *Changing Pattern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Wiley.
- Ross, Robert J. S. 1982. "Capital Mobility, Branch Plant Location and Class Pow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 Ross, Robert J. S., and Kent Trachte. 1990. *Global Capitalism: The New Leviath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ostow, Walter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benstein, James M. 1992. *The Changing US Auto Industry: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Ruggie, John G.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2), 379-415.
- Rupert, Mark. 1995. *Producing Hegemony: 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chiko, Takahashi. 1986. "Weary Wives - A Glance into Japanese Homes." *AMPO Japan-Asia Quarterly Review*, 18 (2-3), 65-9.
- Sako, Mari. 1997. "Introduction: Forces for Homogene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Japanese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In M. Sako and H. Sato, eds., *Japanese Labour and Management in Transition*, pp. 1-24. London: Routledge.
- Sarkar, Mahua. 1993. "Labor Protest and Capital Relocation in a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Textil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World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Meeting, Baltimore, November.
- Sassen, Saskia.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a. "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David A. Smith, Dorothy J. Solinger, and Steven C. Topik, eds., *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pp. 158-171. London: Routledge.
- 1999b. "A New Emergent Hegemonic Structure?"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3, 277-289.
2000.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seco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xton, Alexander. 1971.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oenberger, Erica. 1997. *The Cultural Crisis of the Fir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Schumpeter, Joseph. 1954.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 Schurmann, Franz. 1974.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ntheon.
- Scott, Jame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repanti, Ernesto. 1987. "Long Cycles of Strike Activ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XXV (1), March, 99-124.
- Sedgwick, David. 1997. "VW, Suppliers Work Side by Side, Seek Big Gains in Productivity, at 'Factory of the Future' in Brazil," *Automotive News*, June 9, p. 3.
- Seidman, Ann, and Neva Seidman. 1977. *South Africa and U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 Seidman, Gay W.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mmel, Bernard. 1960.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well, Jr., William H. 1986.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pp. 45-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Toward a Post-materialist Rhetoric for Labor History". In Lenard R. Berlanstein, ed., *Rethinking Labor History*, pp. 15-3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haiken, Harley. 1995. "Lean Production in a Mexican Context." In S. Babson, ed., *Lean Work: Empowerment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pp. 247-59.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halev, Michael. 1978. "Lies, Damned Lies and Strike Statistics: The Measurement of Trends in Industrial Conflict." In C. Crouch and A.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vol. 1, pp.1-19.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2. "The Resurgence of Labor Quiescence." In Marino Regini, ed., *The Future of Labour Movements*, pp. 102-32. London: Sage.
- Shefter, Martin. 1986.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p. 197-2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orter, Edward, and Charles Tilly.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 Beverly J. 1990. "The Contradictions of Semiperipheral Success: The Case of Israel." In William G. Martin, ed., *Semiperipheral States in the World-Economy*, pp. 161-181. New York: Greenwood.
1992. *Labor Unres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PhD Dissertation, SUNY-Binghamton.
- 1995a. "Labor Unrest and World-Systems Analysis: Premises,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8 (1), Winter, 7-34.
- 1995b. "World-Scale Patterns of Labor-Capital Conflict: Labor Unrest, Long Waves, and Cycles of World Hegemon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8 (1), Winter, 155-92.
1997. "Turning Points of Workers' Militancy in the World Automobile Industry, 1930s-1990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6, 43-71.

- Silver, Beverly J. and Giovanni Arrighi. 2000. "Workers North and South."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Theme: Working Classes: Global Realities), pp. 53–76. London: Merlin Press.
- Silver, Beverly J. and Eric Slater. 1999. "The Social Origins of World Hegemonies." In G. Arrighi and B. J.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hapter 3, pp. 151–21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ilver, Beverly J., Giovanni Arrighi, and Melvyn Dubofsky, eds., 1995. "Labor Un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70–1990." A special issue of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8 (1), Winter.
- Singer, Daniel. 1982. *The Road to Gdansk*.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Singleton, John. 1990. "Showing the White Flag: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32 (4), 129–49.
1997. *The World Textile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aughter, Jane, and Kim Moody. 2001. "American History 101: War Fever Allows Government to Clamp Down on Unions," *Labor Notes*, 271, October, 3.
- Smith, William C., and Roberto Patricio Korzeniewicz. 1997.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W. C. Smith and R. P. Korzeniewicz, eds., *Politics,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Latin America*, pp. 1–20.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Smitka, Michael J. 1991. *Competitive Ties: Subcontracting in the Japa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David, and William R. Kelly. 1977. "Conflict Intensity, Media Sensitivity, and the Validity of Newspaper Da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LII (1), February, 104–23.
- Snyder, David, and Charles Tilly. 1972.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XXXVII (5), October, 520–32.
- Solinger, Dorothy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WTO and China's Work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December 12.
- Somers, Margaret. 1995. "The 'Misteries' of Property: Relationality, Rural-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unity in Chartist Narratives of Political Rights." In John Brewer and Susan Staves, eds., *Early Modern Conceptions of Property*, pp. 62–92. London: Routledge.
- Sonn, Hochul. 1997. "The 'Late Blooming' of the South Korean Labor Movement." *Monthly Review*, 49 (3), 117–29.
- Southall, Roger. 1985.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Industrial Unionism in the South African Motor Industry." *Labour, Capital and Society* 18 (2), November, 304–42.
- Stark, David. 1986. "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 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 August, 492–504.
- Stavrianos, L. S. 1981.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 Steven, Rob. 1997.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Thailand,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 Decade of JASEAN." In Joe Moore, ed., *The Other Japan: Conflict, Compromise, and Resistance Since 1945*, pp. 199–245. Armonk, NY: M. E. Sharpe. New edition.
- Stiglitz, Joseph E. 2001. "Foreword."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second edition), pp. vii–xvii. Boston: Beacon Press.
- Stohl, Michael. 1980. "The Nexus of Civi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ed Robert Gurr,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97–33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ugimoto, Yoshio. 1978a. "Measurement of Popular Disturb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II (3), September, 284–97.
- 1978b.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Post-Occupation Japan (1952–196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VII (2), February, 273–91.
- Sumiko, Takagi. 1986. "Women on the Labor Front." *AMPO: Japan-Asia Quarterly Review*, 18 (2–3), 48–54.
- Tabb, William. 1997. "Globalization Is an Issue, the Power of Capital Is the Issue." *Monthly Review*, 49 (2), 20–30.
- Tabili, Laura. 1994. *"We Ask for British Justice": Workers and Racial Difference in Late Imperial Brita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rrow, Sidney. 1989.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ishnets, Internets and Catnet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Michael P. Hanagan, Leslie P. Moch, and Wayne te Brake, eds., *Challenging Authority*, pp. 228–4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aylor, A. J. P. 1954.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M. 1986. "The product-cycle model: a critiqu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8, 751–61.
- Therborn, Goran.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103, 3–41.
- Thompson, E.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2, May, 146–64.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81. "Computing History." In C. Tilly, ed., *As History Meets Sociology*, pp. 53–8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9. "Introduction: The Effects of Short-Term Variation." In L. Haimson and C. Tilly, eds., *Strikes, Wars, and Rev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433–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5. "Globalization Threatens Labor's Right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47, 1-23.
-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olliday, Steven. 1987. "Management and Labour in Britain, 1896-1939." In S. Tolliday and J. Zeitlin, eds.,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Its Workers: Between Fordism and Flexibility*, pp. 29-5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Torigian, Michael. 1999.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Paris 1936, Flint 1937."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1 (2), 324-47.
- Traub, James. 2000. "This Campus Is Being Simulate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19, 88-93 ff.
- Treece, James B. 1997a. "GM Kicks Off Major Push in China," *Automotive News*, June 16, pp. 1 & 34.
- 1997b. "Warning on Overcapacity Has Korean Industry in an Uproar," *Automotive News*, June 30, p. 4.
- 1997c. "China Takes Hard Road to a Market Economy," *Automotive News*, July 14, p. 1.
- Tronti, Mario. 1971. *Operai e Capitale*. Turin: Einaudi.
- Truchil, Barry E. 1988. *Capital-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Textile Industry*. New York: Praeger.
- Tsurumi, Patricia E. 1990. *Factory Girls: Women in the Tbread Mills of Meiji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Uchitelle, Louis, and N. R. Kleinfeld. 1996. "The Downsizing of America: On the Battlefields of Business, Millions of Casualt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 p. A1.
- UNCTAD. 2000.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DP. 199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ESCO (various). *Statistical Yearbook*. Paris: UNESCO.
- Van Onselen, Charles. 1976. *Cbizaro: African Mine Labour in Southern Rhodesia, 1900-1933*. London: Pluto Press.
- Vernon, Raymond.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2), 190-207.
- Vogel, Ezra F., and David L. Lindauer. 1997. "Toward a Social Compact for South Korean Labor." In D. L. Lindauer, J. Kim, J. Lee, H. Kim, J. Son, and E. Vogel, eds., *The Strains of Economic Growth: Labor Unrest and Social Dissatisfaction in Korea*, pp. 93-12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olpato, Giuseppe. 1987.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ransition: Product Market Changes and Firm Strategie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S. Tolliday and J. Zeitlin, eds.,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Its Workers: Between Fordism and Flexibility*, pp. 193-22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dinger, Roger, Chris Erickson, Ruth Milkman, Daniel J. B. Mitchell, Abel Valenzuela, Kent Wong, and Maurice Zeitlin. 1998. "Helots No More:

- A Case Study of the Justice for Janitors Campaign in Los Angeles." In K. Bronfenbrenner, S. Friedman, R. W. Hurd, R. A. Oswald, and R. L. Seeber, eds., *Organizing to Win*, Chapter 6, pp. 102–19.
- Wall Street Journal. 2000. "Work Week: A Special News Report About Life on the Job and Trends Taking Shape Ther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7, p. 1.
- Wallace, Michael, Larry Griffin, and Beth Rubin. 1989. "The Positional Power of American Labor, 1963–1977."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2), 197–214.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esponse: Declining States, Declining Right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47, 24–7.
- Walton, John. 1984. *Reluctant Rebel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volu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on, John and Ragin, Charles. 1990. "Global and National Sources of Political Protest: Third World Responses to the Debt Cri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December, 876–90.
- Weinraub, Bernard. 2000. "Strike Fears Grip Hollywood as Unions Flex New Muscl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pp. A1, A25.
- Western, Bruce. 199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ing-Class Disorganization: Union Decline in Eightee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2), April, 179–201.
- Williams, William A. 1969.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Growth and Shaping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 Marketplace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Wolf, Eric.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Wood, Phillip J. 1991. "Determinants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North American Periphery." In Jerry Leiter, Michael D. Schulman and Rhonda Zingraff, eds., *Hanging by a Thread: Social Change in Southern Textiles*, pp. 58–78. Ithaca, NY: ILR Press.
- Woods, Ellen Meiksens, Peter Meiksens, and Michael Yates, eds., 1998. *Rising from the Ashes? Labor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World Bank. 1984. *World Tables*. Vols. 1 & 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D-RO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right, Erik O.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4), January, 957–1002.
- Zhang, Jikang. 1999.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hinese Market – 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 (Beijing), vol. 4 (in Chinese).
- Zolberg, Aristide. 1995. "Response: Working-Class Dissolu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47, 28–38.